

以社會運動學視角

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與滅亡

詹姆斯·詹姆斯·D·萊特 著

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與滅亡
以社會運動學視角

詹姆斯·詹姆斯·D·萊特

著

世界華語出版社



轟轟烈烈的文革群眾運動以失敗而告終，群眾運動是被自己的瘋狂打敗的。文革後的多次社會運動，依然繼續在相同範疇循環。被重新研究群眾運動史，使我們不能正確地理解文革群眾運動與其他中國社會運動之間的聯系。認真地總結文革中群眾運動失敗的教訓，對於未來的中國社會運動不無益處。本書為中國未來的社會運動提供了啟示和借鑒。

世界華語出版社

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與滅亡 ——以社會運動學視角

喬晞華、James D Wright 著

目 錄

序言

省思，從文革群眾運動的失敗開始

緒論

第一篇 典型省的群眾運動

第一章 北京

- 1.1 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出生地
- 1.2 清華大學：武鬥終止地
- 1.3 “天派”與“地派”
- 1.4 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誕生地
- 1.5 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暴力發源地

第二章 上海

- 2.1 上海“工總司”的兩位核心人物
- 2.2 上海“工總司”的成立和“安亭事件”
- 2.3 一月奪權
- 2.4 “工總司”攻打“上柴聯司”

第三章 天津

- 3.1 天津的文革開端：16中事件
- 3.2 “三輪二社事件”
- 3.3 打抱不平的造反者
- 3.4 大聯合奪權
- 3.5 “二·二一事件”

第四章 湖南、湖北

- 4.1 湖南文革運動的興起
- 4.1 造反派的第一次分裂
- 4.3 造反派的第二次分裂
- 4.4 “省無聯”及其思潮
- 4.5 實用主義的造反
- 4.6 道縣大屠殺
- 4.7 造反派的第二次風光
- 4.8 造反運動的沒落

第五章 江蘇

- 5.1 南京大學文革運動的興起
- 5.2 南京師範學院附中文革運動的興起
- 5.3 南京長江廠文革運動的興起
- 5.4 轟動南京城的“王金事件”

- 5.5 一.二六奪權
- 5.6 “清查五.一六”
- 5.7 第二次奪權
- 5.8 造反派捐棄前嫌最後一搏

第六章 黑龍江

- 6.1 範正美的崛起
- 6.2 潘複生的崛起
- 6.3 分裂和內戰

第七章 內蒙古

- 7.1 文革前的內蒙
- 7.2 高樹華的崛起
- 7.3 內蒙軍人的抗命
- 7.4 “內人黨”事件

第八章 西藏

- 8.1 西藏群眾運動的興起
- 8.2 武鬥的興起
- 8.3 “六.七大昭寺事件”
- 8.4 “邊壩事件”和“尼木事件”
- 8.5 “紅成事件”

第九章 雲南

- 9.1 雲南造反派的興起
- 9.2 造反派的分裂
- 9.3 軍管會支左和幹部站邊
- 9.4 “滇西挺進縱隊事件”
- 9.5 劃線站隊運動
- 9.6 雲南知青大逃亡

第十章 青海

- 10.1 青海文革的開端：“六.三社論事件”
- 10.2 “二.二三屠殺事件”
- 10.3 事件的結局

第十一章 新疆

- 11.1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 11.2 新疆的第一張大字報
- 11.3 新疆的“九.三事件”
- 11.4 新疆造反領袖吳巨輪
- 11.5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慘案”
- 11.6 文革中新疆的民族問題

第十二章 解放軍

- 12.1 空軍高層的奪權鬥爭
- 12.2 海軍高層的鬥爭
- 12.3 總參謀部“八·二五事件”
- 12.4 南京軍事學院的文革
- 12.5 南京軍區內的文革
- 12.6 “五·一三沖擊三軍演出事件”

第二篇 群眾運動的興亡

第十三章 代表性問題

- 13.1 抽樣
- 13.2 省市自治區的分類
- 13.3 省市自治區分類的意義

第十四章 社會運動學

- 14.1 社會運動的定義和分類
- 14.2 社會運動學的第一代理論
- 14.3 社會運動學的第二代理論
- 14.4 社會運動學的第三代理論

第十五章 毛的動員

- 15.1 毛為什麼發動文革
- 15.2 毛的黨內思想動員
- 15.3 毛的黨內組織動員
- 15.4 毛的黨外思想動員
- 15.5 毛的黨外組織動員

第十六章 民眾的動員

- 16.1 關於參加群眾組織的問卷調查
- 16.2 數據
- 16.3 參加群眾組織的比例
- 16.4 參加群眾組織的原因
- 16.5 民眾參加群眾組織原因的分析
- 16.6 民眾的動員

第十七章 省級群眾組織的分類

- 17.1 省級群眾組織的派別
- 17.2 分類指標和分類
- 17.3 基於派別對立的省市自治區分類

第十八章 群眾組織的派別

- 18.1 家庭出身和派別間的四種因果關係

- 18.2 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省的情況
- 18.3 造反派內鬥省的情況
- 18.4 清華大學的派別與家庭出身分析
- 18.5 運動初期保守派的流向
- 18.6 廣州中學紅衛兵的計算機模擬分析
- 18.7 階級分裂與派別選擇的關係
- 18.8 分派的原因
- 18.10 群眾運動的組織形式
- 第十九章 群眾運動的自毀
 - 19.1 文革的武鬥
 - 19.2 文革中獨一無二的“海戰”
 - 19.3 武鬥的戰場紀律
 - 19.4 一個葬送一線希望的爆炸
 - 19.5 群眾運動的終結
 - 19.6 群眾運動內訌自毀的原因和教訓
- 第二十章 結語：中國未來社會運動展望

附錄

- 附錄1 樣本量的計算
- 附錄2 各省分類的計算

- 附錄3 統計學中的聚類分析法（CA）
- 附錄4 關於民眾在文革中參加群眾組織情況的問卷調查
- 附錄5 對數回歸模型的有關問題
- 附錄6 省級大派群眾組織的分類計算
- 附錄7 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中派別不明者的分析
- 附錄8 民眾參加群眾組織比例的調整計算
- 附錄9 省級群眾組織簡況

參考文獻

序言

十年文革等同於十年動亂，十年夢魘。可是發動者還是萬眾景仰的“英明領袖”；黨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的黨；領導寫作“五.一六”通知，舉手贊同發動文革並發誓永不翻案的領導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還要用文革方式加害別人。一個國家與一個黨的罪錯，就這樣利用政治“替罪羊”的審判方式，輕而易舉地算在幾個人和紅衛兵群眾的身上了。難道這就是官方刻意營造的一種曆史記憶？這樣的曆史距離客觀公正又有多遠？又怎麼可能正確地總結曆史教訓？現在不是天天說要尊重曆史、還原曆史嗎？曆史本身，尤其是億萬民眾所親曆過的文革史，不應該是一個任人宰割的羔羊。我相信，通過眾多文革親曆者的回憶及海內外學者的不斷挖掘、研究，文革曆史的真相定會逐漸顯現出本來的面貌。

美國知名社會學教授 James Wright 和華人學者喬晞華博士合作，運用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和闡述文革，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聶元梓

2017年1月18日

（聶元梓，生於1921年，1938年加入共產黨，1963年調入北京大學，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文革中，聶元梓因張貼被譽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而聲名大震，成為紅衛兵運動的第一號領袖。）

省思，從文革群眾運動的失敗開始

轟轟烈烈的文革群眾運動以失敗而告終。群眾運動是被自己的內訌打敗的。認真地總結文革中群眾運動失敗的教訓，對於未來的中國社會運動不無益處。被歪曲的文革群眾運動史，使我們不能正確地理解文革群眾運動與其他中國社會運動之間的聯系。文革後的多次社會運動，依然繼續在犯先驅們同樣的錯誤。我們希望本書能為中國未來的社會運動提供啟示和借鑒。

在本書的撰寫過程過，得到嚴家祺、宋永毅、徐友漁、胡平、周澤浩、何蜀等先生的熱心幫助和指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進行了關於文革中民眾參與群眾運動情況的問卷調查。得到啟之（吳迪）、閻淮、孫怒濤、王複興、譚加諾（阿陀）、王虹等先生，以及許多不知名的朋友的大力幫助。在此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特別要感謝的是北京大學友人王複興先生和清華大學友人孫怒濤先生。他們既是文革研究者又是文革親曆者，對我們研究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文革群眾運動給予了巨大的幫助和啟發。

王立嘉先生主動為我們的中文版進行了文字修改，使拙作增色不少，在此表示誠摯的感謝。

本書有中英文兩個版本。考慮到語言和讀者的差別，兩個版本略有差異。尤其是第一篇，為了適合西方讀者，英文版做了適當的簡化。

作者 於美國

2019年3月

緒論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一影響直到 50 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可以說，一個人要想了解今日的中國，就不能不了解文革。當年，文革使中國的經濟瀕於崩潰，陷入貧困落後的境地。今日的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巨頭之一，中國今日的成功之路是穿越文革而來的。

正如著名文革研究學者嚴家祺所說，文革還沒有成為曆史。文革之所以長期在國內外引起廣泛和持續的注意和討論，有四大原因：第一是這場所謂文化革命，既包含著無數苦難和血淚，也使當時成千上萬的青少年沉溺於摧毀舊秩序的狂歡中。時過 50 多年，當文革的苦難被淡忘後，參與全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串聯”的情景，革命樣板戲的聲音，還縈繞在當時的青少年、現在進入老年一代人的心頭。第二，這場所謂文化革命，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登峰造極後，在文革最後一年，爆發了一場與文革在政治上相反的運動——一場以悼念周恩來為名、實質上是抗議毛澤東專制獨裁的民主運動，這就是當代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天安門運動。這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引起廣泛注意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是中國曆史的轉折點。經歷文革苦難的中國，文革結束後發生了一場與文革在經濟上相反的運動，這就是鄧小平和充滿人性的兩位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推動的局部“非毛化”和改革開放。沒有文革就沒有改革開放。正是改革開放，把一個傳統的農業經濟中國，轉變為經濟現代化的中國。時隔半個多世紀，文革之所以沒有完全成為曆史，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非毛化”只做了一半，文革的舊賬沒有清算完。文革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從劉少奇、林彪、周恩來、江青到聶元梓、孫蓬一；一些重大事件，如《571 工程紀要》，還沒有得到實事求是的評價，毛澤東在文革中和文革前的罪行還沒有得到清算。而且，近幾年來，中國又出現了要給毛澤東文革翻案的苗頭，文革的幽靈又在中國上空徘徊。^[1]

本書是我們 2018 年出版的《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2]（譯為《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義》）一書的續集。在那本書中，我們對文革的暴力、定義和分期進行了討論。本書討論文革中的群眾運動，離不開這三個問題。文革的定義和分期一直存在著爭議。因對文革有不同的定義，相應地就有了不同的分期。在眾多派別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四個大派

別。它們可分為兩大陣營，即“十年陣營”和“三年陣營”。“十年陣營”中的第一派是“內亂說”。這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定的基調。為了維護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鄧小平主持審議並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決議》對文革的定義如下：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關於責任的問題，《決議》指出：對於文革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負有主要責任”。毛發動文革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思想的軌道。《決議》把文革分為三個時期：（1）從文革開始到九大；（2）九大到十大；（3）十大到1976年。第一階段中，幾乎所有的各級黨政機關失去了權力，由此產生動亂，不得不依靠軍隊來維持秩序。九大的召開，加強了林彪和“四人幫”在黨內的地位。第二階段中，林彪集團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權力。這一陰謀被粉碎。周在毛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各方面有所好轉。十大的路線繼續了九大的錯誤，同時加強了“四人幫”的實力。第三階段中，“四人幫”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把矛頭指向周。因為周身體的原因，在毛的支持下，鄧取代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局勢有了明顯的好轉。但是毛不能容忍鄧對文革的否定，又一次罷了他的官。毛去世後，中央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災難性的文革。總而言之，《決議》把文革定義為“災難性的內亂”，以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的興衰為標志，分為三個階段。

國內的學者對《決議》把文革定義為“內亂”並不滿意。金春明指出，“內亂”在中文裏是個中性詞，指一種社會現象，不能明確表述該現象的性質和特點。“內亂”可以是強大的藩鎮向封建最高統治者皇帝奪權，可以是最高統治者家族內部的權力之爭，也可以是農民起義造封建統治者反的革命鬥爭。雖然文革與歷史上的“內亂”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本質上是不同的。《決議》中的“內亂”有兩個形容詞加以修飾和補充：“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和“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但是不能回答一個關鍵的問題，即領導者為什麼發動文革？

[3]

因此，國內的學者把文革定義為“一場複雜的政治運動”。這是“十年陣營”中的另一個派別。根據該派的定義，文革是“由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思想的，以所謂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為革命對象的，採取‘四大’方法動員億萬群眾參與的，以反修防修鞏固紅色江山為神聖目標的一場矛盾錯綜複雜的大規模的長時期的特殊政治運動。” [4]

這就是人們後來常說的“一個文革說”。該學說把文革分為五個階段^[5]：（1）文革發動階段（1965年11月到1966年12月），（2）高潮階段（1967年1月至1968年），（3）趨於穩定和林彪事件階段（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4）批林批孔階段（1971年9月到1974年12月），（5）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文革結束（1975年1月到1976年10月）。

Anita Chan等人對中共的“內亂說”提出尖銳的批評。^[6]他們認為“內亂說”是對曆史的嚴重歪曲，是毛與溫和派、保守派對手（特別是鄧及其追隨者）長期鬥爭中的勝利者對曆史的描述。曆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中共的《決議》也不例外。這是鄧及其追隨者在鞏固了他們在黨政軍地位後做的一次努力。在這些學者看來，《決議》將文革定義為一場“權力鬥爭”，是鄧及其盟友同毛及其追隨者之間圍繞著權力的鬥爭。這是一場十年的鬥爭。在此期間，毛的對手受到迫害、摧殘甚至致死。《決議》忽略了廣大民眾（特別是紅衛兵和造反派）在這場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在鄧氏框架中，廣大民眾的作用充其量是被動的，在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中只是無足輕重的棋子而已。

他們用“社會沖突說”來定義文革。這是“三年陣營”中的一個學派。在這一觀點下，民眾占據了文革的中心舞臺。文革中，民眾分裂成對立的派別：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進一步分裂成敵對的派別。每一個派別都有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在文革的前3年中，這些派別之間為了奪取權力進行激烈的鬥爭。在此期間，中國陷入內戰，傷亡數百萬。所以不是“內亂”，不是運動，更不是權力鬥爭，而是你死我活的為控制中國的階級鬥爭。許多西方學者（如Chan^[7]、Lee^[8]、White^[9]）發現，區分派別的明顯因素是民眾的階級背景。這些階級背景和標籤，是中共1949年建政後強加在百姓頭上的。每一個中國人都被分為三大類中的一類：紅五類、黑五類或灰五類^[10]。這些標籤決定了人們的社會地位、教育機會、政治前途、事業前景。換言之，決定了人們的整個未來。Chan等人調查了廣州中學紅衛兵的派別與家庭背景之間的關係，發現出身不好的人傾向於參加造反派（“紅旗派”），出身好的人傾向於參加保守派（“東風派”）。簡言之，“社會沖突說”把文革描寫成是為期3年的民眾反抗中共及其同盟（保守派）的群眾運動；文革結束的標志是九大的召開。

深受“社會沖突說”影響的中國學者提出了“兩個文革說”。這是“3年陣營”中的第二個學派，與“社會沖突說”大同小異。王希哲^[11]最先提出“人民文革”的觀點。他認為在文革中，“伴隨著毛澤東的每一步勝利，都是人民對他的認識的進一步加深和抵抗的進一步加強。經過了1966年至1971年感性認識的積累，經過了1971年至1975年

比較理性認識的積累，終於在1976年4月3日爆發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對毛來說，文革是為了清洗中央、省市級政府機構裏的走資派。而在眾多的群眾運動中卻存在著“人民文革”，迫使毛及其軍政界內的追隨者不得不鎮壓民眾以維持國家的穩定。“兩個文革說”認為，清洗敵人和鎮壓民眾是文革中的兩大要素。“人民文革”是中國人民進行的抗爭，是為了結束政治歧視和壓迫，要求糾正社會不公和分裂，追求基本權力的保護（包括人權），代表了民眾反抗中共統治制度。因此，“人民文革”也可以理解為是文革中的抵抗運動。

按照鄭義^[12]的說法，第一個文革是“毛的文革”，主動自覺地利用群眾運動來打亂共產黨，以清除威脅他地位的高級同僚。他不怕天下大亂，他自信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第二個文革可稱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被動地不自覺地利用毛澤東的威望，來打倒直接壓迫他們的貪官污吏，以爭得起碼的民主權利。兩個文革為了各自的目標相互利用，同時又相互沖突鬥爭。“毛文革”持續了10年，“人民文革”僅持續了3年（從1966年到1968年）。文革中成立的群眾組織，被毛依靠軍隊的幫助強行解散了。“人民文革”以那些敢於挑戰中共統治的造反派被抓捕、判刑甚至死刑而告終。

“內亂說”被廣大中國的民眾所接受，包括大多數知識分子。西方學者一邊倒地認同“社會沖突說”，把文革看成是一個大規模的為期3年的群眾運動。當然，近年來有些西方學者也開始接受文革是10年的看法。“社會沖突說”與“一個文革說”的重要區別，是3年和10年的分期問題。前者視文革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運動，不應該與後7年的黨的運動混淆在一起。對這些西方學者來說，區分中共的鎮壓、迫害與民眾造反運動的最佳途徑，是把文革定義為3年。“一個文革說”與“兩個文革說”爭論的焦點，是“人民文革”是否存在的問題，即是否存在著一個獨立於“毛文革”的“人民文革”。支持“兩個文革說”的學者大多是當年的造反派。這些學者與參與上世紀70年代學潮的西方學者一樣，有著類似的經歷。他們的一個重要的特征是，對把抗議的民眾描述為“暴民”持否定態度。在他們看來，“人民文革”不是“烏合之眾”的非理性爆發，而是一個具有明確目標和策略的政治運動。“兩個文革說”的支持者通過他們自身的經歷和使命感，從正面來描述文革的群眾運動。這些曾經的造反派試圖把群眾運動與文革後發生的民主運動聯繫起來，認為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是文革後民主運動的前奏，民主運動是文革群眾運動的繼續。“一個文革說”的學者，對“兩個文革說”學者的前造反派身份持鄙視態度。中共竭盡全力抹黑當年的造反派，使得民眾與曾經的造反派保持距離。在文革定

義的爭議中，不僅有學術的因素，還帶有政治色彩。我們則以中立的立場分析關於文革定義的爭論中各派存在的問題和缺陷，並對文革的定義和分期提出自己的觀點。

“內亂說”把文革定義為以鄧為首的被迫害的領導人與以毛為首的極左派之間進行的一場權力鬥爭。在為期10年的內亂中，堅持正確路線的老幹部受到殘害、清洗，有的甚至被整死。他們在毛死後終於“撥亂反正”，“挽救”了黨和國家。在該版本的文化大革命定義中，沒有億萬民眾的身影，沒有提到在文革中影響巨大的紅衛兵運動和群眾運動。在鄧以及追隨者的眼裏，民眾在權力鬥爭中只是工具和棋子，民眾不可能理解黨內的權力鬥爭。中共的“內亂說”把民眾描述成無知、非理性、無意識的群氓，根本沒有必要在文革的官方史書中寫上一筆。

事實與“內亂說”大相徑庭。文革中，民眾分裂成敵對的派別，陷入激烈的鬥爭。這些派別可以基本分為三大陣營：激進派、溫和派、保守派。這些派別分裂的根源是社會沖突。工人、農民和廣大民眾積累了多年來對政府的不滿。當機會來臨時，民眾趁機造反，發泄不滿。由於這一現實對中共十分不利，使他們十分尷尬，所以中共的“內亂說”有意回避之，盡量縮小民眾在文革中的作用。“內亂說”故意把具有造反精神的民眾與林彪、“四人幫”混淆在一起。造反派從毛、林和“四人幫”的受害者變成了他們的同夥，成了十惡不赦的惡魔。這就混淆了民眾激進派與黨內激進派的區別。同時，“內亂說”把鄧及其追隨者打扮成文革的主要受害者^[13]。

事實上，文革的最大受害者是黑五類。他們在文革的一系列運動中始終是被打擊的對象，甚至連造反派也對他們避而遠之，生怕受到牽連。3年的群眾運動過去後，造反派相繼倒臺，所受的迫害不亞於所謂的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眾多的造反派被槍殺或判刑。如南京王金事件運動的首領查全華因言獲罪，被軍管會於1969年底槍決。查全華並未參與過“打、砸、搶”，他很早就淡出運動，潛心研究馬列主義。但是，當局仍未放過他（十多年後終獲平反）。總之，“內亂說”掩蓋了黑五類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而且這一現象至今仍在繼續。

更重要的是，“內亂說”把保守派和黨的各級領導在文革中的罪責一筆勾消。造反派被描繪成為雙手沾滿鮮血的惡棍和流氓，文革中所有的壞事和惡事都被轉嫁到造反派身上。如果有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那都是造反派幹的。事實上，保守派和黨的幹部在群眾運動結束後不久就重掌權力，對民眾犯下許多不可饒恕的罪惡，這些人的罪責卻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

被歪曲的文革群眾運動史，也使得我們不能正確理解文革群眾運動與後來的民主運動之間的聯系。在“內亂說”的影響下，造反派與流氓成為同義詞，造反派受到民運人士的抵制和排斥。這些民運人士沒有從造反派身上汲取教訓。持不同政見的中國學生運動，更不願將文革群眾運動與後來的民主運動聯系起來。這一錯誤的後果是令人痛心的。盡管中國的民運人士鄙視造反派，可是他們卻依然在犯先驅們同樣的錯誤：不包容、不妥協、無休止地爭權奪利，最後走上自毀的道路。在文革中，造反派好歹還造就出一批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領導數萬、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民眾進行抗爭。今天的中國民運隊伍卻是一盤散沙，毫無戰鬥力，比當年的造反派還不如。這正應了美國哲學家桑塔亞那（Santayana）的一句名言：“忘記過去，必將重蹈覆轍。”

“一個文革說”的學者把文革定義為一場複雜的政治運動，他們駁斥“兩個文革說”的論點是：“人民文革說”是否能夠成立的關鍵，“要看是否存在著所謂的反抗共產暴政的人民起義”。該派學者認為，在這方面，“兩個文革說”並沒有也不可能提供有說服力的證據。在群眾組織身上找不到一絲反抗所謂“暴政”的影子，更不用說有任何“反共”的味道。文革中的造反派的目標既非改朝換代，也非推翻國家政權和打倒共產黨^[14]；即使有反官僚的因素，也只是反官僚不反皇帝，連古代的造反者都不如^[15]。總之，“兩個文革說”的致命問題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16]。顯然，“一個文革說”的學者在這裏採取了雙重標準。如果說“人民文革說”的成立需要建築在造反派提出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基礎之上，那麼“毛文革”反的是哪個政權、哪個“皇帝”呢？

社會運動學把社會運動分為四類。其中一個重要而又常見的類別是“改革運動”。“改革運動”的矛頭並不指向現行的制度，只是對現有體制進行局部的改革。運動的目標是改革社會的某些不合理部分，並非企圖推翻整個現行體制。按照“一個文革說”學者的標準，中國的1976年的四·五運動、1989年的民主運動也不能成為獨立的社會運動，因為它們只反對“四人幫”、只是請願要求民主化，並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共的政權和現行的體制。既然文革中根本沒有“一個文革說”學者所指的那種“革命”（無論是“人民文革”還是“毛文革”），為什麼他們對屬於“改革運動”的文革群眾運動與黨的運動的迥然不同的性質視而不見呢？這是因為，“一個文革說”是建築在一個錯誤的理論框架下的學說。

按照“一個文革說”的觀點，億萬群眾卷入文革的原因，是由於林彪和“四人幫”的蠱惑挑唆，是不明真相^[17]。徐賁認為，毛對各種

各樣的群眾始終牢牢地維持著全面控制，毛展現了巨大的蠱惑天才。儘管造反派的行為動機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但是這種逆反的作用有限^[18]。有學者明確地指出，民眾不辨真偽，失去個性，沒有推理能力，變成了烏合之眾^[19]。陳子明則更明確地提出，造反派是“瘋子”，逍遙派是“傻子”^[20]。

認為民眾智力低下，是瘋子、傻子的說法是有理論根據的。這個理論就是“烏合之眾論”，它的代表人物是勒龐（LeBon），代表作是1895年發表的《烏合之眾》。遺憾的是，“烏合之眾論”早在上世紀的70年代就已經被“不名譽地開除出”了社會運動學的研究領域^[21]，已成“死老虎”。建築在已經被摒棄的“烏合之眾論”理論框架下的“一個文革說”，也就不攻自破了。我們華人學界沒有必要再重複西方學界60年前所批判的“民眾非理性”的老路^[22]。

大多數華人學者認同“一個文革說”的另一個原因，是語言問題。在英語中，政黨的運動與民眾的運動是兩個不同的單詞，前者是Campaign，後者是Movement。在中文中，兩種不同性質的運動都用“運動”一詞表達，所以常被混淆。

Lee^[23]和Chan^[24]等人在分析文革群眾運動時，運用了“社會沖突論”的理論。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主義雖然沒有提出專門的社會運動理論，但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關於社會運動的理論^[25]。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只要資產階級掌握權力一天，工人階級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該理論的核心是，社會的不平等必將導致革命運動的爆發，階級利益是社會運動的核心^[26]。由於受“必然性”的影響，認同“社會沖突論”的學者往往把文革中的矛盾歸咎於集團利益的沖突。家庭出身問題成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組成，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占多數^[27]。階級背景的對立，轉化成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派別^[28]。

文革中暴露出來的社會矛盾並非一朝一夕產生。為什麼文革前17年這些矛盾並沒有導致民眾大規模的反抗？因為結構條件並不能自動導致民眾的反抗^[29]。在這方面，“資源動員論”顯示出優越性。該理論認為，運動的發起不僅需要存在的社會矛盾和沖突，還需要社會資源。“政治過程論”強調不僅需要民眾的反叛意識，還需要政治機會。民眾有了額外的機會，運動才能發動起來。“新社會運動理論”強調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追求，跳出了過去的經濟範圍。雖然文革中曾經出現過一些“經濟主義”運動，但是民眾關心的更多的是政治問題。由於“社會沖突論”存在的缺陷^[30]，該理論的運用受到了限制

[31]。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社會沖突論”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失去往日的威力[32]，退出了曆史舞臺。

“社會沖突說”的另一個問題是其分期問題。“內亂說”把文革作為10年一起否定，是出於政治考慮。鄧小平很“策略地”把3年造反和不受歡迎的7年鎮壓混合起來[33]，使造反派成了文革罪孽的兩個最重要的集體記憶之一：上層是林彪、“四人幫”，下層是造反派。造反派成了誣陷、陰謀和暴力的代名詞。當局將文革定為10年，使得許多人把造反派誕生前和群眾組織已經解散後受迫害的賬也算到了造反派頭上[34]。在各種複舊風、翻案風、平反風、昭雪風中，當局為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和不公正找到一個容量巨大的替罪羊[35]。“文革3年說”可以撇清當局對造反派的妖魔化。至少文革後7年，自上而下的由高層發起的整人運動（如“一打三反”之類），這些迫害賬不能算在造反派頭上。

然而，這種因噎廢食的作法忽視了群眾運動和黨的運動之間的聯系。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不同於西方社會的民主國家。生活在或者曾經生活在中國的華人有切身體會。除了文革初期毛為了打敗政敵的特殊情況，執政黨對群眾運動一直視為洪水猛獸。持“兩個文革說”者也不得不承認，沒有“毛文革”就沒有“人民文革”[36]，兩個文革的關係是相互利用[37]，相互交錯[38]。正如 Unger 所說，文革不是要麼“人民文革”要麼“毛文革”的問題[39]。

為了防止文革結束後秋後算賬遭報復，造反派開始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尋求官方的正式承認。“上海工總司”試圖通過讓市委領導露面的方式得到官方的承認。結果市委抓住造反派的軟肋，宣布“三不”：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毛深夜召見首都五大學生領袖，標志著文革群眾組織的止歇。但是群眾組織的消失，並不意味著其人心、影響力和戰鬥力的消失。群眾組織消失的同時，各地的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相繼成立，有一些造反派得以進入新的政權機構。當時還存在一個合法組織專門收留造反派成員，這就是“革命工人代表大會”（簡稱“工代會”）。有些省的造反派利用這一活動平臺，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東山再起，與保守派做最後的抗爭。盡管群眾組織在形式上沒有了，但是造反派人還在，思想還在，鬥爭還在繼續。

中國是一黨天下的專制國家，與西方民主國家有著諸多不同。最重要的一個差別是群眾運動的生存條件。中共曆來實行禁言禁黨的政治高壓政策，對社會實行嚴密控制。草根的社會運動在中國大陸基本上沒有生存空間，無法有效地向民眾傳播自己的主張。自下而上的草根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壯大幾乎不可能，自發和自主的社會改革運動幾

乎沒有存在的可能性。文革中的群眾運動雖然有其獨立性，應該與黨的運動區別對待，但是群眾運動並不像西方國家裏的民主運動那樣享受真正的自主權，並不完全獨立。由於忽略了以上這些區別，不少西方學者未能正確地理解文革和群眾運動之間的關係。西方學者一邊倒地持文革3年的觀點，是因為在西方國家，不以推翻現行政權的社會運動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深受“社會沖突說”影響，持“兩個文革說”的中國學者，提出“人民文革”作為一種妥協和讓步^[40]。這是因為中國學者經歷過文革，對中共及其體制有更深刻的體會。

儘管“一個文革說”存在嚴重的缺陷，但並不意味著“兩個文革說”正確。“兩個文革說”的問題與“一個文革說”一樣，問題也出在理論框架上。該學說基於一個已經過時的理論——“社會沖突論”。“兩個文革說”的另一問題是其錯誤的定位。該派學者認為，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是一個利用皇帝打倒貪官汙吏，爭取自身權力，不自覺的、帶有民主色彩的“人民起義”和“人民革命”。面對“一個文革說”極力否定“人民文革”的存在，“兩個文革說”的學者只好牽強附會，把文革中民眾的“改革運動”硬說成是“革命運動”。在這個問題上，“一個文革說”和“兩個文革說”均犯了一個低級錯誤。即忽視社會運動學中對社會運動的分類，沒有意識到“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群眾運動有其合法地位。如果持“兩個文革說”的學者在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提出，文革中民眾的群眾行為是社會運動中常見的“改革運動”，他們就會理直氣壯得多。“起義說”和“革命說”過於激進，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被“一個文革說”抓住了把柄。“真理向前一步是謬誤”的說法，用在“兩個文革說”上再合適不過。

文革涉及全中國的億萬民眾和中共的各層官僚。文革不是“內亂”，不是革命，也不是“一個”運動，而是一場為謀取利益的鬥爭，是諸多決策主體根據掌握的信息和對自身能力的認知，做出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決策的一場經濟和政治鬥爭。現代數學中的博弈論是應用數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這是關於多個決策主體之間行為具有相互作用時，做出決策的一種行為理論。當相互發生作用的當事人之間，有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協定，博弈屬於合作博弈。反之，博弈是非合作博弈。按照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了解程度，博弈又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在博弈過程中，每一位參與人了解其他參與人的特征、策略及收益的準確信息。如果對其他參與人的情況了解得不夠準確，博弈屬於不完全信息博弈。文革就是一場不完全信息的博弈。中共的保守派和溫和派對毛的目的並不清楚。毛對中共的保守派尤其防備，保守派因對毛的意圖不甚明了，以至於在文

革一開始處處被動，幾乎全軍覆沒。同樣，民眾對毛的意圖也不甚理解，所以遲遲不敢有所動作。毛不得不千方百計動員民眾起來造反，以達到他的目的。

文革的前3年，激進派和溫和派聯合起來對付保守派，保守派無情地打壓民眾的激進派。當保守派垮臺以後，民眾的激進派與溫和派發生分裂，打派仗^[41]。毛通過軍隊，依靠“三支兩軍”的方式控制群眾組織，用文革中的新文官入主軍隊，制衡軍隊中的保守派，用民眾反對保守派^[42]。毛澤東依靠小將，不靠譜；依靠老將，不放心；依靠軍隊，不可靠；依靠工人，又不行。於是像走馬燈，惡性循環，他自己也收不了場^[43]。保守派失勢以後，黨內的激進派分裂，林彪集團倒臺是激進派內部分裂的結果。與此同時，民眾的激進派受到殘酷的整治。文革的後7年，是黨內的激進派、溫和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鬥爭，最終以激進派徹底失敗而告終。文革是一場混戰，6個集團沒有固定的同盟，沒有長久的共同利益，沒有真心的合作，各打各的算盤，是一場非合作式的博弈。

我們對文革的定義是：為期10年的文革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文革中，黨內和黨外各自的激進派、溫和派和保守派6個集團之間和集團內部，進行了一場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文革以保守派失勢開始，以激進派完敗告終^[44]。我們提出的文革定義，可以簡稱為“博弈說”。

我們對四派觀點學說的批評，並不意味著對它們完全否定。“博弈說”事實上汲取了各派觀點的合理成份。“博弈說”不僅包括了“內亂說”中的權力鬥爭，包含了“社會沖突說”和“兩個文革說”的民眾為自身利益進行的抗爭，還包含了“一個文革說”中所暗指的一系列清洗運動。文革實質上是黨內外各自的激進派、溫和派和保守派6個集團之間和集團內部的一場搏殺和鬥爭。忽略這些複雜鬥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將導致我們不能正確地認識文革。

從目前文革研究的狀況來看，定量研究的論著和致力於定量研究的學者為數不多。正如有位學者說的，國內過去關於文革的研究多重於定性分析缺少定量分析^[45]，不能不說是個遺憾。更令人憂慮的是，有些學者試圖把定性研究的結果和發現推及整個文革。我們在《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書中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對文革中群眾運動的歸屬進行了分析。具體方法是，對建政以來中共曾進行的各種政治運動、文革後中國曾出現過幾次大的民主運動以及文革中的幾個大的群眾運動，運用聚類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和隱類別分析法（Latent Class Analysis）進行分類。我們采用以下7個定量指標：

運動的目的、運動的自主性、運動的自發性、中共對運動的政策、運動的對象、運動的結果和運動的性質。我們得到的各運動的分類如下：第一類運動是土改運動、鎮反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反右運動、四清運動、二月鎮反、一打三反運動、清查五.一六運動、批林批孔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取締法輪功運動。第二類運動是抗美援朝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學雷鋒運動、學大寨運動、學大慶運動、學習解放軍運動、上山下鄉運動、五講四美運動、三講運動、三個代表運動、科學發展觀運動、和諧社會運動、保持先進性運動、社會主義榮辱觀運動、創先爭優運動、群眾路線運動。第三類運動是文革群眾運動、王金事件運動、全紅總運動、1976年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運動、1986年民主運動、1989年民主運動、美國黑人人權運動。

第一類運動顯然屬於“鬥爭運動”，或者叫做“整人運動”。第二類運動屬於“思想教育和生產建設運動”。第三類運動具有民主運動的性質。美國的黑人人權運動作為參考放入模型中。“全紅總運動”要求提高改善臨時工和合同工的地位和待遇，與黨的整人運動、思想教育和生產建設運動風馬牛不相及。文革的群眾運動屬於第三類，即民主運動。這一結果說明，文革中億萬民眾參加的群眾運動，與其他中共領導的運動有著明顯的、本質性的區別。

造反派們沒有把改朝換代作為他們的目標，也沒有把推翻國家政權和打倒共產黨作為運動的宗旨。按照金春明的說法，造反派是“在偉大領袖圈定的範圍內活動”，造反的對象僅僅是所謂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46]。但是，造反派的矛頭不再是以往黨的運動中的平民百姓和“賤民”，而是共產黨的幹部，這是不爭的事實。

從社會運動的7個指標上看，文革的群眾運動與黨的兩種運動有著巨大的差別：從運動的目的（是否改革社會不合理現象），運動的組織形式或自主性（是否經過層層黨組織的嚴密控制），運動的自發性（是否成立草根組織），運動的對象（是否矛頭向下），運動的性質（是否整治百姓和“賤民”），以及運動中積極分子的命運等諸多方面，群眾運動與黨的運動有天壤之別，卻與中國曆次出現的民主運動和美國的人權運動相似。忽略這些特點，就不能客觀地理解文革中的群眾運動。

文革中的群眾運動與曆次的民主運動同為一類，說明文革中的群眾運動與中國的民主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正像有人提出的，“我們發現了一個很神奇的連接：當年的造反派，與今天的民主派有著必然的邏輯聯系。”當年的造反派懷抱民主的理想，響應毛的號召

投身文革，成為造反派骨幹。他們現在繼續當年的主張，回到當年“人民文革”的立場，開始推進當今中國的民主^[47]。可以說，文革後中國出現的數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是文革中群眾運動的繼續，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是這些民主運動的前奏。

該書還採用假設檢驗的方法，對文革的定期進行討論。從建政以來黨的運動可以了解中共的政策，並可對文革進行分期。文革前的“鬥爭運動”占總運動數量的38%，文革後則只占18%，僅是文革前的約二分之一，文革前3年與後7年的比例是各時期中最高的。假設檢驗結果告訴我們，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後幾個時期的“鬥爭運動”出現不同頻率並非出於偶然，出現顯著差別有其客觀原因。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鬥爭運動比文革後要多得多。“前30年”和“後30年”的說法在此得到證明。檢驗進一步說明，文革應為10年，前3年與後7年中，中共的整人政策並未發生變化，仍以整人或階級鬥爭為其主要政策。假設檢驗還說明，文革前與文革10年期間也有顯著差異，即文革中整人更加厲害。文革前17年是文革的前奏，文革是文革前17年的繼續，也在此得到證實。最後的假設檢驗還說明，文革後與文革時期有著顯著的差別，不可混為一談。文革後的整人運動，比文革時期和文革前要少得多。中共自文革結束後調整了政策，基本結束了整人運動，其顯著性在此得到證實。

中共建政以來年代分期的定量分析表明，文革期間中共的政策並沒有發生變化。盡管毛為了打敗他的政敵，給了百姓暫時的民主和自由，但是中共的政策沒有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毛在清洗了他的政敵後，很快又恢復了他以往的方針和政策。所以從中共政策的角度出發，文革的前3年和後7年同屬一個時期。盡管文革的前3年發生了轟轟烈烈的全國幾億人參加的群眾運動，中國人民在短暫的時間內享受到自由結社自由言論，但並沒有改變中共政權的性質，也沒有改變國家機器的性質。對於廣大的百姓來說，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文革應該定位於10年；從中共執行的政策來看，文革前的17年與文革的10年也可以視為一體。也就是說，文革是文革前17年的繼續，文革前17年是文革的前奏。這也是為什麼 MacFarquhar 能夠寫出三本洋洋灑灑的巨著，從文革前的歷史中尋找文革起源。正像有的學者說的，文革不是平地生風的，是1957年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各項政治運動的總匯和最高潮。正是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為文革作了充分的政治、理論和思想準備。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那些政治運動的不斷發展和惡性循環就沒有文革^[48]。

在這本書裏，我們沿著前一本書的思路分析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本書分為兩篇：第一篇是典型省份的文革情況的簡述，第二篇是文革

中群眾運動的動員、群眾組織的出現、分裂和滅亡。第一篇有12章，介紹具有典型意義的12個省市自治區和解放軍的文革群眾運動。

第一章是關於北京的文革。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也是中國高等院校的集中地。學生的紅衛兵運動在北京的群眾運動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一章重點介紹北京大學（簡稱“北大”）和清華大學（簡稱“清華”）的紅衛兵運動。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貼出了全國第一張大字報，標志著文革群眾運動的開始，可以說北京大學是文革群眾運動的發源地。清華大學是北京大學的近鄰，發生在清華大學的武鬥是導致文革群眾運動終止的原因。這兩所大學，分別標志著文革群眾運動的興起和滅亡，在文革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記述上海的文革群眾運動。與北京學生當道的情況成鮮明對照，上海的工人運動在當地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城市，是中國的經濟重心和工業中心。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是全國規模最大、影響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群眾組織。它控制上海局勢長達十年，上海“工總司”在上海和全國的文革進程中有著無可比擬的地位和影響。上海是全國為數不多的造反派一統天下的省市之一。北京和上海是中央直接控制的直轄市，與其他各省有著明顯的區別。

第三章講述天津的群眾運動。天津當時是中國的第三個中央直轄市（當時的中國只有3個直轄市），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在全國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天津沒有像北京和上海那樣由中央直接控制，但作為北京的近鄰，天津的文革進程受到“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以下簡稱“中央文革”）成員陳伯達和江青等人的控制，屬於中央間接控制的區域。因其特殊的地位，天津在全國的文革中具有其特殊性。

第四章介紹的是湖南省的群眾運動。湖南的工人在文革中顯示了強大的力量，其力量大到中央不能無視的地步。北京的學生運動過於強大，工人運動相形見绌。上海的工人運動過於強大，學生運動失去了獨立發展的空間。湖南省的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結合為一體，在充分發揮學生組織作用的基礎上，以產業工人為主體實現當地的大聯合。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相結合，能發揮知識分子的先鋒引導作用和工人階級的巨大能量，湖南的群眾運動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在第四章的末尾，還簡單地論述了與湖南省鄰近的湖北省的群眾運動。這是因為，兩個省不僅在地理位置上相近，而且文革運動的進展也頗為相似。

第五章討論江蘇省的群眾運動。與湖南省相似，江蘇省的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相結合，也發揮了巨大作用。在中共建政以前，省會南

京曾是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在中國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江蘇的群眾運動以南京為中心，而南京大學始終是南京市和江蘇省群眾運動的風向標。南京大學群眾運動的興起，在時間上僅次於北京大學，在全國占據領先地位。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介紹的湖南、湖北和江蘇3個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3個省的保守派均在1967年上半年基本垮臺，造反派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造反派還未來得及慶祝勝利，就立即分裂成勢不兩立的敵對派別。兩派很快卷入殘酷的武鬥，自相殘殺，兩敗俱傷，直至最後的滅亡。

第六章簡述黑龍江省的群眾運動。該省是在地理位置上最北端和最東端的一個省。黑龍江省曾是中國重要的裝備製造業、能源工業與農業基地，在全國占據較重要的地位。黑龍江是早期造反的省之一。文革開始時，身為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的潘複生公開支持造反，成為該省的第一任省革委會主任。黑龍江也是全國較早成立革委會的省之一。然而黑龍江的形勢並未穩定，很快出現反覆，造反幹部潘複生被撤換。作為早期造反省份之一的黑龍江省，在文革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七章講述的是內蒙古自治區的群眾運動。內蒙古文革的重要標誌，是1967年2月5日軍隊開槍打死學生的事件。內蒙軍區殺害學生的槍聲驚動了中央。中央公開表態支持內蒙的造反派組織，強令保守派組織解散。內蒙軍區和保守派進行了頑強的抗爭，數千名軍人到北京告狀，不滿中央的決定。最後中央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壓制了軍人的抗命。內蒙成為造反派一派當權的省之一。

第八章記述的是西藏的群眾運動。由於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以及民族和宗教的特殊性，西藏地區的群眾運動既有全國的一般特征，也有邊疆地方的特點。西藏地區的動蕩時間相對內地較短一些，文革的進展較之內地也晚一個節拍。西藏的文革圍繞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進行。軍方暗中支持保守派，曾於1967年6月7日開槍打死駐紮在大昭寺的10多名造反派。此事驚動了中央，軍隊不得不道歉認錯。西藏還發生過兩起涉及少數民族的武鬥事件。造反派（多為少數民族）受到軍人的鎮壓，武鬥事件演變為民族事件。兩個事件目前被稱為“反革命暴亂事件”。造反派領袖則認為，當年發生的暴力事件是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西藏由於其特殊性，派性鬥爭演變成民族鬥爭，在中國的內地省是不多見的。

第九章記敘的是雲南的群眾運動。雲南是中國最西南方的一個省，屬於邊遠地區。由於自然環境的制約和曆史原因，雲南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比較滯後。在邊遠地區省中，雲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當保守派垮臺之後，雲南省的造反派在奪權問題上發生了分裂。造反派的

頭頭們當初冲破壓力挺身造反時，也許並未想到能夠奪權掌天下。當造反派真正開始奪權時，他們的野心和權欲被誘發出來，整個雲南陷入武鬥，武器也從冷兵器發展到現代化的熱兵器。雙方背後有省委和軍區高層插手。駐雲南的野戰軍謊報軍情，誣告其中的一派企圖叛國，該派受到毀滅性打擊。文革期間，雲南還發生了知青大逃亡事件。成千上萬的支援雲南的外地知青試圖逃回城市，終被政府用金錢收買的農民所鎮壓。只是到了文革結束後的1978和1979年，雲南的知青再次鬧事才得以脫離苦海，回到闊別多年的城市。

第十章記載的是青海省的群眾運動。文革中的青海省因“二·二三事件”聞名全國，因此青海的群眾運動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1967年1月，省軍區司令劉賢權主持召開省軍區常委會，通過了支持造反派的方針，並上報蘭州軍區、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即“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和多數幹部不接受這個決定，他們奪了司令的權。2月23日，趙永夫調集軍隊圍住造反派，下令向造反派開槍，造成了347人傷亡，其中169人死亡。這就是震驚全國的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央宣布支持造反派。原來支持趙永夫的一派群眾被清查。青海的造反派自此占據優勢，直到文革結束。1976年文革結束後，趙永夫很快獲釋。169人死亡案也不了了之。

第十一章介紹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群眾運動。新疆是中國西北部的一個省級自治區，是中國陸地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境內居住著19個民族的群眾。新疆盡管屬於邊遠地區，但是其政治和經濟在全國占有特殊的地位。與其他省市自治區不同，新疆的文革不僅以其省會烏魯木齊市為中心，也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簡稱“建設兵團”）為另一個中心。1967年1月26日，新疆發生石河子“一·二六血案”。部隊打死26人，打傷74人。中央為保持邊疆穩定，將事件定性為“雙方武裝衝突”。該血案對新疆的局勢影響深遠，該案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底才重新定性。新疆文革中動亂的根源在於兩個基本問題：一是生產建設兵團問題，二是民族問題。這是其他省所沒有的。

第十二章介紹軍隊的文革情況。文革初期，空軍與海軍領導層發生激烈的鬥爭，在中央高層的介入下風波得以平息。但是矛盾依然存在，為日後軍內政治派系的演變和鬥爭埋下了伏筆。1966年總參謀部的“八·二五事件”導致賀龍的倒臺。1966年8月，總參謀部的一些部和局貼出大字報，矛頭對准代總長楊成武，楊一時成為眾矢之的。由於毛認為總參謀部炮打楊成武事件的背後責任人是賀龍，所以賀龍也涉及此案。該事件成了賀龍倒臺的導火索。1967年，軍內發生“五·一三”沖擊三軍演出事件。毛在這場造反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中，竟然支

持了保守派。毛因為擔心失去對軍隊的控制，在1967年4月間定下一個秘而不宣的方針：通過北京軍區的穩定，以穩定全軍；通過軍隊的穩定，以穩定全國。“五.一三”事件是軍隊穩定的始發點，在軍隊文革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相對於地方的文革，軍隊相對穩定些。這是因為軍隊是中共政權的支柱。軍隊如果真正失控，對中共肯定是災難性的。所以，中共在掌控軍隊的穩定方面還是比較重視的。

在第二篇的始章（即第十三章），討論了代表性的問題。本書的第一篇簡述12個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群眾運動。中國大陸當時有29個省市自治區，為什麼我們只分析12個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情況，置其他17個省市自治區於不顧呢？Chan等人在研究廣州市中學紅衛兵運動時發現，群眾組織的分派與其成員的家庭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Walder對北京的大學紅衛兵的研究發現，紅衛兵的權力和特權的狀況對文革中的派別沒有影響。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相互矛盾的結論呢？因為廣州的中學紅衛兵和北京的大學紅衛兵存著區域差別和年級差別。這就涉及文革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代表性問題。

如果試圖對全國的文革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應包括全國的29個省市自治區，否則就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對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進行全面論述，會有難以深入的問題。在研究中很難做到既涵蓋全國各地的詳細情況，又有深入的理論分析。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是一對矛盾，很難同時兼顧。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之一是抽樣。我們採用分層抽樣的方法，解決可靠性和樣本大小之間的矛盾。

我們對省市自治區的分類，採用3個方面的客觀指標共計10個變量：（1）經濟、人口、政治、地理方面；（2）局勢穩定性方面；（3）群眾運動發展方面。由此我們得到了7個類別：北京和上海屬第一類，即中央直控類。第二類是群眾運動發展較成熟的省類，共有14個省，如湖南、湖北和江蘇。第三類是早期造反類，有6個省，如黑龍江和內蒙。雖然這些省的革委會成立得較早，但是它們並不安定，反復較大。第四類是邊遠地區類，共有4個省，如雲南和西藏。此類省在全國的地位並不太重要。第五類是特異類，即中央間接控制的天津直轄市。天津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其他省不盡相同。雖然中央文革對天津的控制不如對北京和上海那麼直接，但是陳伯達和江青等人能夠直接幹預。這些情況使得天津既有別於其他省，又有別於北京和上海。第六類也是特異類，只有青海省。這是由該省的特殊性造成的。青海省以其“二·二三事件”聞名全國。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依靠軍區內多數軍人的支持，通過非正常途徑整倒並扣押省軍區司令，並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百姓開槍。第七類也是特異類，只有新疆一個省。新疆的文革以首府烏魯木齊和建設兵團為兩個中心，這在全

國罕見。在第一篇裏，從以上7類省份中挑選12個省進行了分析。雖然只有約三分之一的省，但可以較全面地代表全國的文革情況。

第十四章，介紹了社會運動學（Social Movements）理論發展的簡史。社會運動學是一個因中國的文革興起並與文革研究密切相關的重要學科。多年來，該領域的發展一直未引起華人學界的重視。在中國文革的影響下，從1968年5月開始，西歐和北美出現了類似中國紅衛兵的青年和學生造反浪潮。該現象引起西方社會學家的興趣，對其研究開始增多。到上世紀的70年代中期，社會運動學逐步成為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領域。社會運動學理論可以分為三代。第一代是烏合之眾論，第二代在理性選擇的框架下有社會沖突論、理性選擇論、博弈論、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和新社會運動論，第三代是構框理論。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運動學經歷了從瘋狂到理性再到情感/網絡的螺旋形變化。這些理論對於我們研究文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社會運動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運動的動員（Mobilization）。運動的動員可以分為兩個具體的問題：（1）為什麼動員？（2）如何動員？關於文革的動員，這兩個問題又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方面的4個問題，即：（1）毛為什麼發動文革？（2）毛如何發動文革？（3）民眾為什麼參加文革（為什麼被動員）？（4）民眾是如何參加文革的（即如何被發動的）？

第十五章討論“自上而下”的兩個問題：“毛為什麼發動文革？”和“毛如何發動文革？”毛發動文革的目的是要樹立真正的接班人，以確保他的路線得以繼續，而且可以在他死後防止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對他進行清算。文革是毛“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毛通過告誡中共所面臨的潛在威脅，把黨內的高層動員起來。當中共在“可能垮臺”的威脅下團結起來準備共度難關後，毛甩開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通過中央文革使其成為直接指揮文革的常設機構，迅速完成了黨內의思想和組織動員。

毛通過提出一個新的理論，區分黨中央與各單位黨組織，解除了民眾多年的顧慮。恐懼終於開始從中國民眾的心中悄然退去，實現了民眾的思想動員。1966年10月開始的第一次“平反潮”和1967年4月開始的第二次“平反潮”，是民眾組織動員的關鍵。第一次平反導致黨政機關的癱瘓，第二次平反引發各地“揪軍內一小撮”和“砸爛公檢法”的高潮。沒有兩次大規模的平反，廣大民眾不可能敢於起來造反。許多處於觀望和猶豫狀態的民眾毫無顧忌地加入到造反隊伍中來，全國終於迎來“全民造反”的情景。

第十六章討論群眾的動員（即自下而上的動員）。研究群眾的動員與民眾參加哪派群眾組織是有區別的。前者只注重民眾為什麼參加

和如何參加群眾組織（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後者注重民眾因為什麼原因參加某派群眾組織。在這一章裏，我們研究民眾為什麼參加文革中的群眾組織。迄今為止的文革研究存在著一個普遍的問題：很少有學者採用大規模的直接詢問文革當事人的方式，了解他們為什麼參加群眾組織。2017年4月16日，我們啟動“關於民眾在文革中參加群眾組織情況的問卷調查”的活動。截至2019年1月31日，征集到1,670人的有效回覆。關於民眾為什麼參加文革，有兩個突出的原因：一是響應毛的號召，二是對當權派不滿和／或爭取改變自身的處境。在響應毛的號召方面，“革命幹部”、“革命軍人”（以下各章均簡稱“革幹革軍”）子弟尤其多。工農子弟、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依次遞減。在對當權派不滿和／或爭取改變處境方面，是按相反方向依次遞增。這兩個原因看似不同，實質上卻是一回事，即都與自身的處境有關。作為紅五類子弟，他們只要聽從黨和毛的號召，前途是有保障的。響應毛的號召只是表面的，實際上與紅五類子弟的前途密切相關。而爭取改變處境對於非紅五類子弟來說，是非常實際的目標。文革前的17年裏，中共執行的階級路線，把灰五類和黑五類劃為二等公民。他們在升學、就業、提幹、事業發展和生活等各方面受盡歧視。文革的發動，使他們看到了從未有過的機會。他們帶著這一目的積極投入文革，希望能在文革中打個“翻身仗”。

響應毛的號召是紅五類子弟的一種積極防守性的動因，目標是保住他們已有的特權和利益。對當權派不滿和／或爭取改變處境，則是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的一種積極進攻型的動因，旨在爭取奪得自己以前所沒有的權力和利益。兩個動因從不同的側面展現相同的動機，事實上是殊途同歸。從受訪者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中國無形中分裂成為兩大陣營：紅色陣營和非紅色陣營。在紅色陣營裏有革幹革軍子弟、工農子弟、黨團員積極分子以及中共的各級幹部等。在非紅陣營中，有黑五類和灰五類子弟，本人是黑五類或灰五類的人們，以及被淘汰下來的原來屬於紅色陣營中的少數人。總之，無論民眾參加的是哪個派別，都是為了改變自身的處境而戰，或是為了保持自身的處境而爭。

根據我們的推算，文革中大城市裏的民眾參加群眾組織的比例在53%～67%之間。在非省會地區，民眾的積極略低一些，在43%～57%之間。農民參加群眾組織的積極性最低，約占28%。

當人們談論文革的群眾組織或派別時，常會使用“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個詞，這是文革中群眾組織最常見的兩個類別。儘管以前對群眾組織的派別有不少研究，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對全國各省級群眾組織進行系統的分類。第十七章，我們對全國的省級群

眾組織進行了系統客觀的定量分類。分類採用的 6 個定量指標是：

（1）是否是文革初期保守派或改頭換面？（2）是否是二月鎮反的受害者？（3）是否有代表進入省革會常委會？（4）進入省革會常委會的代表是否在文革後受到整肅？（5）支持該派的領導是否在文革後受到整肅？（6）支持該派的領導是否在文革後複出重新上臺？全國 77 個省級組織可以分為 3 類：保守派、溫和派、激進派。溫和派與激進派同屬於造反派，只是造反的程度不同而已。

根據對各省大派組織的分類，我們對各省的文革也進行了分類。有的省份主要是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沖突，即“階級性派別”的沖突。有的省份是分裂的造反派之間的矛盾，即“派性派別”之爭。也有少數省是造反派“一家天下”，局勢基本上由一個造反派別控制。各省的文革進展情況，有許多不同。我們在分析民眾參加不同派別的動機時，應該注意上述兩類派別鬥爭的區別。

第十八章分析民眾為什麼加入不同的派別組織以及如何組織起來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群眾組織的分派與家庭出身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將這種觀點稱為“社會沖突派”。但是也有學者發現派別與家庭出身無關，認為派別與鬥爭過程有關。我們將這派學者稱為“政治過程派”。以上兩派觀點分歧的根源在哪裏？與家庭出身無關的派別之爭，通常是同一造反派陣營裏的不同派別之爭，即“派性派別”；與家庭出身有關的紅衛兵之鬥，則是不同階級陣營的對峙和沖突，即“階級性派別”。忽略派別鬥爭中存在著不同性質的類別，將兩者混為一談，是造成兩派學者不同觀點的原因之一。“社會沖突派”和“政治過程派”存在兩個主要問題。首先，他們均忽略了基層派別組織，使得中間過程變成了“黑箱”，導致這一關係難以預測。其次，他們混淆了派別的類型，忽略了“階級性派別”與“派性派別”的區別。

在群眾組織的派別鬥爭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是保守派與造反派的分裂。這是階級性的分裂。各省有一個共同的現象：保守派有“五多”，即紅五類多、黨員多、團員多、幹部多和積極分子多。他們是文革前政治社會秩序的受益者，屬於優勢群體。造反派則包括從紅五類到黑五類的各種人，其中有不少是曆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或受牽連者，屬於弱勢群體。優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內的成員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常會發生變化。這種人為地制造差別的過程，我們稱做“篩選差分過程”（Screening Differentiation Process）。它像一臺高速旋轉的離心機，不斷地把一部分不能緊跟黨的分子甩出核心圈，降入落後群體。先進群體在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方面占據優勢，落後群體則在政治上受歧視，精神上受壓抑。這一動態的先進群體和落後群體的劃分，與以階級分裂為線的優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劃分並

不完全同步。文革時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以階級劃線分成優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以篩選差分劃分先進群體和落後群體的分裂社會。

除了保守派與造反派的鬥爭以外，在同一陣營裏的造反派內部也存在著分裂和鬥爭。此類派性矛盾的激烈性，不亞於“階級性派別”的鬥爭。這類分裂大多因“一月革命”奪權引發。無論是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階級性派別”鬥爭，還是造反派之間的“派性派別”鬥爭，都是圍繞一個“權”字。當然，“權”的背後，歸根到底是一個“利”字。

“社會沖突派”沒有充分注意到分裂的造反派之間的內鬥，因此沒有意識到文革中的派別鬥爭不僅有既得利益者與挑戰者間的鬥爭，也存在挑戰者之間的內部沖突。“政治過程派”忽視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片面強調運動的多變過程。真實的情況是，文革是一場博弈，是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保守派與作為挑戰者的激進派的鬥爭為主，挑戰者內部激進派與溫和派之間沖突為輔的博弈。文革是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進行的一場非合作式的、信息不明的利益博弈。因此，我們用“兩類派別鬥爭”（Two-Type Factional Struggles Explanation）來解釋說明文革中的派別鬥爭。我們的觀點可以稱為“兩類派鬥說”。

由於各省的分裂，群眾組織陷入你死我活的派戰，天下大亂，中國處於內戰狀況。這一形勢是毛及其追隨者沒有預料到的。第十九章討論文革群眾運動的自毀，試圖回答群眾運動“為什麼”和“如何”走向自毀的道路。造反派當初作為毛整治官僚們的“石頭”，此時成了實現“天下大治”的絆腳石，成了新生政權革委會的對立面。毛對造反派失去耐心，遂派出數萬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強行結束了武鬥，兩派群眾組織在內戰中同歸於盡。從這一天起，毛利用造反派的戰略也結束了。毛澤東告別了造反派。

文革對民眾帶來的災難是巨大的。根據我們推算，民眾因參加群眾組織受整的面非常廣。中學生和知青的受整率為11%～12%，其他民眾的受整率達到23%～27%。換言之，文革後，約有四分之一的參加過群眾組織的民眾或多或少地受到整肅。參加造反派的民眾更是首當其沖。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過群眾組織的民眾，出身好的、政治面貌屬於紅類的、曾為幹部和科員的民眾，受整率高於普通民眾。

文革研究中被許多學者忽略的兩個重要問題是：（1）造反派為什麼分裂？（2）他們的分裂對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帶來了哪些害處？由於中共當局對造反派的醜化，很少有人能夠認真地總結他們失敗的教訓，為中國今後的群眾運動提供借鑒。文革中，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分裂。每當造反派獲得一個大的勝利，他們立即分裂，陷入內戰，

造反派的能量在內戰中消耗殆盡。但是造反群眾組織並非永遠“死磕”，沒有聯合。例如湖南、湖北和江蘇的造反派從“清隊運動”開始逐步喪失權勢，一步一步跌入牛鬼蛇神的集中營。到了“一打三反”運動時，造反派們遭到幾乎全軍覆沒的厄運，造反派的領導人和骨幹分子都成了挨整對象。在後來的運動中，造反派們盡棄前嫌，共同對敵，做最後的拼搏。這是為什麼呢？造反派沒有能夠聯合有多種原因，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對形勢的誤判。他們沒有分清真正的敵友，以為保守派已經完敗。在對權力貪婪的驅動下，把曾經同一戰壕的戰友當成了敵人，試圖獨霸天下。正是由於這一錯誤的策略，出現了造反派的分裂。如果造反派在保守派失敗後能夠迅速地聯合，共享勝利果實，中國的曆史也許會改寫。認真總結他們失敗的教訓，對今後的中國社會運動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第二十章結語中，我們對全書進行總結並對中國未來的社會運動提出展望。文革結束後，中國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但是自1989年民運遭到血腥鎮壓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然，中國民眾的抗議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由無數抗議活動組成的社會運動，將推動專制國家向民主化發展。借鑒國外（特別是“阿拉伯之春”）的成功經驗，對研究中國未來的社會運動不無益處。“阿拉伯之春”因參加的人數眾多和非暴力而著稱，並有以下3個引人注目的特點：“無線”（Wireless）、“無領導者”（Leaderless）和“無階級”（Classless）。“無線”是指“阿拉伯之春”革命運動的爆發，是由新一代的信息和媒體技術（英特網、臉書和推特等）催化並構框的。按照以往的經驗，社會運動離不開有效能和有號召力的領導人。“阿拉伯之春”的實踐卻表明，運動的發動和發展離開領導者也能進行。無領導者對運動發展的好處是，能保護運動的精英和骨幹。在專制國家裏，傳統的社會運動常因為運動組織的主要領袖遭到暗殺或監禁陷於群龍無首的困境。電子網絡的出現，為社會運動的領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護。“無階級”指的是，參加“阿拉伯之春”的民眾拋開了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分歧，為改變政權萬眾一心。未來中國的社會運動是否能夠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運動的參與者能否接受先輩們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本書在分析中較多地采用統計學工具（如對數回歸模型、聚類分析模型等）。為了減少一般讀者閱讀的困難，我們盡量避免在正文中涉及統計學。我們把詳細的計算和討論放在附錄中，供有興趣的讀者參閱。在附錄中，我們還簡述全國各省級群眾組織的情況，這是我們對省級組織進行分類的依據。

第一篇 典型省的群眾運動^[49]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一項毛親自審定的通知，世人稱之為“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文革的開始^[50]。本篇將簡述 12 個省市自治區的文革群眾運動。文革期間，盡管民眾可以自由結社，繞開中共嚴密的黨組織控制，但是毛絕不允許民眾成立全國性的群眾組織。以經濟利益為宗旨的“全紅總”雖然曾經在各地擁有分部，成為文革中唯一的一個全國性的民間群眾組織，但是很快被取締。所以，文革中的群眾運動都是為省市自治區為單位的。在各省市自治區內，群眾運動都是以其省會為中心（除四川和新疆以外）。省會所在地的群眾組織主導了省內運動的發展。本書將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對文革中的群眾運動進行分析。

文革時期，中國大陸劃分為 29 個省市自治區，其中直轄市 3 個（即北京、上海和天津^[51]），自治區 5 個（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由於各省市自治區的政治、經濟、地理及人文等方面的差異，文革中群眾運動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第一章 北京

北京是中國首都，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科技的中心。北京東西寬約 160 公里，南北長約 176 公里，面積 16,411 平方公里。北京 1964 年人口普查人口為 757 萬，排全國第 23 位。1978 年，北京的 GDP 排全國第 14 位。^[52]考慮到北京市的面積和人口，其人均 GDP 在全國還是相對高的。北京不僅是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政府、全國人大、政協委員會、中央軍委和國務院所在地，而且還是中國政府各部（如外交部、國防部、高教部、公安部、財政部、鐵道部、水利部等）的所在地。北京也是中國高等院校的集中地。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北京約有 50 多所大專院校。學生的紅衛兵運動（尤其是大學的紅衛兵運動）在北京的群眾運動中占據重要的地位。本章重點介紹兩所大學和兩所中學的紅衛兵運動。

1.1 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出生地^[53]

由聶元梓等人在 5 月 25 日貼出的被毛贊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標誌著文革的群眾運動正式拉開序幕。如果不了解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就不能真正地瞭解文革。因此我們從文革的第一張大字報的出生地——北京大學——開始研究文革群眾運動的興起和滅亡。

1.1.1 第一張大字報問世的背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始於 1966 年 5 月發起的文革，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可以追溯到 1964 年進行的社教運動。1964 年 7 月，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帶了一個工作組到北京大學蹲點。這個工作組是有備而來的，目標是北京大學的陸平和北京大學校黨委。工作組一個系一個系地找各系總支書記談話，動員給陸平和校黨委提意見。

聶元梓是通過陸平調到北京大學的，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北京大學哲學系是全校的重點，也是北京市委的重點。中國科學院可以直接指導，中宣部可以下指示交任務，直接插到系裏。陸平為了掌握住哲學系，派了他認為可靠的聶元梓去執掌哲學系。聶調到北京大學後，從系的副主任提拔為系總支書記，校黨委委員。陸平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生活上對聶也相當照顧。她的住房和身邊的孩子安排得都很好，聶非常感激陸平。

按理說，作為陸平線上的人，聶元梓只要死心塌地地跟著陸平，她的仕途應該不會有問題。由於陸平有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聶元梓有了一些看法。但在工作組面前是否應該提出這些意見，聶元梓心存矛盾，有點猶豫。受工作組誠懇態度的影響，考慮到工作組是黨中央派來的，聶提出了對陸平的批評意見。工作組的張磐石把情況匯報給中央書記處，報告中把聶元梓的談話作為重要依據。張磐石把問題看得很嚴重，認為陸平和北京大學校黨委已經演變，不姓“無”而姓“資”了。

張磐石的報告引起了中央書記處的重視。經鄧小平批准，決定在北京大學搞社教運動的試點，組織了龐大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哲學系成為重點，由張磐石親自抓。工作組召集教師和幹部開會，因為人們發言態度激烈，陸平聽了受不了，直出汗，連手也哆嗦。張磐石與陸平的矛盾沖突反映到中央。1965 年 1 月，中央否定了張磐石的意見；張被撤職，工作組也撤出北京大學。彭真下令北京大學停止社教。

工作組離開後，北京大學在國際飯店召開“總結前階段的學校工作大會”。大會的實質是整治社教運動的積極分子，整治那些給陸平

提意見的人。聶元梓作為被整對象，行動受到限制。1965年10月，聶元梓經過考慮，給中共的最高層領導毛和劉寫了一封信進行申述，讓毛的秘書田家英轉交。她認為，北京大學進行社教運動是中央決定的，群眾提意見是經過工作組動員的。群眾的意見可能有錯誤，但是不應受到追究和整治。來北京大學搞社教的都是大幹部。他們走了，為什麼抓住小幹部不放？事實上，張磐石整陸平，是中宣部長陸定一指示張這麼做的。所以毛曾說過，“北京大學社教運動是姓陸的整姓陸的。”聶元梓的信交上去以後，石沉大海。

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停止後，學校的幹部和師生都到農村去參加社教運動。以聶元梓為代表的曾經批評過陸平的人，被下派到社教工作組，這些人下派後，是不准備再讓他們回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的哲學系總支書記的職務也被人取代。1966年三四月間，康生的妻子曹軼歐以中央理論小組的名義，帶了幾個人來到北京大學。曹軼歐鼓動聶元梓不要下鄉，繼續與陸平鬥爭。聶此時已經心灰意冷，不願再卷入黨內的鬥爭。

聶元梓此時已經下放到農村，只是因病回北京休息了幾天。當她正準備回農村時，中共中央發表了《五．一六通知》。《通知》的矛頭直指彭真，列舉了彭真搞的《匯報提綱》的十條罪狀，宣布這是反毛、反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是資產階級的，是修正主義。彭真成了混進中共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通知》指明，類似彭真的人物在黨內大量存在，必須進行揭露和清洗。既然彭真是被揪出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第一號人物，他在北京大學社教中力挺陸平的作法也理所當然地受到質疑。

彭真的倒臺使聶元梓看到北京大學的問題得到澄清的希望，看到了平反國際飯店會議上挨整受冤屈的希望。聶打算再寫封信給毛和劉，匯報北京大學的情況。聶找了幾位曾經受整的同事，討論如何寫信。有人提議不如寫一張大字報，該提議得到大家的贊同。聶曾寫過信，並且由毛的秘書田家英轉交，但是杳無音信。寫大字報能讓廣大群眾知道，也能反映到上層，也許比寫信更管用。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人貼出了大字報。就這樣，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問世了。

該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其主要內容如下：現在全國人民正以高昂的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可是北京大學卻按兵不動、冷冷清清。宋、陸和彭聲稱“北京大學不宜貼大字報”，“要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企圖把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的討論上去。他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制造種種清規戒律，是壓制群眾革命，不准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

命。大字報號召北京大學的師生團結起來，反對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1.1.2 工作組的進駐與撤離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貼出去以後，引起巨大的反響。1957年，參加鳴放後被打成右派的北京大學學生譚天榮，當年也是把大字報貼在大飯廳的東山牆上。這一巧合，使人聯想起當年的右派。有不少人認為右派又出現了，大字報是反革命、反黨。當然，也有不少人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學生們開始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進行爭論。圍繞對於學校工作和陸平的評價，北京大學很快形成反對和支持陸平的兩種意見。群眾中開始形成兩派。

陸平從1957年開始主管北京大學直至1964年社教期間，北京大學的一般黨員幹部、教師甚至學生中，普遍存在對陸平的不滿情緒。陸平上任不久就搞了個反右補課，增劃右派173人。1959年北京大學反右傾，陸平搞擴大化。陸平在北京大學整了很多很多人。北京大學內部對以陸平為代表的官僚的不滿，形成了反對和批判陸平和校黨委的一派群眾。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聶元梓等7人寫的大字報，表明毛和中央支持他們的行動。支持聶等人大字報的師生們受到鼓舞。處於觀望態度的人們不再猶豫，紛紛表示響應中央的號召，批判陸平和校黨委。以前支持陸平和校黨委的人們也轉變立場，開始批判陸平和校黨委。

當晚，華北局派出以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工作組接管了學校大權，實行“反右、矛頭向下”的方針。換言之，他們把鬥爭的目標指向基層幹部，出身不好或有一般歷史問題的教師和教授，以及出身不好的學生。工作組把所有的師生排隊，分為好的、比較好的、犯有嚴重錯誤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四類。從工作組進駐到6月26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全校各級幹部、教師被鬥人數達230人，被戴高帽子遊街者達107人。工作組執掌北京大學的50多天裏，非正常死亡達到4人。6月18日，北京大學出現亂批亂鬥的混亂局面。工作組把這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對參與此次批鬥活動的師生和職工進行清查批判。工作組並不是制止鬥爭，而是試圖由工作組來領導鬥爭。

7月19日，聶元梓在哲學系對師生講話，說“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次日，北京大學支持和反對工作組的兩派群眾進行大辯論，兩派的大字報布滿了校園。6名高幹子弟貼出了《愛護工作組，保護工作組》的大字報。另有人針鋒相對在其下方貼出反對工作組的

大字報。中央文革成員來到北京大學調查。北京大學師生就工作組問題進行激烈的公開辯論。中央文革贊成撤銷北京大學工作組。江青建議北京大學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由聶元梓負責籌建。

1.1.3 群眾組織的興起

8月中旬，北京大學的幾個高幹子弟吸收一些工農子弟，組建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各系開始出現群眾組織，如曆史系有“延安戰鬥隊”，“紅色清道夫戰鬥隊”，“橘子洲戰鬥隊”，“紅梅戰鬥隊”等。9月初，北京大學進行校系兩級文化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文革會”）的民主選舉。全校有選舉權的是13,836人，實際在校參加投票的為9,609人^[54]。這種“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在文革中極為罕見，並未在北京和全國推廣。聶元梓當選為北京大學文革會主任，42名校文革會委員由各系選舉推出。此時，北京大學各系的群眾組織林立，有眾多的戰鬥隊。9月底，相同觀點的幾十個戰鬥隊召開串聯會，會上有人提議成立跨系的紅衛兵組織，取名為“新北大紅旗兵團紅衛兵”（簡稱“紅旗兵團”）。成員們一律配戴印有“紅旗”的袖章，有5人被選為總部成員。“紅旗兵團”是支持聶元梓的中堅。

10月初，有人貼出反聶元梓的大字報，批判聶元梓“執行了一條右傾保守的改良主義路線”。以幹部子弟為主的“主義兵”站在反聶一邊。支持聶元梓的一派也貼出大字報，針鋒相對。北京大學出現了支持和反對校文革會的兩大派別，逐漸形成“紅旗兵團”、“北京公社”、“東風兵團”、“紅教工”等支持校文革的“擁聶派”，和“井岡山”、“紅聯軍”、“主義兵”等反對校文革會的“反聶派”。

“反聶派”反對聶元梓和以聶為首的校文革會的理由之一是，聶和校文革會執行的是資反路線。事實上，聶和校文革會是反對陸平、反對工作組的，是得到毛和中央文革支持的。“反聶派”採取了更激進的立場。11月12日，“反聶派”因為不同意《新北大》校刊的觀點，砸了校刊編輯部，關押辦公人員，撕毀書刊，切斷電話。毛的女兒李訥和中央文革人員看了現場。此事被中央文革定為“反革命事件”。12月23日，“反聶派”的成員、經濟系教師楊勳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被抓，導致“反聶派”受到牽連。“擁聶派”的群眾組織“紅旗兵團”、“北京公社”和“東風兵團”趁機查封了反聶的“井岡山”和“紅聯軍”的辦公室。“反聶派”開始瓦解崩潰。1967年1月8日，63軍派解放軍進駐北京大學搞軍訓。原有的“擁聶派”組織

“紅旗兵團”、“北京公社”、“東風兵團”和“紅教工”合並成立“新北大公社”。

中央文革頻頻號召掌權的群眾組織領導人開展整風，清除各種不良之風。1967年3月3日，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作者之一的郭羅基貼出大字報，批評聶元梓驕傲自滿，文過飾非，官僚作風。該大字報並非出於惡意，但埋下了分裂的種子，“新北大公社”出現了裂縫。當6月5日陳伯達提出北京大學是“一潭死水”，要“掀起大風浪”時，北京大學再次出現分裂。

整風中的反對派與過去的“反聶派”骨幹形成了新的“反聶派”。數日內，反聶的“新北大井岡山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總部”和“新北大北京公社”相繼成立，加上此前在5月份成立的“新北大東方紅公社”和“紅旗飄戰鬥隊”，這些組織形成了新的反對派，人們簡稱該派為“井、紅、團、零、飄”。8月17日，上述5個組織聯合成立“新北大井岡山兵團”，著名的物理學家周培源教授曾是該組織的第一號領導人。後來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周培源教授退出該組織。反聶的“井岡山兵團”提出，要在北京大學“二次奪權”、“二次革命”。

在整風中，“擁聶派”也出現兩派。一派是壓制給校文革會和聶元梓提意見的死保派——“聯戰”。另一派支持校文革會和聶，但是堅持批判聶的錯誤，堅持繼續整風的溫和派——“六·六串聯會”。儘管“擁聶派”內部分為兩派，但分而不裂，在對付“反聶派”上立場基本一致。8月1日，擁聶的“聯戰”和“六·六串聯會”聯合，重組“新北大公社”。

1.1.4 北京大學群眾運動的困境

北京大學圍繞奪權問題陷入內戰。兩派都想壓倒對方，使自己在運動後期處於有利的地位。雙方的領導人都被本派中的激進派綁架，沒有勇氣和智慧脫離派別鬥爭。聶元梓曾多次試圖退出文革會。1967年2月，聶在校文革常委會、公社總部、各系戰鬥團團長聯席會上提出，她本人和校文革會無力領導北京大學運動，提出辭職，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反對。同年7月，聶在校文革常委會提出解散校文革會並辭去校文革會主任職務，又遭到常委們的反對。8月，聶在中央文革的接見會上，當著周恩來和江青的面，又一次提出解散北京大學校文革會並辭去校文革會主任的職務，被江青否決並遭到江的訓斥。聶元梓甚至想偷渡香港一走了之，但是她放心不下兒子。她必須帶兒子一起走，可是兒子的游泳技術差，只能遊1,000米，於是作罷。

北京大學兩派的鬥爭逐步升級，1968年3月底終於爆發武鬥。3月29日，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李鐘奇到北京大學視察制止武鬥被打傷。不僅北京大學發生大規模的武鬥並死了人，全國也進入全面武鬥的階段。

1.2 清華大學：武鬥終止地^[55]

清華大學是北京大學的近鄰，兩校人員的來往比較方便。一個學校有重大的事件發生，另一個學校很快就會知曉。如果說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標志著文革群眾運動開始，發生在清華大學的武鬥是導致文革群眾運動終止的原因。因此，不了解清華大學的文革，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國的文革。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矛頭直指北京大學黨委，《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明確地把北京大學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新改組的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化大革命並代行校黨委職權。這些消息猶如一顆顆重磅炸彈，爆炸在北京大學的上空，也震撼了清華大學校園。

1.2.1 保蔣還是反蔣

6月2日，清華大學的學生貼出大字報，聲援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清華大學校園裏同時出現矛頭指向清華大學黨委和校長蔣南翔的大字報。既然北京大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那麼清華大學黨委有問題也是可能的。6月3日，清華大學校黨委組織反擊。蔣南翔自1952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至1966年已有14年。這是他苦心經營多年的根據地。校黨委依靠強大有效的政工系統，組織力量對懷疑蔣校長和清華大學黨委的論調進行迎頭痛擊。輔導員、各級幹部、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被動員起來，貼出保衛校黨委、保衛蔣校長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聲勢浩大，頃刻間就把那些對蔣和校黨委持懷疑意見的大字報壓了下去。

然而6月4日開始，高幹子弟劉濤（劉少奇之女）、賀鵬飛（賀龍之子）、王小平（王任重之女）、喬宗淮（喬冠華之子）、劉菊芬（劉寧一之子）、鄭易生（冶金部長鄭天翔之子）和李黎風（李井泉之子）等人貼出大字報，把矛頭對准蔣南翔和校黨委。劉濤公開質疑：蔣南翔是姓“馬”（馬列主義）還是姓“修”（修正主義）？清華大學究竟是“延安”（革命）還是“西安”（反革命）？高幹子弟的大字報釋放了相當重要的信息，在清華大學師生中引起巨大的震動。從來沒有思考過的尖銳問題突然擺在大家的面前。

清華大學的群眾運動就這樣開始了，第一階段圍繞著保蔣和反蔣進行。師生們就校黨委是“延安”還是“西安”、蔣南翔是姓“馬”還是姓“修”進行激辯。“保蔣派”認為應該肯定校黨委和蔣南翔，堅持肯定 17 年是紅線主導。“反蔣派”則認為需要“徹底砸爛舊清華大學”，校黨委和蔣南翔是修正主義，必須打倒。

6 月 9 日，新組建的北京市委派出龐大的擁有 500 多人的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工作組以葉林為組長，周赤萍和楊天放為副組長，代行黨委職權，領導文革運動。清華大學進入保工作組與反工作組的第二階段。6 月 10 日，中央書記處決定高等教育部長蔣南翔停職反省。6 月 13 日，清華大學工作組宣布停止蔣南翔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一切職務。清華大學的師生員工突然驚醒，沒有想到以蔣南翔為首的清華大學黨委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許多曾經保蔣的師生（尤其是幹部）紛紛“反水”，大呼受騙上當。學生們開始抓黑幫和抓保皇派，進行批鬥和遊街。工作組成員出面勸阻學生，批評學生不講政策，甚至說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組織性紀律性太差。

1.2.2 保工作組還是反工作組

對此，有的學生貼出大字報，認為工作組不可信任。6 月 16 日，蒯大富和另一位同學貼出題為《工作組往哪裏去？》的大字報，公開表示對工作組的質疑。6 月 21 日，王光美來到蒯大富所在的清華大學工化系進行蹲點，她的正式職務是工作組顧問。事實上，她是劉少奇派來的眼線，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實權人物。同日，蒯大富在一張大字報下面留下批語，提出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如果工作組不能代表清華大學革命左派，就應該再奪權。6 月 23 日，以蒯大富為首的 10 人貼出大字報，與葉林直接交火，並對王光美食言未參加座談會進行抨擊，引起全校的關注。一位在文革中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開始進入人們的視線。

工作組從蒯大富的批語中，認定他是想奪工作組的權力。他的批語成為工作組定他為反革命的重要證據。工作組於 6 月 24 日組織辯論會，試圖對蒯大富等人進行嚴厲的批判。想不到的是，毫不膽怯的蒯大富侃侃而談，充分展示了雄辯口才。工作組企圖以勢壓人，結果卻捉襟見肘，疲於應付。辯論會上，清華大學師生的輿論倒向了蒯大富。次日，工作組開始“反蔣必先反蒯”的運動，提出反工作組就是反黨，蒯被定為反工作組、想要奪權的反革命分子。工作組的工作非常有效。全校的輿論立即發生變化，在數小時之內，大字報由批評工作組轉變為批判蒯大富。蒯大富失去了自由，被工作組看管起來。蒯以超人的勇氣和膽略，只身與工作組和眾人對抗。7 月 4 日，蒯大富

開始絕食抗議非法政治迫害，不承認反黨、反劉少奇。不過，他對個人前途已經絕望，寫信給舅舅要錢，準備接受勞改。

到7月18日，反蒯鬥爭毫無征兆地突然剎車了。7月20日，蒯大富被釋放，重新獲得自由。清華大學形勢的突然變向，是上層鬥爭角力的結果。因為毛批評劉、鄧犯了方向性錯誤，提出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7月28日，北京新市委宣布撤銷工作組。工作組臨走前組建了“臨時籌委會”，繼續領導清華大學的文革。7月31日，周恩來分兩次聽取蒯大富的匯報，了解清華大學前段時間的運動情況。8月4日晚，周恩來帶領約100多中央委員到清華大學開現場會。全校的輿論仍認為蒯大富是反革命，可見工作組反蒯運動的巨大影響。周恩來在會上公開為蒯大富平反。保工作組還是反工作組的爭論，終於以工作組的失敗告終。

1.2.3 紅衛兵的興起

此刻在清華大學校園外，清華大學附中的中學生已經組織起紅衛兵。他們貼了3張大字報，毛回信表示支持。有些大學裏也出現紅衛兵組織。在清華大學校園內，因為工作組的反蒯運動，學生間的對立情緒相當嚴重。對於下一步運動如何進行，清華大學的師生發生分歧。一部分人認為工作組已經檢討了，下面應該鬥黑幫了，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應該繼續批判工作組的錯誤。工作組扶植的“臨時籌委會”贊成鬥黑幫的主張。

8月8日，堅持繼續批工作組的師生成立“八．八串聯會”。認為應該鬥黑幫的師生不甘示弱，第二天成立“八．九串聯會”。8月19日，劉濤等人成立以幹部子弟和軍隊幹部子弟為主的“清華大學紅衛兵”（因其觀點與“八．九串聯會”相同，也稱為“八．九紅衛兵”）。8月22日，以平民子弟為主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56]（因其觀點與“八．八串聯會”相同，也稱為“八．八紅衛兵”）也成立。4個群眾組織的成立，開始了兩派對峙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雖然工作組撤走了，但它的勢力和影響依然在，其代表是“八．九派”。蒯大富和他的同情者雖然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但是還沒得到徹底平反和翻身，處於邊緣狀態。從人數上看，“八．九派”是多數派，“八．八派”是少數派。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12日閉幕，劉少奇從黨內的第2位降為第8位。清華大學立即有了反應。有人貼出大字報，指控王光美是大扒手。劉濤、賀鵬飛等高幹子弟也開始反戈一擊。清華大學的師生們明顯地看出，劉少奇和王光美肯定有問題，於是貼王光美的大字報激增。但是，“八．九派”的高幹子弟把師生對王光美和劉少奇的批

評看成是右派翻天、攻擊黨中央。8月24日下午，賀鵬飛、劉濤、劉菊芬等人組織“八．九紅衛兵”和清華大學附中、人大附中等12所中學的紅衛兵，在清華大學刮起一場“紅色恐怖”行動，用武力打擊敢於造他們父母反的群眾。他們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他們撕毀大字報；在此後的一個多星期內，沒有人再敢貼大字報。該派紅衛兵還押著校系的領導和機關人員，強迫他們拆毀清華大學的標志性建築——二校門。

1.2.4 蒯大富的崛起

8月27日至9月6日，北京陸續出現了3個跨市的大學紅衛兵組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簡稱“首都紅一司”或“首都一司”）^[57]、“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首都紅二司”或“首都二司”）^[58]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59]（即“第三司令部”，簡稱“首都紅三司”或“首都三司”）。蒯大富盡管在社會上名氣挺大，但是在清華大學卻並不受待見，只是一個光杆司令。蒯大富曾想參加“八．八派”，卻被拒之門外。曆史就是這樣捉弄人。如果蒯大富被吸收加入“八．八派”，也許他會成為其中的一位有影響的人物，但不會成為一派組織的頭號人物，中國的文革也就少了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不過，曆史沒有“如果”。當時，蒯大富只是以個人的名義參加“首都紅三司”，獲得一個組織負責人的身份。事實上，蒯並未在該組織做過多少工作。

9月24日，以蒯大富、鮑長康、彭偉民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簡稱“清華井岡山”）正式宣告成立。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批工作組的錯誤路線，批清華大學“八．九派”紅衛兵，為“蒯式人物”平反。由於“清華井岡山”是聞名的、飽受爭議的蒯大富領導的紅衛兵，引起大家的極大關注。“清華井岡山”的成立，標志著清華大學的文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清華大學的“八．九派”逐步並最後退出清華大學的文革舞臺。“八．八派”分裂為“八．八總部”和“八．八臨時總部”，而“清華井岡山”蒸蒸日上，成為清華大學校園裏的第一大造反派組織。“清華井岡山”得以迅速發展，不僅源於中央文革的公開支持，而且因為它吸收非紅五類的師生參加。

12月19日，在中央的號召和群眾的促進下，“清華井岡山”、“八．八總部”和“八．八臨時總部”聯合起來成立“清華井岡山兵團”（簡稱“井岡山兵團”），一統清華大學天下。“井岡山兵團”的成立，使清華大學的文革進入又一個新的階段。“井岡山兵團”成立後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到天安門廣場宣傳打倒劉少奇。這一行動是

由張春橋向蒯大富面授機宜的，這一切又是毛的意圖。北京的其他大學也參加到天安門的反劉宣傳中來。他們的行動受到不少民眾的支持。12月28日，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在大會上檢討，揭發劉少奇和王光美的罪行。她的長達4個小時的講話錄了音，在全市傳播。“井岡山兵團”的刊物《井岡山報》也刊登了她的檢討全文。劉濤的檢討引起市民們的密切關注，劉少奇和王光美很快垮臺了。

“井岡山兵團”成立不久就出現分裂。雖然“清華井岡山”與“八·八派”的旗號消失了，但是在表面統一的兵團之下，又出現了好幾個“縱隊”、“團”之類的組織。“清華井岡山”的核心力量換了名字，叫做“二·八團”（簡稱“團派”），“八·八派”則出現了“八·八縱隊”、“東方紅縱隊”和“毛澤東思想縱隊”，人們簡稱為“縱隊派”。原有的紅衛兵組織聯合後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並沒有真正聯合。“團派”和“縱隊派”之間存在著許多分歧意見，分歧的核心是如何看待文革前17年的問題。“團派”認為17年的教育路線是修正主義的，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對17年必須全面否定。該觀點也叫作“徹底砸爛論”，或“黑線主導論”。“縱隊派”認為，17年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同樣照耀在教育戰線上，該觀點也稱為“紅線主導論”。

1967年3月，中央號召解散跨車間、跨班組、跨系、跨班級的組織，按行政系統實現大聯合。“團派”和“縱隊派”的所屬組織宣布解散。但是“縱隊派”深感幾個縱隊解散以後力量分散，經過密謀，於4月14日成立“四·一四串聯會”。這一串聯會的成立，標志著清華大學文革進入最後的兩派全面對抗的階段。串聯會成立後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廣播問題。“四·一四串聯會”希望學校的廣播站廣播串聯會成立的消息，遭到拒絕。為此，“四·一四串聯會”組織人馬強行占領廣播站，播出消息，但很快被原來“團派”的人趕了出來。雖然此次沖突只是赤手空拳，雙方沒有傷亡，但標志著清華大學兩派武力沖突的開始。兩派的沖突朝徒手到器械、長矛到真槍實彈的方向發展。

為了擺脫被動，蒯大富為首的“團派”提出在5月底以前成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並於4月30日宣布成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5月21日，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團派”和“四·一四派”負責人，主持兩派的協商談判會議。在謝富治的主持下，兩派達成了著名的《四項協議》。協議規定：（1）雙方停止一切“內戰”，不許相互攻擊；（2）雙方整風、自我批評，逐漸實現按班和系的大聯合；（3）調整和擴大“革籌小組”和總部，盡快實現學校的三結合；（4）“井岡山兵團”總部、“革籌小組”作出的決議必

須執行。經過討價還價式的協商和談判，雙方決定“革籌小組”由22人組成，其中學生13人，革命幹部5人，教職工4人。組長蒯大富。13名學生代表中，“團派”占9人，“四．一四派”有4人。

談判中，“四派”的代表擔心，因為“團派”占絕對優勢，將來很可能做出不利“四派”的決議，堅持在協議的第四條加“正確”兩個字，即“‘井岡山兵團’總部、‘革籌小組’作出的正確決議必須執行”。“團派”代表堅決不同意，謝富治也不同意。“四派”代表迫於謝富治的強硬態度，被迫在協議上簽了字。顯然，這一協議對於“團派”非常有利，可以看作是他們的勝利。當“四．一四派”代表向本派的群眾宣布協議時，遭到本派群眾的質問和非議。“四．一四派”其他沒有參加協商的領導人發表聲明，公開否定和抵制《四項協議》。參加協商的領導人也自感立場不夠堅定，沒有為本派的群眾爭得利益，因而默許這一撕毀協議的舉動。清華大學聯合的最後一線希望破滅了。

1.2.5 “四．一四派”的正式決裂

正當“團派”喜氣洋洋，全力以赴地準備召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的慶典時，“四．一四派”決定與蒯大富為首的“團派”徹底決裂，成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簡稱“四．一四總部”、“四派”）。“團派”把5月30日定為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日子，“四．一四派”把公開宣布與蒯大富所領導的“團派”分裂的時間選在5月29日。這個日子是精心計算過的。在5月30日革委會成立之前成立“四．一四總部”，是紅衛兵組織內部鬧分裂的問題。如果在革委會成立之後再成立“四．一四總部”，那就是公然與新生的革命政權對抗，性質要嚴重多了。由於分裂，清華大學革委會未能如期成立，“團派”的革委會流產了。此後，清華大學出現一強一弱、一朝一野的兩個紅衛兵組織並存的局面。

1967年5月和12月，清華大學校園裏曾出現過代表中間派的第三種勢力，即“五．七串聯會”和“一二．二五戰團”。他們反對派性，反對分裂，反對武鬥，促進聯合，深得清華大學絕大多數師生員工的共鳴和支持，但是他們並未成功。兩派的爭鬥還涉及權力和利益。無論是“團派”還是“四派”，都在盡力地爭權，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派性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政治根源。而且，走極端常常被視為最革命、最堅定、最勇敢。

1968年4月23日，清華大學開始百日武鬥。“團派”主動發起攻擊，企圖把“四派”趕出校園。5月30日，清華大學發生死傷最慘重最血腥的大武鬥。為了攻占久攻不下的東區浴室，“團派”放火燒

荒，使之陷入火海之中，有多人在武鬥中死亡。清華大學是所理工科大學，武鬥中很快出現了土雷、土炮甚至土坦克。5月30日後，“團派”團團圍住科學館內的“四派”。被圍的“四派”人員受困於館內，不能出大門一步。試圖突圍的“四派”，用炸藥炸壞通往清華大學高壓電線，導致周圍地區停電4小時。“四派”總部決定從動農館與科學館雙向對挖地道，以解救科學館內100多位“老四”脫險。指令一下，大家一刻也不停留，馬上幹了起來。7月9日，“團派”又采用火攻，科學館頂樓完全燒毀。當天下午，“四派”抬著一名被打死的“四派”成員的屍體到天安門廣場、前門大街、北京市革委會等地遊行，並向毛和中央發出電報求救。中央派謝富治、吳德等人介入，希望停止武鬥但未果。面對困境，“四派”的領導人沈如槐不得不決定，如果被圍的“四派”人員能夠脫離險境，他將帶領全體“四派”人員撤出清華大學。然而天不從人願，“四派”突圍的地道被“團派”發現，“團派”用炸藥炸塌了地道，“四派”被圍人員突圍的最後希望破滅。

1.2.6 紅衛兵運動的結束

正當“四派”絕望之時，7月27日，毛終下決心解決全國連綿不斷的武鬥問題，北京的3萬多名工人開進清華大學。“團派”開槍打死5名工人。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召見北京的五大紅衛兵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毛與他們談話長達五個半小時。蒯大富遲到了3個小時。這次召見，標志著文革造反的結束和造反派的終結，全國各地進入恢復新秩序的階段。毛終於拋棄了他曾利用的年輕無知的學生。

1.3 “天派”與“地派”

1967年1月，上海的奪權風波影響了全國。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北京的一些大學開始了奪權運動。遵照周的指示，大學按照系統奪權，所以就在教育口奪權。在奪權中，矛盾集中在由誰來掌權；具體地說，集中在對盧正義的評價上。北京的幾所大學發生矛盾，這是北京的“天派”與“地派”分裂的開端。

一部分大學生支持高教部的一個叫做盧正義的幹部出來掌權，北京大學的學生認為盧正義的曆史有問題，是叛徒，堅決反對。為此，兩邊爭執不下。北京師範大學（簡稱“北師大”）的“井岡山”和它的領導人譚厚蘭支持盧正義掌權。《紅旗》雜誌的林傑與譚厚蘭關係很好，林傑又與戚本禹關係很好，因為他們都是《紅旗》雜誌社的。

這樣，作為中央文革成員的戚本禹介入派性鬥爭。由於有中央文革成員的支持，譚厚蘭出頭反對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北京大學的學生當然不幹了，於是與譚厚蘭發生矛盾，他們進行辯論和激烈的爭執。

北京的造反派分裂了。北京地質學院（簡稱“地院”）的“東方紅”和王大賓支持北京師範大學的“井岡山”和譚厚蘭，反對北京大學。1967年4月11日，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帶著幾個學校的學生到北京大學抗議。他們乘坐汽車，開著高音大喇叭，在北京大學校園裏遊行一圈，呼喊口號：“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組織”，是“二月逆流派”，“北京大學校文革壓制真正的造反派”。他們的汽車開到南校門，被驚動的北京大學學生湧出來，關起校門，跟他們辯論。事態危急，很有可能發生武鬥。幸好北京大學的學生盡管人數占優，但比較克制，所以未打起來，事件平息了。

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航的韓愛晶觀點相近，形成“天派”，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則形成“地派”。其實“天派”和“地派”沒有什麼大的原則差別，同一派內部的看法也不一致。如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和清華大學的“團派”觀點比較接近，清華大學的“四·一四派”則參加了“地派”。天地兩派之間也沒有什麼大的沖突，有時搞一些小動作，如“天派”的韓愛晶和蒯大富在北京師範大學扶持一個與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對立的小組織，與譚厚蘭作對。

對於“天派”和“地派”的說法，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持否定態度。她認為這種叫法是中央文革搞的，事實上並不存在“天派”和“地派”。

1.4 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誕生地^[60]

清華大學是所享譽中外的高等學府，也是中國的莘莘學子向往的聖殿。清華大學附中在清華大學的光環下，也顯得非同凡響。能夠到清華大學附中讀書的中學生，應該算是天之驕子。清華大學附中地處清華大學等八大學院和高等軍事院校環繞之中，高級知識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識背景的中層幹部子弟是其核心。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中還有許多高級幹部子女，他們中間不乏部長和將軍之後。清華大學附中是紅衛兵的發源地，所以本章將敘述紅衛兵的產生經過。

1.4.1 紅衛兵的誕生

知識分子子弟和幹部子弟兩派，在文革前的 1964 年已經進行過一次較量。平民子弟婁琦與幹部子弟熊剛發生爭執，婁琦打了熊剛一拳。校長把事件上升到“打幹部子弟”的階級路線高度，引發知識分子子弟的不滿。雖然事件最後以雙方認錯平息了風波，但是階級出身的鴻溝已經把學生分為兩派。

評《海瑞罷官》、批“三家村”運動的開展，中央的《五·一六通知》，通過上層渠道流傳到學生中間的各種內幕消息，影響了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1966 年 5 月中旬，有幹部子弟貼出牆報，公開質疑學校領導，引起學校內的緊張。知識分子子弟也形成一個小組，商量對策，與幹部子弟暗中對抗。當時擁護校領導的學生占多數，反對校領導的學生是少數派。5 月下旬，在巨大的壓力下，少數派的骨幹開始在熄燈後跑到圓明園秘密碰頭，商量如何在學校掀起運動，揭發校領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5 月 29 日下午，在圓明園召開的各班不同政見骨幹分子會上，成立了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當然，這是個十分松散的、有相同政見的一群人的聚合。

“紅衛兵”的名稱來源於張承志曾在小字報上的署名。6 月 1 日晚，少數派又一次開會，決定採用“紅衛兵”的名義貼出大字報，並決定把 5 月 29 日定為紅衛兵成立日。6 月 2 日，第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出現在清華大學附中校園。大字報旗幟鮮明地向校領導挑戰：堅決拔掉黑旗，砸爛黑店，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擁護該大字報的簽名者有 100 多人。但是擁護校領導聲討“紅衛兵”的大字報的人數更多，他們當中有不少是擔任黨團幹部的幹部子弟。

“紅衛兵”就這樣橫空出世，走上中國的政治舞臺。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紅衛兵”這三個普通的漢字會風靡全國甚至世界。

1.4.2 對抗工作組

紅衛兵的出現，迅速吸引了越來越多驚奇的目光。北京市各中學學生紛紛湧到清華大學附中觀看大字報，並紛紛以某校紅衛兵的署名來表示他們對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支持。紅衛兵不脛而走，出現在京城的各個校園。

6 月 8 日晚，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附中。第二天（即 6 月 9 日）晚上，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明確支持紅衛兵，稱他們是堅定的左派，並宣布學校領導班子靠邊站，交待問題。學校的大字報出現了 180 度的轉彎，支持紅衛兵的人數迅速上升。6 月 17 至 20 日，全校進行了 3 次批鬥校領導大會，校長萬邦儒在 20 日被宣布撤職反省。

6月21日，全校召開師生代表大會選舉革命委員會。工作組要求在人選上有更大的代表性，遭到紅衛兵的拒絕，21名革委會委員基本由紅衛兵組成。知識分子子弟看到這些幹部子弟走上主席臺，內心感到“個個面目可憎”。工作組這才感覺到，紅衛兵並非是一群可以任意擺布的中學生，他們已經表現出強烈的權力意識。工作組不能容忍在正統的黨組織外出現第二個權力中心，開始籌建新的分團委來取代由紅衛兵控制的革委會，企圖消化紅衛兵。盡管工作組與紅衛兵有分歧，但是在批判校領導的問題上是一致的，而且批判範圍擴大到老師和右派學生。

6月23日，團中央發表社論，強調左派要服從工作組，團結大多數。6月24日，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貼出兩張大字報公開反擊：《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是徹底鬧革命》和《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第二張大字報的第一句話，提出一個令人震驚的觀點：革命就是造反。大字報還提出：“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敢造反。”明眼人一看就是針對掌權的工作組。工作組感到，在共產黨的天下提倡造反不可思議。聰明紅衛兵故意留了個破綻，沒有說明“革命就是造反”這段話的出處。工作組果然上當，把這段話定性為“反動”。實際上，這句話出自6月9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短評。毛曾說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7月4日，紅衛兵在另一張大字報中正式引用毛的語錄時，工作組非常被動。不過工作組採取以下3條措施奪回了主動權。首先，工作組成立分團委，由自己擔任正副書記，取代革委會。第二，採用迂回戰術，做紅衛兵家長的工作。第三，把紅衛兵骨幹拉到軍營裏去進行軍訓。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召開大會，宣布撤銷中學工作組。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宣讀兩張大字報——《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並把大字報底稿和一封信交給江青，請毛判定他們的大字報是否反動。江青答應了紅衛兵的要求，並向紅衛兵喊道：“我支持你們！”

毛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公布他在8月1日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信，對紅衛兵的造反精神“表示熱烈的支持”。毛澤東支持紅衛兵的消息不脛而走，紅衛兵立即成了最光彩的稱號；各學校的學生組織放棄原來五花八門的組織名稱，紛紛改成紅衛兵。至此，紅衛兵運動開始蔓延全國。

1.5 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紅衛兵暴力的發源地^[61]

1966年8月5日，發生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的學生打死校長的“卞仲耘事件”。因為事件的部分事實尚未澄清，凶手至今仍逍遙法外，在華人學界爭論了近30年。由於與當時中共的最高層有關，該事件更加引人注目。卞仲耘事件是北京文革中的第一起死人事件。事件發生的13天後，毛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該校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宋為毛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的照片成為文革標志之一。毛提議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暗示毛對暴力的默許，此後紅衛兵暴力迅速蔓延全國。可以說卞仲耘事件是文革中紅衛兵暴力的開端。

1.5.1 暴力的開始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也在第二天的新聞聯播中廣播。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的3位學生（即劉進、宋彬彬和馬德秀）隨即貼出大字報，指責學校領導阻礙學生參加文革。大字報使學校陷入混亂，3位貼大字報的學生受到譴責。6月3日晚，中央團委的胡啟立到學校，表示支持，3位貼大字報的學生。次日，以張世棟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學校。6月6日，工作組主持成立校革命師生代表會，由2名教師和5名學生組成學校領導班子，原校領導靠邊站了。各班的團支部和班委會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組和年級核心小組。

在工作組的領導下，6月21日下午，學校召開揭批校領導的大會。卞仲耘校長一人站在臺上，其他4名領導站在臺下。次日繼續開批判大會。兩次大會都發生了針對校領導的暴力行為，卞仲耘挨打最多。卞仲耘在被批鬥的當天，向中央和鄧小平寫信反映被打的情況，希望中央能制止暴力，但是並未獲得中央的回應。7月3日，卞仲耘被工作組定為敵我矛盾。7月5日，工作組向鄧小平匯報情況，鄧對卞仲耘被定為敵我矛盾未表示異議。7月30日，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宣布撤離女附中，原因是毛對工作組領導文革不滿。在工作組的領導下，卞仲耘已經遭到嚴重的暴力對待，工作組的撤離意味著卞將承受更殘酷的暴力。

1.5.2 女校長之死

工作組的撤離，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學生思想的混亂。8月4日，卞仲耘被勒令交出她寫給中央的信的底稿。8月5日，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員接到通知，命令他們參加下午召開的批鬥大會。批鬥分為4個階段。首先，5位校領導在操場上遊街，繞場3周以吸引更多的學生。第二階段是領導們被拉到學生宿舍前的高臺上受批鬥。批鬥

完之後，他們被強迫在校園內抬土。最後，他們又被分散到各處去打掃走廊和廁所的衛生。

下午 2 時，暴力開始了。副校長告訴學生們，他們召開批鬥大會需要得到市黨委的批准。學生們不但不聽，反而把一瓶墨汁倒在她身上。3 時左右，學校領導被推上高臺接受批鬥。那位副校長又一次聲辯她不是黑幫。有學生高喊，：“到木工房去拿木棍去！”拿回來的是帶有鐵釘和鏢絲的桌椅腿，打在人身上留下一個個血印。批鬥結束後，領導們被強迫去抬土。他們根本抬不動，又挨了打。大約在 4 時左右，卞仲耘倒下了。她躺在潮濕的土地裏，流著血，嘴角吐著綠色的沫子，白襯衫已經變成黑色。幾個工人被叫來，把卞仲耘拖走。學生認為卞是裝死。

卞仲耘在無人關注的情況下被放在露天。直到晚上 6:30，學生才讓一位副校長把卞仲耘抬起來放入室內，但是為時已晚。當副校長清理卞身上的髒物時，知道她幾乎沒有救了，要求學生立即把卞送到醫院搶救。後來，來了一位鄰校的醫生，打了強心針。卞仲耘被送到附近的醫院，晚上 9 時，醫生宣布卞死亡。

卞仲耘死後，女附中的學生劉進和宋彬彬向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匯報情況。吳德遲疑了一下，說道：“死了就死了。”

1.5.3 毛的支持

在卞仲耘死後的第 13 天，即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紅衛兵。為了證明紅衛兵獲最高領導的支持，作為紅衛兵代表的宋彬彬向毛獻上紅衛兵袖章。

毛問宋：“你叫什麼名字？”

宋答道：“宋彬彬。”

毛又問道：“是文質彬彬的彬嗎？”

宋答：“是。”

毛說道：“要武嘛。”

宋與毛握手，激動得不知所措。宋當時戴著一副眼鏡，紮著小辮子。那張記錄了宋為毛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照片，成為文革的經典之作。以後《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刊載以宋要武為作者姓名的文章《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改名為要武學校。紅衛兵暴力在毛的“要武”的號召下，迅速蔓延到全國。

第二章 上海^[62]

文革中北京群眾運動的發展，大學占據了主導地位，特別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北京工人組織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充其量不過是大學生組織的跟隨者。相比之下，上海的工人運動在當地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因為上海是中國當時工人最集中的城市。如果說上世紀 60 年代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上海就是中國的經濟重心和工業中心。上海的“工總司”，是全國規模最大、影響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群眾組織。它控制上海局勢長達十年，它的領袖王洪文曾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度取代林彪成為毛的接班人。上海“工總司”在上海和全國的文革進程中，有著無可比擬的地位和影響。不了解上海“工總司”，就無法了解文革中的工人運動；不了解文革中的工人運動，了解文革也就無從談起。

2.1 上海“工總司”的兩位核心人物

“工總司”的成立和發展離不開兩個人：潘國平和王洪文。潘國平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早期的重要人物，號稱“潘司令”。潘 1962 年初中畢業參了軍，因膝蓋受傷於 1964 年 10 月提前複員。複員後潘進了上海玻璃機械廠，當模具木工。因為多才多藝，潘進廠不久就被借調到廠工會。雖然是工人編制，但是幹的是幹部的活^[63]。這是廠黨委對他的培養。所以他每天提早上班打掃辦公室，努力好好表現。文革開始時，潘國平才 20 歲。

潘國平當初應算是“保守派”，他的造反是為了保本廠的黨委幹部。文革前，他所在的工廠進行“四清”，工廠裏的幹部全都遭殃：廠黨委書記是“貪大求洋”，一個廠長是“叛徒”，另一個廠長成了“變節分子”。工廠裏的中層幹部不是“招降納叛”，就是“階級異己分子”。潘國平認為，工作組對幹部的打擊面太大。受聶元梓的大字報的鼓舞，1966 年 6 月上旬，他給廠裏的“四清”工作組貼了大字報：《工作組包庇牛鬼蛇神過關》。

潘國平的大字報立即遭到工作組組織的反擊，廠裏貼滿反駁潘的大字報。工作組稱潘的大字報是“大毒草”，對潘組織圍攻並扣發工資。工作組還整理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交給公安局，要求抓捕潘國平這個“反革命”。所幸的是，公安局並未抓捕潘國平。當年 8 月下旬，工廠裏成立了紅衛兵。潘因為反對過工作組，沒有資格參加。潘原打算報考上海戲劇學院，因為工作組拒絕開單位證明，潘未能考成。

潘國平去市委告狀，遇到北京來的紅衛兵，潘向他們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北京的紅衛兵告訴潘說，在北京工作組早就被趕出去了。紅衛兵使潘大開眼界。他跟著紅衛兵來到北京，還見到周恩來總理並向周告了狀。回到上海後，他和廠裏觀點相同的工人們成立“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的造反組織並擔任隊委，成為該廠工人造反組織的領導人。這為他登上上海工運的歷史舞臺奠定了基礎。

王洪文與潘國平的情況有一些相同之處。王洪文也當過兵，經歷過抗美援朝戰爭。王退役後分到上海國棉十七廠，當上了保衛科的幹部。受聶元梓的大字報的影響，王洪文在1966年6月12日發起寫了一張批評廠黨委副書記張鶴鳴^[64]的大字報。大字報的標題為《剝開畫皮看真相》，轟動了全廠。這是廠裏第一張未經黨委審閱的針對廠領導的大字報。寫大字報的原因，是因為廠黨委當時規定批判8個人，不許超出這個範圍批判別人。王洪文認為這是劃圈圈、定調子，就貼了反對黨委副書記張鶴鳴的大字報。

王洪文貼書記大字報的更深層原因，涉及該廠兩個廠長張元啟和張鶴鳴之間的矛盾。張元啟是部隊轉業幹部，文化不高但是資格老。他是山東人，做起報告來因一口山東話，上海工人聽不懂。他作報告時，即使有時下面聽報告的工人全走光了，他也照念稿子繼續作報告。張鶴鳴是地下黨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幹部。他是浙江寧波人，說一口上海話。與張元啟相比較，張鶴鳴與工人的關係更密切。二張有矛盾，當時他倆都是副廠長。張元啟想當正廠長，大概因為他資格更老些。張元啟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衛，與王洪文關係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由於兩個廠長有矛盾，張元啟分管保衛科，分管生產的張鶴鳴從不去保衛科，以避嫌疑或矛盾。王洪文說張鶴鳴從1963年起從沒到保衛科坐過，哪怕是半小時。這是不抓階級鬥爭。王洪文貼大字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兩位廠長矛盾的影響，他支持張元啟，反對張鶴鳴。

王洪文等人貼出大字報後，廠黨委停止了他的工作並派人盯他的梢。王洪文寫了第二張大字報。王洪文寫大字報以後不僅與廠黨委對立，也引起全廠很多群眾的不滿，有人罵他是野心家和陰謀家。王洪文貼廠黨委的大字報，在上海工廠中是比較早的。大字報貼出不到一個小時，該廠的上級公司——上海棉紡公司立即做出指示：王洪文的大字報是大毒草，上百張反擊王洪文的大字報出現了。6月20日，上海紡織工業局黨委^[65]向廠裏派來工作組。局工作組肯定王洪文貼廠黨委大字報的行為，連續召開各種會議，揭發批判副書記張鶴鳴。

但是，局工作組沒待多長時間便撤走了，市委派出文革工作組於7月20日進駐該廠。市委工作組一進廠就把矛頭對准群眾，強調“搜

索一切牛鬼蛇神”。到9月底，全廠共排出四類對象114個，一般幹部和工人群眾有98個。起初，王洪文與市委派出的工作組合作。後來由於觀點不一致，王洪文與市委工作組對立起來。10月7日，《紅旗》雜誌的社論宣傳毛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思想。王洪文等人又貼出大字報《就目前形勢談看法》，公開打出反對市委工作組的旗幟。不過，市委工作組沒有組織反擊王洪文。

但是王洪文還是感到了市委工作組的壓力。在10月10日的辯論會中，王洪文被圍，幸好由廠職校的紅衛兵解了圍。當晚，王洪文提出到北京去告狀。第二天，他們成立了一個戰鬥隊，王被推為負責人。在北京期間，王洪文參加了毛的第八次接見紅衛兵，抄錄了不少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在北京，工作組已經進了曆史垃圾箱，可是上海的工廠仍然是工作組的天下。

回到上海的王洪文，立即提出當前的任務是趕走工作組。廠裏的群眾分為兩派。一派是以王洪文為首的戰鬥隊，另一個是市委工作組支持的“赤衛隊”。到了10月底，工作組終於撤走，王洪文等人勝利了。國棉17廠成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發源地，為王洪文登上上海工人運動的舞臺提供了條件。

2.2 上海“工總司”的成立和“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6日，北京“首都紅三司”的紅衛兵駐上海聯絡站召開了解上海工礦企業文革情況的座談會，潘國平、王洪文和10多個工廠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有人揭發市委樹立的標兵有假，也有人抱怨在工廠裏遭受關押和毒打的情況。一位北京紅衛兵提出，上海工人應當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與其要求北京紅衛兵向中央反映情況，不如自己成立組織。參加會議的人都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座談會上選出大會主席團，有潘國平、王洪文等7人。潘國平被選為主席團主席，所以上海工人叫潘為“潘司令”，後來連毛也這樣稱呼潘。

11月9日，上海“工總司”在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到會的人數大大超過原來的估計，達到近3萬人。廣場裏擠滿了人，周圍的馬路上也坐滿了人。根據當時的統計，大約有470多個工廠約57,000多工人造反隊員。盡管潘國平被選為主席團主席，但是在“工總司”排座次時，因為王洪文是黨員，比潘的政治條件更好，成了“工總司”的第一號人物。潘因為本身存在的缺點，在“工總司”的地位逐漸下落。這是後話。

“工總司”成立後，工人們最擔心的是組織的合法性。雖然憲法中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但是文革前17年來民眾自由結社還沒有

過，跨行業的聯合組織更是異想天開。所以“工總司”的成立大會要求市長曹荻秋到場承認組織的合法性。但是上海市委堅持“三不”：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成立大會上沒有得到市委支持的工人們，到市委大樓前要求市長接見。經過周折，直到第二天凌晨仍不見市長蹤影。王洪文等人帶領數千名工人擠進北上的幾趟火車，試圖到北京告狀。

如此多的工人進京告狀的消息驚動了周恩來，周下令載有赴京告狀工人的火車停車，王洪文等人被堵在一個叫做安亭的小站。工人們憤而攔住南來北往的火車。“工總司”赴京告狀的行動，造成交通動脈滬寧線中斷 31 多個小時。中央發電不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承認攔火車是革命行動。張春橋被派往上海處理這一事件。

張春橋與王洪文和潘國平等“工總司”負責人進行談判。經過 13 個小時的交涉，王洪文在張的堅持下，宣布回上海繼續談判解決問題。張春橋向工人擔保，安亭事件解決不好決不回北京。回到上海後，“工總司”提出 5 條，要求讓張簽字同意。最重要的要求是兩條：承認“工總司”合法地位和赴北京告狀行為是革命行動。張春橋被迫簽了字。他的簽字承擔了很大的風險，因為中央並沒有授予他這樣的權力。張春橋焦急地等待著中央的回複。毛對張的行為表示贊許，說“可以先斬後奏”。張春橋押寶押對了。上海“工總司”從此進入文革工人運動的前列。

2.3 一月奪權

1967 年 1 月 6 日，“工總司”在人民廣場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如果算上周圍街道上觀看的群眾，參加會議的人數估計有近 100 萬人。大會批鬥了陳丕顯和曹荻秋等人，並宣布三項通令：

（1）不再承認曹為市委書記和市長；（2）勒令陳丕顯交代罪行；（3）請求中央改組上海市委。一次大會和一紙通令，就使上海的黨政最高領導倒臺了。1 月 11 日，中央發來賀電，肯定上海的大會。這是毛和中央正式表態支持群眾組織的奪權，全國興起“一月革命”風暴。在奪權方面，上海走在全國的前頭。

上海的最高領導人倒了，但是誰來接管這一權力的問題還沒有解決。1 月 10 日左右，一個叫做“工人造反第八司令部”（簡稱“工八司”）的組織突然派人進駐市委，宣布奪了市委的權。“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簡稱“上三司”）於 1 月 15 日與“工總司二兵團”聯合宣布奪了市委的權。他們向毛和中央發了一份電報，要求中央承認他們的奪權，並提名張春橋和姚文元分別擔任上海市的第一、第二書記兼任正副市長。“上三司”在 1 月 22 日又一次宣布奪

權。1月24日晚，“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採取突然行動，沖進中共華東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機關以及區委區人委，奪走了大印，也宣布奪權。“紅革會”是上海當時最大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學生組織。“紅革會”一直與“工總司”並肩作戰。但是當該組織在上海有了名氣之後，它的領導人有點自恃造反有功，不甘居人之下。他們對張春橋和姚文元心懷不滿，為了收集炮打張和姚的材料，他們甚至綁架了張春橋得力的助手徐景賢。張春橋不得不求助於軍隊尋找徐景賢。中央文革發出特急電報，譴責“紅革會”。“紅革會”的炮打張春橋行動的失敗，導致了它的垮臺（此次炮打張春橋被稱為是“第一次炮打”）。由於沒有中央的肯定，上海的幾次奪權均未成功。

面對混亂的局勢，張春橋決定於1967年2月5日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宣布上海市新的權力機構——“上海人民公社”^[66]誕生。但是在成立宣言的署名問題上又發生矛盾。上海當時有32個較有影響的群眾組織參與奪權和宣言的起草，署上它們的名字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當消息傳出去以後，發生了預想不到的矛盾。在內部，32個組織中，有的對排名順序不滿意，要求把自己的組織排在前面。在外部，聽說要成立上海市新政權，一下子冒出600多個群眾組織，都想擠進權力機構，占一席之地。面對這一困境，張春橋召集32個群眾組織的代表開會。張主張宣言上不署具體組織的名，但是許諾32個組織的代表是當然委員。張還告訴代表們，“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將有幹部代表、軍隊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組成三結合權力機構，這個方案已經得到中央批准。張的提議得到代表們的贊同。就這樣，上海新的權力機構成立了。

雖然成立了革委會，但是“工總司”內部的矛盾並沒有徹底解決。這就是“工總司二兵團”與總部的矛盾。“二兵團”的領頭人物是耿金章。耿是中共黨員，複員軍人，上海紙漿廠工人。他造反以後，自恃打過仗，會帶部隊，在“工總司”中單獨拉起了一個山頭。

“二兵團”一度發展到50～60萬之眾，勢力比“總部”還大。儘管“二兵團”掛名在“工總司”之下，但“二兵團”與王洪文的“工總司”總部常常唱對臺戲，耿金章根本不把王洪文和潘國平放在眼裏。王洪文和耿金章甚至各拉自己的一派勢力，調動人馬，準備在南市區一帶打內戰。後來耿金章受騙去談判，被王洪文等人抓捕送到公安局，耿被關押兩個多月。等到他獲釋恢復自由時，“二兵團”早已瓦解。“工總司”的內部矛盾終於消除了。

不過，張春橋也遇到了麻煩——1968年4月20日，發生針對他的第二次炮打。第二次炮打的規模及涉及的人數，遠遠超過第一次炮

打。原因是，3月下旬中央召開的兩次重要的大會，中央領導人包括毛、林彪和周恩來都出面了，張春橋因其他事務未露面，引起一些人的懷疑。上海市革委會成員、《文匯報》負責人朱錫琪提出疑問：中央那麼重要的活動，林彪和毛都到場，為什麼張春橋未去？當時社會上有流言說張春橋是叛徒；張的妻子文靜曾被捕自首是真實的，並非謠言。朱錫琪根據《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的渠道得知一些內部消息，認定張春橋可能有問題。4月12日，《文匯報》發表傳單《十個為什麼》，把矛頭指向張春橋。

上海街上出現許多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王洪文帶了“工總司”的一批領導人商量反擊。按照張春橋的意見，不要組織反擊，一搞反擊馬上就會變成兩大派打內戰。上海市革委會內部開展大辯論。以朱錫琪為首的“倒張派”表示他們是宣誓來的，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在此之前，海軍和空軍都向駐上海部隊發出通知，反對炮打張春橋，顯然這是中央的態度。辯論會上，東海艦隊副司令高志榮大聲念了海軍總部的3點指示，並發表個人意見，聲稱張根本不是叛徒。全場鴉雀無聲。與會者開始責問朱錫琪，朱臉色發青，頭上不斷冒汗，全市的炮打形勢急轉直下。朱錫琪受到批判，炮打張春橋事件平息了。

正當上海市革委會起勁地追查炮打事件的後臺時，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到上海，詢問朱錫琪的情況。當張得知朱的檢討群眾通不過時，張春橋表示，既然朱願意檢討，就放朱一馬。張表示，這次炮打卷進去的人很多，把朱解脫了，其他人心裏的石頭就放下來了。張還表示，複旦大學、二軍大、國防科委等軍人單位的炮打事情都不查了，這是毛的意見。毛在聽了張對上海工作的匯報後對張說，你可以對那些炮打你的人講“無事”。不過，到了1970年，炮打張的事件還是受到追查。1968年不追查炮打事件，也許是權宜之計。

2.4 “工總司”攻打“上柴聯司”

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上海的局勢並未就此穩定。“工總司”雖然解決了內部的矛盾，但是它卻遇到來自外部的挑戰。“一月革命”後，很多基層單位存在著權力再分配的問題。不同的群眾組織都打著造反旗號，宣稱自己是左派，力圖獨攬大權，不願意與對方聯合，分享權力。王洪文領導下的“工總司”有明顯的傾向，支一派打一派，所以積怨不淺。上海柴油機廠有兩個群眾組織：“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上柴聯司”）和“工總司上海柴油機廠總部”（簡稱“上柴東方紅”），他們都宣稱自己是造反派。他們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廠裏應該打倒誰、解放誰和結合誰。“上柴聯司”受到壓制，便組織人員公開靜坐，把問題鬧到社會上。那些受壓、失

意、丟權的群眾組織對市革會、“工總司”、支左部隊有意見，紛紛表示支持“上柴聯司”，成立全市性的組織“支援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絡總站”（簡稱“支聯站”）。上海有可能分裂為對立的兩大派，局勢面臨著動亂的危險。

7月18日，上海柴油機廠發生武鬥，“上柴東方紅”的一位成員被打死。王洪文抓住機會，在全市大造輿論。兩天後，武漢發生“七·二零事件”，當時身處武漢的毛不得不緊急轉移到上海。7月23日，上海召開大會，宣稱誓死保衛中央文革，“上柴聯司”和“支聯站”是此次大會的所針對的目標之一。8月3日，市革委會起草了一封給“上柴聯司”群眾的公開信，呼籲他們與“上柴聯司”的領導人決裂。當革委會派人送公開信時，“上柴聯司”以暴力應對，中了“工總司”的圈套。

8月4日，王洪文召開“工總司”會議，討論如何攻打“上柴聯司”。有人提出此事需要經過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批准。但是王洪文等不及張、姚的批准，決定下令發起攻擊^[67]。王布署從水路切斷“上柴聯司”的退路，調集1,000多輛汽車，約有十幾萬人攻打“上柴聯司”^[68]。“上柴聯司”用彈弓阻擊進攻者。他們在屋頂平臺上樹起水泥柱，系上橡皮筋，把鋸成小段的鐵塊作為子彈，通過橡筋彈射出去，很有殺傷力。由於廠門口有重兵把守，進攻者不得不從工廠的側翼進攻。他們調來四輛大型吊車和鏟車，沖破圍牆進入該廠。在最後攻占“上柴聯司”總部的大樓時，“工總司”強攻不下。消防系統的進攻者調來17輛消防車，架起雲梯，用高壓水槍噴射守衛者，這才得手，攻下最後的堡壘。當時的戰鬥情景，由電影攝影師拍了下來。整個戰鬥從上午10時到下午6時，清掃戰場結束，共持續了8個小時。所幸的是，雖然受傷者不少，但沒有一個人死亡。

當天深夜，毛得知剛剛發生的大規模武鬥事件，表示要到外面看看。毛親眼看到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手持鋼釵、頭戴柳條帽、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電視臺連續三次播放攻打“上柴聯司”的電影紀錄片，毛饒有興趣地觀看了電視，並稱贊工人的勇敢。張趁機向毛請示是否重建民兵，毛同意上海可以武裝10萬工人。上海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取代民兵和人武部。由此可以看出，毛是支持上海“工總司”攻打“上柴聯司”的行動的。由於“上柴聯司”和“支聯站”的瓦解，“工總司”一家獨大，上海自此一直比較穩定，再也沒有出現大的反複。

第三章 天津^[69]

天津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位於華北平原的海河各支流交匯處，東臨渤海，北依燕山，有海河在城中蜿蜒而過。1949年至1958年2月間，天津市曾是中央直轄市。後因大躍進，天津市被並入河北省，曾作為河北省會達8年。1967年1月，中共決定天津市恢復為中央直轄市並保持至今。文革期間，天津是全國僅有的3個直轄市之一，在中國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3.1 天津的文革開端：16中事件

與許多地方一樣，天津的文革是由幹部子弟的帶頭造反興起的。例如天津第16中學的李羅力（天津市長胡昭衡的兒子）、河北大學的劉力裏（河北省長劉子厚的女兒）和南開大學的周少華（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的女兒），平民子女沒有那個膽量。天津市最早起來造反的是天津第16中學的李羅力。1966年6月2日早晨，受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影響，第16中校園內在第1節課後，出現了高中學生李羅力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質疑為何本校也有壓制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問題，大字報立即在學校裏引起轟動。第2節課後，學校前院各教學樓的牆上貼滿各班同學的大字報，矛頭直指學校黨支部，嚴厲批判學校黨支部壓制文化大革命的行為。當天上午第3節課後，整個16中自動全面停課，所有的學生和老師都被卷入文化革命的運動之中。天津市其他一些中學也開始出現類似情況。

這一情況立即引起天津市委領導的高度重視。6月6日，天津市委成立由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和團市委負責人組成的天津市中學文化革命辦公室。6月7日和8日，天津市委分別向16中等學校派出工作組。但是，天津市委所采取的這些措施，在16中並未能起到滅火作用。相反，16中的學生們投身運動的熱情越來越高漲，行動也越來越大膽。6月8日，第16中學的學生們自發地進行奪權行動，終止了校領導和黨支部對學校文革運動的領導，選舉成立以李羅力為首的完全由學生組成的“16中文化革命委員會”。各班級和各年級也選舉成立本班級和本年級學生組成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自此，學校運動進入“學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領導自己”的新階段。不僅原來的校領導失去了領導權，而且市裏派出的工作組也形同虛設。

進入6月中旬後，第16中的學生運動又出現新的動向。有些學生貼出大字報，追究學校領導的幕後黑手，批判工作組的所作所為，矛

頭直指天津市委。隨著 6 月 15 日中央宣布廢除高考制度，學校運動進入高潮。6 月 21 日下午，天津市委在天津民園體育場召開全市中學生慶祝廢除高考制度大會。在這個大會上，第 16 中學生向在場的各中學分別散發“致全市中學生的一封公開信”。該信指責天津市委壓制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認為天津市委像北京市委一樣，存在一條又粗又長的黑線，呼籲全市中學生團結起來與天津市委做作鬥爭。大會的氣氛十分緊張，16 中的個別同學要沖上大會主席臺。

6 月 21 日晚，天津市委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將 16 中的公開信定性為反黨黑信，並要求嚴肅追查指使 16 中學生進行反黨活動的幕後黑手。6 月 22 日下午，天津團市委召開全市各中學學生代表和工作組代表參加的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 16 中公開信的觀點。市委要求全市各中學 23 日起到 16 中去進行聲討，貼大字報，並且要求點名批判李羅力，揪出以李羅力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集團。

天津市委還對 16 中採取了幾項重要措施：（1）重新派出工作組，人數多達 170 人，16 中的每個教學班都有一至兩個工作組成員；（2）廢止學生自發選舉的“16 中文化革命委員會”和各年級各班級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把學校的領導權重新控制在工作組手中；（3）向市有關各單位下發通知，凡是 16 中學生的家長必須把自己的子女看管好，不但要與 16 中一小撮反黨分子劃清界限，而且要把那些長期住在學校裏搞運動的積極分子領回家去，否則家長本人將會受到 16 中事件的牽連和影響。

然而，後來的形勢出乎人們的預料。8 月 6 日，天津市委在天津體育館召開大會，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做報告，向全市公開承認天津市委在文革初期犯了錯誤，宣布 16 中的行動是革命行動，並為 16 中的革命小將平反，號召全市中學生向 16 中的革命小將學習。至此，文革初期轟動全市的 16 中事件宣告結束。沒過多久，天津市的主要領導人萬曉塘和張淮三被中央定為“萬張反黨集團”，倒臺了。

3.2 “三輪二社事件”

1966 年 8 月開始，北京的暴力事件逐步升級。從 8 月下旬到 9 月初的 10 來天裏，在市區和近郊區一共打死了 1,772 人。這就是所謂的“紅八月”。這場災難像瘟疫一樣飛快傳播，離北京最近的天津最先響應。在最恐怖的幾天裏，天津的市民時時可見自殺和被殺人員的屍首在流經天津的海河上漂流。挨鬥的對象最多是所謂的牛鬼蛇神，包括一些剛露苗頭的造反派，被鬥的當權派並不多。天津市三輪運輸二社（簡稱“三輪二社”）黨支部書記陳良謀是被鬥的少數當權派之一。

8月29日，天津市三輪二社召開職工代表會，籌備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會議進行時，衛國道中學的紅衛兵和部分工人一哄而上，將支部書記陳良謀及社主任、人保股長、工會主席等47人抓捕關押。他們接管了該社文件、檔案及印章，並對被關押人員拷打。支部書記陳良謀9月1日被打死。這就是轟動天津的“三輪二社事件”。

紅衛兵參與施暴，是因為陳良謀被指控是汪精衛的漢奸，有7條人命。對陳良謀的這些指控並不真實。文革中此類不實指控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工人參與的原因，可能與工資制有關。1950年代公私合營以後，很多企業（特別是小型企業）曾實行計件工資制，使一些勤快的工人收入不菲。到了1964年，特別是四清運動以後，計件制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而取消，使平均工資水平降低，嚴重影響了工人們的收入。在一些工廠裏，這往往成為文革期間造反的動因之一。而且作為黨的基層幹部，陳良謀在運動初期阻止一些有問題的工人成立造反組織，並且整了這些工人。當毛調整運動方向時，對陳良謀不滿的工人趁機造了他的反。陳良謀成了文革的犧牲品。

文革初期有兩股潮流：一股潮流是幹部子弟的紅衛兵運動，另一股潮流是平民造反。紅衛兵運動針對的是社會上意義含糊的牛鬼蛇神，執行者主要是中學的信奉鼓吹血統論的紅衛兵，他們在一段時間內橫行社會，所向披靡。平民造反運動曾被當權派的鎮壓，但是在毛返京後又翻了過來。一般來說，這兩股潮流在當時很少有交集。因為紅衛兵主要在街上耀武揚威，平民的造反活動一般局限在單位內部。而且紅衛兵破四舊的時候，平民造反的潮流還未成氣候。“三輪二社事件”的詭異之處在於，它正好處於兩股潮流的交匯處，因而在文革史中有著特殊的代表意義。天津的“三輪二社事件”表明，文革中天津的工人運動更早地走到前面，也預示著天津工人在後來的造反運動中將起主導作用。

雖然當時天津被打死的人不計其數，但是對於發生在同一時期的“三輪二社事件”，市委卻很快進行了處理。在聽取有關部門的情況匯報以後，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果斷拍板，依法嚴懲打人凶手。經有關部門進一步調查，發現打人凶手大多數在曆史上都有罪惡。於是遵照市委指示，法院對12名打人凶手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和死刑。這是京津兩市在“紅八月”裏唯一嚴肅處理的事件，而且一件命案有12個人被判刑也是空前的。根據當時的鉛印傳單《誰是三輪二社反革命案件的罪魁禍首？！》分析，當局把紅衛兵撇在一邊，只處理工人中的責任者。在市委的主持下，先後有2,400多個單位、49萬多人次到三輪二社追悼陳良謀。目前，陳仍被列為天津的烈士。“紅八月”的受難者很少能得到應有的紀念，陳良謀是個例外。

3.3 打抱不平的造反者

1965年，林啟予從天津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天津市電業局所屬發電設備檢修大隊電機中隊當實習技術員。林所在的電動機班組長是耿成民，他是林啟予的師傅。耿成民因孩子多負擔重，家庭生活比較困難，有時小偷小摸廠裏的東西賣錢貼補家用。文革開始後，耿成民成了電機中隊的壞人典型。林啟予仗著個人曆史清白，學生時期又是個積極分子，覺得他們批鬥的矛頭不對，與中央的精神不符。他認為，耿成民的問題四清都有結論了，於是與黨支部的紅人朱光海較上了勁。

朱光海曾是個貪汙犯，原來是農電處的保衛科長。支農的時候，朱貪汙了1萬多塊錢，這在當時算是大數了。四清的時候工作隊長找他談的話，說這是最後一次談話。放在他面前兩條路：一條是坦白交代，退回贓款；另一條就是逮捕歸案。結果他坦白了罪行並如數退賠贓款，處理結果是免於刑事處分，保留黨籍，下放勞動。文革一開始，朱光海成了電機中隊黨支部書記的一杆槍。

林啟予在班裏成立了一個造反組織，叫做“只爭朝夕戰鬥隊”。組織有四五個成員，都是同情林啟予的年輕人。到1966年10月，天津大學的學生到林啟予的單位串聯。聽了雙方辯論的理由後，學生們公開表態支持林啟予等人的觀點。學生一介入，全大隊其他組織的觀點也都傾向林啟予，很多班組也成立造反組織。林啟予翻了身，成了大隊的紅人。電業局成立造反聯合總部時，由於林啟予在單位小有名氣，被調到電業局造反聯合總部當二把手。

當時天津的造反格局是以大專院校來劃分的。天津大學“八·一三”、南開大學“衛東”屬於一派；河北大學“八·一八”為另一派；天津工大“八·二五”為第三派，三派成鼎足之勢。天津大學是工科院校，與企業的聯系比較密切。天津又是傳統的工業城市，因此該派組織在天津的工業系統勢力強。到機電系統來串聯的是天津大學“八·一三”的學生，於是林啟予成了外派的聯絡官，與天津大學“八·一三”的山頭掛上了鉤。

1967年1月，全國掀起奪權風潮。在如何奪權的問題上，林啟予主張先聯合後奪權。他的主張得到大家的認同，成為“八·一三派”工人代表的第一號人物。當時學生造反需要工人的支持，林啟予所在的單位是電業局，擁有大量的產業工人。這就為林啟予成為天津文革中的風雲人物鋪平了道路。

3.4 大聯合奪權

與其他省份不一樣，天津並未出現大規模的造反派奪權風潮。1967年2月，天津的解放軍全面分系統進行支左，全市開始醞釀大聯合後奪權。3月，周恩來指示，讓天津成立革命委員會奪權籌備小組。經過選舉，林啟予進入籌備組。周恩來又指示，天津市要做一個試點，成立“五代會”，即“工代會”、“幹代會”、“農代會”、“大專院校紅代會”、“中學紅代會”^[70]，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大聯合。林啟予受命籌建“工代會”，並成為“工代會”組長。3月15日，“工代會”召開成立大會。選舉中落選的造反派領導人張承明公開站出來另立山頭，成立“天津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簡稱“大聯籌”），與“五代會”分庭抗禮。“工代會”成立的這一天，標志著天津市兩大派群眾組織對立的公開化。對於那次選舉，康生曾說過：“看起來選舉不如協商”。當時軍隊如果先拿出一個名單，讓大家討論協商，還有進退的餘地。可是一選舉，一唱票，誰也沒法改。所以，其他各省的革委會組成都是采用協商的方法，很少通過選舉。

“五代會”成立以後，準備成立天津市革委會，可是兩派對立越來越嚴重。3月下旬，中央要求兩派組織到北京談判，但是並未解決問題，兩派發生武力衝突。1967年8月15日到12月8日，中央主持第二次談判，共進行了100多天。談判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制止武鬥，抓革命促生產；第二階段是大聯合；第三階段是成立革委會。主要是中央領導講話，陳伯達講得最多。從第一次接見起，中央的態度就已經很明確。中央的態度日趨明朗，支持以“五代會”為基礎的大聯合，暗示“大聯籌”這個組織不行，應該解散。這在“大聯籌”內部引起不小的震動。

形勢對“大聯籌”十分不利，“大聯籌”內部開始分化。有些人一看“大聯籌”這個組織沒有前途，於是轉變立場。一部分人站出來公開表態，承認錯誤，申請加入“五代會”。後來，這些分裂出來的人都進了“工代會”和天津革委會。12月2日，中央首長第11次、也是最後一次接見談判代表。參加接見的有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謝富治、姚文元、吳法憲、鄭維山等人。以“五代會”為基礎的大聯合成立。此後發表聯合公報，為天津市革委會的成立鋪平了道路。大家舉手通過，宣布天津市革委會成立。

3.5 “二·二一事件”

1968年2月21日，天津市革委會成立不久，天津發生了一件大事，簡稱“二·二一事件”。在此之前，天津文藝界發生了3件事。第一件事是全國文藝界在天津開了一個會，代表人物是方紀，後來被稱作“黑會”。第二件事是1967年的5月，天津人民話劇院上演話劇《新時代的“狂人”》。有人發現，“狂人”的日記裏不但有反對劉少奇的內容，也有反對毛的內容，於是這出話劇成了“黑戲”。第三件事是天津文聯的群眾組織把文聯的另一個叫做“文聯紅旗”的組織給砸了。不幸的是，“文聯紅旗”的後臺是王曼恬。她是毛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兒，是個手眼通天的人物。文革中，王曼恬曾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書記、中央文化組副組長等職。王曼恬將這三件事羅列在一起（稱為“二黑一砸”）上報中央文革，又經毛作出批示。

2月21日，中央召集天津各界人士約1,000多人，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大禮堂開會。大禮堂裏樓上樓下都坐滿，有革委會的領導、部隊首長以及大大小小造反組織的領導人。解學恭和幾位地方領導坐在樓下前排當中，他的左邊坐著3位66軍的首長，右邊是3位警備區的首長。稍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楊成武、吳法憲、汪東興、葉群等出來，坐在主席臺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楊成武等先後講了話。江青主持會議。她上來就說：“我有證據證明，你們天津有變色龍！”她在會上不指名地罵“小爬蟲”、“變色龍”，還點了王亢之的名，說他是“深澤叛徒集團”的頭子、日本特務、“萬張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骨幹。江青還點了胡昭衡的名，說他是壞人。陳伯達在講話中更是推波助瀾：“你們天津出了變色龍，我都不敢到天津去了，變色龍太厲害。”

第2天下午，召開天津市革委會委員全體會議，在主席臺就坐的是革委會主任解學恭，他的一側是66軍的代表，另一側是警備區的代表，地方幹部的代表一個都沒有。剛剛宣布成立的天津革委會又出問題了：王亢之第二天吃早飯時沒有下樓，人們發現他已經死了。江楓原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長，結合為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回天津以後，江楓立即被關押到天津梨園頭的第二勞改監獄，不久因心髒病發作去世。胡昭衡是原天津市市長，尚未被結合，但已擔任革委會生產指揮部副主任。他回津後亦被長期軟禁。楊潤身當然也倒臺了。“二·二一講話”以後造成的後果是，一大批剛站出來的地方幹部又被打倒，軍隊幹部全面掌權。市革委會中有一個副主任的位置是留給群眾代表的，只有林啟予有這個資格。但是由於林啟予是剛出校門的學生，不算真正的工人，所以群眾代表的副主任一直沒有人充任。

經過清洗的天津市革委會此後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從成立到文革結束，天津市革委會都是由中央文革（尤其是陳伯達）直接插手，造反派和地方幹部以及軍隊幹部都沒有太多的發言權。這一點有別於其他省份。

第四章 湖南^[71]

湖南地處中國的中南部，長江中遊以南地區，省會是長沙市。文革開始時人口為 3,718 萬，居全國第 7 位。文革結束後，1978 年的 GDP 居全國的第 11 位。湖南的文革運動是以省會長沙為中心的，長沙的文革左右了湖南省的文革。湖南工人群眾運動在文革中顯示了強大的力量，其力量大到中央不能無視的地步。北京的學生運動太強大，工人運動相形見绌。上海的工人運動太強大，學生運動失去了獨立發展的空間。本章論述的湖南省及下一章討論的江蘇省，則是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結合為一體，在充分發揮學生組織的作用基礎上，以產業工人為主體實現當地的大聯合。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相結合是運動發展的最理想之路；只有這樣，運動才能發揮知識分子的先鋒引導作用和工人階級的巨大能量。湖南的文革群眾運動具有相當重要的代表性。

4.1 湖南文革運動的興起

受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的影響，1966 年 6 月 2 日上午，湖南大學土木系道建 62 級的幾個女學生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十一個為什麼》，質問校黨委為什麼按兵不動，把學校搞得冷冷清清。大字報拉開了湖南造反運動的帷幕。不久，大字報、漫畫、標語鋪天蓋地，校黨委向省市委告急。6 月 7 日，省委以特急電報通知各地，向大中院校各單位派遣工作組。6 月 9 日，省委工作組進駐湖南大學，宣布一定要相信省委、相信工作組。省委拋出湖南大學副校長魏東明、曆史系副主任林增平等作為替罪羊^[72]。

文革中湖南的中學生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學運動的風向標，是高幹子弟雲集、信息渠道暢通、曆來對政治敏感的長沙市第一中學（簡稱“長沙一中”）。1966 年 6 月初，省市委聯合工作組進駐長沙一中。學生黨員謝若冰（革命幹部家庭出身）、黃杏英等人貼出多張大字報，批評工作組為了保護校黨支部書記把鬥爭矛頭指向幾位知識分子。謝若冰、黃杏英和楊小凱^[73]等被工作組定為校內的重點批判對象。教師葉衛東公開支持謝和黃等人的造反行動。葉衛東的這一舉動，是他日後成為湖南文革中群眾運動領袖之一的第一步。謝若冰和黃杏英等人於 8 月初悄悄地繞道上海赴北京告狀。8 月 14 日，長沙第 12 中學的學生在市委大樓牆上公開貼出大字報，堅決打倒“三相信”（即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組），引起巨大轟動。8 月 18 日，毛

澤東接見紅衛兵，到北京告狀的湖南中學生登上天安門。謝若冰作為外地來京革命學生代表講了話，並獲得毛的簽名。這對於湖南造反派是莫大的鼓舞。

長沙的高幹子弟首先組織以省委領導子女為領導人的保守派組織。他們宣誓：誓死保衛省、市委和共產黨紅色江山，聲言要打擊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和“黑鬼”。8月19日，湖南大學的學生前往長沙市委，要求進入市委大院貼大字報，與應召前來保衛市委的工人發生沖突。學生受到圍攻和毆打，有6名學生受傷，此事件被稱為“八·一九事件”。圍繞如何看待該事件，人們產生分歧。有不少民眾對遭受暴力的學生抱有同情，但是也有民眾認為，學生反對省委、市委，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學生向黨進攻。當天晚上，大街上出現一支由工人組成的遊行示威隊伍，他們表示支持學生的造反行動。同時不少學生也走上街頭，抗議市委挑起工人鬥學生。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評長沙等地挑動工人鬥學生，肯定“八·一九事件”。省委立即改組長沙市委。省委第一書記的張平化^[74]到湖南大學發表講話，稱“一來請罪，二來造反”。連省委書記都要造反，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造反學生揚眉吐氣，士氣大振。然而，湖南省的風向很快又開始轉變。9月24日，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作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動員報告（史稱“九·二四報告”）。大批同情和支持過造反學生的人士遭到打擊，全省範圍內抓出的“右派”和“黑鬼”以10萬計，湖南的造反運動一度陷入低潮。由於有《十六條》的保護，造反的學生本身沒有受到迫害。這批大學生無私地協助工人、市民向中央反映情況，爭取平反。他們還幫助工人和農民組建自己的組織。

10月3日，《紅旗》雜誌社論指出文革的對象是走資派，提出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簡稱“批資反路線”）。10月14日，長沙一中的教師葉衛東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湘江風雷挺進縱隊”（簡稱“湘江風雷”）。“八·一九事件”中造反的湖南大學的學生於10月15日建立“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高司”）。“湘江風雷”和“高司”成為湖南文革中舉足輕重的兩個群眾組織。10月底，幾十名“湘江風雷”成員回長沙造反。11月2日，“湘江風雷”在省委禮堂第一次公開舉行批鬥張平化大會。11月13日，長沙市各群眾組織聯合召開“批判湖南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行大會”，強烈要求平反並交出黑材料。張平化在這些大會上被迫檢討。批判資反路線，是毛為了克服當時黨內外對文革發動的阻力提出的動員口號。對於被打成“右派”和“黑鬼”的人們來說，這是他們脫離困境的機會，他們很自然地站到曾經整肅他們的省

委和市委的對立面。這些民眾成為以“湘江風雷”為首的造反組織的基本隊伍。

4.2 造反派的第一次分裂

1967年1月16日，《紅旗》雜誌正式點名湖南的保守派組織是走資派的禦用工具，周恩來甚至把這一組織與北京的“聯動”^[75]相提並論。湖南的保守派人員被造反派驅散，物資被查抄。保守派沒有人敢反抗，因而瓦解了。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響下，湖南的奪權提上議事日程。勝利的造反派逐漸分成兩大陣營：一派以“高司”為首，另一派以“湘江風雷”為首。“高司”由長沙8所高校的紅衛兵組成，約2萬多人。“湘江風雷”全省約有百萬之眾，主要由工人組成，還有社會各界人士，如教師、居民和下鄉知青等。“高司”的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半年中充當了造反先鋒，是他們最先點起湖南省造反的烈火，日益壯大的工人造反組織也是他們幫助建立的。“高司”是當之無愧的造反先鋒和功臣，所以“高司”的首領們理所當然地以湖南省造反派的首領自居。“湘江風雷”的工人造反派們雖然承認“高司”的貢獻，但是涉及造反領袖地位時卻有不同意見。毛曾說過，“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毛還曾說過，“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有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曆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領導，革命就勝利了。”以毛的教導為依據，“湘江風雷”不承認“高司”在造反運動中的領導地位。羽翼豐滿的工人造反派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領導階級。

湖南省軍區在1967年1月15日的大會上明確支持“高司”，導致“高司”與“湘江風雷”的徹底翻臉。省軍區的立場與兩大派成員的階級成份有關。“湘江風雷”人員複雜，什麼樣的人都有，幾個領導人的來曆和家庭出身也有疑點。“高司”卻純潔得多，全是年輕的大學生，非常單純，幾個領導人還是中共黨員。省軍區偏向“高司”是情理之中的事。兩派的爭鬥，迅速演化為針對省軍區的造反浪潮，局勢漸呈白熱化。2月4日夜裏，湖南省軍區按中央文革的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風雷”支隊長^[76]以上的全部頭目，一夜間摧毀了這個龐大的造反組織。“高司”成為軍人的幫凶，支持對工人群眾的鎮壓。反對鎮壓的工人群眾與學生發生衝突。1966年的“八·一九事件”中，工人與學生發生衝突，那是因為市委挑動工人毆打造反的學生。半年後，工人與學生又一次發生衝突。此時是工人造反，學生卻站到保守的省軍區一邊。支持省軍區對“湘江風雷”進行鎮壓的人群中，還有已經解散的原保守派成員。他們充當軍人的耳目，幫著搜捕

“湘江風雷”的領導人。“高司”為了壯大自己的隊伍，接納了許多原保守派的成員，大批的保守派站到“高司”一邊。

不過，形勢並沒有向有利於“高司”的方向繼續發展。4月7日，經過一番精心策劃，長沙的造反派發起大規模的反攻。以謝若冰為首的中學紅衛兵裏應外合，封閉了由省軍區控制的《湖南日報》。省軍區因鎮壓“湘江風雷”遭到強烈的反彈，此次未敢再出手打擊造反派。另一個使省軍區怯退的原因，是4月2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社論說，社會出現了一股資本主義複辟的反革命逆流。這是反對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否定前階段文革的成果。對於這股逆流，必須堅決回擊，徹底粉碎。省軍區不敢輕舉妄動，只好對關閉《湖南日報》一事持靜觀其變的態度。工人造反派受到鼓舞，於4月中旬成立一個以產業工人為主的群眾組織：“長沙市工人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工聯”），該組織以各工廠群眾組織為成員單位。顯然，這是汲取“湘江風雷”的教訓。“湘江風雷”完全社會化，成員複雜，易被保守派和省軍區攻擊為“組織不純”。

“工聯”的隊伍迅速擴大，成為擁有數十萬工人的湖南省內最大的工人群眾組織。“工聯”的一號首領是胡勇，他是長沙汽車電器廠的工人。因為文革初期時支持造反的學生，被廠黨委打成反革命。他被迫造反，成立“造反有理總隊”。“工聯”的第二號人物是唐忠富。唐是長沙曙光電子管廠的工人，中共黨員。胡勇和唐忠富日後成為湖南家喻戶曉的群眾運動領袖。

“工聯”的矛頭不僅對准“高司”，而且對准省軍區，提出要揪出湖南的趙永夫。“工聯”更是大膽地為“湘江風雷”鳴冤叫屈，呼籲為其平反。因為“工聯”的群眾們清楚，如果“湘江風雷”的問題不解決，“湘江風雷”的昨天就有可能是他們的明天。6月4日，原“湘江風雷”的成員召開“湖南省‘湘江風雷’恢復戰鬥誓師大會”，數千名與會者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大會之後，開始遊行示威。由於長沙的幾十個群眾組織一致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工聯”的強大支持和數萬“湘江風雷”成員公開的組織活動，“湘江風雷”的恢復已經是既成事實。

以“工聯”和“湘江風雷”為一方，以“高司”為另一方的鬥爭逐漸達到訴諸武力的程度。雙方勢力以湘江為界：河東是“工聯”和“湘江風雷”的天下，河西是“高司”的天下。到了7月，武鬥進入白熱化階段。雙方不僅裝備有步槍、機槍和手榴彈，甚至用上了坦克。省軍區和武裝部暗中武裝“高司”，軍事院校的造反派則暗中引導“工聯”和“湘江風雷”去搶槍，並派人幫助訓練使用搶來的武器。工人們明白，他們沒官方背景，只有靠強大的實力。

4.3 造反派的第二次分裂

8月10日，中央發出了關於解決湖南省文革問題的決定：撤銷“二·四批示”，為“湘江風雷”平反，承認“湘江風雷”是革命群眾組織，支持“工聯”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組織，批評了省軍區，指責“高司”派是保守組織。中央指定第47軍長黎原為組長，華國鋒、“工聯”一號領導人胡勇、“湘江風雷”一號領導人葉衛東^[77]等為副組長，組成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省革籌小組”），接管湖南省大權。“高司”及其盟友傾刻間土崩瓦解，他們的成員紛紛倒戈或者隱退。曾被鎮壓的造反派們為平反欣喜若狂，“湘江風雷”組織成建制地恢復起來。

然而，曾是同盟的“工聯”和“湘江風雷”還未來得及舉行慶功會，兩派立即開始內戰。“工聯”認為，他們幫助“湘江風雷”平反出了大力。且中央文件上寫明，“湘江風雷”是革命群眾組織，“工聯”是革命造反組織，故自認為是正統的造反派，地位理應高於“湘江風雷”。“湘江風雷”則自認為比“工聯”的資格老，是老造反派，理應是湖南省造反派的首領。有人甚至提出，湖南的造反派（包括“工聯”在內）應全部統一在“湘江風雷”的組織之下。

8月下旬，也就是在中央表態以後不到半個月，“工聯”和“湘江風雷”的基層組織為幾輛汽車的歸屬發生流血事件。兩派水火不容的觀點和立場，導致殘酷的暴力對峙，湖南又陷入武鬥。

4.4 “省無聯”及其思潮

省革籌小組的成立，標志著文革以來湖南省權力的一次極為重要的再分配。省革籌小組有6名群眾組織代表，其中“工聯”2人，“湘江風雷”1人。其他3人，1人傾向“工聯”，另外2人曾是“湘江風雷”的支持者，此時表示中立。這樣，“湘江風雷”處於明顯劣勢。在這場權力再分配的博弈中，那些曾經堅決支持“湘江風雷”平反，較有影響力的造反組織的代表，被排除在省革籌小組之外。他們的怨氣和不滿是可想而知的。10月11日，20多個被排斥在外的組織成立“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省無聯”）^[78]。這是一個松散的組織，對參加者沒有任何約束力，屬於相同觀點的組織聯合起來的臨時性聯盟。該組織並沒有試圖吸收個人成員參加。

“省無聯”出版過一個刊物——《湘江評論》。1968年1月6日，楊小凱執筆撰寫《中國向何處去》一文，作為征求稿在組織內部

傳閱。當時只印了 80 份，散發 20 多份。另一位成員寫了《我們的綱領》，補充闡述楊文中的觀點。盡管這些文章與文革中常見的大字報和傳單並無顯著的差異，但被省革籌小組上報中央。1 月 24 日，中央文革和周恩來公開點名，稱“省無聯”為反革命組織，楊文被定性為實質是極右。不久，楊小凱被逮捕，隨後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批判“省無聯”和楊的文章。

《中國向何處去》一文所運用的理論，仍屬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和毛的思想，但它的理論分析已越出官方的意識形態，表現出一種全面反對整個中共體制的激進傾向。該文提出，中共的整個上層已經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階級。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為阻礙曆史前進的腐朽階級。他們與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變成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要實現中華人民公社，就必須推翻這個階級，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中央文革的康生感覺到了該文對當權者的危險性。用他的話說，該文的實質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

更為重要的是，“省無聯”對文革中出現的革委會也有深刻的批判。在“省無聯”看來，革委會是資產階級篡權的假公社。三結合的提出，等於把“一月革命”中倒臺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三結合不可避免地會成為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省無聯”的政治綱領，不僅要推翻文革前由中共高級幹部形成的紅色資本家階級，還要推翻毛和中央文革通過奪權所建立起來的革委會。“省無聯”提出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極左派的新政黨，組織革命人民自己的武裝力量，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奪取勝利，推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即革委會）的統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省無聯”向往的理想政權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有無產階級權威的幹部。他們是公社的一員，但是沒有特權，在經濟上與普通群眾一樣的待遇，可以隨時根據群眾的要求撤換。

盡管幼稚的楊小凱們憧憬的政體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權，然而這也許是一條通向多元政治和真正民主的道路。“省無聯”的激進思考，在文革思想史上留下一份寶貴的思想史料。

4.5 實用主義的造反

造反派在 1966 底和 1967 年初得勢，使得各單位的領導在壓力下向造反派妥協。有些人趁機提出經濟方面的要求，如補發被扣的工資，要求恢復工職等。例如湖南省長沙市商業局有一個造反組織，叫做“毛澤東思想橫眉兵團”，它的成員是 1962 年被下放到農村的原商業單位的店員，兵團的司令是一位過去賣肉的小販。他們的造反要求

很明確：恢復他們原來的工作，補發下放以來的全部工資。由於事關切身利益，他們的造反熱情非常高。他們圍住商業局的正、副局長，白天黑夜死纏爛打，最後終於達到了目的。《湖南日報》的一些右派編輯和記者組織了一個造反組織，試圖為他們的右派冤案翻案。可惜他們沒有得到造反派的支持，被強行解散了。長沙出現過一個全部由原勞教人員組成的造反組織“長沙青年”，其司令是一個曾被勞教的年輕扒手。他們的造反目的是報復曾經管教過他們的公安警察，並趁機搞打砸搶、發橫財。造反派們對該組織極為反感，因為有損造反派的名聲。

為自己的利益造反最有影響的，當屬湖南老知青的造反。這是一批在文革開始以前已經上山下鄉的知青。他們的大多數人，因為家庭出身不好無法升學被迫下鄉。1966年8月工作組撤離後，知青們開始投身文革，名目繁多的知青造反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開始時，知青造反組織以控訴對知青的迫害和歧視為目標，他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當地的幹部和四清工作組。有的縣（如江永縣）的知青造反組織把縣委作為他們的造反對象。他們的另一個重要目標是回城。湖南省約有6萬多知青借串連之機返城。他們要造“戶口”的反，要求相關部門解決他們的城市戶口、糧食、就業等問題。他們提出，文革是一場社會革命，應該解決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首先應該改變知青被安置的命運。知青不是失業者，有權力參加革命和工作，應該到社會上去鬧革命。有的知青硬逼著相關單位的人員辦理戶口遷移。他們還熱衷於批鬥農墾局的走資派、街道辦事處的幹部。這是因為，農墾局的領導負責知青的安置，街道辦事處的幹部是強迫他們下鄉的罪魁。在長沙，知青和他們的父母舉行集會示威，並批判上山下鄉辦公室的一位官員。

知青們不僅在本省造反，他們還參與全國性的大串聯，建立“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造反團”。當湖南省出現“湘江風雷”造反組織時，知青組織一邊倒地站在“湘江風雷”一邊，成為其成員。有的知青還建立了隸屬“湘江風雷”的“山鷹戰團”。這些知青造反組織名義上是響應毛的號召，實際上是在爭取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們的自主意識與毛發動文革的想法格格不入，所以很快在1967年的1月被取締或禁止。但是當湖南的民眾在同年5月為“湘江風雷”平反時，知青再次掀起回城高潮。10月，知青們在《反迫害》^[79]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為《劉氏上山下鄉運動是對毛主席青年運動方向的徹底背叛》。該文印刷了幾千份，群眾踴躍購買。文革要打倒劉少奇，於是懷有不同目標的人們便把自己討厭的人和事都算作“劉少奇的資反路線”和“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一種策略，一種保護色，與對劉少

奇、對文革、對所謂的兩個司令的真實看法和感情無關。“省無聯”的楊小凱曾寫有《長沙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公開為知青打抱不平。後來隨著湖南省革委會的成立，知青們的活動空間受到擠壓，他們的返城運動又一次失敗了。70年代末期，知青們再次鬧返城。此時他們不再用革命、捍衛毛的路線裝飾自己，不再以反對劉少奇的資反路線作為掩護。他們直接了當地以回城為目標，以上訪、絕食、攔火車為手段，以結束他們的苦難。

4.6 道縣大屠殺

文革時期出現過幾起大屠殺，湖南的道縣是其中的一起。道縣有兩派對立的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屬於“湘江風雷派”）。“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該組織成份較複雜，但知識層次較高。以往遭受不公平對待的人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該派在縣城的勢力較大。“紅聯”與當地的政權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他們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統治者的依靠對象。因此該組織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對那些鬥膽犯上作亂且自稱造反派的人極為反感。“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1967年7月開始，兩派的矛盾沖突達到新的高潮。“紅聯”稱“革聯”為“革匪”，“革聯”則把“紅聯”叫作“紅老保”。

8月5日，該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召開全縣各區的緊急會議。縣委書記在給會議作總結時講到，當前階級鬥爭複雜，前幾天六區出現反動標語。階級敵人造謠說，蔣幫要反攻大陸，美帝要發動世界大戰。戰爭一旦打起來，先殺正式黨員，後殺預備黨員。一區有個“偽團長”，天天找到大隊支書和貧協主席，鬧翻案、鬧平反。十一區唐家公社下龍洞大隊的地主富農公開反攻倒算，揚言要把貧下中農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對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志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萬萬不可掉以輕心。我們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制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罪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各區的“抓促”小組組長，大多是區武裝部長或公安政治幹部。他們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自然聞風而動。會議一結束，他們星夜兼程趕回各區，傳達精神，部署工作。

緊接著，一場突發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殺的到來。8月8日，在兩派鬥爭中處於劣勢的道縣“革聯”先下手為強，沖擊縣武裝部，砸爛武器倉庫的大門，接管了現有的槍支彈藥。第二天，“革聯”又把武裝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槍支彈藥全部搶走。搶槍後，“革聯”以左派勝利者自居。作為對立面的“一月革命”的勝利者“紅聯”感到壓力很大，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

“紅聯”準備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有槍支的民兵），攻打“革聯”總部。同時加強管制四類分子，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80]。縣委書記通過郵電線路召開電話會議。他憤怒地敲著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雖然他並沒有明確發出殺人的命令，但是殺人的信號已經發出，紅色恐怖已經籠罩那些未來的犧牲者。

道縣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曆史問題），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者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殺人手段可歸納為10種：（1）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2）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4）炸死（又稱“坐土飛機”）；（5）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7）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8）繩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燒（含熏死）；（10）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1967年8月29日，解放軍第47軍奉命進駐道縣，制止殺人，道縣的道江鎮居民走出家門夾道歡迎。9月27日，第47軍和省革籌小組聯合發出緊急通告。這張通告為最終平息歷時兩個多月的慘絕人寰的湘南農村大屠殺發出最後的通牒，深受“革聯”造反組織歡迎。可惜好景不長，在以後的幾次運動中，“革聯”將受到軍代表和地方官員組成的革委會的殘酷鎮壓和清洗。

4.7 造反派的第二次風光

省革委會成立後，“清隊”、“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相繼開始。開始時運動在掌權的造反派的主持下進行，但專案組大多由原保守派組成。這是因為，專案組成員需要由政治上可靠的人員擔任。原保守派黨團員多，是當然的人選。“清隊運動”中，首當其沖的是黑五類。這些黑五類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屢遭打擊，一直戰戰兢兢地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即使最激進的造反派也不敢對他們表示同情。《湖南日報》中有一批被打成右派的記者和編輯，他們在文革中成立了一個造反組織，試圖平反他們的冤案。他們希望得到造反派的支持，遺憾的是，沒有一個造反派組織敢支持他們。甚至有造反派組織說他們是“右派想翻天”，勒令他們解散。更有甚者，有的右派還被造反派打得遍體鱗傷，幾乎喪命。雖然造反派也曾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和“右派”，但並沒有去幫助本應同病相憐的黑五類。所以，有人把“清隊”這段曆史稱為“造反派的恥辱”。正因為造反派天生有著與黑五類相似的背景，所以造反派從“清隊”開始逐步喪失權勢，一步一步跌入自己設置的牛鬼蛇神的集中營。到了“一打三反”運動時，湖南的造反派遭到幾乎全軍覆沒的厄運，造反派的領導人和骨幹分子都成了挨整對象。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後，除了上海的造反派因有張春橋的庇護未受到迫害，全國的造反派均先後遭到整肅而垮臺；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已經陷入苦難有三四年之久。

湖南的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華國鋒調至中央後，湖南省的實際大權由省委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卜占亞掌握。林彪事件中，卜占亞被牽連受到審查，因此湖南的“批林批孔運動”變成“批林、批孔、批卜運動”。長沙市的革委會主任景林與蔔占亞是關係密切的上下級。造反派成功地制造輿論，把“批林、批孔、批卜運動”擴展成為“批林、批孔、批卜、批景運動”。造反派把謀求翻身、再次造反的鬥爭鋒芒指向卜占亞和景林。當時造反派組織已經解散，造反派們通過合法的組織（即“工代會”），把原來的領導人和骨幹匯集起來。他們利用大字報影響運動的形勢，並向中央傳遞造反派的信息。

“工代會”的全稱叫做“革命工人代表大會”。解散造反派組織時，中央試圖把工人造反派統一納入“工代會”，以便將來取代文革前的工會，使“工代會”成為一個純粹的工會組織。幸運的是，“工代會”曆經“清隊”、“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保存了下來。此時，“工代會”成了造反派們暗中串聯和聚會的場所，成了再次造反活動的司令部。對於造反派的這些行為，省市革委會的當權者不敢隨意鎮壓。這是因為，卜占亞的問題不是造反派揭發出來的，

而是中央上層鬥爭的結果，當權者只能靜觀其變。湖南造反派領袖之一的陳益南，公開貼出大字報向當權者進言，希望能改變造反派受整的處境。陳益南因為造反，在 1970 年挨了整。為什麼現在他又造反呢？用他自己的話說，與其做一個准四類分子，不如拼一把，以爭得應有的人權。陳益南覺得道理在他們一方：造反派響應毛的號召，為什麼要把造反派置於死地？

陳益南的大字報，使他無形中成為再次造反的負責人，進入省市革委會的造反派領導們暗中支持他。文革中，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分裂。每當造反派獲得一個大的勝利，立即分裂，陷入內戰，造反派的能量在內戰中消耗殆盡。但是在此次的造反中，他們盡棄前嫌，共同對敵。在省革委會中的造反派，曾分為以胡勇和唐忠富為首的“汽電派”和以葉衛東和周國強為首的“湘瓷派”，兩派之間曾有過內訌。胡勇和唐忠富不僅向湘系的造反派作自我批評，還邀請他們出山。原已遭冷落的“湘瓷派”東山再起，恢復在省市革委會中的職務，並進入造反派的決策層，進行造反活動。一些已經入獄的造反派，也被胡勇等人設法保釋出獄。湖南出現造反派重組力量後一致行動的獨特態勢。

新當選的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在 1974 年 1 月發表一個講話，大力贊揚“反潮流”的造反精神，並提出要大力提拔造反分子進入領導機構。這一講話向造反派和湖南的官方領導傳遞了明確的信息。此時，張平化重新擔任省委書記。張對於此前在卜占亞當權時期的“清隊”、“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的問題沒有任何責任，故順從造反派的再次造反。許多被關押的造反派，在平反材料尚未準備好的情況下被先行釋放。當時，這種做法叫做“先下車，再出票。”原來的保守派人士也採取不對抗、順從造反派立場的作法，以避免在“清隊”、“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受整的造反派對他們進行報復。湖南出現“各派團結、一致造反”的新局面。造反派們不僅能較為順利地平反、再次燒毀“黑材料”、恢復革委會職務，還能入黨、提拔為領導幹部。

不過，好景不長。以“批林批孔”為契機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未能維持多久，造反派的回光返照僅持續 4 個月就停頓下來。造反派領袖王洪文的權勢開始下滑。鄧小平出來主持中央的工作，造反派的克星來了。

4.8 造反運動的沒落

1976 年，是 10 年文革的最後一年，也是湖南造反派做最後搏鬥的一年。毛在批轉一封清華大學的告狀信中，對鄧小平表示明顯不

滿。中共的宣傳喉舌指出，反擊否定文革的右傾翻案風是文革深入與繼續。在鄧主政時期受到壓制的造反派又一次利用省、市工會的平臺，試圖做新一輪的反攻。造反派明白，只有向鄧小平的複舊路線進攻，才能使自己在政治格局中處於不敗的地位。他們以為中央與自己是同盟，卻並不了解上層所發生的博弈內幕。1976年的形勢與1974年“批林、批孔”的形勢看起來很相似，但是此時省委和省革委會的當權者卻並沒有像上次那樣順從，他們采取不理不睬的方法敷衍造反派。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造反派似乎占了上風，但是此時的造反派已經失去廣大民眾的支持。同為造反的1966、1967年，廣大的民眾是積極參與者，造反派得到民眾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到了1976年，造反的只是造反派的頭頭腦腦們，廣大民眾成了旁觀者。他們在輿論上支持鄧小平，認為鄧強調抓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沒有錯。經過文革，當權的官員們不再像文革前那樣專橫，民眾以前的怨氣基本發泄完了。民眾覺得，1976年的造反只不過是當權的造反派的事，與他們無關。此次的造反成了少數人的革命，所以失敗是不可避免的。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宣告文革激進派的滅亡。

4.9 湖北文革情況簡介^[81]

與湖南僅一江之隔的比鄰省是湖北，國人常將兩省連起來稱為“兩湖”。兩省不僅在地理上有許多相近的地方，而且在政治、經濟上也有相似之處。湖北與湖南的文革相互影響，所以我們將湖北的簡況放在本章之末加以論述。

湖北的文革與其他省一樣，受控於省會形勢的發展。省會武漢的群眾組織分為三大派：“鋼派”、“新派”和“百萬雄師”。“鋼派”指的是“鋼工總”^[82]、“鋼九·一三”^[83]和“鋼二司”^[84]。

“新派”指的是“新華工”^[85]、“新華農”^[86]和“新湖大”^[87]。

“百萬雄師”全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百萬雄師聯絡站”，由具有官方背景的保守組織“武漢市革命職工聯合總會”（簡稱“職工聯合會”或“聯合會”）演變而來，其支持者是武漢軍區。

鋼派以“鋼工總”為主，成立於1966年的11月10日^[88]。他們逐漸從地下的少數派發展成武漢市最大的工人組織。需要說明的是，文革初期，工人組織的建立並未得到中央的明確許可。在文革前的17年中，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組織。任何自發性結社活動，都被視為極端危險遭到取締和鎮壓。文革之初，中央曾三令五申，不准工人串連，成立組織屬於反革命。“鋼工總”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成立呢？最主要的因素在於，少數派工人大都出身非紅五類，在

曆次政治運動中往往是被打壓、排斥的對象。文革第一階段作為政治邊緣人，又深受其害。為改變自身的受壓狀態和爭取個人權利，他們敢於鋌而走險，沖破條條框框結成組織。這些人造反的原因主要是：

（1）爭取個人權利，改變自身政治處境；（2）對本單位的當權派不滿；（3）同情受打壓者；（4）響應毛的號召。

“百萬雄師”及其前身“聯合會”出於自身利益，主張維護現有統治秩序。他們的政治傾向，偏重保湖北省委和本單位的當權派。在1967年“一月革命”運動中，官辦的保守派組織“聯合會”垮了臺。其後演變為以基層民兵為主體，受到武漢軍區支持的“百萬雄師”。湖北的“一·二六奪權”流產，加深了造反派組織間的矛盾。在武漢三鎮，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其實這是“鋼派”與“新派”的對立。

1967年3月17日，武漢軍區以貫徹《軍委八條》為名，宣布“工總”（即後來的“鋼工總”）為“反革命組織”，勒令解散。軍區出動部隊，與公安機關聯手逮捕了以朱鴻霞、胡厚民為首的“工總”區分部以上領導人近500人。3月21日，部隊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通告》（時稱“三·二一通告”），羅列“工總”

“十大罪狀”，宣布解散“工總”及其所屬組織。3月間，造反派中的“新派”也同樣受到軍區的打壓。深感唇亡齒寒的“新派”等溫和派組織，遂與“鋼派”中的“二司”（即後來的“鋼二司”）一道，要求為“工總”翻案，抗議武漢軍區。

武漢軍區的做法引起中央文革的不滿。武漢軍區被迫釋放除朱鴻霞、胡厚民等人以外的大多數“工總”頭目，但不同意給“工總”平反。6月4日，武漢軍區在中央壓力下檢討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之後，仍肯定軍區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確的”，重申不得為“工總”翻案。1967年5月到7月間，受軍區支持的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多次挑起武鬥。影響較大的，有“六·一七血案”、“六·二四血案”和“七·一五慘案”等。

湖北文革中的重要事件是全國聞名的武漢“七·二零事件”。1967年7月，毛和周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湖北的問題。湖北省軍區獨立師部分官兵（該師整體加入了“百萬雄師”）和“百萬雄師”的部分群眾抵制中央處理問題的精神，沖擊武漢軍區和武漢東湖賓館。他們揪鬥中央文革的成員王力，在全市武裝遊行示威，批判中央文革的路線與政策。當時毛就住在東湖賓館，誤以為發生“兵變”，在周的安排下倉促乘飛機逃離武漢。毛很少乘飛機出行，可見此次情況何等緊急。此次事件被中央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和“反革命政變”。“百萬雄師”被定性為反革命組織，瞬間瓦解。

“七·二零事件”以後，“百萬雄師”垮臺。同屬造反派的“鋼派”與“新派”產生激烈的矛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轉化為“鋼新之爭”。主要焦點在於席位之爭，即權力爭鬥。這種鬥爭使得群眾組織內部的關係變得紛繁複雜，直接影響著武漢文革運動的發展。權力鬥爭源於下層等級中人們相對不同的社會地位所產生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的分歧。“鋼派”的多數工人因受壓較深，造反更為堅決徹底，行動上顯得更為激進。“鋼工總”發起人胡國基、丁喆生等，在運動初期無不是挨整對象。“新派”成員的出身大多要好於“鋼派”，他們在運動初期沒有怎麼挨整，因此行動上較為溫和。如“新派”的領導人之一吳焱金不僅出身好，文革前還是本單位“四清”工作組成員，後來又進入單位文革籌委會。另一位領導人彭勳出身貧農，文革前是校“四清”專案組成員。

同時，兩派組織與省市委幹部的關係各異。在某種程度上，也與這種“相對不同”的社會地位有關。幹部並不喜歡造反派，但是因為“新派”較為溫和，所以相對來說比較能接受。對於造反精神強、性格獨立、不願依附於人的“鋼派”，幹部們則不喜歡；甚至懷恨在心，能壓就壓，能打就打，在革委會裏從來沒有真心與他們合作過。

“鋼工總”曾經歷過領導層更迭，作為發起人的彭國華、胡國基、丁喆生、李文祥等人後來退出核心小組。這是因為，胡厚民、朱鴻霞等人自恃出身大型企業，認為小廠無法承擔“鋼工總”領導之職。這是該組織內部的一次權力爭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湖北著名的“北、決、揚”（即“北鬥星學會”、“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和“揚子江評論”的簡稱）。這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由湖北省造反派中具有異端思潮的，從一個松散群體演變而來的3個組織的名稱，其主要成員有魯禮安、馮天艾、童丹等人。“北、決、揚”的人員並不多，鼎盛時不過25人，但是其影響極大。他們認為：在“一月革命”後成立的革委會只是一個臨時權力機構，直至當時仍在襲用資產階級國家體系。他們宣布，革委會這種由革命群眾自己創造出來的新事物，必將由革命群眾自己來把它消滅掉。這個任務毫無疑問地落到了“北、決、揚”的肩上。他們要建立的是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甚至主張通過國內戰爭的形式達到目標。他們還認為，中國存在著一個官僚資產階級，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推翻這一階級。並認為從中央到地方，都存在著一批右傾機會主義者組成的中間派或考茨基派人物。“北、決、揚”認為，中共面臨重新改造、重新建設、重新組織黨的隊伍的嚴峻任務。魯禮安等人準備建立新政黨，取代已經腐敗的中共^[89]。

由於認識上的差異，“鋼派”和“新派”中的絕大多數人並不支持他們的觀點。由於魯在“七．二零事件”前曾冒著白色恐怖為“鋼工總”翻案，魯被抓後，“鋼工總”的許多基層單位自發組織營救活動。“鋼工總”領導人雖然並不支持營救魯，但仍參與營救行動。這是他們對於對魯在為“鋼工總”翻案時表現的一種回報。

從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上半年，是湖北造反派掌權的時期，這是他們最風光的時期。但是湖北群眾組織的風光期並不長，很快像全國其他省市的造反派一樣，最終仍難逃厄運。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整風”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中，遭到毀滅性打擊。“鋼派”和“新派”此時才又一次深感唇亡齒寒，走向團結與聯合，發動“反複舊”運動。但是，終歸是強弩之末。在全國造反派失勢的情勢下，湖北造反派骨幹成員也普遍在“清查五．一六”等運動中遭到清算和打擊。普通造反群眾從此也被打上文革的標記，生活維艱。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捕。湖北的造反派又被打成“四人幫”的“爪牙”、“黑幹將”、“黑爪毛”等，遭到更為嚴厲的清算，被捉拿逮捕、隔離審查、批鬥逼供、撤職降級、開除黨籍、判刑勞改者不計其數。湖北的造反派與湖南的造反派一樣，沒有逃脫失敗的命運。

第五章 江蘇^[90]

江蘇省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較為富庶的地區，經濟位居全國前列。文革開始時，江蘇的人口是 4,450 萬人，僅次於山東和四川，居全國第三。文革結束後的 1978 年，江蘇的 GDP 僅次於上海和四川，居第 3 位。在中共建政以前，南京曾是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在中國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江蘇的文革以南京為中心，而南京大學（簡稱“南大”）始終是南京市和江蘇省文革的風向標。南京大學的群眾組織“紅色造反隊”與“八·二七革命串聯會”（簡稱“南京大學八·二七”），則被稱為江蘇文革的“發動機”。江蘇省後來形成的兩大派組織，正是以南京大學的這兩個組織為首。而且南京大學的文革群眾運動興起在時間上僅次於北京大學，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本章將介紹具有代表性的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學院^[91]附屬中學（簡稱“南師附中”）、南京長江機器制造廠（簡稱“長江廠”）的群眾運動和文革初期轟動全城的“王金事件”等。

5.1 南京大學文革運動的興起

1966 年 6 月 2 日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南京大學當天下午就有人貼出大字報，矛頭直指校長匡亞明。南京大學的前身是國民黨的中央大學和美國教會創辦的金陵大學，教職員工隊伍的政治成份比較“複雜”。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為了加強學校的政治工作，響應毛的關於高等教育改革的號召，在 1966 年初提出建立南京大學溧陽分校的主張，組織文科師生到農村進行“半農半讀”的教學改革。農村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師生們承擔了艱苦的建校基建的重擔。師生的學業受到影響，他們每天只能看看報紙聽聽廣播，專業完全被放棄，文、史、哲三系的 500 多名師生對此極為不滿。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為溧陽分校的師生帶來契機，他們嘗試用一種更為激進的話語策略來實現自己的訴求。溧陽分校的師生在大字報中指責匡亞明提出到溧陽農村創辦文科分校，是為了把廣大教師和學生同正在轟轟烈烈展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隔絕開來。還有人指稱，匡亞明讓教師和學生整日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目的在於借此阻止他們參加政治學習和革命大批判運動。更有甚者，有人提出溧陽分校是修正主義的產物。此舉激怒了匡亞明，於是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擊戰。被重點批判的，包括當時的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中共黨員胡才基。不幸的是，匡亞明想要積極貫徹毛的主張，

“反對那些自私自利的批評者”，結果卻被江蘇省委拋棄，淪為文革的犧牲品，成為文革初期第一批被打倒的對象。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社論，就南京大學揪出校長匡亞明和改組共青團北京市委發表評論。

江蘇省委派出以省委書記彭沖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南京大學^[92]。工作組一方面組織南京大學師生批判匡亞明和幾個被省委拋出來的反動學術權威，另一方面肯定南京大學黨委還是好的，試圖把群眾運動限定在省委設定的範圍內。工作組實行對下層橫掃的政策，批鬥了許多普通教師，對曾經幫助匡亞明打擊造反學生的幹部採取保護的政策。這一做法引起師生的不滿。教師中最早站出來的是中共黨員、轉業軍人文鳳來。他認為，工作組將矛頭指向普通教師和學生的作法是錯誤的，貼了大字報，成為轟動事件。文鳳來造反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曾在南京飯店工作過。他說彭沖經常去那裏遊泳，生活腐化，不配領導南京大學的文革，所以起來造他的反。當時工作組正愁找不到人整，便立即把重點轉移到文鳳來身上。工作組動員黨團員、學生幹部和積極分子，向對工作組不滿的師生發起圍攻。溧陽分校的造反者胡才基等人成了工作組的打手。到了8月初，圍繞工作組的功過和去留，南京大學的群眾形成了三個派別。一派堅決支持擁護工作組，由溧陽分校與匡亞明發生過沖突的師生組成。該派以胡才基為首，組織叫“紅旗戰鬥隊”。其成員一直是江蘇省委的忠實支持者，後來受到省委的庇護^[93]。第二派堅決反對工作組，他們的矛頭指向省委，由教師文鳳來為首的激進派組成，他們的組織叫做“紅色造反隊”^[94]。由於“紅色造反隊”過分強調組織的純潔性，只接受政治表現和家庭背景無可挑剔的人員參加，作為其外圍組織的第三派成立了，這就是以數學系團總支書記、中共黨員曾邦元為首的“南京大學八·二七”^[95]。因為吸收成員的標準較低，其規模很快超過了它的核心組織。“八·二七”後來宣布完全獨立，脫離“紅色造反隊”。工作組最終被撤銷，文鳳來和曾邦元逐漸成為文革時期南京和江蘇地區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

5.2 南京師範學院附中群眾運動的興起

南京師範學院附中是南京公認的最好的中學之一。在中學系統中，南京師範學院附中對南京文革影響有較大的影響。該校的革幹革軍子弟和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弟占了很大的比例。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的鼓舞下，南京師範學院附中出現批判副校長李夜光的大字報，指稱他是國民黨特務。南京師範學院附中的黨支部書記兼校長是沙堯。他從1955年始擔任校領導，在肅反和反右等政治運動中是積極的執行

者。文革開始後，為了保全自己，他通過拋檔案，將目標轉移到其他幹部和教師身上。他長期排擠壓制曾是地下黨幹部的副校長李夜光。

1966年6月中旬，市委向該校派出一個工作組，負責協助學校黨支部開展文革。8月初開始，南京師範學院附中相繼出現5個紅衛兵組織，以下是這些組織的一覽表：

表5.1 南京師範學院附中文革時期紅衛兵組織

序號	組織名稱 (簡稱)	成立時間 (1966 年)	主要成員	立場
1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思想兵） [96]	8.9	地方幹部子弟	保省委、保校黨支部，贊同血統論
2	紅色造反軍（造反軍）	8.11	軍隊幹部子弟	反省委、反校黨支部，贊同血統論
3	八.一戰鬥隊（八.一隊）	8.13左右	軍隊幹部子弟	反省委、反校黨支部，贊同血統論
4	紅色尖刀隊（尖刀隊）	9.18後	工農子弟 人數較少	保校黨支部，不贊同血統論
5	紅色造反聯合會 [97] （紅聯）	9.29	非幹部子弟 近一半學生參加	堅決反對血統論

8月初，南京師範學院附中的校領導已經靠邊站，失去了權力。最先成立的3個紅衛兵組織，在血統論中登上學校的文革舞臺。以軍隊幹部子弟居多的“造反軍”，對學校中的教工實施暴力。8月27日成立勞改隊，把包括校長在內的10多名教職員工關起來。盡管在對待省委和校黨支部的問題上“思想兵”和“造反軍”有不同觀點和立場，但是他們在利用血統論鬥同學方面完全一致，甚至在行動上也有配合。

“八.一隊”相對溫和一些，沒有鬥同學的行為。“思想兵”因是保守派，後來解散了，部分成員加入“造反軍”。“八.一隊”也解散了，部分成員加入“紅聯”。“尖刀隊”解散後，部分成員加入“造反軍”。“紅聯”因社會上的分派，分裂出另一個組織——“井岡山兵

團”（“井岡山兵團”在校內仍與“紅聯”是聯盟，只是在校外的分派上有些分歧）。經過整合，最後在南京師範學院附中形成以“紅聯”、“井岡山”為一方，“造反軍”為另一方的對立局面。以下是各組織演變過程：

表5.2 南京師範學院附中紅衛兵組織的演變過程

1966.8 — 1966.9	1966.10 — 1966.12	1967.1 — 1968.10
思想兵	造反軍（未與社會結派 ^[98] ） （支持沙堯校長兼書記）	
造反軍		
尖刀隊		
八·一隊	紅聯 （支持副校長李夜光）	紅聯（P派）
紅聯		井岡山（好派）

“造反軍”與“紅聯”在對待校領導的問題上有不同的立場。在“紅聯”看來，沙堯基本上扮演了階級路線、階級政策的忠實執行者的角色。“紅聯”反對沙堯，反映出對文革前的一些相關政策的不滿。“造反軍”推崇沙堯，則反映出對於文革前的相關政策有著本能的認同。沙、李之爭的根源，是對於文革前基本狀況的不同認識。

“造反軍”與“紅聯”、“井岡山”在政治訴求上完全對立，沒有任何聯合的基礎。不僅當年未能實行真正的聯合，後來上山下鄉時仍以派別走到一起：“造反軍”一派的人結伴下到一個地方，“紅聯”的也只與本派的人一起下鄉插隊。直至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彼此也沒有相同的理念和價值觀；“造反軍”的多數人還在懷念毛時代，仍然贊同共產專制，這是後話^[99]。

5.3 南京長江廠群眾運動的興起

南京長江機器制造廠（簡稱“長江廠”）是一個大型的國有企業，隸屬第四工業機械部（簡稱“四機部”）。該廠在業務上受四機部領導，在黨組織關係上受南京市委領導，是個受雙重領導的單位。這樣的安排，埋下了沖突的禍根。該廠始建於1945年，由國民黨政府創辦。廠裏的許多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是中共建政前留下的，他們與中共建政以後進廠的工人、技術人員和複員轉業軍人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社教運動前夕，長江廠的黨委書記是南京市委任命的高祥芝。1964年9月，四機部派了一個龐大的工作組進駐長江廠。工作組認為長

江廠黨委徹底爛了，實施無情的整肅。高祥芝受到清洗，近半數的中上層幹部成了“高祥芝集團”成員，許多普通工人和技術人員也受到批判。1965年1月，社教運動轉向。工作組的清洗有所收斂。當年7月，工作組撤離時任命孫樹楨為廠黨委副書記。數月後四機部又任命柳金銘為廠黨委書記。柳金銘和孫樹楨這兩位正副書記培養進廠不久的青年工人、大學生、複員轉業軍人，取代所謂的舊人員（即廠長段俊和其他一些中層幹部）。

1966年6月9日，長江廠出現第一張大字報，指控廠長段俊是反革命和資產階級技術權威的保護傘。大字報的作者是蔣震虹和魯學智。蔣是新任命的黨委書記調進廠的，任廠政治部副主任，其丈夫是部隊的軍官。魯是轉業軍人，廠黨委辦公室秘書。魯曾在蔣的丈夫手下當過兵，與蔣關係密切。7月12日，又有一些青年技術人員貼出大字報，指責段俊企圖複辟資本主義。8月16日，新黨委撤銷車間黨支部書記陳其昌的職務，罪名是鎮壓群眾運動。顯然，這是文革前社教運動中四機部挑起的清洗運動的繼續。

數百名陳其昌的支持者反對撤職決定，到南京市委去請願，要求恢復他的職務。2,000多名新黨委的支持者也結隊前往市委，表示支持對陳的處理。8月20日，市委宣布不批准清洗陳其昌的決定。長江廠黨委召開群眾大會，指責南京市委背離毛的階級鬥爭路線，鎮壓群眾運動，以便保護他們自己。當市委書記前往長江廠時，廠黨委書記避而不見，拒絕傳達市委的決定。

8月26日，長江廠的第一個工人組織“長江紅旗戰鬥隊”（簡稱“長江紅旗”）正式成立。該組織受到廠黨委的支持，魯學智是主要領導人之一。後來魯學智成為“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省工總”或“工總”）的負責人之一。8月29日，一個對立的組織——“紅色職工戰鬥委員會”也宣告成立。該組織受到南京市委的支持。備受廠黨委打擊的廠長段俊和車間主任陳其昌，公開宣布支持該組織。9月2日，因不滿南京市委的決定，“長江紅旗”動員1,000多人進京請願，後被說服返回南京。9、10月間，南京市委和四機部經過磋商，最終同意對長江廠黨委進行改組。11月2日，四機部官員來長江廠宣布，將派一個新的黨委班子取代現任領導。“長江紅旗”表示抗議，認為這是南京市委鎮壓群眾的舉措，其對立派“紅色職工委員會”則表示支持。11月16日，長江廠爆發一場大武鬥，“紅色職工委員會”被打敗，他們集體撤離長江廠以示抗議。從此，該廠在“長江紅旗”的絕對控制之下。可以看出，長江廠的兩個群眾組織對立的根源，來自於四機部與南京市委的矛盾。

5.4 轟動南京城的“王金事件”

1966年9月27日，南京外國語學校（簡稱“南外”）的幾位女“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簡稱“思想兵”）沿街散發傳單。負責跟蹤保護的男生，發現兩個行跡可疑的人。王金揀了一張傳單以後，跟著又揀了兩張。“思想兵”上前盤問王金，並把他押回學校。途經人民大會堂時，巧遇王金所在單位南京玄武建築聯社（簡稱“玄建聯社”）第三工程隊的指導員。指導員證實王金是工人，並且作了擔保，王金被暫時釋放。“思想兵”當天還抓了一個自稱姓葉的工人。晚上，趁看守大意睡著，葉某翻牆逃跑。9月28日，“思想兵”找不到葉某，懷疑王金與他是一夥的，就把王金從單位帶回學校關了起來。

王金曾參加過國民黨，是中尉藥劑師，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過。解放後，王金曾在徐州的一家醫院任藥劑師。因配錯藥造成一名工人死亡，王金被判刑。刑滿釋放後，他回到南京。“思想兵”對王金進行審訊。“思想兵”大多是革幹革軍子弟，得知眼前的王金曾經參加過國民黨軍隊，這還了得。“思想兵”出了一道算術題，問他在戰場上救治了多少國民黨兵，被他救治的國民黨兵又殺害了多少解放軍。王金回答不了，挨了打。

晚上，“思想兵”把已經一天粒米未進的王金從樓梯間裏拖出來，毒打一頓。王金被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流，鮮血濺到牆壁上。王金被放回樓梯間裏，無人過問，饑餓難忍，向紅衛兵討吃的。紅衛兵的管理混亂，沒有專門的看管人員和機構，誰也不會自掏飯票為王金買吃的，有一位“思想兵”給王金喂了一勺貼大字報的漿糊。

晚10時左右，王金又被拉出來。在毆打中，有人對王金的太陽穴猛擊，有人用木棍狠搗王金的腹部，打斷三根體操棒，還有人把皮帶蘸水狠抽王金。王金有五六次昏厥過去，“思想兵”用冷水潑醒過來繼續打。拷打一直持續到午夜，王金被關回樓梯間時已經奄奄一息。

9月29日上午8時，又有一群“思想兵”過來，命令王金出來。王金癱在血泊中，已經爬不起來，他們仍又打了一陣。上午10時左右，王金已經四肢僵硬，瞳孔無光，被活活打死。由於火葬場堅持要有明確的死因，“思想兵”才通知公安局做法醫鑒定和刑事攝影。公安局派出的便衣警察趕到南京外國語學校，警察和打人的紅衛兵握手言歡。警察看了行凶器械，傳授多長的鞭子最合手，還誇獎紅衛兵的鞭子編得好。

王金的死訊傳到王金的單位，同事們憤怒了。事情竟然如此湊巧：王金曾經為建造南京外國語學校的大樓辛勤勞動過；他被折磨致死的地方，正是他曾經揮汗如雨、辛勤勞動之處。10月2日，南京玄武區建築聯社的工人們首先貼出“強烈抗議南京外國語學校的學生打死

工人”的大字報。10月3日，王金的3位同事與華東水利學院^[100]的7位學生成立調查小組，赴南京外國語學校進行調查。王金之死震驚全城，許多群眾開始自發地到南京玄武區建築聯社表示聲援。14日，王金的同事和南京大學的造反派發起成立聯合調查組。16日，一個群眾性的草根組織“九.二八王金事件聯合調查團”（簡稱“九.二八調查團”）在南京大學正式成立。該調查團由南京玄武區建築聯社、南京長江機器制造廠、南京電子管廠和南京大學等40多個單位的工人和學生組成，其主要成員有王金的同事查全華等人。

上海“工總司”是公認的全國第一個工人造反組織，但南京的“九.二八調查團”有兩點超過上海“工總司”。首先在時間上，南京的“九.二八調查團”成立於10月16日，上海“工總司”11月9日才正式成立，前者比後者整整早了24天。其次在自發性上，上海“工總司”是在北京紅衛兵的發起和幫助下成立的，南京“九.二八調查團”則完全是由工人首先發起，在學生的參與下成立的。南京“九.二八調查團”的工人成員後來成為“省工總”的成員，為文革中的江蘇工人運動立下汗馬功勞。

“九.二八調查團”派人四處請願告狀，在本市和周圍城市大造輿論，組織集會抗議紅衛兵的暴行。工人們起初在南京外國語學校校門口抗議，以後沖破校門，湧進學校並占領禮堂，召開大會，要求懲辦凶手。有的工人們站在教學樓下，揚言凶手不受懲罰就拆掉大樓為王金報仇。

當然，在一片憤怒聲中也有不同的聲音。在辯論會上，工人高呼口號，要求懲辦凶手。一位北京的紅衛兵反駁道，“難道要用我們紅衛兵的鮮血去抵償一個社會上小混混的血？”眾多的工人竟無以言對，反駁引來臺下紅衛兵的一陣掌聲。一些參加打人的“思想兵”的家長對死人事件不以為然，認為“打死個把人有什麼關係”，“反正市委要替我們頂住”。有位家長堅決反對行凶者寫檢討，市委不得不告誡這些家長，“不要再火上加油”。南京第9中學和第10中學的紅衛兵開始串聯，說打死王金是革命行動，還說北京打死的人多著呢。

為什麼王金之死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彈？原因有二。首先，南京曾是中華民國的首府、國民黨的老巢。國民黨敗退臺灣時，其政府和部隊的人員撤離了，但是百姓並沒有跟著去臺灣，這一強大的社會基礎留了下來，進入共產黨的新社會。南京地處長江三角洲，屬於富饒的江浙地帶，解放前人民的生活並不像北方地區那樣貧困。比起北方的人民來說，他們對於共產黨的解放不但沒有那麼感恩戴德，甚至還有些抱怨。第二，南京玄武區建築聯社的政治成分複雜，黨團員極少。一個擁有200多人的工程隊，因黨員數量不足3人竟無法成立黨支

部，只好派一名黨員任指導員。這裏的工人盡管也被稱為工人，但與國營大型企業裏的工人有著天壤之別。他們屬於邊緣化的群體，經濟地位低下，政治地位低微，為社會所歧視。南京玄武區建築聯社裏，有許多像王金那樣有曆史問題的工人。如“九.二八調查團”的骨幹查全華，曾因辦過地下刊物被提前退伍，淪為內控人員。對於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來說，他們的“不幸”是打錯了人。如果他們打死的是本校的老師，肯定不了了之。可是他們打死的是王金，他所在單位充滿了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這是一只“馬蜂窩”。

當局為平息民憤費了不少心思。王金被打死當天，玄武區委立即召開由多方領導參加的緊急會議。會上決定把屍體迅速處理掉，免得工人抬屍體上街，他們還組織“赤衛隊”與造反派對抗。市委書記甚至威脅說：誰要再把事態擴大，我們決不會放過他。市公安局5處的一位科長曾3次請示，要求對打人現場拍照留證，一直未獲批准，副市長則指示沖洗現場，銷毀凶器。為控制輿論，當局也搞了個調查組。3日調查組成立，4日鉛印的調查報告就印發出來了。

10月8日晚，副市長王昭銓親自坐鎮指揮，派出10多輛接待外賓用的大轎車，把南京外國語學校學生秘密護送到與安徽交界的僻遠鄉間。同時去的還有10多名市委工作人員，負責照看學生。他們不僅更改校名，對不知情的農民進行隱瞞，連學生家長也不讓知道學生的去向。由於走漏了風聲，學生們不得不分散潛回南京，悄悄地逃往外地串連去了。

10月11日晚，市委送“思想兵”的頭號凶手乘飛機前往山東避風。市公安局開始藉口保密，不許工人看王金的法醫鑒定和刑事攝影。後來公安局刪去法醫鑒定中的詳細敘述，銷毀刑事攝影中的幾張慘不忍睹的照片，以免引起更大的公憤。他們派出大批的便衣，在南京外國語學校散布說，打死人的行為算不了什麼。他們還通過派出所、居民段，把南京玄武區建築聯社的15名工人整成反革命，並準備逮捕其中的1人。

工人們要寫大字報、印傳單，領導不給經費。符合省市委口味的傳單卻不愁經費。不僅如此，單位還扣發參加調查王金事件的工人的工資。當局認為，“死者家屬不起來鬧，事情就好辦了”。他們採取“加速處理、穩住一頭”的方針，派出女工一天24小時地看住王金的家屬，以安慰、照顧為名，行看守、隔離之實。他們還通過房管所換房子，悄悄地把王金的家屬搬了家。在撫恤上，對家屬格外照顧，待遇大大超過王金所在的集體制單位的標準，甚至超過國營企業和國家幹部的撫恤標準。這樣的處理，確實起到了穩定死者家屬的作用。王金的家屬自始至終沒有在公眾場合出現過，沒有公開為王金鳴冤叫

屈，為死者討公道。從家庭的角度上說，王金是可悲的，但又是幸運的。他的同事們冒著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風險，為他奔走呼叫，在南京甚至在江蘇掀起軒然大波。

1966年12月30日，市政府在民眾的巨大壓力下決定緝拿凶手，市委決定逮捕3名“思想兵”。其中1位凶手的父親是南京軍區後勤部的少將副部長，是位1929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在逮捕凶手的公審會上，第1號凶手的父親公開表態，表示兒子犯了法，應該受到懲罰，支持有關部門的決定，決不包庇縱容自己的孩子。他的誠懇態度對平息民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經過5個月激烈和反複的博弈，“九.二八調查團”完成對王金之死的調查，向社會公布調查結果。這是一份詳細的報告，共有50頁，包括王金被打死的經過，王金的個人簡歷，參與打死王金的學生名單，法醫鑒定和刑事攝影，市委書記處會議記錄摘要和省市主要領導人的報告，南京玄武區建築聯社三隊造反派的批判文章，南京外國語學校部分學生的批判文章，南京市委和玄武區委工作人員於順良、張國義、徐俊良和孫勳的揭發批判，國營X廠工人^[101]的批判省市的大字報，南京市委對處理王金事件的檢討，以及王金事件大事記。

“九.二八調查團”於1967年2月6日，在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關於王金事件省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揭發批判大會”。省市委負責人被揪鬥，一位副市長代表市委作檢討。

在文革期間發生的成千上千萬死人事件中，王金之死平常無奇，可圈可點的是王金死後發生的事情。王金之死引發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導致3名老紅衛兵被抓，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九.二八調查團”對曆史做出的貢獻，不僅僅是弄清楚王金之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對南京市乃至江蘇省的紅衛兵暴力起到了阻遏作用，使許多無故百姓得以逃脫厄運。王金事件引發的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顯示了當年民眾對政治利益的訴求。調查團沒有把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作為最終目標，而是借機把鬥爭矛頭指向省、市委。調查報告明確地提出，王金事件的真正凶手是省、市委的走資派。他們的口號非常巧妙，“殺人償命”是任何國度、任何制度都行得通的要求。在此要求的幌子下，聚集起一大批對現實制度不滿的人們，形成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當年的造反派對於紅衛兵還是手下留情的，調查報告稱打死人的紅衛兵為“幾個小家夥”，足見他們的立場和態度。為了不被對手抓住把柄，領頭鬧事的組織者均是曆史問題較輕的工人，真正有明顯曆史問題的工人很少公開拋頭露面。調查團采取的鬥爭策略、目標、手段，無不體現民眾的睿智。

在為王金討回公道的群眾運動中，湧現出一批造反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查全華。查後來脫離造反組織，潛心研究理論問題，發起成立“馬列主義小組”。按照查全華的想法，當時並沒有成立一個政黨的必要，建黨時機尚未成熟。“馬列主義小組”是為迎接可能發生的革命做些思想準備，稱為小組更適宜些。今後，根據形勢的發展再決定後面的行動。被當局定為反革命政治綱領的“論二次革命”，是查在這段時間寫的一篇文章。該文是查全華嘗試運用馬列的理論，剖析文革以及文革給國家與人民帶來的災難，對文革持否定的立場。“二次革命”的提法，是查全華預測將會發生的事情。他的依據是，造神運動出現的“早清示晚匯報”、搭“忠字臺”、全民大跳“忠字舞”、“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是愚民政策，物極必反，最終民眾是不會被愚弄的。眾多的革命功臣被打倒，知識分子被冠以“資產階級”，停課停產鬧革命，學生插隊農村，民眾稍不小心即因言獲罪，凡此種種，導致的結果必然是走投無路的民眾起來反抗。毛林自毀國家基石，隨時可能引發革命，並很有可能爆發於黨內、當政者內部。查全華因為王金事件中的表現，早被當局盯上。後來主要因為那篇文章獲罪，於1969年12月15日被南京市軍管會判處死刑。

5.5 一. 二六奪權

1966年11月開始，群眾運動開始向社會各界蔓延，南京大學的“紅色造反隊”率先走出校門，與工礦企業和社會其他階層串聯成立“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省紅總”或“紅總”）和“省工總”。“南京大學八.二七”也在南京成立“南京八.二七串聯會”（簡稱“南京八.二七”）。南京大學的“紅旗戰鬥隊”則在省委的暗示慫恿下，拉起保守派組織“赤衛隊”和“紅色娘子軍”^[102]。1967年1月3日，“紅總”、“八.二七”為一方與“赤衛隊”為另一方，在江蘇飯店發生大規模的武鬥，造成1,000多人負傷。保守派被打垮，“赤衛隊”迅速瓦解。勝利的造反派並未想到奪權。造反派勢力的發展，是他們在文革初期遭受迫害後不斷抗爭的結果。所以當他們獲得平反和道歉後，已經心滿意足。他們的鬥爭目標，只是希望組織能得到承認，中央能罷免那些迫害他們的官員。在周恩來的敦促下，南京的造反派才開始籌備奪權。周曾給曾邦元打電話，詢問南京的造反派是否也準備奪權。曾回答說，造反派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管理江蘇。周解釋道，所謂奪權並不是真的要造反派接管政府，而是要他們監督在任的官員做好工作。

1月22日至24日，造反派領導們開會商議奪權，會議期間成立以文鳳來為首的“奪權委員會”。但是有代表指責會議缺乏民主，宣布退

出會議。“南京大學八.二七”的領導（包括著名的曾邦元）竟被排除在委員會之外。因此，造反派在奪權問題上分裂了。1月26日凌晨，“南京大學紅色造反隊”、“省紅總”、“省工總”等組織順利奪得省委的權力。其實，黨政機構早已癱瘓，根本沒有抵抗，奪權只是走過場而已。雖然“奪權委員會”向中央文革和周恩來報告奪權方案並得到批准，但是奪權並未按照周的要求進行，造反派沒有聯合奪權。因此周指示造反派，暫緩對外宣布奪權。但是已經奪權的造反派不顧周的指令，登報宣稱奪權成功，並在1月30日召開大會慶祝奪權。周恩來不支持奪權的關鍵原因是，新的權力機構中沒有中共的原高級官員或軍隊將領。文鳳來不過是一名基礎幹部，他的能力和資曆不足以管理一個省的政治和經濟。江蘇地區的造反派分裂為“好派”和“P派”^[103]。支持奪權的稱為“好派”，反對奪權稱為“P派”。

奪權後不久，“好派”的“省工總”發生裂變。該組織起初由市政建築公司、碼頭貨運公司和人力三輪車行業協會的工人造反派領導。張春橋認為“省工總”組織不純，不是以產業工人為主力軍。因此，“省工總”宣布改組。新當選的“省工總”領導人表示支持“好派”。老的“省工總”（簡稱“老工總”）領導人則反對改組，所以帶領其擁護者投入“P派”。最終，江蘇的“P派”由“老工總”、“江蘇東方紅”和“南京八.二七”（簡稱“老、東、八”）組成。江蘇“省工總”的內部分裂，與湖北“鋼工總”內部的分裂如出一轍。

此後，周恩來下令組織一個由軍人、幹部和造反派參加的代表團赴京解決問題。開始“好派”信心十足，以為他們會獲得中央的支持。但是他們很快意識到，中央在各地的奪權問題上有著絕對的權威。周恩來的意圖是，希望原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成為權力機構的第一把手。反對奪權的“P派”，在赴京代表團的28人中只占3個席位。為了表達不滿，他們在南京發動輿論攻勢，指責“一.二六奪權”是少數人的政治野心，不是廣大群眾的意願。曾邦元和支持“八.二七”的幹部高嘯平，組織了一個“江蘇控告團”赴京反對奪權。控告團抵京後，周拒絕接見。該團受到冷遇，連住宿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一個辦公大樓裏打地鋪。不過，中央文革對控告團表示歡迎，對他們的住宿做了安排。周恩來立即改變態度，同意控告團參加談判會議。由於控告團急需中央高層的支持，只要他們的競爭對手不在新的權力機構內掌握實權，他們願意接受任何方案。所以周的方案得到“P派”的支持。

但是，“P派”的幹部高嘯平堅決反對江渭清複出。高嘯平是較早支持造反派的省委幹部，文革開始時任省委統戰部長。他在上世紀60年代受到省委的整肅，個人仕途受到影響。如果江渭清複出，他必定

會遭到打擊報復。由於“二月逆流”，周恩來讓江渭清複出的安排受挫。中央文革提議由高嘯平出任第一把手，但沒有得到回應。由於建立新權力機構談判失敗，南京的局勢失控，兩派武鬥事件頻發。中央不得不在1967年3月5日對江蘇實行軍管，軍管會由軍區政委杜平為首。

5.6 “清查五.一六”

江蘇實行軍管以後，軍隊很快卷入兩大派的派性紛爭。1967年3月中旬，南京軍區對造反派（主要是“好派”）進行鎮壓，聯綿延安區“土建八.三零”、“金陵船廠紅色縱隊”（簡稱“金陵紅縱”）、南京鐵路分局的“鐵道兵”等造反派，抓了這些組織的領導人。這是“好派”在1967年夏掀起“倒許反軍”浪潮的原因之一。“P派”成為南京軍區的堅定支持者。與此同時，南京軍區內部也出現了裂隙。南京軍區空軍和一些駐寧軍事院校的派別支持“好派”。軍方“好派”的領軍人物是軍區國防工業部長杜方平、南空政委江騰蛟、副政委王紹淵、政治部主任高浩平。軍方“P派”領軍人物是江蘇省軍區副政委梁輯卿。

到了8月，南京街頭暴力沖突完全失控。“好派”占領主要城區，“P派”被趕到下關區及江北郊區。兩派以挹江門為界，城內是“好派”的占領區，城外由“P派”占領。9月4日，南京兩派在中央幹預下簽署停火協議。周恩來命令江蘇組織代表團赴京商議大聯合。“好派”堅持許世友及軍區須對軍管時期犯的錯誤和南京暴力沖突事件負責。經過幾個月爭吵，協商毫無進展。12月下旬，毛終於定下決心，許世友不能打倒。1968年1月26日，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個批語，批准南京軍區的檢討報告，表明中央對許世友作出裁決：盡管他犯有錯誤，但是還沒有嚴重到要將他撤職查辦的地步。周恩來和康生在1月28日的大會上，突然宣布兩位江蘇的幹部是幕後挑動兩派暴力和阻礙大聯合的黑手：“好派”的杜方平和“P派”的高嘯平。中央還宣布，除兩人之外，其他人不必為過去的暴力事件負責。中央在處理江蘇問題上負有責任，此舉顯然是找替罪羊，以平息兩派和軍方之間的爭執。

許世友的權力得到鞏固。南京軍區的軍人立即解散跨行業的群眾組織，並將支持“好派”的軍內成員踢出軍管會。江蘇省革委會於1968年3月23日正式成立，許世友任省革委會第一把手，4位副主任中有3位來自南京軍區。雖然軍人的人數在省革委會中只占18%，但是他們壟斷了所有的重要領導職位。革委會部門的正職均由軍人擔任，造反派代表在革委會中被邊緣化了，南京軍區實現了對江蘇的控制。

許世友在一系列打擊反對派的措施後，對反對派的最後一擊是“清查五.一六”運動。該運動於1970年春在全國發動，江蘇的情況異常慘烈。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江蘇在這次運動中受到牽連的人數超過13萬人^[104]，在全國名列前茅。運動一開始，“好派”的領導人相繼落馬。已經被分配到外地工作的幾個領導人（如張建山、葛忠龍和耿昌賢），全被揪回南京接受隔離審查，文鳳來和戴國強^[105]被關進南京監獄。支持“好派”的地方黨政幹部和那些在1967年夏天支持倒許的人，都遭到隔離審查和刑訊逼供。如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杜方平和高浩平等一批軍隊高級幹部被關進軍中監獄，高浩平在監禁期間死亡。與他們有牽連的人，以及那些在1969年被迫離開軍隊的人，只要其所在的工作單位地處江蘇境內，都成為本單位清查運動的重點目標，有些人還被押回南京接受審訊。

“清查五.一六”的突破口選在南京大學，因為江蘇兩大派的主要領導人均在南京大學。省革委會常委遲明堂任南京大學調查組組長。審查對象揭發交代出什麼人，那人馬上被關起來。“五.一六”成員就這樣滾雪球似地越抓越多，最後人們開始亂揭發亂交代。南京大學的調查組長遲明堂也被人揭發是“五.一六分子”，被關了起來。文鳳來是個講義氣的人，他承認反許有錯誤，但是始終否認參加過“五.一六”，沒有牽連他昔日的戰友。文革開始時文鳳來挺身而出貼工作隊的大字報，並不是因為有個人恩怨，而是出於對受工作組打擊的師生的同情和正義感。文鳳來在清查“五.一六”中被整得很慘，精神失常，於1976年自殺離開人世，留下甚多的遺憾。

在這次清查中，最冤的也許要算曾邦元。“八.二七”內部分為兩派，一派以曾邦元為首，另一派以袁服武為首。分裂的原因是高嘯平的問題。當中央決定把杜方平和高嘯平作為替罪羊拋出來時，曾邦元無情地將過去的盟友拋棄。袁服武等人對此表示不滿，認為曾邦元兩面三刀，為了保自己升官，為人不夠厚道。他們倒向“好派”，尋求支持，袁服武後來與“好派”的領導人耿昌賢成為好朋友。“清查五.一六”主要是抓“好派”的人。曾邦元趁機打擊袁服武，把袁也關了起來。清查運動本來就是無中生有收拾造反派的借口，根本不需要任何事實。只要有人揭發，被揭發者立即被關起來。如果不交代就打，打了就胡亂揭發。袁服武被關起來後痛恨曾邦元，心想：“你把我們搞成‘五.一六’，你自己倒春風得意，還當你的省革委會常委？我們把你一起交出來！”結果被關進去的袁派串通起來，一口咬定自己是曾邦元發展的，時間、地點、組織關係講得頭頭是道，相互吻合。最後曾邦元也成了“五.一六分子”，被關起來，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許世友後來到牢房裏找過袁服武。許世友問袁服武：“他媽的，你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袁服武答道：“是真的。”許世友聽了，把桌子一拍，罵道：“他媽的，‘好派’奪我的權，‘八.二七’騙我的權，都不是好東西！”

最後被關的人揭發許世友的老婆田普^[106]和吳大勝也是“五.一六分子”，運動搞不下去了才罷手。

5.7 第二次奪權

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開始。江蘇省的“批林批孔”與湖南省顯著不同。此時的江蘇正處於軍隊幹部的控制之下，軍人占據省級、地、市、縣各級黨委第一書記和革委會主任的職位。雖然因為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有不少軍人受到牽連，但是江蘇的許世友不僅毫發未損，反而在黨內的地位有所上升。因此，控制著江蘇各級政府的軍人在許世友的庇蔭下未受到觸動。許在江蘇也到了說一不二的地步，儼然一個土皇帝。可是好景不長，在1973年12月的8大軍區司令大調動中，許世友被調到遠離千里的廣州任職。那些被許世友安插在各級政府中的軍人轉眼間失去保護，江蘇的強權統治戛然而止。雖然他的兩名副手接手了江蘇省的最高權力，吳大勝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會主任，蔣科任省委書記和省革會副主任，但是軍人的麻煩開始了。

江蘇的軍隊在1968年以鐵腕手段鎮壓派性武鬥，並進行一系列針對許多地方黨政幹部和其他社會勢力的鎮壓行動。軍人不僅在“清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城鄉居民下放運動中傷害了眾多的民眾，而且對各級地方幹部也不放過。例如，1967年3月實行軍管後，他們把20多位省級領導人關進南京以東句容縣的一個監獄，直到許調走後才放他們出獄。大量的地方幹部被軍人們趕到五.七幹校。即使有少數幹部通過了所謂的審查被解放，也最多在新的政權機構中擔任掌權軍人的副手。舊省委領導彭沖和許家屯雖然幸運地躲過一系列的清洗並進入省革委會，但也落得被邊緣化和解職的結果。造反派的領袖們（例如文鳳來和曾邦元）則更加悲慘。他們雖然曾進入過革委會，但早在清洗中成為階下囚。許多曾經獲得革命幹部頭銜的老幹部，在清洗中成為軍人整治的對象。軍隊中反許的人員也遭受清洗。許世友及其追隨者的所作所為，必然招致造反派和地方幹部的強烈不滿。

因為許世友已經調離南京，所以吳大勝負責領導江蘇的“批林批孔運動”。盡管中央對於運動連續下達文件並通過控制的媒體發表重要社論，但吳等人對中央的意圖並不清楚，不知所措。吳試圖把這次運動搞成教育群眾，使他們與各種反動思想決裂，更好地抓革命促生

產。被整肅的造反派領導們，卻把此次運動視為爭取為自己平反的機會。1974年3月，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指責軍方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的錯誤作法。南京大學的兩名前造反派成員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寫出系列大字報，詳細披露清查時逼供信的情況。4月初，省總工會主席、前蘇州造反派領導人華林森在省總工會的一次群眾會議上，指責作為蘇州黨政第一把手的軍隊幹部與林彪事件的牽連。華的這一指控還涉及許世友。與會的前造反派領導人紛紛響應，提出更多的指控。其中的一個重要指控是，吳大勝為了保護許世友夫婦和蔣科，在1973年初審閱省委向北京報送有關林彪集團在江蘇活動情況的調查報告時，刪去關於許夫婦和蔣的情況。這些指控得到省委中老幹部的響應。彭沖和許家屯提出，對林彪在江蘇死黨的活動展開調查，鬥爭矛頭直指吳大勝等人。彭沖提出，要“清查五.一六”冤假錯案和軍方人員與選妃活動^[107]的牽連。

造反派領導人與地方幹部在對付軍人專權上聯手出擊。4月中旬，吳大勝不得不在一次省委會議上承認存在錯誤，做自我批評，並同意釋放一批還被關押的造反派領導人。此後，彭沖等人對省委辦公室進行改組，使其擺脫吳和蔣的控制。他們還加緊追查林彪在江蘇死黨的活動，旨在攻擊許世友、吳大勝和蔣科等人。鬥爭並未僅停留在省級領導層，處於底層的民眾也紛紛起來。在軍管期間，江蘇約有35萬市民被迫到農村安家，南京下放了13多萬人。強迫下放造成諸多的社會問題。對軍管人員錯誤的批評和指責，使這些“下放戶”受到鼓舞。4月28日，數千名下放戶湧入南京火車站，試圖登車到北京告狀。登車不成後，他們集體臥軌攔車，使京滬鐵路運輸中斷兩天。在中央的強令下，吳大勝不得不直接出面與抗議的人們談判。雙方於5月2日達成協議，允許他們返回原地，並發放經濟補貼和糧油煤炭計劃配給。該協議引發連鎖反應，更多的下放戶湧入南京要求同等待遇。地方當局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這些抗議者聚集在南京市內示威。還有部分人向北京進發，與勸阻人員發生衝突。中央嚴厲批評吳大勝對第一批請願者的處理。彭沖和許家屯等老幹部趁機攻擊吳大勝，指出他的錯誤不是偶然的，說他長期捂住林彪問題的階級鬥爭蓋子。5月中旬到6月底，省委召開省級機關“批林批孔”大會，數十位群眾代表（造反派成員和“清查五.一六運動”的受害者）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對軍方人員進行批判。與會者還有人寫大字報、散發傳單，公開點名譴責吳大勝等人。彭沖和許家屯等人常常與這些代表密謀，指導他們如何在大會上鬥爭。部分掌權的軍人開始倒戈，批評吳大勝。對吳大勝最有殺傷力的指控是，吳直接卷入提名林彪為毛接班人的活動並參與林彪集團的活動（如選妃活動）。

8月下旬，吳大勝和蔣科不得不承認和交代自己的問題，並作了檢討。但是他們的交代沒有得到諒解，反而引起更大的憤怒。由於他們交代的問題涉及許世友，代表們將鬥爭的矛頭指向了許。8月31日，彭沖代表省委總結，作為原省委第一把手許世友的錯誤應該受到批判。雖然彭沖和許家屯的舉措受到軍人的零星抵抗，但是10月6日到14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明確地支持彭沖和許家屯。中央會議結束後，彭沖和許家屯進一步加大批判吳大勝和許世友的力度。在江蘇省委召集的部委辦局、地市委和南京軍區政治部負責人聯席會議上，對南京軍方主要領導人提出指控。指責他們與林彪集團有牽連，搞以人劃線的分裂主義；否定文革，搞獨立王國，破壞批林批孔；有錯不認錯，政策不落實，影響安定團結。

11月13日，地方老幹部群體的勝利得到確認。南京軍區和江蘇省委主要負責人奉召進京，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和紀登奎的接見。中央宣布彭沖為省委第一書記和省革會主任，兼任南京軍區第二政委。吳大勝和蔣科被停職，繼續接受批判和審查。彭沖和許家屯返回南京後傳達中央指示。吳和蔣不得不表示支持中央決定，擁護彭沖的領導。12月30日，江蘇省委和省軍區聯合發出通知，命令所有軍方人員全部返回軍隊。至此，軍人專權的局面終於落下帷幕，地方幹部終於翻身了。新的省委領導立即致力於鞏固他們的勝利，對曾經幫助他們攻擊軍方人員的造反派要求恢復原先領導職務的要求，無情地拒絕，因為造反派此時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5.8 造反派捐棄前嫌最後一搏

1975年春夏，複出的鄧小平在毛的支持下實行全面整頓。該整頓對重建社會和生產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於以強力打擊原造反派領導人，產生了始料不及的後果。從1970年的清洗運動開始，幾乎所有的“省紅總”和“八.二七”的重要領導人均遭到審查和清洗。他們當中有一些人在刑訊逼供中死於非命，有的人因為長期監禁精神失常。雖然有不少人得以幸存並協同原省委的地方幹部驅逐占據省革委會中的軍方勢力，但在安排工作時受到明顯的歧視。相同的個人處境，使得曾經是敵對兩派的造反派逐漸被統一的造反派身份所取代。他們捐棄前嫌，團結一致，為改善自身處境拼死一搏。江蘇省各地的原造反派領導人頻繁串聯，逐漸形成反對以彭沖和許家屯為首的江蘇省委的聯合陣線。在這一聯合陣線中，原造反派領導人，南京的曾邦元、蘇州的華林森和徐州的孔慶榮發揮了重要作用。

曾邦元1974年獲平反後，被分配到蘇北某縣工作，曾對此極為不滿。華林森原為蘇州長風機器廠老工人、中共黨員、勞動模範，他是

蘇州“支派”的領導人。由於華林森在軍管後支持軍管，所以他沒有受到清洗，而且還高升成為中共十屆全會的中央委員，是蘇州的第二號人物。軍管人員被排擠出勢力圈後，華林森掌握了蘇州黨政大權。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華大力突擊發展造反派入黨。在整頓期間，華林森被停止一切領導職務，擔任其他職務的造反派也被下放到工廠。蘇州造反派領導人與省委的矛盾空前激化。

徐州的孔慶榮也是一位老工人、老黨員、老劳模。由於孔慶榮屬“支派”，與軍管會合作，所以形成一派掌權的局面。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反對派（“踢派”）再次向軍管會和孔所屬的“支派”發難，使得徐州的局勢失控。在整頓中，江蘇省委與鐵道部派工作組進駐徐州。“支派”和“踢派”兩派領導人均受到打擊，少數人甚至被判刑入獄。孔慶榮所屬的“支派”長期掌權，是整頓的最大受害者，自然對整頓和江蘇省委不滿。

1975年底和1976年初，“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形勢又一次發生逆轉。原本各自為政的南京、蘇州、徐州等地造反派領導人聯合起來，緊緊抓住蘇州問題、徐州問題向江蘇省委發難，成為江蘇“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主力。這一情形與湖南、湖北的情況極為相似。

1976年三月底和四月初，南京市民為悼念周恩來總理，發生“南京事件”^[108]。中央定性該事件為嚴重政治事件。聯合的造反派積極收集和整理材料，通過各種途徑與“四人幫”建立聯系，試圖將彭沖和許家屯等省委領導打成“南京事件”的黑後臺，進而推翻老幹部在江蘇省的統治。值得注意的，是造反派、省委當權派與民眾的立場和關係。在追查“南京事件”中，省委當權派迫於壓力進行追查，但心裏是同情民眾的反抗行為的。造反派明為追查，暗地裏卻以幹部為目標。與文革初期相比，民眾的立場發生變化。他們對造反派領導人與當權派的鬥爭不再感興趣。他們不再與造反派為伍，繼續支持造反派，而是倒向黨內的保守派和溫和派，希望局勢穩定，不再折騰。造反派因為失去民眾的支持，終於未能使他們的命運發生奇跡般的逆轉。

1979年1月，華林森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移交司法機關逮捕法辦。同年底，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華林森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曾邦元也遭到逮捕法辦的下場，被判14年。一代叱吒風雲的造反英雄，就這樣隕落了。

第六章 黑龍江^[109]

黑龍江省是中國最北和最東面的省，省會駐地是哈爾濱。中俄界河黑龍江為境內最大河流，黑龍江省之名由該江名而來。該省的土地面積當時排名全國第六。根據 1964 年人口普查數據，全省常住人口約 2,012 萬人，在當時全國排第 16 位。黑龍江曾是中國重要的裝備製造業、能源工業與農業基地。文革時，在全國占據較重要的地位。

黑龍江的文革曆史上有兩個很重要的人物：潘複生和範正美。前者文革開始時是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文革期間是第一任省革委會主任。後者文革開始時是哈爾濱師範學院（簡稱“哈師院”）的學生，學生會幹部，剛剛在社教運動中入黨。文革期間，範正美不僅是哈爾濱師範學院的群眾組織的首領，而且是黑龍江省的群眾組織首領，並進入省革委會，一度擔任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相當於革委會）的班長。

6.1 範正美的崛起

196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聶元梓的大字報和 6 月 16 日《人民日報》的《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社論，引起民眾的巨大反響。哈爾濱師範學院的黨委書記召開中層幹部大會做動員，並拋出院黨委的 1 位副書記、歷史系的 8 位教授以及 5 個中層幹部共 14 人作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群眾揭發批判。群眾認為，這是書記玩弄群眾、轉移鬥爭方向的伎倆，批判他的大字報貼滿主樓和禮堂外的大牆。範正美所在的政治系，批判系總支書記兼系主任的大字報也布滿政治系的大走廊。政治系師生要求改組系黨總支，學院黨委批准該系師生的請求，組建政治系“文革工作組”。由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和幹部代表共 9 人組成，範正美是 9 位代表之一。這是哈爾濱師範學院文革中的最早奪權。

1966 年 7 月 16 日，黑龍江省委向哈爾濱市的各高校派出工作組。省委在 7 月 18 日又召開大會，提出要抓右派，抓反革命。省委派來的工作組一進駐哈爾濱師範學院就召開大會，把矛頭對准前段時間的積極活動分子。一位曾在 1957 年反右運動中被定為“三類分子”的教師，因貼了黨委的大字報被指控為“漏網右派”。政治系的“文革工作組”被解散，不少人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和“右派”，整個學校沉寂了。範正美和曾貼過大字報的師生感到巨大的壓力。

8月9日晚，範正美等人到哈爾濱工業大學（簡稱“哈工大”）參加大會。一位副省長在會上承認省委向高校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並承認7月18日大會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範正美立即回到學校，召開大會傳達這一好消息。由學生召開學院的大會，這在哈爾濱師範學院還從未有過，範正美等人遭到反對。但是範等人沉著應對，在激烈的辯論中占了上風，大會以範正美等人的勝利告終。會後，與範正美觀點相同的師生醞釀成立組織，並推舉範為領導人，哈爾濱師範學院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成立。不到一個星期，有300多人參加該組織。後來該組織改名為“紅色造反團”，並與哈爾濱市的其他大學的造反組織聯合，組成“哈爾濱大專院校紅色造反團總部”（簡稱“大專總部”）。範正美以黑龍江省造反領袖的身份，登上黑龍江的文革舞臺。

6.2 潘複生的崛起

同年8月18日，毛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哈爾濱也像過節一樣，到處是飄揚的紅旗。時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的潘複生，在北方大廈門前廣場接見大學的各造反團。範正美見到潘複生時，他們緊緊握手。潘複生對範說，“向革命小將學習！”潘承認前段時間犯了方向性錯誤，壓制了群眾，表示要檢討並向紅衛兵們道歉。潘複生的誠懇態度得到紅衛兵的諒解。作為省委書記的潘複生在文革初期就公開支持造反，在全國並不多見。

黑龍江省的主要城市都是中共建政以後發展起來的。在該省，哈爾濱算是有點歷史的城市，也只有幾十年的歷史。該市有不少工礦企業，許多屬於中央直接管轄，與地方的聯系並不密切。哈爾濱市的工人運動嚴重滯後。哈爾濱大學雲集，有14所，其中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和哈爾濱工業大學是名揚海內外的知名大學。運動的主流控制在大學生手中。正如俗語所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知識分子不與工農相結合、不動員工農民眾，就不可能動搖社會根基。紅衛兵們意識到動員工人的重要性，向工礦企業派出學生，進行點火和發動。到1967年1月中旬，哈爾濱先後成立31個行業的“紅色造反團”。

在上海造反派奪權的影響下，哈爾濱的“大專總部”順利地奪得報社和公安局的權，掌握了輿論和執法兩大系統。為了協調學校和工礦企業的造反派，“黑龍江紅色造反者聯合總部”（簡稱“聯合總部”）成立。1967年1月29日，“聯合總部”商定成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或“革委會”），作為黑龍江的臨時權力機構，由17人組成。領導核心為5名勤務組成員：範

正美為班長，另外 2 名紅衛兵代表為副班長，原省委書記潘複生和省軍區司令汪家道僅擔任勤務組成員。1 月 31 日，黑龍江省召開大會宣布奪權，並向中央發了電報。2 月 2 日，中央電臺廣播黑龍江奪權大會的消息，並發表社論，高度評價奪權行動。毛對黑龍江搞的三結合加以肯定，確定為奪權的基本形式。3 月 16 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接見黑龍江革委會的代表，提議由潘複生和汪家道任第一、第二把手。潘複生作為一顆政治新星，將主宰黑龍江省文革初期的政壇。

6.3 分裂和內戰

革委會的成立並不意味著矛盾的結束。曾任革委會副班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造反團”的遊興懋，暗中整理潘複生的材料，控告潘炮打中央文革，結果遊興懋被潘複生以反革命罪抓進監獄。“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色造反團”在劉錄的帶領下，公開打出反潘旗號。潘複生把劉錄等 10 多人抓進監獄，並宣布“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色造反團”為“右派組織”，予以解散。潘複生的強硬手段並未能消滅反對意見。1967 年 4 月，黑龍江大學（簡稱“黑大”）“紅色造反團”組建校革委會，準備結合于天放（原副省長、政協副主席），讓其擔任校革委會主任，省革委會一直不批准。“黑龍江大學紅色造反團”貼出大字報，炮轟省革委會，“炮轟派”由此得名。潘複生召開省革委會常委會，把炮轟行為定為“反革命逆流”，並認定後臺是于天放等人。潘複生動員省革委會的群眾代表出面，成立“捍衛革命三結合總指揮部”（簡稱“捍聯總”）。4 月 27 日，省革會召開大會反擊資產階級二月逆流，批鬥並當場逮捕于天放。但是黑龍江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等“紅色造反團”不甘示弱，正式成立“炮轟聯絡站”。哈爾濱出現新的兩大陣營：“捍聯總”和“炮轟派”。

6 月 5 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屬“炮轟派”）^[110]代表來到省革委會駐地，要求潘複生和汪家道接見，遭到潘和汪的拒絕。代表們席地而坐，開始靜坐示威。潘用武力驅散靜坐人群，並調動 2,000 多人乘機奪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權（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由“紅色造反團”掌權）。6 月 9 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冒著大雨高唱《國際歌》，上街遊行抗議，許多市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炮轟派”因要求潘和汪接見遭拒而靜坐，因靜坐而遭到潘和汪武力圍剿。省革委會發動一系列武鬥，引起人們的不滿，社會輿論發生轉變。許多曾經支持潘複生的民眾開始改變立場，轉而支持“炮轟派”。一些“紅色造反團”的領導人因不認同潘的強硬手段，被打成“暗炮派”。他們被逼成為潘的反對派，範正美是其中之一。

潘複生的高壓政策使哈爾濱的武鬥升級。在有的武鬥中，雙方動用步槍、機槍甚至裝甲車和坦克，造成不小的傷亡。中央決定解決黑龍江的問題，組織兩派匯報團到北京開會。這一安排對於“炮轟派”極為重要。它標志著兩派組織平起平坐，否定了潘和汪欲置“炮轟派”於死地的作法。12月7日，潘和汪向中央和中央文革提交書面檢查。雖然“炮轟派”並不滿意，但總算摘掉“逆流”和“反革命”的帽子。

然而兩派回到哈爾濱後，鬥爭並未就此結束。中央派來的監督組剛一走，潘複生就開始繼續打壓“炮轟派”，力圖實現“捍聯總”一派掌權。在此過程中，多人含冤自殺。潘還把矛頭指向宋任窮，稱其為“漏網走資派”。潘甚至試圖整治曾經的盟友汪家道，並向中央提出撤銷範正美等人職務的請求。由於潘四面出擊，樹敵過多，造成社會的動蕩，中央不得不於1971年3月至6月對潘複生進行批判，並撤銷其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

對比潘複生和範正美對於對立派所採取的措施，能給人一些啟示。潘複生采用的是高壓的強制手段。面對“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的靜坐，潘調動工人強行驅散；並趁其不在學校，用調集工人強行奪權的辦法打壓對手。潘還指揮對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哈爾濱第一機械廠和港務局等進行武裝奪權，造成傷亡流血事件。有的武鬥不僅動用刀槍，甚至使用裝甲車和坦克。然而暴力的辦法並未奏效，反而引起更為強烈的反彈，最後是自己下臺。範正美這個被潘複生稱為“心慈手軟、下不了手”的溫和人物，對於對立派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設法做別人的思想工作，不以勢壓人。對於願意改變立場的曾經的宿敵，給予信任並委以重任，成功地化解矛盾，消除了對立。範正美在哈爾濱師範學院有較好的聲譽，與他的溫和立場分不開。對於這一問題，將在以後的章節裏作進一步的討論。

第七章 內蒙古^[111]

內蒙古自治區橫跨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主要居住者是漢族、蒙古族及滿族等民族。內蒙東西直線距離長達 2,400 公里，南北跨度長 1,700 公里，面積 118 萬平方公里，在全國排第 3 位。1964 年人口普查時，人口為 1,235 萬，位列全國第 22 位，每平方公里僅 10 人左右，是個地廣人稀的自治區。

7.1 文革前的內蒙

分析內蒙的文革，不能不提及文革前擔任內蒙古自治區第一書記、內蒙古軍區司令兼政委的烏蘭夫。烏蘭夫曾試圖走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因為烏蘭夫直接從蘇聯人那裏學到社會主義理論。所以蒙古人認為，烏蘭夫比毛澤東更懂得社會主義。在民族自治、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階級與民族等問題上，烏蘭夫與毛有著不同的理念。烏蘭夫設想民族自決，實行高度自治的區域性民主政府，然後根據內蒙人民的意願，與漢族等其他民族組成中華聯邦政府。烏蘭夫強調自由聯合和自由分離。蒙古族與漢族存在遊牧業與農業的矛盾和沖突，漢人的開墾使草原大面積沙漠化。烏蘭夫及其部下極力推行保護草原的政策，反對漢人開墾，甚至提議漢人也可以搞牧業。烏蘭夫不同意在牧民中劃分階級，推行“三不”政策，即不鬥（牧主）、不分（財產）、不劃（階級）。顯然，烏蘭夫的政策與毛相悖。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的“反黨”錯誤。與此同時，5 月 22 日至 7 月 25 日，由內蒙各級領導參加的北京前門飯店會議也在召開。烏蘭夫原先準備拋出前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胡昭衡作為替罪羊，以圖自己過關。結果在這次大會上，烏蘭夫未及傷人便倒臺。烏蘭夫受到嚴厲批判，罪名是分裂國家，企圖建立大蒙古帝國，做當代的成吉思汗。大會結束 4 天後，華北局起草報告呈送中央，對烏蘭夫的結論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文革剛剛開始，烏蘭夫就成了一只“死老虎”。

7.2 高樹華的崛起

在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的影響下，1966 年 6 月 3 日，內蒙古師範學院（簡稱“內蒙師院”）外語系教師高樹華等人貼出大字報《評紀

之 5 月 18 日的動員報告》，批評院長紀之。師生們議論紛紛，贊成和反對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高樹華的大字報在內蒙古師範學院和全自治區引起巨大反響，自治區向師院派出工作組。人們很快發現，工作組是來滅火的，不是來幫助批評院黨委的群眾。6 月 21 日和 25 日，高樹華等人又貼出大字報，批評工作組。7 月 8 日，支持高樹華的 200 名師生寫了一條巨幅標語，準備貼到主樓上。因為標語蓋壓了“七．一”的紅色標語，被定為反革命事件，貼標語的師生受到圍攻和毆打。7 月 25 日，工作組宣布規定，7 月 19 日以後與高樹華有聯系者必須交待檢查，7 月 23 日後與高有聯系者加重處分。高樹華等人因試圖去北京告狀被抓回，受到嚴密監視。8 月 5 日，毛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撤銷工作組，高樹華等人才獲得自由。8 月 29 日，內蒙古師範學院“東方紅戰鬥縱隊”（簡稱“東縱”）正式成立。呼和浩特先後成立 3 個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第二和第三司令部（分別簡稱為“呼一司”、“呼二司”和“呼三司”）。事實上，“呼一司”和“呼二司”為同一個陣營，以幹部子弟為核心。“呼三司”是平民為主，屬於另一個陣營。高樹華領導的內蒙古師範學院“東縱”加入“呼三司”。高樹華逐步成為內蒙的造反派領袖。

7.3 內蒙軍人的抗命

在上海“一月革命”奪權的影響下，內蒙的“呼三司”奪了《內蒙古日報》的權，開始出版自己的報紙。與其對立的保守派組織“紅衛軍”圍攻內蒙古報社，內蒙古軍區派一個連的士兵進入報社，支持“紅衛軍”。各校的造反派學生在軍區門前靜坐示威，要求軍區領導表態支持造反派。2 月 5 日上午 11 時，軍區用高音喇叭廣播，命令造反派必須撤出靜坐，否則將採取行動。軍區大院裏一片沉寂，堵在門口的卡車和衛兵悄然撤離。持槍荷彈的士兵隱藏在工事後面，主樓頂上架起了機槍。參加示威的人群中有當過兵的，他們是“呼三司”一派的“河西公司八．一八革命造反團”（簡稱“河西八．一八”）的工人們，預感到軍區可能要殺人。果然，在 12 時 15 分，軍區作戰部副部長柳青^[112]從軍區大院內向民眾開了兩槍，把正在鼓動靜坐學生的韓桐打死。“呼三司”的學生被激怒，試圖沖進軍區大院。軍區大院內的士兵得到準備戰鬥的命令，準備為鎮壓學生立功受獎。

幸運的是，“河西八．一八”的工人們站到第一線，極力阻止學生的盲動行為，高喊：“不要上當，這是陰謀！”憤怒的人們止住腳步，軍區的主樓裏傳出因失望發出的咒罵聲。一位軍人事後曾對學生們說，“真佩服你們的策略，如果沖的話，機關槍一突突，2,000 個

也死了。”內蒙古軍區的副司令黃厚事後甚至表示，“當時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沒有機會動手。如果把他們幹掉，現在省了多少麻煩。”

內蒙軍區殺害學生的槍聲驚動了中央。1967年4月13日，中央發布處理內蒙問題的《八條決定》（當時被內蒙當地稱為《紅八條》），並派北京軍區的69軍28師進駐內蒙。中央承認“呼三司”等是革命群眾組織，要求與其對立的保守派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內蒙軍區和保守派進行以“全力對付北京”為宗旨的大規模反抗。當《紅八條》傳到呼和浩特市後，“周恩來是兩面派”、“打倒康生”、“與中央血戰到底”、“強烈要求中央撤銷八條”、“重審內蒙問題”等標語立即出現在呼市的大街小巷。1967年8月11日，保守派召開“誓師大會”，聲明即使被打成反革命，即使只剩下一個人，也要幹到底，會議制定決不解散組織、赴京告狀和就地示威的策略。有3,000多軍人不歸營房，脫離建制，有一個武裝連上街遊行，對抗中央。解放軍第4754部隊有些戰士跑到北京，組織地下連隊。眾多的人到北京告狀，留在呼和浩特市的保守派挑起武鬥。4月18日，內蒙軍區代理司令員滕海清來到呼和浩特市，軍區數千名戰士高呼“把滕海清和吳濤從軍區趕出去”的口號。司令和政委竟然無立足之地，住進新城賓館。第二天晚上，保守派有幾十輛車包圍並沖進賓館，滕海清在“呼三司”的保護下從後門逃出。幾天後，滕海清在軍區作報告時，遭到軍人的圍攻、辱罵，滕高血壓複發，住進醫院。

中央《八條》強令解散保守派，使得保守派面臨淪為社會賤民的危險。他們不得不鋌而走險，與命運、與對手做殊死搏鬥。他們反抗的目的和軍區領導的做法是一致的：壓中央，改《八條》，重做結論，重新分配權力。局勢越亂、武鬥越凶，對他們越有利，越有可能迫使北京回到談判桌上來。

在北京上訪與呼和浩特市武鬥的雙重壓力下，中央只好出面解決問題。5月16日上午，周恩來、中央文革和中央軍委三方面給內蒙古軍區赴京人員開會，勸他們回去照《八條》辦事。當天晚上，周恩來、康生、江青、徐向前、聶榮臻、葉群等16位中央首長在人大會堂接見2,700餘名赴京官兵。結果臺上的中央領導人聲嘶力竭，好話說盡，臺下是哄聲四起，群情洶湧，大會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5月24日，總政治部在政協禮堂開會歡送內蒙赴京人員，千餘軍人在會場上再次高呼“背叛中央”的口號。數百人沖上主席臺搶麥克風，向中央提出以修改《八條決定》為主要內容的“五條要求”，並強令軍區政委吳濤簽字。吳不簽，戰士們拳腳交加，將吳濤打翻在地，予以痛毆。5月25日，中央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下令：外出的軍人必須

於5月底返回，過期不歸者按自行離隊處理。軍區領導機關和部隊不開展“四大”，不許有群眾組織，不許遊行示威。中央表態支持“呼三司”，“呼三司”成為內蒙境內唯一的革命群眾組織。同時中央對支持鬧事的幾個軍區副司令、副政委等實行審查，有的部隊調離內蒙，北京軍區的65軍、69軍的下屬部隊調入內蒙。5月底，在北京軍區部隊的協助下，“呼三司”攻下保守派的最後堡壘——內蒙工會大樓。一度有百萬之眾的保守派，終於土崩瓦解。

7.4 “內人黨”事件

內蒙地區的明爭暫時告一段落，但內蒙古師範學院的暗鬥卻並未結束。中央的《八條》決定下達後，師院的造反派面對一個問題：如何對待曾經的對立派群眾。當時有兩種意見：有的認為要以牙還牙，另一部分人堅持和平懇談。贊成以牙還牙是可以理解的。造反派曾經遭受一些緊跟工作組的保守派師生的迫害，所以要求批鬥保守派，並定他們為“壞頭頭”，加以審判。師院曾發生過20多位老造反派把原對立面的領導人綁起來毒打的事件。以牙還牙派的觀點和立場未獲得大多數造反派的支持，堅持和平懇談的一派占了上風。但這也使“師院東縱”內部分裂成兩派。

1967年11月1日，內蒙成立革委會。高樹華擔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常委，參加了九大和全國四屆人大，並於1976年升任內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委書記。內蒙革委會的成立，並不意味著鬥爭的結束和局勢的穩定。早在1967年下半年起，內蒙境內掀起整肅“內人黨”的運動。所謂“內人黨”，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簡稱。已經成為內蒙革委會委員、原內蒙黨委宣傳部長的特古斯也不能幸免，他被綁架後，進行連夜審訊。1968年4月23日，《內蒙古日報》發表《發動全面總攻，奪取決戰決勝》的社論，許多蒙古族的領導幹部和群眾被打成“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成員。烏蘭夫雖然已經被打倒，但並沒有被人忘記。據估計，揪“內人黨”運動曾關押過50多萬人，致殘12萬人，死亡3萬人。

不僅蒙古族人受到迫害，許多漢族人也受到傷害。例如，高樹華的妻子是漢人，在一所中學任職。進駐該校的工人宣傳隊長曾是保守派，他趁挖“內人黨”之機向造反派發難。工宣隊把造反派負責人隔離在辦公樓的黑屋子裏，將一般人員圍在學習班，進行逼供。高樹華不得求助於“呼三司”的造反派，略施小計，暗地裏狠狠地教訓了那個工宣隊長，才使妻子逃脫厄運。面對內蒙古師範學院上百人被打成“內人黨”的現實，高樹華無力相救。師院打“內人黨”的目標是針對造反派，尤其是高樹華。

由於有太多的人上訪，到北京告狀，中央於 1969 年 5 月 22 日發出文件，承認擴大化了，要求對誤抓的好人徹底平反，並對負有責任的革委會主任滕海清進行批判。結果該文件引起混亂，內蒙再次陷入派別鬥爭；一派是“批滕派”，另一派是“保滕派”。1969 年 12 月 19 日，內蒙實行軍管。直到 1971 年 5 月才結束軍管，由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尤太忠接任內蒙革委會主任。

第八章 西藏自治區^[113]

由於西藏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高寒缺氧的氣象條件，以及民族和宗教的特殊性，西藏地區的群眾運動有邊疆地方的特點。西藏地區的動蕩時間，相對內地要短一些。西藏的首府拉薩市，在西藏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拉薩左右了西藏自治區的文革形勢，西藏的群眾運動基本上為拉薩為中心展開。

8.1 西藏群眾運動的興起

1966年5月31日，西藏自治區黨委成立“文革領導小組”。6月，自治區黨委召開會議，作出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會議要求自治區各部門、各地市成立“文革領導小組”。8月19日，拉薩5萬群眾集會，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開。拉薩中學成立紅衛兵組織^[114]，領頭的是該校的年輕男教師陶長松。陶是江蘇揚州人，1960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陶志願申請進藏，被分在拉薩中學教漢語文。西藏師範學校的紅衛兵領導人則是位藏族男教師。

8月24日，拉薩中學和西藏師範學校等學校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拉薩各居委會要求居民對所轄區的寺院、佛殿、佛塔等宗教建築“破四舊”。12月22日，拉薩部分藏漢群眾和紅衛兵在首都進藏紅衛兵組織等的支持下，成立“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簡稱“造總”）。陶長松後來成為“造總”的總司令（人稱“陶司令”）和西藏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陶是文革期間西藏地區的聞名人物。與“造總”對立的群眾，於1967年2月5日成立“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指揮部”（簡稱“大聯指”）。西藏對立的兩大派正式登上舞臺，開始了生死角逐。

8.2 武鬥的興起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響下，拉薩的“造總”奪了《西藏日報》的權，“造總”從1967年1月11日到2月23日控制了該報。2月24日開始，軍隊包圍報社，擺開強行接管的架勢，有數千人被圍在報社。3月2日，陶長松等人不得不向軍方投降。軍方這才解除包圍，未流血地接管了報社，陶等人被關押起來。據後來透露，當時軍方已經做好開槍強攻的準備。如果造反派沒有及時地撤出，很可能會慘遭屠殺。2月初，“造總”內部的一部分人成立一個叫做“專打土

皇帝聯絡委員會”，矛頭直指張國華^[115]。不過該組織沒有存活幾天，於2月26日被取締。由於該組織的原因，“造總”與軍方有了矛盾。4月1日，中央文革下達指示，表示要為造反派平反，同時命令軍隊停止鎮壓造反派。陶等人在被關押77天後獲得釋放。5月份，西藏自治區的軍管會成立。軍隊一開始是支持“造總”的，但是“造總”把矛頭指向西藏的主要領導人張國華等人。這樣軍隊就不答應了，轉而支持“大聯指”。

隨著兩派的對立不斷激化和升級，出現了暴力。開始時，雙方使用比較原始的武器，如石頭、烏多^[116]、鋼釵、刀矛，後來武鬥發展到使用熱兵器。這些武器是“明搶暗送”的，是由軍隊暗地裏給“大聯指”的，軍管會有明顯的偏向。“造總”通過他們控制的幾個工廠，用鋼管自己造槍，進行自衛。在很短的時間裏，拉薩因武鬥死了約120多人，兩方各有傷亡。

8.3 “六·七大昭寺事件”

雖然“造總”的武器落後，但是他們戰鬥力很強，“大聯指”不敵“造總”。這一形勢導致軍隊直接參與武鬥，幫助“大聯指”打擊“造總”。“六·七大昭寺事件”，是軍隊參與武鬥的一例。“造總”占據大昭寺，將其作為據點。大昭寺3樓臨街一側的一間屋子是“造總”的廣播站。廣播站的宣傳攻勢很厲害，因而受到攻擊。當時駐守在大昭寺的有幾十名“造總”成員，他們多數是居委會、工廠和中學的“造總”成員。

1968年6月7日，一群軍人突然從後門沖進來並開槍，被打死的有10人。還有2人在附近的大街上中彈身亡，死者的平均年齡20多歲，都是藏人，3女9男。在大昭寺發生的血案，令拉薩嘩然。軍隊說他們是執行命令，接管大昭寺。軍方後來又說是槍支無意走火，顯然這些都是謊言。在時任西藏軍區司令曾雍雅^[117]的幹預下，軍隊做了調查，結論是部隊支一派打一派。西藏軍區不得不向“造總”道歉，軍區政治部主任成了替罪羊。真正的責任人，時任西藏軍區副政委的任榮^[118]卻逃脫了懲罰。此事驚動了中央，毛批示說：“軍隊領導不袒護部隊所作壞事，替受害人伸冤，這種態度，是國家興旺的表現。”“造總”在《紅色造反報》上予以詳細報道。“造總”專門制作印有毛澤東批示的毛澤東像章，還舉行大型遊行活動。被打死的12位紅衛兵，被隆重埋葬在拉薩“烈士陵園”內專門開辟的小陵園，西藏軍區和西藏革委會為其立碑。文革後，此事又翻案，烈士陵園被棄。這當是後話。

8.4 “邊壩事件”和“尼木事件”

1969年3月起，西藏的許多地區發生較大規模的暴力事件。5月20日的“邊壩事件”和6月13日的“尼木事件”，是兩起影響較大的事件。邊壩與西藏其他地區一樣分為兩大派，從縣機關到整個農牧區都存在兩派鬥爭。邊壩有個“造總”的小領導人，被稱為“紅色喇嘛”，較有威信。所以邊壩“造總”的勢力比較大，邊壩成了“造總”的天下。5月20日，邊壩的“造總”召開大會，批鬥縣委書記，大會上出現過激言論和行動。據《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記載，縣委機關受到襲擊，幹部職工被打傷30餘人。6月8日，又有2,000餘人沖擊縣委機關，奪了縣革委會的權，搶走縣革委會各辦事機構的公章。接著，又有人襲擊邊壩縣、區機關和軍宣隊，搶劫縣人武部武器彈藥，炸毀軍宣隊住房，打傷幹部、戰士上百名，打死50餘人。中央下令平叛。奉命平叛的部隊中，有的是鐵杆的“大聯指”。部隊全是漢人，阻擋軍隊的全是藏人，事件發展成兩個民族間的戰爭。有一位解放軍戰士迷路，被4位藏族姑娘勒死，主要凶手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姑娘，她後來被解放軍抓住槍斃。她臨死前，被五花大綁。解放軍用刺刀捅她，刀尖從她的胸口冒出一截。她未叫一聲，只是轉過頭來狠狠地瞪了解放軍一眼，最後挨了好幾槍死亡。當天，由解放軍公開槍斃的有30多人。

尼木縣的大多數鄉村都加入“造總”。尼木縣也發生武鬥，縣政府官員成為“造總”攻擊的對象。根據官方資料，尼木縣發生反革命暴亂事件。尼木縣一位尼姑利用宗教迷信跳神並呼喊口號，煽動群眾圍攻、毆打軍宣隊，軍宣隊22人全部被打死。6月21日，他們打死基層幹部積極分子13人，後來軍隊前來鎮壓。這位尼姑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槍斃，參與事件的藏人被槍斃的多達36人。

參與“邊壩事件”和“尼木事件”的人員，沒有一個是出身成份不好的。那些戴有各種帽子的黑五類，因為兩派都不接受，沒有參與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從而逃過一劫。這些黑五類甚至有點幸災樂禍，因為被解放軍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鬥爭過他們的積極分子。

根據中共的官方記載，上述兩個事件被稱為“反革命暴亂事件”。當時，被定性為“再叛”，即再次叛亂，軍隊是以“平叛”的名義進行鎮壓的。所謂“再叛”，是相對於1956—1959年全藏區發生的反抗中共政權的起義而言。該起義被中共定性為“反革命叛亂”，予以鎮壓。達賴喇嘛及西藏政府流亡印度，數萬難民逃離家園。1969年發生的事件，是否可算作第二次反抗中共政權的叛亂？為什麼官方現在要改變口徑，將當時定性的“再叛”改為“反革命暴

亂”？“造總”總司令陶長松認為，當年發生的暴力事件（包括“邊壩事件”和“尼木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

8.5 “紅成事件”

“邊壩事件”和“尼木事件”屬於派性鬥爭還是藏民們的抗暴起義仍有分歧，發生在西藏的“紅成事件”則是毫無疑問的藏民起義。四川成都有一個造反派組織叫做“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西藏藏人桑砸紮西（又叫阿壩臣甘）到成都與“紅成”聯系，得到鼓勵。於是他在阿壩縣成立“紅成”分支，集聚了很多。後來這個造反派組織的性質發生變化，變為反抗中共，驅逐漢人，護衛西藏佛教，趕走共產黨，恢復舊制度的藏人反抗運動。不過，該組織提倡和平反抗。

1968年10月下旬^[119]，阿壩縣的“紅成”與四川和甘肅的“紅成”聯得聯系，統一組織反抗運動。他們圍困久治縣，並派人到縣城向中共的幹部傳話。來人轉交標語和傳單，要求所有的漢人幹部自動離開縣城回家。如果3天不離開，“紅成”將進行軍事進攻。但是在“紅成”進攻之前，中共開始了鎮壓。根據公開的官方資料，“紅成”自動歸降的人員有824人，被俘64人，被擊斃7人。被捕12人，其中被槍斃2人，處理基層幹部15人。資料還顯示，參加“西藏紅成”的人員來自包括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的10多個縣，總數達10萬人。

由於“西藏紅成”已發展為一個龐大的組織，而且在繼續蔓延，對中共統治西藏極為不利。10月17日，成都軍區向中共中央報告，認為“西藏紅成事件”是藏人的“新叛”活動，並將該組織確定為“進行新叛活動的反動組織”。中共10月27日電報批准同意後，11月初開始平叛鎮壓。對西藏久治縣“紅成”的鎮壓，直到1969年6月才結束。據參加“紅成”組織的藏人介紹，在鎮壓“紅成”中，至少有200多藏人被殺。

西藏由於其特殊的原因，派性鬥爭演變成民族鬥爭，在中國的內地省是不多見的。

第九章 雲南^[120]

雲南是中國最西南方的一個省，省會昆明離北京的距離是 2,907 公里。除了西藏和新疆，雲南省會和省會中離首都最遠的。由於自然環境因素制約和歷史的原因，雲南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比較滯後。在邊遠地區省中，雲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與其他省份一樣，雲南的群眾運動發展是以其省會昆明為中心的。

9.1 雲南造反派的興起

雲南省委於 1966 年 5 月 8 日決定：加強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成立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該小組由時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委宣傳部長的高治國任組長。高治國提議（並經雲南省委書記處通過），拋出《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為替罪羊，將其定性為北京“三家村”在雲南的分店。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通過《五一六通知》，雲南省委采取舍車保帥的措施，拋出高治國以保全雲南省委。批判高治國的第一張大字報，是由雲南大學（簡稱“雲大”）政治部副主任尤正發等人在 6 月 29 日寫的。高治國升任省委宣傳部長之前，曾經任過雲南大學的校長兼黨委書記。高治國離開雲南大學之前，把尤從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提拔為校政治部副主任。高治國對尤有知遇之恩，但是當高成為省委替罪羊時，尤正發毫不猶豫地向自己的恩人開炮。

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等人以加強領導為名，向省內幾個主要大專院校派出工作組。閻聲稱，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是集中力量打擊牛鬼蛇神，打擊反革命，打擊資產階級右派，打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說教師隊伍問題多，家庭殺、關、管的占 40%，問題嚴重的占 10% 至 20% 可以清洗。根據他的指示，各地組織大批工作組，集中整訓中小學教師，把大批教師打成“反革命”。雲南省委在控制各大專院校運動時，拋出幾個聞名的“右派”（如雲南大學的李廣田），把鬥爭矛頭指向普通的幹部和群眾。據統計，雲南大學、昆明師範學院、昆明工學院、昆明農林學院、昆明醫學院 5 所高等院校的 3,470 名幹部及教職工中，被大字報點名的達 1,867 人，占 53.7%。

8 月 18 日，毛接見紅衛兵。19 日，雲南大學物理系學生曹齊康和保榮卿貼出大字報，指責揪鬥高治國是省委“舍車馬，保將帥”的陰謀。該大字報的攻擊目標指向省委，省委立即組織上千人的大字報圍攻，說大字報是反革命的。就在曹、保二人被圍攻，以至於曹不得不向校黨委和工作組俯首投降之時，雲南大學物理系的學生方向東

[121]挺身而出。在全校貌似轟轟烈烈實則萬馬齊喑的高壓下，方向東寫出一份同情曹和保的大字報。方向東在大字報中非議對曹、保的圍攻，主張平等待人，以理服人，讓人講話，進行真正的大辯論。方向東當時能這樣做，需要相當的人格力量和勇氣。霎時間，全校師生的大字報矛頭又都指向方向東。於是方向東成為眾矢之的，日子異常難過。也正是那張大字報，為方向東日後成為全省家喻戶曉、赫赫有名的造反派英雄奠定了基礎。

8月20日，毛的《炮打司令部》以文件發到雲南，中央要求立即傳達。省委扣壓該文件，並未及時傳達。省委認為，現在學校鬧得很厲害，機關再亂起來可不得了，毛的大字報被扣壓100多天。8月23日，在北京南下串聯隊的支持下，昆明工學院（簡稱“昆工”）等校的學生到省委禮堂集會，提出“炮轟省委，火燒市委”的口號，雲南的群眾運動正式揭開帷幕。省委表面上表示歡迎，暗地裏準備把“八·二三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說這是類似匈牙利事件的小政變。由於昆明工學院參加造反的學生人數眾多，省委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讓他們全部外出串連，其它各高校的學生也先後走掉一半以上。雲南大學和其它高校的造反派（不幸的是，他們是少數派）被勒令不准外出，留在校內受到打擊。然而在客觀上，這樣做卻保證了除昆明工學院工以外昆明各高校造反派力量的完整。繼續炮轟省、市委的任務，曆史地落到雲南大學和其它高校少數派的身上。

8月26日，在省委的支持下，“昆明地區紅衛兵總部”召開成立大會，省委派官員出席這次大會。大會選定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朱家璧少將的女兒、昆明第八中學的女生朱勉生為總隊長，聘請昆明軍區政治部主任許志奮為總輔導員。顯然，這是一個以保衛省委為目標的保守派組織。

雲南大學的少數派和昆明地區其它高校的少數派，具有一種破釜沉舟、義無反顧的氣概。與發起“八·二三風暴”時的造反派相比，雖然間隔不算長，這些少數派顯得成熟多了。他們開始懂得喚起民眾的重要性，活動範圍不再局限於各高校，而是小心謹慎地深入到“昆明地區紅衛兵總部”控制得最厲害的一些中學和中專學校裏。他們在那裏發展了為數可觀的一批造反派，並在工廠和機關裏也贏得一批同情者。在認為已經具備一定力量的時候，他們發起對省市市委的第二次大沖擊。

9月14日，在北京學生及其它外地學生的鼓動和支持下，雲南大學少數派串連雲南各高校及中專中學生共1,700多人，組織炮轟省委火燒市委的大遊行。遊行隊伍首先沖擊雲南省委的機關報《雲南日報》社，繼而沖擊省委機關大院並進駐省委禮堂，點名要見省委書記

閻紅彥。這是繼“八．二三風暴”之後的一次規模更大，口號更為響亮，遊行者的來源更加廣泛的一次造反活動。這就是在雲南文革史上被稱為“九．一四狂飆”的造反行動。

保守派垮臺之後，“八．二三事件”成為雲南一大派群眾組織的標志和旗幟（簡稱“八派”）。“九．一四事件”成為雲南另一大派群眾組織的標志和驕傲（簡稱“炮派”）。當雲南的造反派分裂為誓不兩立的兩派時，“八派”認為最值得驕傲的是“八．二三行動”，因為比“九．一四狂飆”整整早了20天。但是兩者有三大差別。一是在人員構成上。“九．一四派”（即“炮派”）的骨幹們幾乎都參與了“八．二三行動”，“八派”的人幾乎都沒有參與“九．一四行動”。作為“八派”的主力軍，昆明工學院學生們沒有受過什麼壓制，雲南大學等各高校的少數派曾備受壓制。二是在行動的口號上。

“八．二三事件”以“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到北京去”為主。所謂“炮轟、火燒”，無非是批評省委為何不及早組織大學生上北京而已。“九．一四派”的口號卻要響亮鮮明得多，在炮轟火燒之外，還要堅決揭開省市階級鬥爭的蓋子。可以說，從此把雲南的群眾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三是在影響範圍方面。“八．二三事件”以昆明工學院學生為主，其它高校的少數人以及昆明冶金工校部分人參加。

“九．一四事件”以雲南大學少數派為主，會同各高校少數派及中學生、工人、幹部，聲勢更加浩大，旗幟更為鮮明。該事件對社會的影響，要廣泛深刻得多。“九．一四事件”中，原來勢單力薄的雲南大學物理系“炮兵團”，逐步成為雲南大學最大的群眾組織，其領軍人物正是雲南大學學生方向東。

9.2 造反派的分裂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響下，雲南省的造反派也躍躍欲試，準備奪權。1967年1月中旬，“雲南大學炮兵團”串連省市156個群眾組織，組成“新雲南聯絡站”，積極進行奪權的準備。同時，昆明工學院“八．二三造反兵團”串連另外160多個群眾組織，組成“雲南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指揮部”，也在加緊進行奪權的準備。為了壯大自己的隊伍，雲南大學和昆明工學院都打出響亮的口號和醒目的標志。雲南大學以“炮兵團”為旗幟，昆明工學院以“八．二三”為旗號，竭力宣揚自己光榮的造反曆史。各地各單位的群眾組織，都想依附於一個具有光榮造反曆史的組織，以表明自己的革命性。因此，雲南大學和昆明工學院的造反派可以一呼百應，雲行影從。全省範圍內很快形成“八派”和“炮派”兩大派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雲南大學和昆明工學院各自校內的兩派組織。雲南大學各系各班原先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少數派最積極的是班幹部們。當他們積極向班上的造反派組織靠攏時，受到已經成為多數派的造反派們的歧視和冷遇。這些保守派一氣之下成立“雲南大學八·二三戰鬥隊”，並與“八派”掛上鉤，成為雲南“炮派”大本營雲南大學內部的一股異己力量。昆明工學院亦然：那些文革初期當了保守派的班幹部，也被逼成立“昆明工學院炮兵團”，成為“八派”大本營昆明工學院內部的一股異己力量。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文革初期時，昆明工學院和雲南大學的老造反派們是同一條戰壕裏的戰友，同時遭受省市黨的壓制和保守派的圍剿。為什麼他們不能聯合起來，非要分裂成兩大派呢？

這些造反派組織的領導們當初沖破壓力挺身造反時，也許並未想到能夠奪權掌天下。當造反派真正開始奪權，他們的野心和權欲被誘發出來。如果聯合與自己旗鼓相當的昔日戰友，意味著自己只能奪到一半的權利。如果單獨動手，就可能奪到完整的大權，本派的大小頭目都可得到好處。一朝權在手，可把令來行，也不枉冒風險造反一場。這涉及一批人乃至一派人的重大利益。如果領導人不能審時度勢，引導大家去爭取利益，即使是最有資曆的老造反派，也將為本派群眾組織所拋棄。只要領導人能因勢利導地組織大家去奪取權利，即使當初是鐵杆老保也無所謂。“八派”的首領黃兆琪就是一例。他文革開始時是鐵杆的保守派，但是他能順應形勢，及時轉向，成為“八派”的首領，從而成為雲南文革史上的顯赫人物。

在兩派內部，也曾發生過分歧。例如“八派”楊樹先^[122]曾試圖拉攏幾個“八派”的組織，成立“八·二三工人造反總指揮部”（簡稱“八工總”）。他們想挑起昆明地區第三次大規模武鬥，決心消滅“炮派”，然後再討論建立省革委會的問題。“炮派”方面，原先擔任過“炮派”常委的馮廷波，因為赴京代表名額中沒有他而不滿意，試圖成立“炮派工人造反總指揮部”（簡稱“炮工總”）。由於響應者寥寥，陷於難產。無論是“炮工總”還是“八工總”，都對大學生領導雲南群眾運動極為不滿。他們都認為，應當由工人階級唱主角。此外，昆明醫學院的“炮派”領導人趙璋等人，串連一部分大中學校的炮派組織，成立“炮派第三造反司令部”（簡稱“炮三司”）^[123]。此舉無非是對李毅和方向東等“炮派”領導人不滿，想要分道揚鑣罷了。但是曆史沒有給這些人機會，否則造反派的進一步分裂，會使派鬥更加複雜。關於造反派分裂的問題，在後面的章節會進一步討論。

9.3 軍管會支左和幹部站邊

1967年3月5日，雲南省軍管會正式成立。省軍管會成立後，立即認真學習貫徹中央關於軍隊支左的文件。軍管會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在昆明以及整個雲南有成千上萬個群眾組織，究竟哪些是左派組織，哪些是右派組織或反革命組織？省軍管會經過調查，得出如下的觀點：參加“八派”組織的群眾，大多造反資曆較老，造反精神特別強，過火行動比較多。從人員構成上看，“八派”成員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多，曆次政治運動中犯過錯誤、受過沖擊的人多。從年齡層次上看，該派年輕人居多。參加“炮派”組織的群眾大多造反資曆較淺，造反精神不足，其中不少組織與當權派和走資派暗中還有這樣那樣的聯系，有的組織干脆是由官辦的保守組織改頭換面後轉變過來的。從人員構成上看，該派家庭出身以工人和貧下中農居多，老黨員、老模範、老積極分子多。從年齡層次上看，該派中年以上的人偏多。

在此觀點的基礎上，省軍管會重點審查“八派”的幾個組織，將其中的15個組織內定為反革命組織。省軍管會內部也有派別，與軍管會主任有隙的一派把內定的情況捅給“八派”。“八派”立即做出反應。在省軍管會成立還不到10天的時間內，炮打軍管會副主任的大字報上街。該副主任被迫引咎辭職，從此離開雲南政治舞臺。文革是風雲變幻的年代，省軍管會的態度變化也特別快。省軍管會突然又宣布15個原定為反動組織是左派組織。這樣一來，“八派”和“炮派”兩大派都有氣。“八派”認為，軍管會一成立就想鎮壓造反派。現在不得不轉變立場，但是舊賬不能就這麼一筆勾銷。“炮派”則認為，軍管會是不負責任地亂表態，把反革命組織也算到左派一邊來了。已經開始分裂為兩大派的組織居然臨時聯合起來，採取統一行動。3月22日夜晚，兩大派一同查封實行軍管後的《雲南日報》。這是雲南造反派對省軍管會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沖擊，是對省軍管會權威的一次挑戰。從此以後，雲南省軍管會的威信和地位一日不如一日，直到它的終結。

在奪權問題上，中央的態度很明確，要有效地奪權，必須聯合革命的領導幹部。雲南的兩派也開始尋找原先的幹部成為奪權的夥伴。

“八派”開始時，打算支持省委書記處書記趙健民為革命幹部。但趙健民因為被黃兆琪指揮造反派戴高帽遊街，肚子裏一直憋著氣，不願意與“八派”合作。於是“八派”轉而支持省長周興。此時的周興還被造反派冷落在一邊，如熱鍋上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一見有“八派”願意支持，當然一拍即合，聯為一體。“八派”所支持的幹部是省長周興等人，“炮派”支持的是趙健民等人。

4月26日晚上，“炮派”召開有近10萬人參加的大會。會後“炮派”舉行遊行，結果遭到“八派”的伏擊，隊伍被沖得一塌糊塗。人員受到毆打，傷者多達200多人。這就是震驚全省的“四·二六事件”。該事件產生一個後果：原先一大批持騎牆態度，一派不得罪也不親近的幹部們，逐漸分化，加快向兩派靠攏。因為向一派靠攏即可得到該派的保護，比兩邊受打要好得多。

9.4 滇西挺進縱隊事件

“四·二六事件”以後，昆明以及整個雲南地區陷入武鬥，武器從冷兵器發展到現代化的熱兵器，手槍、步槍、沖鋒槍、機槍和手榴彈皆有。更重要的是，雙方背後都有省委和軍區高層插手。12月中旬，昆明地區的“炮派”攻打位於該市西郊黑林鋪的“八派”的“一一·三零兵團”，取得勝利。該派打死對方百餘人，俘獲數百人。以前“炮派”受到打壓，此次勝利終於使“炮派”占了上風。如果“炮派”能見好就收，可以免受日後的災難。可是“炮派”卻以為可以趁勝前進，打通西線，支持滇西地區受壓制的“炮派”。1968年1月10日，“炮派”組織“滇西挺進縱隊”（簡稱“滇挺”），向滇西進發。

1月14日，“滇挺”到達雲南重鎮下關。當地的地方部隊軍分區支持“炮派”，但是第14軍支持“八派”。作為地方部隊的軍分區，自然不是野戰軍14軍的對手，所以當地的“炮派”一直受氣。“滇挺”的到達使局勢發生逆轉，“八派”傷亡百餘人，並被趕出來，逃到14軍軍營避難。14軍向中央發出急電稱：“炮派”土匪武裝正在下關屠殺革命左派，妄圖打通西線叛國而去，請予緊急指示。“滇挺”接到省軍管會返回昆明的命令後即刻返昆，然而令他們預料不到的是，昆明軍區已經設下埋伏。3,000多名解放軍士兵在昆明軍區副司令魯瑞林的指揮下，在幹海子附近等待著前來送死的1,000多名“滇挺”成員。“滇挺縱隊”被打死200多人，其他全部被俘。經過刑訊逼供後，這些人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遣送回原籍監督管制。

“雲南炮派”的群眾給魯瑞林起了個綽號，叫“魯屠夫”。1月22日，雲南的兩派在中央的監督下，於北京達成停火交槍協議。

9.5 劃線站隊運動

8月13日，雲南省革委會正式成立，省革委會主任由譚甫仁擔任。雖然兩派在革委會中都有代表，但是“炮派”明顯處於弱勢。

“炮派”保趙建民、打周興，證明是錯了：趙建民被中央拿下^[124]，

周興成了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八派”則相反，打趙保周證明對了。作為省革委會主任、昆明軍區第一政委的譚甫仁，明顯站在“八派”一邊。譚對“炮派”橫加指責，對“八派”給予全面肯定。譚甫仁搞的劃線站隊運動，與當時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結合在一起。劃線站隊就是對每個群眾組織和每個人作考查，看其是否站在毛的革命路線上。換言之，是否站對了隊。

省革委會成立後，“炮派”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譚甫仁等對“炮派”進行打擊。基層各單位成立革委會，如果沒有體現以“八派”為主就得不到批准，以保證領導權掌握在“八派”手中，甚至在工資待遇上也存在明顯的偏向。例如，在武鬥期間弱小的一派被迫離開原單位期間的工資補發問題上，“八派”可以如數補發，“炮派”則不予補發，還要交代那段時間到哪裏去了，是否充當趙健民的打手。

1969年1月開始，雲南省革委會召開第七次省、市革委聯席會議，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為劃線站隊運動火上加油。省革委副主任李毅、省革委常委方向東等所有“炮派”的領導以及“炮派”所支持的軍隊和地方老幹部（如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陳康、省軍區政委張力雄、省軍區副司令員熊琨、李明、丁榮昌、朱家璧），全部被遊街示眾。據不完全統計，雲南的劃線站隊運動導致“炮派”方面非正常死亡人數達17,000人以上^[125]；因劃線站隊受迫害傷亡人數，是全省武鬥期間傷亡人數的20倍以上。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劃線站隊運動的始作俑者，積怨甚多的譚甫仁被人暗殺。在中國，如此高位的官員被暗殺實屬罕見。凶手是昆明軍區保衛科副科長王自正。王因為劃線站隊運動受到審查，被關在昆明軍區原戰俘管理所^[126]。王的仇恨不是一個人的仇恨，客觀上代表了一大批人。他對譚甫仁恨之入骨，對虐待他的整個對立派有刻骨仇恨，欲殺之而後快。王還試圖槍殺原單位負責人陳漢中，因陳出差上海不在家未能得手。王自正後來自殺身亡。

9.6 雲南知青大逃亡

雲南還因知青事件聞名全國。1974年8月，數千名赴雲南支邊的知青在返城要求得不到當地政府答復的情況下，開始大批向瑞麗江橋和滇緬公路移動。8月28日凌晨，守衛瑞麗江橋的邊防檢查站接到上級命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守住大橋，決不讓一個逃亡的知青過橋，唯一的限制條件是不許對人群開槍。7時50分，第一批黑壓壓的知青隊伍出現。隊伍越來越近，100米，80米，50米……橋頭的警報拉響，然而知青的隊伍仍然繼續前進。“砰！砰！砰！”士兵對天鳴

槍，高音喇叭裏反複宣講政策。知青們不為所動，悲壯地挽起手臂，唱起《國際歌》，繼續前進。但是他們面對著的是訓練有素的軍隊和民兵的防線，猶如岩石始終紋絲不動。軍人和民兵成功地阻擋了知青們的輪番沖擊。

後來，人數更多、來勢更加凶猛的知青隊伍出現，三道民兵防線相繼被沖垮。最後一批士兵和民兵撤退到大橋入口處，手挽手組成人牆，高喊“誓與江橋共存亡”的口號。數百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和民兵奉命堅守江橋，在不得開槍的情況下，只好將自己身體當作障礙物，堵住知青逃亡者的必經之路。數以千計歸心似箭的知識青年則冒著危險，用身體去撞擊和搖撼這道防線。

僵局持續到中午。聰明的知青從附近農場趕來一群水牛，許多不怕死的男知青騎在牛背上亂踢亂砍。水牛負痛受驚，向瑞江橋狂奔。橋上的防線抵擋不住牛群的強大沖擊，數以千計的知青在一片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中，浩浩蕩蕩通過瑞江橋，踏上通往中國內地、通往家鄉的道路。

雲南知識青年的舉動驚動了省會昆明和北京，雲南省革委會和昆明軍區派出大批部隊沿途圍追堵截。省革會和軍區同時發動公路沿線數十萬農民，許以雙倍工分補貼，在千里公路上布下圍捕知青的天羅地網，知青們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成千上萬的農民手持銅炮槍、獵槍、鋤頭、扁擔，男女老少齊上陣，晝夜監視公路上一切可疑的行人。一旦公路或者山坡上出現逃亡知青的身影，農民們就高舉大刀長矛，揮舞鋤頭扁擔，亢奮地吶喊著，奮不顧身沖向知青。因為上級規定，捉拿一名知青可獎勵工分若干，農民們煥發出極大的積極性，許多農民為爭奪俘虜互相動手，打得頭破血流。抓捕遣返知青的工作足足進行了半個多月。各地政府出動數百輛汽車，才將捕獲的知青陸續送回邊疆。雲南知青的第一次返城暴動以失敗告終。

雲南的知青們不甘心失敗，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再度舉行要求返城的抗議活動。他們發起抬屍遊行、萬人簽名運動，組織罷工、北上請願，並到各大城市活動，意在喚起廣大市民和知青家長的共鳴和支持，配合策應他們的抗爭。知青們集體臥軌，致使由昆明方向開出的數十對客運和貨運列車受阻，昆明連接京滬、京廣、隴海幹線的鐵路大動脈中斷。知青們還強行扣留領導幹部作為人質，揚言如果臥軌的代表受到傷害，他們將以牙還牙。在所有的努力都未能奏效的情況下，絕望的知青們以勐崗農場為中心舉行千人大絕食活動。他們的口號是：“不回城，毋寧死！”一位來自北京的知青，當著中央派來的調查團和眾多參加絕食知青們的面割腕自殺，他的自絕行為點燃了知青壓抑已久的反抗怒火。如果不是知青糾察隊及時維持秩序，失去

理智的知青們一定會把露天會場的臺子踏成平地。一位女知青向中央調查團長跪下求助，一時間 3 萬多名被稱作“祖國未來”的知識青年齊刷刷朝主席臺跪了下來。石破天驚，哭聲動地！

雲南知青不屈不撓的抗爭，終於使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劃上句號。數千萬被趕到農村和邊疆的知青，回到他們生長的城市。

第十章 青海^[127]

青海省位於中國西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東北部。東西長1,200多公里，南北寬800多公里，面積約72萬平方公里，位全國第四位。中國最大的內陸高原鹹水湖——青海湖位於省內。文革前人口215萬，居全國倒數第二，僅略多於西藏。1978年的總產值15.5億元，僅高於西藏和寧夏，位全國倒數第三。雖然青海人煙稀少，工農業不發達，但因文革中“二.二三事件”聞名全國。

10.1 青海文革的開端：“六.三社論事件”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報》發表一篇由陳逸執筆撰寫的社論《大進攻，大反擊，大革命》，揭開青海文革的序幕。此前，報社的總編程光遠向陳逸傳達中央會議的精神，其中包括《五.一六通知》精神。總編認為需要發表一篇社論，廣泛發動群眾，參加即將全面鋪開的文革。社論的發表立即引起強烈的反響。有人給報社送來大字報，指責社論是大毒草。也有人認為社論好得很，民眾中形成兩種不同的觀點。6月23日，省委正式宣布“六.三社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同時派出以省委副書記為首的有50~60人組成的龐大的工作組進駐《青海日報》報社。

省委作出該決定事出有因。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和第二書記王昭當時在北京，正為中央內部的鬥爭惶惶不可終日。王昭曾任公安部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與公安部長羅瑞卿關係密切。羅瑞卿已經成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王昭預感必將殃及自身。現在他主政的青海搞出個“六.三社論”，引發強烈的反應，他不得不匆忙返回，試圖以最快的速度解決問題。丟卒保車是中共官僚常用的手段；為了保住自己，不惜犧牲下屬。進駐報社的工作組不由分說，一口咬定與社論有關的人員是“別有用心”，社論是大毒草。“六.三社論”成了全省性的政治事件。工作組對程光遠和陳逸進行審查，為“程、陳反黨集團”的定性和組織措施做準備。

西寧群眾圍繞“六.三社論”，展開空前規模的街頭大辯論。群眾組織“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簡稱“八.一八”）支持社論，另一派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簡稱“捍衛隊”）反對社論。省委書記楊植霖因為了解當時的中央精神，表示同意“六.三社論”，支持“八.一八”。省長王昭則對社論持不同看法，所以“八.一八”保楊

揪王，“捍衛隊”則保王揪楊。兩派組織辯論會，辯論中兩派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隨著矛盾沖突的激化，兩派出現武鬥並逐步升級。

外地來青海串聯的紅衛兵，使對峙的力量失去平衡。外地紅衛兵不論出於何派，均一邊倒地支持“六.三社論”。在北京紅衛兵的努力下，中央文革了解了“六.三社論事件”並表態支持。青海的文革形勢突然逆轉，形勢有利於造反派不利於保守派。

10.2 “二.二三屠殺事件”

1967年1月13日，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響下，青海的“八.一八”等27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接管《青海日報》。1月23日，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主持召開省軍區常委會。下午6時，會議通過支持“八.一八”的方針，上報蘭州軍區、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和多數幹部不接受該決定。軍區常委會後，軍區機關幹部召集會議，成立“青海省軍區機關革命造反派群眾指揮部”^[128]。他們要求取消支持“八.一八”的決定，並推出副司令員趙永夫作為頭領，趙當仁不讓。在青海省軍區內，趙永夫的支持者和追隨者是多數。當晚9時許，他們沖進省軍區機關揪鬥劉賢權，扒掉他的帽徽領章。劉賢權被軟禁，電話被切斷，門口放雙崗，他的警衛和秘書均無法見他。後來劉賢權被保守派揪到軍區機關，批鬥、毒打、隔離，家也被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在回憶錄中說，趙永夫整倒劉賢權，“事先事後都未向蘭州軍區請示報告，完全是一種非組織活動，性質非常嚴重”。冼恒漢受中央委托，主持甘肅、青海、寧夏、陝西四省的支左工作。趙永夫的行動則受到軍委副主席徐向前的暗中支持，這可能是趙永夫的底氣。

軟禁中的劉賢權起草電報，稱“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捍衛隊”是保守組織，表示堅決支持“八.一八”。他要求把電報發給中央，機要員卻把電報稿退回來，答復是“趙副司令不同意發。”劉賢權的夫人把電報稿用紗布纏在腿上，穿上棉褲，請假到了蘭州。蘭州軍區把電報發給中央軍委，卻沒有得到回複。1月25日，趙永夫召開青海駐軍各部隊負責人開會，趙成為青海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1月29日，“青海八.一八”奪了省委、省人委的權。“八.一八”雖然形式上奪了權，其實只是得了幾枚公章，並無任何實際權力，他們能控制的只是《青海日報》社。《青海日報》為造反派大造輿論，報社成了青海造反派的中心。報社裏“八.一八”占絕對優勢，編輯部80%的人員都是“八.一八”派的。趙永夫視《青海日報》為眼中釘，曾多次電報請示蘭州軍區，要用部隊強行接管報社。蘭州軍區態度明確，堅決不同意。

2月3日，以趙永夫為核心的“解放軍駐西寧地區部隊聯合指揮部”，動用青藏公路使用的250多臺戰備車輛，進行“支持革命派，鎮壓反革命”的武裝遊行。2月14日，趙永夫等以解放軍西寧衛戍區司令部的名義發布公告，決定自即日起對《青海日報》實行軍管。但是當軍管小組進入報社時，受到報社職工的堅決抵制。多所學校的紅衛兵湧入報社，保衛報社，不受軍人管制。參加保衛報社的造反群眾超過2,000人，他們搭起帳篷，準備長期堅守。軍隊包圍了報社，通向報社的主要道路被軍人封鎖。百姓趟過刺骨的河水，為堅守報社的被圍人員送去食物和棉衣。

2月15日起，趙永夫支持的“捍衛隊”等保守派連日舉行遊行示威，支持軍人對《青海日報》的軍管。2月19日，“八.一八”派也舉行遊行示威，反對軍管。當他們途經《青海日報》報社時，遭到保守派的阻攔。“八.一八”的車輛不慎壓死“捍衛隊”的一名成員，矛盾激化了。僵局持續了9天9夜。省軍區向中央軍委發電報，說“八.一八”在報社裏打砸搶，對報社人員實行白色恐怖，打死多人，並稱“八.一八”擁有槍支彈藥。

2月21日，趙永夫再次主持會議，確定2月23日取締“八.一八”，武裝占領《青海日報》報社。2月23日上午8時，西寧全城戒嚴。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區司令部發布通令：取締反革命組織“八.一八”。省軍區調動13個連隊，團團圍住報社，截斷報社與外界的一切通訊聯絡，斷絕西寧通往外地公路交通。趙永夫在臨近的賓館指揮。由於地勢較低，報社處於周圍樓房和高地的機槍控制之下。“八.一八”通過廣播站不斷發出抗議。11時10分，軍人槍擊廣播站，使其失去作用。下午2時，軍人的指揮部發出信號彈，頓時槍聲大作。十多分鐘的時間，造成347人傷亡，其中169人死亡。這就是震驚全國的青海“二.二三事件”。

10.3 事件的結局

屠殺事件發生的當天下午2時，總參謀部作戰部打電話問蘭州軍區，青海西寧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軍隊、地方的電話都打不進去？趙永夫給出的回答是：西寧市“八.一八”組織發生武裝暴亂，開槍打死打傷幹部戰士，軍隊實行自衛還擊，現已平息暴亂。葉劍英晚上8時看到趙永夫的加急電報以後，給趙永夫打電話說：“你們打得好……對反革命分子要徹底查清，堅決打掉。”軍人開槍殺人以後，展開大搜查大逮捕。據事後軍管會的調查，有10,157人遭到監禁迫害，其中被逮捕的有4,131人，有的受到捆綁吊打灌涼水等各種殘酷刑法的折磨。趙永夫為了欺騙視聽，將現場做了一些安排後，搞了個屍體展覽

讓群眾參觀。趙說這是“走資派劉賢權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行”，還押解著劉賢權等人到現場參觀認罪。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屍體堆積如山，院牆上木樁上樹幹上到處是斑斑血跡。2月24日，軍人又鎮壓民族學院的學生，打死打傷12人。

3月初，解放軍總政治部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趙永夫多次在這個會上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成了“平暴英雄”。不過趙永夫等人的行徑不得人心。中央文革開始收到大量的群眾來信來訪，有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兵，也有北京的學生家長；有的送控訴信，有的送血書。家長哭訴，孩子去青海串連，生死不明。3月11日，毛在中央文革寫的材料上做批示，指示調查此事。調查的結果是，學生手上沒有一支槍，更沒有開槍。3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2時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主持處理“二.二三事件”的會議。會議進一步查清“二.二三事件”當天的一些細節，證實“八.一八”並沒有槍支彈藥。最後周恩來宣布中共中央對青海問題的決定，趙永夫等人被押了下去。

3月29日晚九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召集緊急會議，宣讀中央決定：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一次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軍權之後，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300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支並首先開槍的說法毫無根據。

中央決定，要為死難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給予撫恤，對負傷的群眾要負責進行治療。因為這個事件被逮捕的革命群眾和幹部，一律立即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此時，輪到原來支持趙永夫的一派群眾受難了，“捍衛隊”的骨幹分子被清查。青海造反派自此占據優勢，直到文革結束。

1976年文革結束後，趙永夫很快獲釋，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顧問。以後，趙以正軍職幹部離休。169人的死亡案，也就不了了之。

第十一章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29]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是中國西北部的一個省級自治區，是中國陸地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首府是烏魯木齊市。新疆總面積為160多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陸地面積六分之一。陸地邊境線長達5,600多公里，占中國邊界總長度四分之一。新疆是中國最大的優質棉花生產基地，也是中國油氣資源最豐富的省區之一，儲量占陸地總儲量的近三分之一。克拉瑪依油田是中國西部最大的油田。新疆境內居住著維吾爾族、漢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東鄉族等19個民族的群眾。新疆屬於邊遠地區，其政治和經濟在全國占有特殊的地位。分析新疆的文革情況，不能不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簡稱“建設兵團”），因為建設兵團是新疆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省市自治區不同，新疆的群眾運動不僅以其省會烏魯木齊市為中心，還以建設兵團為另一個中心。

11.1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建設兵團分布的地域與蒙古和前蘇聯接壤，國境線有2,000多公里。建設兵團土地面積達7萬多平方公里，占新疆總面積的4.24%，約占全國農墾總面積的五分之一。建設兵團承擔著屯墾戍邊職責，實行黨政軍企高度統一的特殊管理體制。在建設兵團所轄墾區內，依照國家和新疆的法律法規，自行管理內部的行政司法事務，受中央政府和新疆自治區雙重領導。

建設兵團各級建有中共的組織，發揮著對建設兵團各項事業的領導作用。建設兵團是一個“准軍事實體”，設有軍事機關和武裝機構，沿用兵團、師、團、連等軍隊建制和司令員、師長、團長、連長等軍隊職務稱謂。建設兵團還擁有一支以民兵為主的武裝力量。建設兵團屬於國務院計劃單列的副省（部）級單位，下轄14個師（市）。2014年底，建設兵團總人口有273多萬，占新疆總人口的12%。

建設兵團有較長的曆史。1949年12月17日，新疆人民政府和新疆軍區同時成立。新成立的新疆軍區所屬部隊，很快面臨從內地補充給養的問題。於是從1950年開始，駐疆部隊參加墾荒造田運動。1953年，駐疆部隊保留一個師的兵力作為國防軍，其餘部隊編成為生產軍。195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司令員是陶峙嶽，政委是王恩茂，建設兵團總人口為17.5萬人。1956年，中國農墾部成立，建設兵團隸屬農墾部和軍隊雙重領導。1958年，最

後的現役軍人發給轉業軍人證，宣布建設兵團不再隸屬解放軍，成為一支軍墾部隊。1966年後的文革時期，建設兵團又恢復與新疆軍區的隸屬關係。

11.2 新疆的第一張大字報

聶元梓的大字報在全國各高校引起巨大的震動。1966年6月2日下午，新疆大學（簡稱“新大”）中文系67-2班仲高（錫伯人，後為新疆社科院研究員）等幾位學生貼出第一張向校黨委開火的大字報：

《革命永遠不會過火》。大字報對“二月提綱”在新疆大學的執行者雲光副校長提出尖銳的質問：大字報為什麼不許上街？對黑幫為什麼不許畫漫畫？為什麼不能演活報劇？等等。

這一下全校炸了鍋。6月3日早自習時，響應《革命永遠不會過火》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此事被稱為“六·三事件”。但是到了上午，《革命永遠不會過火》的作者之一已經改變觀點。又過了兩小時，數學系的三好學生姚淑媛貼出一張反駁的大字報：“同學們，冷靜一下，校黨委真的爛掉了嗎？”於是學校的師生形成兩派，雙方大字報論戰達到白熱化。與此同時，北京發生兩件大事：北京市委被改組，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6月8日，新疆大學的一位團支書向大家傳達一個驚人的消息：《革命永遠不會過火》是一張革命的大字報！僅幾天工夫，形勢發生180度的大轉彎。當天上午召開全校大會，剛剛回到學校的溫厚華書記做報告，介紹剛剛入駐新疆大學的工作組成員。

從此新疆大學進入白色恐怖時期，工作組開始了整人運動。在“六·三事件”中，五七年反右的情景又一次重現。一些人因“向黨進攻”痛遭殺手，另一些人因“保衛黨委”又立新功。幸運的是，最後結局竟成了喜劇，仲高等同學幸免於難。因為毛發動的運動矛頭所指大變，從“右派”轉向“走資派”。7月底，中央宣布撤銷工作組，結束了工作組的統治。8月4日上午，中央的決定傳達到新疆大學，工作組撤離，校黨委沒有恢復權力。8月4日中午前後，整個新疆大學校園忽然開始了揪鬥。首先是對著白色恐怖時期控制局面的雲光副校長，因為他和工作組壓制了學生。雲光和10幾位領導被押到圖書館樓前，雲光的臉變成死灰，猶如僵屍。緊接著，整個校園充滿了瘋狂，幾乎所有幹部老師都被學生揪出來。一幫一幫的學生，揪著老師或幹部進行批判鬥爭。

總務處有個幹部特別積極，帶領學生沖入教職員工宿舍樓到處揪人。因為他平時跟領導有些矛盾，自己又有點曆史問題，於是趁著混亂公報私仇，鼓動學生揪黑幫。後來他自己又被仇人揪了出來。那時

揪出黑幫的標志是戴高帽子，好幾層桌子板凳，摞一人多高，倒黴的老師被勒令站在上面。他們搖搖晃晃，彎腰低頭，隨時有掉下來的可能。老師們臉發黃，腿發抖，汗直流，還得咬牙堅持，不能昏過去，以免摔死。更多的招數是“遊街”。學生揪著教師滿校園猛跑，一圈接一圈。老師們年歲都不小，他們成天坐辦公室搞科研，哪裏經受得了如此折磨。溫文爾雅、滿腹經綸的老師，全都被“遊”得臉發灰，眼發直，氣喘籲籲。

11.3 新疆的“九.三事件”

1966年9月，烏魯木齊市已經有些涼意，文革的形勢卻由於大批北京串聯的學生的到來，正如火如荼。在北京學生的心目中，新疆是“天高皇帝遠”，各方面相對落後的地區。他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是文革的開路先鋒，到新疆來點燃革命火種，是曆史賦予他們的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採取的第一個重要的舉動，是要求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王恩茂接見，就他們提出的文革問題表態。9月3日，他們打著各自的隊旗來到新疆自治區黨委大院，造反的學生大約有三四十人。他們高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等口號，高唱“造反有理”等毛主席語錄歌，錯落有致地坐在地上等候接見。王恩茂拒絕接見他們，派了幾個自治區黨委的工作人員出來勸說，讓學生們返回駐地選出代表等候接見。學生們不滿意這一答復，堅持要求王恩茂親自出來。他們把工作人員轟走，以更加激昂的聲調，喊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口號。自治區黨委大院的氣氛越加緊張起來。到了傍晚時候，他們宣布進行絕食，拒絕送來的各種食物。

當自治區黨委派自治區書記處書記武光去看望學生的時候，學生們在地上躺著，沒有什麼反應。雖然他們很累很虛弱，但是要見王恩茂的決心沒有動搖。盡管武光反複勸說，學生們不予理會。自治區給學生們送來熱面條熱饅頭，同時送來棉大衣皮大衣。但是他們視而不見，既不吃也不穿。第二天，自治區黨委開會，一致認為學生們如此強烈地要求見王恩茂，如果再僵持下去，絕食仍舊繼續下去，有可能會出現新的問題，因此一致建議王恩茂出面接見學生。後來王恩茂見了學生們，但是學生們並不滿意，場面發生混亂，接見只好草草收場。絕食事件後來被稱為“九.三事件”。該事件本身雖然沒有造成什麼結果，但是影響卻十分重大。因為如何評價“九.三事件”，成了學生及其他群眾衡量人們對文革態度的標準。

11.4 新疆造反領袖吳巨輪

吳巨輪曾經是新疆家喻戶曉的人物。文革期間，他是新疆“紅二司”的總司令、新疆革命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吳巨輪幼年時，因一次突發事故失去半個右臂，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發展。1963年，他考入新疆大學數學系。在新疆大學期間，他曾擔任學生幹部，在學生中比較活躍，小有名氣。文革開始時，他正在讀三年級，擔任新疆大學團委會和學生會幹部。

文革初期，自治區黨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向自治區所屬各大院校派工作組。派駐新疆大學的工作組，由一名自治區黨委負責人掛帥。新疆大學的學生響應中央的號召，貼大字報批判走資派。隨著運動的進展，有的學生開始貼大字報批判學校黨委。工作組召開校團委和學生會的幹部開會，布置反擊“右派”學生的反動言行，把矛頭指向學生。吳巨輪作為團委和學生會幹部，參加了工作組召開的會議。他明確表明自己的意見，反對工作組把矛頭指向學生的做法。此後，工作組在召集有關會議時，就不再通知吳巨輪以及和他持相同意見的人參加。在工作組看來，吳巨輪是右派學生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吳巨輪得知此事後，找到工作組負責人理論。理論沒有結果，因為雙方觀點對立。吳巨輪貼出揭露工作組做法的大字報，批判工作組執行“形左實右”的錯誤路線。雖然他當時並沒有把矛頭指向自治區黨委，但是誰都知道工作組是自治區黨委派來的。吳巨輪的大字報產生轟動效應。工作組立即與校黨委一起，組織團委和學生會幹部，動員學生批駁吳巨輪。這樣便引發學生兩派的爭論。

後來風向改變，工作組被撤離並遭到批判。與此同時，北京等地來疆串聯的學生進一步鼓動和煽風點火。新疆的群眾運動比北京晚一個多月的時間，來串聯的北京學生帶來超前的觀念與口號，對新疆批判工作組和自治區黨委的浪潮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有趣的是，來自北京兩大派的學生在新疆卻出奇地一致。他們均明確表態，支持造反派批判自治區黨委。更為激進者則喊出打倒王恩茂的口號，當時不少新疆的造反派還沒有此意識。在北京學生的鼓動下，不但批判工作組和學校黨委的熱潮繼續升溫，而且批判的矛頭漸漸指向自治區黨委。1966年9月初，“炮轟自治區黨委”的大字報出現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矛頭直指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恩茂。

以自治區黨政軍領導幹部子女為主的烏魯木齊八一中學成立“紅衛兵司令部”，開始揭批自治區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呂劍人（時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各學校在工作組的安排下，相繼成立以該名稱命名的學生組織，並聯合組建成“新疆紅衛兵司令部”（簡稱“紅一司”）。不久，各學校的少數派（即造反派）組建“革命造反紅衛兵司令部”。造反派通過串聯聯合，成立“新疆革命造反

紅衛兵司令部”（簡稱“紅二司”）。新疆大學影響最大，因此新疆大學的“紅二司”成為全疆“紅二司”的牽頭單位，吳巨輪被推舉為“紅二司”的總司令。吳巨輪等人認為，自上而下組建的“紅一司”批判呂劍人，是王恩茂的一個圈套。以紅衛兵組織批自治區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呂劍人，既給人以自治區黨委堅決批走資派的印象，同時也保護了王恩茂自己。基於這種認識，“紅二司”成立之後便揭露“批呂保王”的陰謀，其鬥爭鋒芒直指王恩茂。

新疆的造反派揭發出來的中共高級幹部的奢侈生活令人震驚。這裏舉兩件事例。第一件發生在十年國慶（即 1959 年）期間。賀龍率團來新疆慰問，一條十來里長的通往農場的大道上鋪上麥草類柔性植物，怕塵土飛揚髒了賀龍。招待賀龍的一桌酒席宰了五條牛，僅取牛臉上的一塊肉。第二件是劉少奇路過省城時發生的事情。劉從巴基斯坦訪問回國途徑烏魯木齊。劉下榻處，方圓 10 里的毛驢全都“轉移”，生怕驢叫影響劉的休息睡眠。劉吃的米飯，是挑選出來的最細心可靠的一位建設兵團女戰士一粒一粒地揀出來的，怕有砂咯牙，怕半粒米有礙觀瞻影響食欲。劉吃的一盤炒素菜，耗費 100 斤大白菜，這盤菜僅用拇指大的菜心制成。這樣的事情，沒有文革沒有造反派，是不會被揭露的。毫無疑問，這些醜聞對民眾的“保”與“造”的立場不無影響。

圍繞著保與反王恩茂，新疆兩大派鬥爭逐漸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保守派組織有“紅一司”，“新疆紅衛兵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簡稱“紅三司”），“新疆烏魯木齊地區大中院校紅代會促進委員會”（簡稱“紅促會”），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八一野戰軍總部”（簡稱“八野”）、“聯總”，“新疆工農聯合革命委員會”（簡稱“工農革委會”）。這些組織是由王恩茂、丁盛等人扶植起來的官辦的組織，簡稱“三促派”。造反組織包括“紅二司”，“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學院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兵農造”），“新疆革命職工造反總司令部”（簡稱“職工總司”），“新疆工交戰線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交總司”）等。“職工總司”和“工交總司”是工人組織，是新疆文革的骨幹力量，人們稱該派組織為“三新派”。

實際上，“三新派”和“三促派”的鬥爭，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地方民族主義勢力也參與其中。自治區黨委、政府、新疆軍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內部的矛盾，也反映到這場鬥爭中。新疆兩派的鬥爭以及自治區黨委的做法，受到中央的高度關注。周恩來將新疆兩派的負責人召集到北京，聽取匯報，要求兩派在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基礎上開展文革。周恩來明確指出，自治區黨委支持多數派壓制少數派的做法不對，不符合中央精神，要予以糾正。

自此之後，吳巨輪在周恩來那裏掛了號。從 1966 年底到 1968 年初，吳巨輪等新疆“紅二司”的負責人多次得到周恩來的接見。除此而外，周恩來先後親自給吳巨輪打電話 20 餘次。接見與通話的內容，主要是聽取匯報，給予相應的指示或提出明確的要求。在段時間內，這種方式也成了傳達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對新疆文革指示的渠道之一。周恩來直接給吳巨輪電話指示和多次接見“紅二司”的代表，給了“紅二司”有力的支持。周恩來的明確的態度，使“紅二司”發展壯大。

周恩來如此明確關注“紅二司”有多種原因。文革期間，“紅二司”和吳巨輪在維護新疆民族團結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與“紅一司”比較，“紅二司”中的少數民族學生占的比例較大。1969 年 9 月，新疆革命委員會成立，革委會成員中吸收了兩派的主要負責人，吳巨輪成了革委會的成員之一。從革委會人員組成來看，“紅二司”仍處於少數派地位，“紅一司”的人數多於“紅二司”。領導幹部幾乎清一色地持“紅一司”觀點。

1981 年，王恩茂重返新疆主持工作^[130]。自治區黨委立即下達文件，將吳巨輪等一批人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接著，對這些“現行反革命分子”進行隔離審查，使他們失去人身自由。曾經反對過王恩茂的少數派領導人，幾乎在一夜之間都被清算。上述舉措的確有效。經過幾年甚至 10 多年的審查和關押，文革期間造反派的成員均被驅除出各級黨政機關。

11.5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慘案”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建設兵團內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蓄積已久的矛盾，在文革“一月革命”風暴背景下的集中爆發。石河子原為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經過建設兵團幾十萬軍墾戰士的開墾，到文革前夕，已成為擁有 30 萬人口的城市。

建設兵團主要由新疆和平解放時的原中共解放軍部隊、經改編的原國民黨起義部隊以及支邊人員組成，其主要幹部由 50 年代初入疆的解放軍幹部組成。1965 年，中央派丁盛任建設兵團副司令，裴周玉任建設兵團副政委，李荊山任建設兵團政治部主任。文革前夕，建設兵團內部自上而下矛盾重重。首先是轉業幹部為一方與以起義人員和支邊人員為另一方的矛盾，前者歧視、壓制、打擊後者。其次是複轉軍人、支邊人員為一方與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為一方的矛盾，後者被壓在最底層。第三是建設兵團領導人之間解放軍幹部為一方與起義幹部為另一方的沖突。第四是奉命改造建設兵團的以丁盛為首的新幹部派

與以張仲翰（建設兵團第二政委^[131]）為首的老幹部派之間的矛盾。這四重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得建設兵團的形勢更加錯綜複雜。

文革開始後，丁盛憑借他們掌控的複員轉業軍人為主的建設兵團值班部隊武裝力量，開始在建設兵團全面奪權，自上而下地改組各級領導班子，老幹部派的張仲翰等人被打成“張仲翰反黨集團”。丁盛一派的人提出口號：“複轉軍人掌大權，九、六、八靠邊站，自流人員滾他媽的蛋！”“九”指的是“九·二五”起義人員，“六”指的是即 1956 年的支邊人員，“八”指的是 1958 年的支邊人員。文革中，建設兵團的複轉軍人支持丁盛和裴周玉，成為保守派。支邊人員、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成為反對丁盛和裴周玉的造反派。

石河子地區的兩派，分別是“八野”和“石河子革命造反聯絡總部（簡稱“石造聯總”）”。“八野”的主要成員是複轉軍人，“石造聯總”的主要成員是受壓制的支邊人員、起義人員和自流人員以及造反的學生紅衛兵。他們的口號是：“打倒丁盛、裴周玉！”該派得到建設兵團原老幹部的支持。

1967 年，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刮到建設兵團，兩派都在積極籌劃奪權。1 月 23 日，中央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也稱為《紅五條》）。該決定廢除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決定，命令部隊積極支持左派的奪權鬥爭。這就使建設兵團內掌握武裝的保守派“八野”動用武力鎮壓對立派有了依據。保守派領導人看到《紅五條》後說：“這下可好了，我們可以參加文革了。若造反派再胡來，我就打他個王八蛋！”甚至有人說：“我們要在石河子搞一個赤色恐怖。”更有人對保守派說：“你們什麼時候需要武裝部隊，我們就支持，要多少有多少！”

1 月 25 日下午 6 時，“石造聯總”調集 2,000 多人，營救前一天被“八野”抓去的戰友。他們團團圍住“八野”總部，並同前來救援的近 1,000 名“八野”的成員展開大辯論。“八野”領導人又調 92 名荷槍實彈的軍人趕到現場。全副武裝的軍人們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和沖鋒槍，沖進正在辯論的人群。“石造聯總”的成員們將帶槍的戰士們圍住。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混戰，“石造聯總”奪得 26 支槍，64 枚手榴彈和 1,307 發子彈。他們將這些武器連同扣押的 3 名官兵送往烏魯木齊，作為軍人鎮壓群眾的罪證。另有 3 支被卸了槍栓的步槍，被人帶回毛紡廠。

當日（1 月 25 日）晚 10 時，“石造聯總”的另一路人馬奪了農八師的權，數千人將農八師的機關大樓團團圍住。搶槍事件被上報到建設兵團，建設兵團武裝部作戰室下令坦克團作好作戰準備。新疆軍

區將情況匯報中央，說石河子發生暴亂，搶了值班部隊的槍，準備出動部隊鎮壓。幸好中央制止，坦克團未出動。

1 月 26 日凌晨 1 時，“八野”組織幾千名軍人和“八野”的武鬥人員，包圍毛紡廠的工人住宅區，強行搜查丟失的 3 支步槍。經過 3 小時的搜查，一無所獲，“八野”準備撤兵，但是被毛紡廠的“造反團”團團圍住，非要討個說法。“八野”組織隊伍突圍，幾千人擠成一團。一名士兵朝天開了一槍，緊接著槍聲大作。軍人們的槍有的是朝天放的，有的是向人群裏打的。在毛紡廠住宅區的血案中，打死 5 人，傷 7 人。到了中午，撤退的軍人遇到前去救援的“石造聯總”的大隊人馬。一名軍人用刺刀刺傷“石造聯總”的一名隊員，“石造聯總”的人上前奪槍，一位奪了槍的隊員被軍人當場打死。

同日清晨 5 時 40 分，在另一條戰線上，“八野”的大批人員沖進農八師進行反奪權，4 個連的士兵被派往現場。他們在大院布滿崗哨，屋頂和陽臺上架起 13 挺機槍和 3 門 60 炮。8 時，“石造聯總”總部調來幾千人，後增至上萬人，把軍人武裝占據的大樓和總機房包圍起來，要求軍人和“八野”撤離。武裝部又派出一個連前去增援軍人，群眾圍住增援的軍人。當一名 13 歲的學生對著增援的軍人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時，被一名軍官當場打死。部隊立即向人群開火，當場打死 3 人，傷 6 人。

新疆軍區命令雙方脫離接觸，並派出副司令副參謀長趕到現場，但是他們明顯地一邊倒地支持“八野”和軍人。失望的人群堅持不讓軍人撤離。到了下午 2 時 40 分，軍人得到命令強行突圍，如遇包圍可以開槍警告。15 時 13 分，部隊開始撤出。看到有很多人堵住去路，一名軍官朝天開了一槍，頓時部隊全部開火，密集的人群在密集的槍聲中四處逃散。直到 17 時，部隊才撤離完畢。農八師大院內和北門外留下 10 多具屍體，受傷者達 20 多人。

撤退的士兵殺紅了眼。途經汽車站時，遇到一輛客車進站，士兵們以為是對立派，機槍和沖鋒槍一起開火，當場打死無辜民眾 9 人。後來他們遇到一支文藝宣傳隊，又無故打死 1 人，重傷 3 人。16 時，部分撤退的士兵停車等待接應，看到前來的汽車，以為是對立派，不分青紅皂白一陣掃射，打死 3 人，打傷多人。結果發現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但為時已晚。石河子“一·二六血案”中，值班部隊打死 26 人，打傷 74 人，其中誤傷 20 個自己人。

新疆軍區謊報中央，稱石河子發生暴亂，搶解放軍的槍。中央為保持邊疆穩定，將事件定性為“雙方武裝沖突”。該血案對新疆的局勢影響深遠，雙方都利用此事件大做文章。3 月 28 日，建設兵團臨時文革委員會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6 月，中央決定

裴周玉為建設兵團第二政委，丁盛為第二司令。丁、裴一派成了大贏家，對立派受到整肅。後來丁盛因“四人幫”倒臺受牽連，該案才翻案。1978年12月20日，新疆自治區黨委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對該案重新定性，認為這是丁盛、裴周玉及其幫派一手策劃的武裝鎮壓革命群眾的事件，死傷百人全是他們蒙蔽並指揮值班部隊開槍造成的。這件事與張仲翰、劉丙正等和武光都沒有關係，應予平反昭雪。此案的蒙冤者經受10多年的折磨後，終於重見天日。

11.6 文革中新疆的民族問題

新疆文革中動亂的根源在於兩個基本問題：一是生產建設兵團問題，二是民族問題。新疆居住著12個少數民族。中共建政前，新疆的總人口為480萬人，建政後漢人大規模移民。到1966年，新疆的總人數達到700萬人以上。漢人移民造成人口結構的逆轉，使各少數民族對中共政策抱有強烈的危機感。

早在1957年反右時期，新疆就把反右運動轉變成為“反地方民族主義”。由於新疆民族歷史上曾要求民族自決，因而要求民族自決的領導人成為大清洗的對象。如當時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書記處書記賽甫拉也夫，自治區黨委常務委員伊敏諾夫和艾斯海提，自治區文化廳長孜牙·賽買提，自治區民政廳長依不拉音吐爾的，自治區黨委候補委員阿不都烈依木·艾沙，烏魯木齊市市長阿·賽德，自治區商業廳副廳長阿不列孜·卡裏。這些有代表性的“地方民族主義者”，曾要求將新疆自治區更名為“維吾爾斯坦”或“東土耳其斯坦”，“排斥漢族，破壞民族團結”成為他們的罪名。有學者認為，維吾爾人長年的積怨和對共產黨的不滿，實質上是對“漢族政黨”的不滿。

新疆1962年5月發生的“伊塔事件”，是民族問題的集中暴露。當時，三年困難時期剛結束。新疆約有6.7萬中國公民，由於饑荒，通過以伊犁的霍爾果斯和塔城的巴克圖等幾個口岸，集體非法越境前往鄰國前蘇聯。該事件造成伊犁草原和阿爾泰草原在內的新疆邊境地區人口銳減。事件發生後，中蘇關係更加惡化，新疆境內的俄羅斯族受到排斥。發生集體逃亡事件的原因較為複雜，有中國的經濟困難，蘇聯方面鼓動等原因，也有積累的歷史原因。1962年4月22日凌晨，數十名拎著行李，拖兒帶女的邊民來到霍爾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國際公共汽車前往蘇聯，因當天無車運營與邊防戰士發生口角。其後，數千名手持蘇僑證的邊民來到口岸並發生沖突。此時，蘇聯方向開來大量汽車接走邊民。蘇聯的這一行動持續了三天三夜。5月29日，沖擊伊犁州政府的人數達到2,000人以上。在平定這起動亂中死亡4人，反對者高呼“打倒漢人”的口號。

在新疆各邊境地區中，塔城地區的逃離者最多，共外逃 4 萬多人。逃亡人員帶走牲畜 30 多萬頭，使得 40 多萬畝農田未能播種。許多公社和農場及其下轄的基層組織一時陷於癱瘓，處於解體邊緣。伊犁州下直屬縣市，也有 1.6 萬多人越境，僅霍城縣就達 1.4 萬餘人。霍城縣經濟損失達 979 萬元左右。大批農牧民離開邊境地區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進駐邊境農莊和牧場，從事生產活動，當時稱為“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建設兵團在中蘇邊境一帶建立國營農場，將其作為國防屏障。建設兵團在通過外交努力遣返外逃人員無望的情況下，新成立邊境團場，並劃定邊境帶。“三代”人員就留在當地，繼續從事農業生產並守衛邊疆。在當時，建設兵團為穩定新疆局勢，防止前蘇聯的滲透和破壞，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文革開始後，幹部隊伍中的民族主義分子，最初在烏魯木齊和喀什兩地組建“維吾爾斯坦人民革命黨”。文革初期，伊敏諾夫與紮哈諾夫、巴特哈（當時均是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尼牙孜·烏買提（溫泉縣商業局副局長）、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自治區對外貿易局絨毛廠副廠長）等人密謀行動，在 1968 年 2 月正式成立“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他們一起開過 4 次會，醞釀成立全疆組織。

“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 12 次向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派遣 26 人次，與當地特務機關聯系。到 1969 年底，該黨發展到 1,500 多人；所屬 78 個基層組織，涉及新疆自治區的 12 個地、州、市和 22 個自治區級單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宣稱，“新疆自古以來就是獨立國家，近代以後變成了漢人的殖民地。打破漢人對殖民地的統治，實現東突厥斯坦民族的獨立，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本黨的最終目標。”該黨還把制造分裂輿論，向各族進行分裂思想滲透，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先後編印《火炬報》、《覺醒報》、《獨立報》等刊物，並編印大量宣傳其分裂主張的傳單或小冊子，四處散發。

該黨主席托呼提庫爾班在 1968 年 2 月被新疆大學的群眾組織監禁之後，該黨才被偵破。這就是說，在該黨成立後的兩年時間裏，中共尚未察覺。新疆大學群眾組織的“發現”顯得極為重要。在民族問題上，漢人的兩派超越派系鬥爭，團結一致。正如王力雄所言：“新疆漢人在其他問題上對當局有各種不滿，一涉及民族問題便與當局成為同盟。即使有批評，也是對鎮壓不夠強硬的抱怨。”

由此可見，新疆的民族問題不只是在文革中發生和激化，而是可以追溯到文革前 1962 年的“伊塔事件”和 1957 年的“反民族右派鬥爭”。

第十二章 解放軍^[132]

前面11章介紹12個省市自治區的群眾運動，本章介紹軍隊的情況。文革初期，軍隊內部曾發生不小的動蕩，主要表現為空軍與海軍領導層的激烈鬥爭。空軍與海軍內部的矛盾與演變，有其內在的原因。中央高層的介入下，風波得以平息，但是矛盾依然存在，為日後軍內派系的演變和鬥爭埋下了伏筆。

12.1 空軍高層的奪權鬥爭

《五.一六通知》發出後，中央還批轉了一份文件——《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該報告在嚴厲批判羅的同時，將已去世的原空軍司令劉亞樓扯了進來，劉被列為已打倒的羅瑞卿和楊尚昆等人的同夥。因劉亞樓在空軍主政時作風強悍霸道，空軍將領對其不滿的甚多。中央文件如此嚴厲批評劉亞樓，給了空軍高層將領（以空軍副司令劉震為首）借機群起批劉，一吐胸中多年積怨的機會。在1966年6月至9月召開的中共空軍黨委第三屆十一次全體會議上，不少與會人員將批判的矛頭對准劉亞樓。劉亞樓已經去世，批他只是個借口。這些人的實際目標，是現任空軍司令吳法憲和政委余立金，他們的目的是把吳法憲和余立金拉下馬。

由於空軍黨委常委劉震等人帶頭，下面便有一些人群起響應，如沈陽軍區空軍的黃立清、南京軍區空軍的聶鳳智、廣州軍區空軍的吳富善、成都指揮所的高厚民、武漢軍區空軍的傅傳作和廖冠賢等。南空的聶鳳智具有代表性。他批判劉亞樓時說，劉主持空軍工作期間，毛的指示空軍聽不到。黨委常委內只有劉一言堂，沒有其他成員的地位。聶鳳智提出，對劉亞樓要“蓋棺重定”。聶成為混戰中奮勇進擊，箭無虛發，深受歡迎和擁護的帶頭人和指揮者。

與此同時，各大軍區的空軍也紛紛打電報，向空軍黨委表達他們的意見。有的單位甚至要求空軍黨委撤銷劉亞樓的訃告和悼詞，重新評價，將劉的骨灰搬出八寶山，並要求改組空軍黨委現有的領導班子。劉震掀起倒吳（法憲）運動，是因為他對吳接替劉亞樓任空軍司令不滿：劉震是中央候補委員，上將軍銜，吳只是個中將，且非中央候補委員。

空軍高層的這一混亂，使中央軍委不得不介入。林彪表態說，空軍的情況不正常。劉亞樓和吳法憲有缺點有錯誤，應當批評，但是這

種作法不對頭。這是有人趁文革之機，搞罷官奪權。7月21日，葉劍英到空軍黨委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傳達中央常委和軍委常委的指示。葉在會上批評空軍一些人搞的罷官奪權鬥爭。吳法憲作檢討，劉震和張廷發則被停職作檢查。

12.2 海軍高層的鬥爭

文革初期，海軍也發生類似的鬥爭。海軍高層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1959年12月1日，東海艦隊418號潛艇與衡陽號軍艦相撞，潛艇沉沒，38名艇員殉職。1960年和1962年，兩名海軍航空兵飛行員叛逃臺灣。中央軍委派檢查團赴海軍檢查工作，指出海軍存在諸多的問題。最本質的問題是，政治工作沒有擺在第一位。為了加強海軍的工作，對海軍領導班子進行調整。任命李作鵬為海軍常務副司令，張秀川為政治部主任。海軍司令肖勁光不以為然，認為許多問題已經進行了調查、分析和研究，並採取了措施。

《五.一六通知》後，1966年5月27日，海軍黨委三屆三次會議在京召開。7月2日，有三個小組提出，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和政委蘇振華是批評的重點，並提議海軍副司令王宏坤出來主持會議。這是公開提出更換海軍領導的要求。此後不久，海軍黨委會的批判矛頭轉向李作鵬、王宏坤和張秀川，會議由批羅瑞卿變成批鬥李、王、張。

針對海軍會議出現的問題，林彪表態說，海軍現在的領導不能改變，肖勁光和蘇振華的領導位置也不能改變。林指出，李、王、張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工作上好的。林還提出，肖和蘇要支持李、王、張，而李、王、張要維護肖和蘇的威信。葉劍英到海軍黨委會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常委的精神。此後的會議上，肖勁光和蘇振華主動檢討了自己的錯誤。

文革初期海軍高層發生的鬥爭，與空軍頗為相似。鬥爭都是在批判羅瑞卿的背景下開始的，又與軍內高層長期以來積累的矛盾相關。這些矛盾中摻雜了一些個人恩怨，借著批羅瑞卿爆發出來。

12.3 總參謀部“八.二五事件”與賀龍的倒臺

1966年8月22日，總參謀部（簡稱“總參”）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代總長、黨委書記楊成武作開展文革的動員報告。當日下午，總參謀部通訊兵部有人到總參謀部機關貼大字報，指責楊成武的講話壓制革命群眾。總參謀部的一些部局也貼出大字報，矛頭對准代總長楊成武。8月25日，毛預定接見外國軍事代表團，由周恩來、楊成武和彭紹渾（副總長）陪同，國防部外事局長潘振武為引見人。外事局的一

個參謀給毛的秘書打電話，說代表革命群眾要求，毛不要讓潘振武參加接見。周恩來與楊成武商量後，同意了這個要求。當天，葉劍英以軍委的名義，做出限制軍隊文革的多條規定並下發全軍。中央還轉發總政治部關於正確處理地方學生要求鬥爭部隊重點批判對象問題的意見。該指示與軍內機關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引起他們的強烈反彈。8月25日，總參謀部作戰部和國防部外事局的一些人貼出大字報，高呼口號，質問楊成武和潘振武為何壓制群眾。總參謀部作戰部長王尚榮和副部長雷英夫帶頭簽名寫大字報，表示支持，楊成武一時成為眾矢之的。

軍內機關中受軍外群眾運動影響，緊跟毛的號召者大有人在。他們站出來批判當權派，在當時被認為是革命行動。只是參加運動的大多數人，並不清楚誰是毛心目中的走資派和革命派。這些人與空軍與海軍機關中批判吳法憲、餘立金、肖勁光、蘇振華等人的行為如出一轍。林彪作為軍委副主席，為了穩定軍隊，煞住軍內的奪權風潮，很快撤了王尚榮和雷英夫的職，此舉起了殺一儆百的作用。楊成武趁機整了許多總參謀部的幹部，指控這些人參與政變。

毛認為總參謀部“八.二五炮打楊成武事件”的背後責任人是賀龍，該事件便成為賀龍倒臺的導火索。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賀龍對劉少奇批判不力，毛很不滿意。在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黨內生活會上，賀龍一直沒有表態，沒有與劉少奇劃清界線。當毛問賀龍，你發言了沒有？賀回答說，還沒有。毛說，怎麼不講一講？賀回答說，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賀龍的這一態度和立場，決定了他的倒臺的命運。

12.4 南京軍事學院的文革運動^[133]

前面幾節講述了軍隊上層的動態，本節介紹作為基層單位的南京軍事學院^[134]（簡稱“軍院”）的群眾運動。南京軍事學院1950年10月30日在南京創建，曾是解放軍最好的高等軍事學府，其前身是華東軍政大學和華北軍政大學，首任院長是劉伯承元帥（後兼任院政委）。該院的戰役系，曾以培養軍及軍以上的人才為目標。1955年授銜時，該系的學員均授將軍銜，其中22人授中將銜。1958年，彭德懷在毛的支持下，發動針對劉伯承等人的反教條主義鬥爭，劉伯承被免去院長職務。1957至1959年間，根據中央軍委決定，以南京軍事學院的部分系為基礎，分別組建高等軍事學院、軍事學院和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等學院，南京軍事學院大傷元氣，但是其實力仍不可小覷。到了文革開始時，院長是張震中將，政委是王平上將，已經成為

培養中級指揮官的軍事學院。雖然此時的南京軍事學院實力不如當年，但仍留有昔日的輝煌。

文革初期，南京軍事學院沒有像社會上那樣轟轟烈烈。直到1966年8月16日以前，只是在幹部和學員中進行正面教育，學習毛的批示和中央文件。南京軍事學院領導對寫大字報“既不反對，也不提倡”，坐等上面的決定，所以學院內沒有發生過激的行動，大字報也不多。8月16日，軍委下發《軍委常委擴大會議紀要》，要求軍隊院校也開展“四大”，破“四舊”。在執行《紀要》時，南京軍事學院黨委對張貼大字報做了一些限制性規定。例如，規定大字報只能到指定地點張貼，23級以上幹部才能觀看，而且還要憑證件；特別強調寫大字報要注意保密，內外有別，不准上街等等。在地方造反派到學院“煽風點火”時，學院廣大群眾不為所動，還是擁護院黨委的領導。

南京軍事學院也沒有整肅所謂的“重點鬥爭對象”。《五.一六通知》下發後，總政要求：“各大單位黨委要著重搞好宣傳、文化、報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門的文化革命。對這些部門要在普遍學習的基礎上，對所屬人員包括這些部門的領導幹部在內進行摸底排隊，從思想上、組織上進行整頓。對那些混進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和言論，必須徹底批判。”但是南京軍事學院的黨委認為剛剛搞完整風，已經走過“清政治”這一步，再搞“摸底排隊”有困難。因此沒有在南京軍事學院搞“摸底排隊”，也沒有把學院黨委委員和學院領導作為重點審查對象。學院的領導層認為，對學院領導“摸底排隊”是上邊的事情。部系領導和其他幹部中的問題已經在整風中解決了，沒有必要再翻老賬。

當時的教學準備工作仍在正常進行。因為運動開始後，軍委和總部並沒有明確學院是否停止招生。在招生問題上，軍委和總部曾變化多次。開始時決定9月份按時招生，接著說推遲到10月份，隨後又說解除招生任務。沒過幾天，又通知國慶節後接收學員，而且多達3,000多名，所以南京軍事學院從未放松教學準備。10月7日，總部最後下令，停止招生。直到此時，學院還在邊搞運動邊準備招生，局面沒有失控。

10月4日，軍委通知召開全軍院校長和政委緊急會議。中央文革認為，有些領導機關和院校領導過分強調軍隊院校的特殊性，壓制民主，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於是中央文革以軍委和總政的名義，搞了一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的文件，規定“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文件明確指出：由院校黨委

領導運動的規定，已經“不適合當前的情況，應當宣布撤銷”，並要求“由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選舉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作為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

10月10日上午，南京軍事學院黨委召開全體會議，傳達軍委和總政的緊急指示精神。當日下午，學院黨委召開各單位代表協商會。張震院長和王平政委宣布中斷院黨委對文革的領導。宣布後，他們當即退出會場，從此學院各級黨委陷於癱瘓，基層黨組織也停止了活動。後來中央將這一《緊急指示》轉發全黨，在更大範圍內出現一場“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當學院黨委中斷對運動的領導後，由學院的政治部出面與群眾協商，由各單位選舉代表成立“軍事學院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院文籌”）。有一些人不贊成“院文籌”，起來造反，沖擊“院文籌”，把“院文籌”的主要負責人抓到北京批鬥。地方和軍內其他單位的造反派也開始到軍事學院串聯，貼大字報，開展辯論，搞聯合行動。張震院長被迫到學院各單位接受群眾的批評教育。從11月5日起，張震向全院同志先後作三次檢查，著重檢查對文革在思想上理解不深和行動上跟得不緊的問題。

12月8日晚，南京軍區召開作戰會議。據稱地方造反派准備利用紀念“一二·九運動”的機會，搞一次“新一二·九運動”，地方造反派可能會沖擊軍事機關，會議要求各單位做好自衛准備。南京軍事學院領導連夜召集各部系領導開會，研究防範措施。決定增派一定數量人員把守營門，加強警戒，同時決定把學院軍械庫的槍支發給部分幹部，用以自衛，但是沒有配發子彈。這一作法觸怒了造反派。清華大學造反派領袖蒯大富此時正在南京，他兩次跑到軍事學院發表演說，對發槍加強警戒一事提出質疑。12月25日晚上，學院領導突然接到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的電話，說軍事學院加強警戒搞戒嚴，是妨礙群眾運動的行為，因而是完全錯誤的。過了兩天，北京又轉來蒯大富的告狀信，要張震院長說明情況。事情變得複雜了。

南京軍事學院逐步形成對立的兩大派組織，開始了嚴重的派性爭鬥。一派是“紅司”，保張震；另一派是“革聯”，反對張震，屬造反派。該派與地方上的江蘇“好派”一個觀點。據一些知情者說，造反派“革聯”的成員大多愛提意見，有點不規矩，或者說“帶刺有棱角”。“革聯”的領導人是張澤上校，任航空兵教研室主任，張與蒯大富較熟悉。張澤帶頭貼大字報，因為是少數派受到圍攻。張澤像其他造反領袖一樣，毫不畏懼。後來形勢逆轉，張成為聞名一時的造反派領袖，人稱“張司令”，幾十年後餘威猶存。他後來得了老年癡呆，有一次走失，錯上了去西安的火車。當地的民警發現了他，無法

得知他的真實身份。幸好有一位民警是原南京軍事學院軍官的後代，有點認識當年赫赫有名的“張司令”。當民警叫他一聲“張司令”時，張澤竟然還記得當年造反時的風光，這才使他的家人找到他。這是題外話。

1967年2月8日，張震在北京開完會乘飛機返寧。飛機剛剛落地，軍事學院“革聯”的造反派們就沖上來，把他強行帶走進行批鬥。他們扒掉張震的領章和帽徽，將張關押近一個月。張震有一陣子被鬥得很厲害，只好躲在學院的汽車連裏，因為汽車連是保張震的。王平的處境比張震院長更為不利。9月16日，中央軍委電告軍事學院，說王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是“彭黃反黨集團漏網分子和假黨員”，決定對他停職反省。倒黴的王平成了兩派群眾組織批鬥的對象，沒有人願意保護他，成為不幸的“棄兒”。

當時南京軍事學院的派性，與單位部門有一定的關係。例如，位於小營外訓部的教職人員基本上是“紅司”的，位於馬標的則多數參加“革聯”。學院中還有一些原本是國民黨軍中的高級將領，留下來作為教官（如原國民黨74師參謀長魏振鉞）。他們受過正規的教育，在軍事理論上比共產黨的教官要強一些。這些人住在北京東路的一個大院裏，人們習慣上稱之為“白黨營”。這些人在文革中均未參與派性鬥爭，但派性仍使人際關係發生巨大變化，對夫妻和朋友關係均產生不良影響。許多家庭為了避免矛盾，甚至在家門口貼上“進家門不談政治”的標語。學院教職員工的子弟也產生分裂，甚至成為仇敵。如筆者（第一作者）的同學是南京軍事學院子弟，他文革前與白黨營子弟（如魏啟立，原國軍74師參謀長之子）是好朋友，文革後因觀點不同勢不兩立，還動手打過架。

南京軍事學院真正的大亂，是1968年無錫的“主力軍”（屬於“好派”）被對立派打出無錫後進駐學院開始的。無錫“主力軍”為了打回無錫，需要武裝自己。“革聯”與他們同屬一派，暗中為他們搶槍提供方便，學院的武器庫被搶空。筆者的一位同學在文革50年後透露說，當時他和弟弟混入搶槍的人群中，把兩顆手榴彈藏在褲衩裏偷了出來。還有一位學院子弟在該院的樹叢中發現一包嶄新的軍裝，顯然是有人從庫房中偷出來，準備日後帶出學院。

1968年8月，軍委辦事組決定：對南京軍事學院實行軍事管制。南京軍區派出60軍的官兵，與此前地方派來的工宣隊共同掌管南京軍事學院。12月26日，南京軍事學院成立革命委員會。1969年2月，軍委辦事組決定撤銷南京軍事學院。當時學院有句話，叫做“活寶没人要，死寶有人搶”。“活寶”是指南京軍事學院精心培育起來的一支優秀的教研隊伍和幹部隊伍。南京軍事學院撤銷後，他們大多沒有得到公

正對待，未被正常使用。一部分人員被安排去地方支左，一部分人員轉業複員，只有少部分人員去北京，組建解放軍軍事政治大學。“死寶”是指學院大量的物資和裝備。學院撤銷後，教研人員嘔心瀝血編寫的教材和資料散失殆盡，全院教職員工艱苦創業，勤儉節約購置的教學設備和器材遭到嚴重破壞。有的人為了占有樟木箱，竟把裏面的檔案和資料成捆地丟棄。

文革結束後，南京軍事學院的造反派受到審查。“革聯”的司令張澤吃了不少苦頭，不過最後的結局不算太差，仍按相應待遇進了部隊的幹休所，安度晚年。

12.5 南京軍區內的文化運動^[135]

解放軍最早卷入地方的群眾運動，是參與文革初期向各大專院校派遣的工作組。中央決定向北京大學派駐工作組後，其他院校也紛紛要求派工作組，得到中央常委和軍委領導的同意，這樣就把軍隊也牽連進去。軍內院校的造反活動一度搞得熱火朝天，如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紅色造反縱隊”就很有名氣。軍隊院校造反派的興起，實際上是地方造反運動的延伸，是毛、江青和中央文革大力支持的結果。

本節重點敘述發生在南京軍區內的軍隊群眾運動。根據中央軍委規定，軍區政治部的宣傳文化部門及下屬的文體單位、軍區步校等開展“四大”。南京軍區的《人民前線報》首先成為攻擊目標，報社的幾位副總編先後停職，只剩下一個編輯組維持正常運作。1967年，上海掀起“一月革命”風暴，軍區宣傳部、文化部、報社和話劇團、歌劇團、歌舞團、軍樂隊和體工隊（簡稱“三團兩隊”）成立造反組織。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與後勤部機關也成立戰鬥隊，貼大字報。還有人與地方的造反派聯合，揪鬥軍區和司政後部門的指揮官，軍區領導機關陷入混亂。《人民前線報》報社的軍人組織“風雷激造反隊”，宣布奪權，由造反派負責出版報紙。不過混亂很快平息。1967年1月28日，中央軍委發出命令，規定軍以上單位分期進行文革，軍以下單位不進行文革。軍區機關不少造反人員在後期受到處罰。

不僅軍區機關受到影響，下屬部隊也卷入文革潮流。發生在駐無錫的南京軍區炮兵第9師的情況就是一例。1966年6月的一天，該師83分隊偵察班指揮儀操作員顧某被師長叫到辦公室。師長很神秘地交給他一個任務：換上便衣到無錫城裏去看大字報，看看那裏發生了什麼。顧某每天早出晚歸，走街串巷，抄寫大字報並記錄所見所聞。他看到市中心廣場煙火熊熊，大批書刊雜誌和所謂的四舊物品被燒，有人戴高帽子遊街，有人跪著被批鬥。顧某回到駐地，立即向首長匯報情況。師首長每晚在燈下仔細閱讀顧收集來的材料，師長邊看邊搖

頭，不住地歎氣，表示不能理解。顧某執行這樣的偵察工作，持續了一個多月。

後來炮兵第9師接到命令，解救被當地群眾圍攻的北京紅衛兵。炮師派出軍車，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軍人一看到被圍的紅衛兵就拉他們上車，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沖出包圍圈，將他們送到安全的地方。

1967年，炮師接到命令，執行支左任務。成立軍管會那天，部隊出動上百輛軍車。車上站滿持槍的戰士，繞城遊行，以壯軍威。然而地方文革的各種觀點和思潮，漸漸地滲透到部隊裏來。無錫駐軍發生了分歧，從軍官到士兵都存在派性。部隊開始騷動，有人寫大字報，有的部隊出現遊鬥基層指揮官的現象。

1967年7月底的一個晚上，近萬人圍攻部隊的一個軍火倉庫，顧某所在的炮師奉命火速增援。當他們到達時，軍火庫已被圍得水泄不通。軍火庫是建在山裏的洞庫，有幾百名戰士守衛，解放軍只能用身體護衛軍火。造反派與軍人層層相圍，有不少人因中暑暈倒，卻因為人太多無法撤離。最後，軍人不得不用水泥和石塊封住洞口，才保住軍火。誰知軍內有人向造反派透露情況，造反派從另一個洞口攻入軍火庫，搶走軍火。泄露秘密的軍官後來受到懲罰。從該炮兵師的情況看，軍人也與百姓一樣，開始時對文革不理解，後來介入派性之爭，為文革的群眾運動增加了變數。

在廣大民眾響應毛的號召，積極投身文革運動的大潮時，也有造反不成的例外。南京軍區X局訓練隊學員的造反就是一例。這是一個小型的訓練基地，約有200名學員。文革開始後，學員們按捺不住萌動的心，躍躍欲試，加入造反的潮流。他們提出，要像軍隊院校一樣參加文革運動，寫大字報，向局部提出要求。因為沒有獲得批准，他們就跑到北京Y部^[136]，要求同意他們參加文革運動。領頭的是一位幹部子弟，其父親是上海市機電局的黨委書記。另一名領頭的則是工人子弟，並無過硬的後臺背景。他們到北京去的目的其實並不很明確，多數人想乘機到北京玩一玩，順便爭取得到Y部領導的支持。

他們到Y部後，要求未得到同意，訓練隊的領導也從南京趕來，勸他們回去。這批造反學員在部裏的一個小禮堂召開批鬥會，給訓練隊的領導戴高帽子，還命令他們下跪。Y部派一位幹部來勸說這批造反的學員，結果被扣為人質，這就越出了Y部的底線。當人質被扣兩天兩夜後，Y部終於出重手。該部派出一隊武裝軍人解救人質，並將領頭造反的3個人抓走。第二天，北京電臺播發該事件的新聞，稱南京某局人員不聽指揮，現已將帶頭鬧事者押送回寧，命令其他滯留人員及時返回。造反者群龍無首，只好乖乖地返回南京駐地。他們在返回南京之前，趁機在北京好好地遊玩了一陣。這些人回來之後未受到嚴厲懲

罰，繼續進行專業訓練，只是幾個領頭鬧事者被提前複員，離開了部隊。

後來這些學員畢業分配工作，部分學員被分配到舟山。由於全國各地的群眾運動如火如荼，學員又一次鬧事，準備殺回局部，要求以軍校學生的身份參加文革。參加這次造反的學員，大多數仍是抱著玩的心態。有的是為了去會女朋友，有的幹脆借機回家，並未到局部造反。來到局部的造反者，參加文革的要求未得到同意，就泄了氣。他們無所事事，自覺無趣，過了幾天主動提出返回舟山，造反也就不了了之。

1968年夏天，當時X局部也有一些科室人員準備造反。為了穩定軍心，南京軍區與X局聯合舉辦學習班，各單位派人參加，軍區司令許世友親自作報告。後來X局召開會議，進一步強調部隊穩定的重要性，一個曾造反的人被反綁著雙手，押到臺上認罪。這一舉動具有明顯的震懾作用，自此X局訓練隊的造反劃上了句號。

12.6 “五.一三”沖擊三軍演出事件^[137]

軍隊裏的造反派，基本上是步地方大中學校運動的後塵產生發展的。當軍內單位起來造反的時候，地方院校裏最早起來“破四舊”的老紅衛兵（如“聯動”）和最先接受工作組領導組成文革領導小組、後來又保工作組的以“紅五類”為主的學生組織，已經被中央文革點名壓了下去。所以，盡管軍內文藝和體育單位最早起來造反的成員的家庭和社會背景與地方的老紅衛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當時的社會大形勢決定他們不可能再重蹈“聯動”的覆轍。

北京駐軍的各軍事單位的造反組織分為兩大陣營。一派稱為“老三軍”，支持本單位的現任領導人，被認為是保守派。另一派是“新三軍派”，反對本單位的當權派，被認為是造反派。“二月逆流”受到批判之後，軍隊院校的造反派受到鼓舞。從1966年6月到1967年4月，軍隊院校的造反派經過將近一年的造反、受壓制、沉默、爆發，反複的沖突，與北京和外地的一些造反派組織建立了廣泛的聯系。這些組織在全國和全軍已經有越來越大的名聲和影響，自我感覺良好。

空政文工團的“老三軍”支持吳法憲、余立金和空軍黨委，由此被“新三軍”抨擊為保守派，遭到打壓。毛表態：“吳法憲可以炮轟、火燒，但是不要打倒。”毛不便直接插手空政文工團的文革，就給葉群寫了一封信，要葉群想法出面支持“老三軍”，毛還讓自己的秘書徐業夫向林彪辦公室（簡稱“林辦”）打招呼。

林彪決定通過“老三軍”計劃的演出，打壓北京軍隊院校中的造反派勢力。“老三軍”原準備聯絡各派人馬，聯合演出，慶祝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講話》）發表25周年。結果受林彪支持的葉群明確表態，不要聯合軍隊內的造反派，而是聯合北京軍區、海軍、二炮等其他軍種的文工團共同演出。1967年5月，解放軍在京的幾個文工團的“老三軍派”發起紀念《講話》發表25周年文藝匯演，他們被稱作“演出派”。“新三軍派”認為這是老保翻天，要沖擊這次演出，所以他們被稱為“沖派”。“沖派”的目的，是爭取讓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支持他們這一派。“沖派”與北京“紅三司”密切合作，沖擊1967年5月13日的演出。雙方發生武鬥，各種樂器被毀壞，設施被砸爛，演員被打傷。武鬥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直到陳伯達和肖華趕到現場，才制止了武鬥。

林彪冒著對抗中央文革的危險，公開支持“老三軍派”對抗“新三軍派”和“紅三司”等造反派。林彪還派葉群出面慰問傷員，以他特有的方式明確表明自己的態度。5月23日，“演出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演出。林彪派葉群前來觀看，並派出部隊進行保護。因為林彪的態度，軍內的造反派垮了。“老三軍派”一下子翻過身來，成為林彪和軍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憑借這支力量，林彪和軍委可以直接與北京“紅三司”等學生造反派對抗，從而穩定了北京的局勢，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卻束手無策。他們支持的學生造反派雖然沒有土崩瓦解，但已經失去往日的威力。

毛在這場造反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中，竟然支持保守派，似乎與他的文革理念不符。有學者認為，毛也許是因為擔心失去對軍隊的控制。毛在1967年4月間定下一個秘而不宣的方針：通過北京軍區的穩定，以穩定全軍；通過軍隊的穩定，以穩定全國^[138]。“五·一三事件”是軍隊穩定的始發點，在軍隊文革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相對於地方的文革，軍隊的運動相對穩定些，因為軍隊是中共政權的支柱。軍隊如果真正失控，對中共肯定是災難性的。所以中共對軍隊的穩定，還是高度重視的。

我們在本書的第一篇，簡述12個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文革群眾運動。中國大陸當時有29個省市自治區，為什麼只分析12個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情況？除篇幅限制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這些問題，將在第二篇中作出回答。

第二篇 群眾運動的興亡

我們在第一篇裏簡述 12 個省市自治區及軍隊文革中群眾運動的情況。在第二篇，將討論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和自毀。首先，我們將討論文革中群眾運動的動員問題：群眾為什麼會被動員起來參與文革運動，他們又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在討論群眾運動的動員問題之前，必須解決前一部分的章節中存在的代表性問題。我們僅討論 12 個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群眾運動情況，中國在當時分為 29 個省市自治區，12 個省市自治區只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多一些，它們能夠全面地反映文革中群眾運動的情況嗎？

隨著文革研究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重某個地區和某個專題的研究。這是因為許多大的運動已經有太多的研究了^[139]。這樣的問題在西方學界也存在。西方的學者們忽略了根本的問題，即資本主義是理解西方國家社會運動的關鍵^[140]。文革的研究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太專太深的研究容易忽略全國文革的發展，忽略文革的根本性矛盾。因此，研究文革不能僅局限於一個地區，必須基於全國各地的情況。

第十三章 代表性問題

Chan 等人在研究廣州市中學紅衛兵運動時發現，群眾組織的分派與其成員的家庭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141]。但是，Walder 的北京大學紅衛兵的研究卻發現，紅衛兵的權力和特權的狀況對文革中的派別沒有影響^[142]。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相互矛盾的結論呢？Chan 等人的調查對象是廣州的中學紅衛兵，Walder 的研究對象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這些紅衛兵有著區域的差別和年級上的差別。這就涉及文革研究中的一個問題，即代表性問題。Walder 在 2016 年 3 月召開的西雅圖圓桌會議時發言也承認，上述代表性問題需要放在其他背景下加以證實，這方面的問題還有待學者進一步研究^[143]。

13.1 抽樣

一般來說，在文革研究學界中進行較深入分析的論文論著均以個案分析為主。如前面提到的 Chan 等人的廣州紅衛兵研究，Walder 的北京大學紅衛兵的研究，Forster 對浙江的研究^[144]，Perry 和李遜

對上海工人運動的研究^[145]，董國強和 Walder 對江蘇的分析^[146]。這些個案分析是否能夠推論到全國，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加以證實。

如果試圖對全國的文革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應包括全國的 29 個省市自治區，否則就有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目前對全國 29 個省市自治區進行全面論述著作不少（如楊繼繩^[147]，金春明^[148]，王年一^[149]，高皋和嚴家祺^[150]等）。但是此類論著一般缺乏深入的理論分析。因為它們大多屬於曆史記載類，以記述史實為重點，以理論分析為輔助。研究很難做到既涵蓋全國各地的詳細情況，又有深入的理論分析。這裏涉及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的問題。兩者間存在著矛盾，很難同時兼顧。

解決矛盾的辦法之一是抽樣：從全國 29 個省市自治區中選出數個有代表性的省市自治區，然後進行深入的分析。抽樣是科學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這是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因條件限制無法獲得所有的研究對象的資料，或者這樣做非常困難。抽樣的關鍵是，被抽取的樣本是否能夠代表全體。要保證樣本的代表性，就必須明確研究的目的，從而在設計抽樣時加以考慮。我們的目的研究各省市自治區的文革情況，涉及面很廣，使得抽樣設計變得非常困難。

根據筆者保守的推測，為了保證足夠的可靠性，如果對全國 29 個省市自治區進行抽樣的話，樣本數量至少需要達到 26 個省市自治區（具體計算請參見附錄 1）。這樣做與不抽樣沒有多大區別。還有一個解決的方法是分層抽樣，該方法可以解決可靠性和樣本大小之間的矛盾。分層抽樣的方法如下：首先按某種特征分為若幹層的次總體，在次總體內，各成員之間的差異盡可能較小；然後從每一層內進行抽樣，組成一個樣本。該方法的優點是：在樣本總數較小的情況下，能夠做到樣本的代表性較好，抽樣的誤差較小。換言之，能夠保證樣本的結構與總體的結構比較相近，從而提高估計的精度。

13.2 省市自治區的分類

對各省市自治區進行分層抽樣，必須首先對各省市自治區進行分類。在分類的基礎上，我們從每個類別中抽取適當數量的省市自治區對其進行深入的分析。關於如何對文革期間全國的各省進行分類，劉國凱曾有過論述。劉把省級文革分為四種模式：（1）典型類，（2）發育不完全類，（3）激進類，（4）殘酷鎮壓類。湖北屬於第一類的典型類。其特點是造反派與軍方支持的保守派進行過艱苦慘烈的鬥爭，幾近被壓垮，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翻身取得勝利。不幸的是，掌權後的造反派產生分裂。北京和上海屬於發育不完全類。北京文革以學生為主角，上海以工人為主體。由於北京和上海在毛中央

的直接關注下，使得這兩個地方具有共同的特點，偏離了運動通常的走勢。所以，這兩個直轄市的群眾運動發展是發育不全的。湖南省屬於激進類。湖南文革的形態本可歸入湖北模式，但是由於湖南“省無聯”的傑出活動，所以歸為特殊一類。廣東和廣西屬於第四類，即殘酷鎮壓類。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無一不以被鎮壓收場，但是鎮壓的時間和力度有所不同。兩廣的情況是，省革委會均是根據康生的一句話，宣布造反派已被反共救國團控制，從而直接了當地對他們進行整體性摧毀，完成清算鎮壓^[151]。

徐友漁也曾對各省紅衛兵的運動作過分類。他認為北京和上海屬一類，其他省份屬另一類。其他省的紅衛兵運動，又可分為內地和邊疆兩類。邊疆地區（如西藏、新疆、內蒙古、廣東和廣西省）造反派內部的兩派鬥爭，一直沒有發展成為主要的派別鬥爭。保守派勢力始終不垮，並與造反派大聯合，共同進入省革委會。大多數內地省份是，起先保守派與造反派鬥，然後是造反派內部的派鬥^[152]。

遺憾的是，上述討論沒有進一步深入討論分類問題，並未把 29 個省份完全對號入座，因此許多省的分類歸屬仍是個謎。而且這些分類都是定性分析，易造成各持所見的尷尬局面。我們決定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用較為客觀的指標對全國 29 個各省市自治區進行分類。什麼是分類指標呢？我們用醫學上的例子來說明“指標”的作用。醫學界測定病人是否患有乙型肝炎病症，通常用兩對半指標：即表面抗原（HBsAg）和表面抗體（HBsAb）、e 抗原（HBeAg）、核心抗原（HBcAg）和核心抗體（HBcAb）。每個抗原或抗體分“陰”性和“陽”性。5 個指標共有 32 種可能的組合，常見的有 9 種組合。如果 5 個指標全是陰性，說明過去和現在未感染過乙肝病毒。如果 5 個指標分別是“陽—陰—陰—陽—陽”，俗稱為“小三陽”，說明傳染性弱。如果是“陽—陰—陽—陰—陽”，那就是常說的“大三陽”。這是急性或慢性肝炎感染，有極強的傳染性。5 個指標為診斷乙肝病症提供了方便而又實用的定量依據。我們對省市自治的分類也采用類似的客觀指標。省市自治區分類基於以下三個方面：（1）經濟、人口、政治和地理；（2）局勢穩定性；（3）群眾運動的發展。

表 13.1 分類指標

方面	變量	變量
地理、經濟、人口、政治	X1	1964 年人口普查（萬人）
	X2	1978 年 GDP 總量（人民幣億）

		元)
	X3	省會離北京的距離（千米）
	X4	省革會第一把手在中央委員會的任職
群眾運動發展狀況	X5	建立省革委會的時間
	X6	省革會常委中群眾組織代表的比例
	X7	群眾組織代表任中央委員、候補委員
局勢穩定性	X8	文革期間省第一把手是否被撤換
	X9	省革會第一把手是否是軍人
	X10	是否是全國十大著名武鬥所在的省

個別省份的數據（如天津和寧夏的人口）暫缺，我們進行了推測，詳情請參見附錄 2。本章採用聚類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 簡稱 CA）。由於該統計模型涉及較深的數學，我們將有關計算放在附錄 2 和附錄 3，此處不贅。以下是分類的結果：

表 13.2 省市自治區的分類

類別	類別名稱	省市自治區	數量	抽樣樣本
1	中央直控類	北京、上海	2	北 京 (1) 上 海 (2)
2	中央間控類	天津	1	天 津 (3)
3	群眾運動發展成熟類	安徽、福建、廣東、甘肅、廣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蘇、遼寧、四川、陝西、浙江	14	湖 南 (4) 湖 北 (4)

				江 蘇 (5)
4	早期造反類	貴州、黑龍江、江西、內 蒙、山東、山西	6	黑 龍 江 (6) 內 蒙 (7)
5	邊遠地區類	寧夏、西藏、雲南、吉林	4	西 藏 (8) 雲 南 (9)
6	特類一	青海	1	青 海 (10)
7	特類二	新疆	1	新 疆 (11)

注：括號裏的數字表示本書的章節。

13.3 省市自治區分類的意義

北京和上海屬於第一類，即中央直控類，該結果與徐友漁和劉國凱的分類不謀而合。兩地的共同點頗多。首先，兩個直轄市的革委會第一把手均為非軍人，而且均在文革期間進入中央政治局（張春橋和王洪文還成為政治局常委）。其次，有群眾組織代表成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群眾代表在革委會常委中的比例占 50% 以上。第三，革委會成立較早，均在 1967 年的上半年之前。與其他省份相比，兩地形勢相對穩定。北京的第一把手易主是因為謝富治病逝，屬於正常死亡。在第一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別敘述了北京和上海群眾運動的發展情況，從中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對兩個直轄市的控制。兩地的群眾運動基本上是在中央文革設定的軌道上運行的。盡管曾經出現過短暫的失控局面，但是很快得到控制，與其他類省有著明顯的區別。

天津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其他省也不盡相同。天津革委會的成立也較早（1967 年底），群眾組織代表在革委會常委中的比例相當高（超過 60%）。天津的局勢也相對穩定。第一把手是地方幹部解學恭，他一直到 1978 年才被解職，受到審查。從第三章的敘述中可以看到，雖然中央文革對天津的控制不如對北京和上海那麼直接，但是由於陳伯達和江青等人的直接幹預，革委會中的群眾代表、地方幹部代表和軍隊幹部代表均沒有太多的發言權。這些情況使得天津既有別於其他省，又有別於北京和上海。

在第三類的省中，14 個省的群眾運動發展相對成熟。在此類省中，群眾代表均有成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省革委會的成立相對晚一些（均在 1968 年）。群眾組織的代表在省革委會常委中的比例也相對較高。最高的是四川省（66%），最低的是廣東省（42%）。在此類省中，有些群眾組織相當出名，如湖南的“湘江風雷”，湖北的“鋼工總”，河南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和“八·二六”，廣東的“旗派”和廣西的“四·二二”。

第四和五章介紹此類省中具有代表意義的湖南、湖北和江蘇的群眾運動情況。湖南的工人們明白，他們沒有官方背景，只有靠強大的實力。“湘江風雷”正是依靠其強大的實力，迫使中央文革最後承認其合法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群眾運動中出現的“省無聯”。“省無聯”對革委會的出現有深刻的批判。“省無聯”認為，革委會是資產階級篡權的假公社，三結合等於把“一月革命”中倒臺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省無聯”的政治綱領不僅要推翻文革前的紅色資本家階級，還要推翻毛和中央文革的革委會。“省無聯”提出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極左派的新政黨，組織革命人民自己的武裝力量，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儘管這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但是其極左思潮在文革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這類省中，兩派（有的省是三派甚至四派）群眾組織的鬥爭比較激烈。作為樣本的湖南、湖北和江蘇在文革後期，曾經的勢不兩立的群眾組織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聯手與軍管會的軍人和重新上臺的官僚進行鬥爭。

第四類屬於早期造反類，有 6 個省份。這些省均很早成立省革委會，最早的是黑龍江（1967 年 1 月 31 日）。雖然省革委會成立較早，但是這些省卻並不安定，反復較大，早期的第一把手全部易主。由於不穩定，軍人任第一把手的較多。例如，貴州和內蒙如終是軍人占據第一把手位置。其他省至少有一任是軍人任第一把手。全國十大著名武鬥事件，有兩起發生在該類省。該類省的另一個特點是，省的主要領導人沒有一個人進入政治局。

第五類屬於邊遠地區類，共有 4 個省：寧夏、雲南、西藏和吉林。它們的特點是政治、經濟和人口等方面不發達，GDP 處在全國的落後水平，人口也不稠密。西藏的省會拉薩離北京有 3736 千米，是省會中離北京最遠的。4 個省的革委會，第一把手都是軍人^[153]。文革期間，第一把手沒有因犯錯誤撤換。省革委會成立都是在 1968 年，西藏（1968 年 9 月 5 日）是全國最後一個省。4 個省沒有群眾代表進入中央委員會，它們的第一把手也無緣進入政治局。由於地處邊遠，4 個省的局勢不太穩定，尤其是雲南。它的第一把手譚甫仁因遭槍殺由周興接任，第一把手如此變更實屬罕見。雲南還發生知青大逃亡事

件。雖然知青的努力被當地政府通過收買農民流產，但是不穩定因素並未消失。文革一結束，這一顆定時炸彈再次引爆，以成千上萬的知青回城告終。同時，此類省在全國的地位並不太重要，人們習慣上把寧夏、雲南和西藏視為邊遠地區，所以我們把此類省份作為邊遠類省。

第六類是特類，只有一個省：青海。這是因該省的特殊性造成的。該省人口稀少，經濟落後，省會離北京較遠。省革委會成立較早（1967年），第一把手一直由軍人擔任。更重要的是，青海省以臭名昭著的“二·二三事件”聞名全國。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依靠軍區內多數軍人的支持，通過非正常途徑整倒並扣押省軍區司令。趙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百姓開槍，造成347人傷亡，其中死亡169人。軍人還展開大搜查和大逮捕，有上萬人遭到迫害，有數千人被逮捕。後來中央查清了事實真相，作出有利於造反派的決定。青海造反派自此占據優勢，直到文革結束。群眾代表有成為候補中央委員的。

第七類也是特類，也只有一個省份：新疆。新疆是名副其實的邊遠地區，省會離北京有3,300千米，GDP在全國排名倒數第四。該自治區的人口也較少，排在全國倒數第五位。新疆革委會成立也較晚，與西藏並列，全國最遲。新疆發生過全國著名的武鬥事件。革委會的第一把手曾經歷非正常變動。第一把手龍書金被撤職，由賽福鼎接任。賽富鼎後來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說明中央對新疆的重視。其他省市自治區的文革均以省會為中心（四川除外），但是新疆與眾不同。由於新疆地廣人稀，中央政府對該地大量移民。新疆建設兵團以其特殊的地位，在新疆的文革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新疆的文革有兩個中心：烏魯木齊和建設兵團。

在第一篇裏，我們分別從以上7類省中挑取12個省、自治區進行分析，因為它們可以較全面地代表全國群眾運動的發展情況。

第十四章 社會運動學

前一章討論省市自治區的代表性問題，以下章節開始討論文革的動員問題。本書將運用西方社會運動學理論對文革的動員進行討論。西方社會運動學是一個因中國的文革而興起並與文革研究密切相關的重要學科。由於種種原因，多年來該領域的發展一直未引起華人學界的重視。這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直到上世紀的60年代，西方學界對社會運動的研究還很少^[154]。在中國文革的影響下，從1968年5月開始，西歐和北美出現類似中國紅衛兵的青年和學生造反浪潮。這一突如其來的風暴席卷整個西歐和北美大陸，使得各國政府措手不及。該現象引起西方社會學家的興趣，對其研究開始增多。到上世紀的70年代中期，社會運動學逐步成為西方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領域^[155]，並擁有專業的學術刊物、叢書和學會^[156]。

14.1 社會運動的定義和分類

社會運動的定義有許多版本。我們在這裏不妨采用威爾遜（Wilson）的定義：“一個有意識的、群體的、有組織的努力，試圖以體制外的手段推動或阻礙社會秩序中大規模的變化。”^[157]該定義中的兩個信息特別重要：“有意識的”和“體制外的”。“有意識的”指的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是有意識的，不是盲目的。“體制外的”指的是社會運動不是通過正常的渠道解決問題。體制外的手段，包括示威、遊行、請願、靜坐，甚至暴力等。需要指出的是，社會運動不同於政黨和利益集團，因為後者擁有接近政權和政治精英的正常管道。

社會運動有以下四個特點：群體性，時間性，認同性和目的性^[158]。群體性的意思是，社會運動是為實現社會變革的群體和組織的努力，不是個人無組織的努力。時間性指的是社會運動在有爭議的問題上與強有力的對手進行一定時間的鬥爭，不是一次性的抗議活動或較量。認同性指的是社會運動的成員不僅僅在一起工作，他們還享有共同的身份認同。目的性指的是社會運動通過抗議等活動試圖改變社會。

如果從社會變化的對象和變化的範圍兩個角度來分析，社會運動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運動^[159]：

表14.1 社會運動的分類

	變化有限	變化巨大
變化只涉及一部分人	替代運動	救贖運動
變化涉及整個社會	改革運動	革命運動

替代運動（Alternative Movement）對現有社會的威脅最小，因為替代運動僅僅針對社會的一部分人，運動的目的是改變這些人的某種行為。美國的“反酒後駕車母親協會”就是一例，該運動專門針對酒後駕車行為。由於該協會的努力，美國通過法律對醉酒駕車者嚴懲不貸，從而使醉酒駕車的事件有所減少。

救贖運動（Redemptive Movement）雖然只是針對一部分人，但是涉及的程度比較深。運動的目的是徹底改變這部分人，宗教的“原教旨主義”運動是此類運動的典範。原教旨主義源於美國，是一個宗教運動。原教旨主義強調聖經內文的正確無誤，不容置疑，聖經擁有最高權威。原教旨主義一詞也用來指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運動。救贖運動旨在徹底改變個人，使之重生。

改革運動（Reformative Movement）的參與者並不將矛頭指向現行的制度，只是認為必須對現有體制進行局部的改革。大多數的抗議事件屬於此類運動。運動的目的是改革社會的某一部分，並非企圖推翻整個現有體制。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反核能運動和保護生態環境運動屬於此類。

革命運動（Revolutionary Movement）涉及社會的所有成員，變化範圍是深刻的，旨在推翻現有制度並創立新制度。革命運動對現有的社會秩序極度不滿，試圖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藍圖重新建設新社會。革命運動大多是由長期受壓迫的某一群體發起，通常在一系列改革運動失敗後群眾極度不滿時發生。人們深信當權者不會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世界各地出現過一些革命運動，例如美國的獨立運動、法國的大革命、南非的黑人自治運動和中國的辛亥革命。

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改革運動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運動，革命運動是“既反貪官、又反皇帝”的運動。

14.2 社會運動學的第一代理論

對社會運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它的前身——群體行為學（Collective Behavior）。19世紀的下半葉（1850—1900），歐洲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動蕩使得聚眾成為政治穩定的巨大問題，公共

秩序受到空前的挑戰。“聚眾”是指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意思。當然，學者研究的注意力主要是鬧事的聚眾，出現不少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第一種理論說，聚眾的成員是瘋狂的，就像安徒生童話中的紅舞鞋無法停下來。任何參與瘋狂聚眾的成員，被認為是魔鬼附身或者精神有毛病。第二種理論說，聚眾鬧事的成員是社會渣滓，是一群脫離社會的家夥，是被社會拋棄的人渣，所以他們對社會不滿。第三種理論說，聚眾的成員是罪犯，認為有的人生來就有犯罪傾向。聚眾鬧事破壞財物和傷害人，由罪犯幹的或者是由罪犯領頭幹的^[160]。概括起來就是“瘋子論”、“人渣論”和“罪犯論”，或者統稱為“壞人論”。

早期的學者研究群體行為學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這是受了社會學三大鼻祖之一的杜爾凱姆（Durkheim）的影響。他的社會平衡觀念對早期的社會學家有著極其重大的影響。群體行為學的研究重點，是社會組織的不自主性、沖動性和即時性。研究者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守法的人變得不守法了？”學者們對群體行為的參與者是否理智和是否有自我意識持否定態度^[161]。該派理論的代表人物是法國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Bon），代表作是勒龐1895年發表的《烏合之眾》（Psychologie des Foules）。勒龐認為，參加聚眾的人本身是正常人，但是聚眾使人的思維轉變，使人失去平常的判斷力，人在聚眾中變得瘋狂^[162]。勒龐的理論對以前的“壞人論”是一個否定，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該理論在理論界獨占鰲頭長達近70年。該派理論家的目的是為精英控制聚眾，反對激進派^[163]。

需要指出的是，華人學界中流行的“一個文革說”，是“烏合之眾論”的理論框架下的一種學說。“一個文革說”認為，造反派是“瘋子”，逍遙派是“傻子”^[164]。億萬群眾卷入文革的原因是：“政治思想的強大壓力，運動中民眾被迫作出抉擇；林彪、江青、康生一夥野心家、陰謀家乘機蠱惑挑唆，蓄意制造運亂，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165]簡言之，民眾參與文革是盲從和不明真相。

堅持民眾非理性的“烏合之眾論”，在上世紀的50至60年代開始受到廣泛深入的批判，淡出研究領域至今已經有近50年^[166]。該派理論是否會在將來的某個時候重返舞臺，東山再起，筆者不敢妄加猜測。但是在過去的近50多年裏新出現的社會運動學理論中，再也沒有誰敢把民眾說成是一群智力低下、沒有自我意識、沒有利益訴求、任人欺騙的傻瓜，是不爭的事實^[167]。

14.3 社會運動學的第二代理論

對“烏合之眾論”持批判意見的理論家很多，馬克思是其中之一。馬克思主義雖然沒有提出專門的社會運動理論，但是其本身就是一個關於社會運動的理論^[168]。馬克思注重社會沖突，關注經濟與革命的關係。馬克思認為，變化的經濟狀況與群眾運動有著反向關係^[169]。也就是說，如果經濟狀況下降、變糟，發生群眾運動的可能會上升、增加。反之，如果經濟狀況上升、變好，發生群眾運動的可能會下降、減少。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常被稱為“社會沖突論”。“社會沖突論”的基本觀點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工人在工會的帶領下與資產階級進行鬥爭。這些鬥爭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都是社會運動。只要資產階級掌握權力一天，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就不會停止。換言之，不斷的剝削是革命的動力，必然導致無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170]。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運動研究的假設是，有共同利益的人必然會組織起來追求共同利益^[171]。華人學界中的“兩個文革說”，是馬克思的“社會沖突論”理論框架下的一種學說。

“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 簡稱 RCT）在上世紀60年代開始崛起^[172]。這是基於微觀經濟理論的學派，受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等人的影響^[173]，屬於自由個人主義傳統。該理論以個人為主導，強調個人作為群體行為的重點^[174]。該派理論的代表人物是奧爾森（Olson）和奧普（Opp）。在該派理論學者眼裏，社會運動是適合外境的追求政治目標的方式^[175]。奧爾森不認同馬克思的關於個人會為共同利益自動參加運動的觀點。該派學者認為，社會沖突並不自動導致社會運動。他們認為，運動的參與者是經過權衡利弊，面對各種選擇作出自利的決擇。理性的個人不會行動起來實現共同的利益^[176]。個人只有獲得利益才會參加工會，參加運動和參加革命。運動需要有措施，實現“不參加就沒有個人利益”的結果。因為理性的人都是為自己的個人利益，不會為他人的利益工作^[177]。也就是說，需要出臺“不勞動者不得食”的規定，才能促使個人積極參與運動。這也是人們常說的“免費搭乘者”問題。該理論強調個人作為群體行為的重點。

“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簡稱 RMT）試圖通過分析個人理性地權衡參加運動的得失來理解社會運動。在有些情況下，社會運動的發生並不是因為社會矛盾增大、人們的剝奪感上升或者人們怨恨的增加，而是社會運動發起者和參與者可以利用的資源增長了。是否參與社會運動，是人們對資源動員進行的理性選

擇。資源包括甚廣，有知識、財力、傳媒、物力、人力、合法性、社會精英的支持等等。如果對社會不滿的群體能夠動員手中掌握的資源，運動就能發展起來^[178]。該觀點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有的群體能夠組織起來開展社會運動，有的群體卻無法組織起來的原因。該派的學者認為，對於社會運動的動員來說，資源比不滿更重要^[179]。資源動員論是深受馬克思影響的宏觀學理論^[180]，試圖尋找有利於降低成本、提高效用的組織性資源^[181]。

理性選擇論和資源動員論的區別在於：前者認為人是孤立的，後者承認關係的重要性，從而實現群體的理性。理性選擇論反對情感化，認為情感總是不理性的，資源動員論繞過了這一關。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的，這種聯系會影響人們的決定^[182]。在相互依賴的語境下，僅靠個人的理性不足以達到爭取利益的目的。出於情感的行為也可以是理性的。資源動員論強調有形的和無形的資源，例如社會運動組織、外部的精英、社會網絡和媒體等^[183]。

有學者批評資源動員論太注重內部的因素，忽略了外部因素（即政治機會）。這就產生了“政治過程論”（Political Process Theory）。該理論的核心思想是：社會運動依賴於有利的政治環境。只有在政治環境有利的時候，社會運動才會出現和成功。該理論事實上是外部的資源動員論。政治機會使社會運動得益或受阻，影響社會運動的成敗^[184]。泰羅（Tarrow）總結出四種情況會出現有利的政治機會^[185]：（1）挑戰者有機會進入國家政體；（2）精英重新站隊；（3）精英分裂；（4）鎮壓挑戰者的能力和傾向有變化。政治機會也可以是現行政治體制的受歡迎程度或脆弱程度。如果現行體制比較脆弱不堪一擊，社會運動很容易發生^[186]。總之，是宏觀的政治結構和政治過程為運動的發生提供了政治機會^[187]。

資源動員論和政治過程論之間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前者強調內在的因素，後者更強調外部的因素。雖然兩者間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它們都強調社會運動是一個過程，強調運動參與者的利益和理性選擇^[188]。資源動員論和政治過程論的共同特點是，兩者都屬於宏觀層次的理論，都強調物質性的條件沒有考慮非物質性的因素（如文化和情感）。

以上理論是北美學界發展起來的。在歐洲大陸，社會運動學的發展采取的是一條不同的道路。“新社會運動理論”^[189]（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 簡稱 NSM）是由歐洲的3位思想家（德國的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法國的圖賴訥 [Alain Touraine] 和意大利的梅盧西 [Alberto Melucci]）提出來的。新社會運動理論是在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為基礎的社會衝突論的交鋒中發展起來的。該派學者

認為，社會運動成員再也不是自動地產生於以階級沖突為基礎的工業社會。社會運動成員需要重新發現自己和創造自己，使自己形成新的群體身份。這是人們常說的“身份認同”。該理論試圖解釋北美和西歐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社會運動。該時期的社會運動有別於舊形式的運動，所以被稱為新社會運動。

新社會運動強調對於後物質主義價值的追求，不再強調勞工被資本家剝削，不再強調收入。該運動強調生活、身份、環境、性別、和平和反戰等^[190]。這是因為社會沖突在歐洲仍然很重要，但又不同於舊的產業工人運動^[191]（例如民主運動和人權運動）。此類運動的特點之一在於它們涉及的範圍。由於現行政府的政策是全國性的（如民主問題和人權問題），所以運動的範圍也是全國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如反核能運動）。該理論融匯了歐洲19世紀以來的杜爾凱姆、馬克思和韋伯（Weber）三大社會學傳統，體現了原有的現代化價值與正在興起的後現代化價值之間的沖突^[192]。傳統的社會運動能得到工人階級的支持，因為大多數傳統的社會運動致力於經濟鬥爭。現在的新社會運動則跳出了經濟範圍，得到更多的中產階級的支持。

14.4 社會運動學的第三代理論

以上的理論均忽略了意義制造（Meaning Making）。這是因為，這些學者們認為民眾與觀察者相似，沒有必要研究他們的意義制造。例如，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的覺悟是他們與生產關係的產物。馬克思在調查工人狀況時只關心事實，並不關注工人的態度。他認為群體行為是可以從客觀指標中讀出的，即工人最終會如馬克思本人那樣理解他們的自身狀況^[193]。文化主義者從社會心理角度關注個體微觀動員機制。運動的動員是文化現象和話語活動。每個運動的動員都需要通過話語和實踐，傳遞意義，實現動員^[194]。因此構框理論

（Framing）被用來解釋社會運動^[195]。該理論是由人類學家貝特森（Bateson）在1972年提出的^[196]。框架是這樣定義的：一種簡化與濃縮“外在世界”的詮釋架構，通過有選擇地強化和符號化一個人現時和過去環境中的對象、情況、事件、經驗和行為順序^[197]。社會運動的任務之一是提出一套重新認識世界的辦法，以便喚起民眾加入運動。受壓迫的民眾受到壓迫，並不一定視其為不義採取批評或抗議行動。沒有新的解釋構成群體的共識，社會運動不易興起。簡言之，構框是以“動員潛在的支持者，尋求旁觀者的認同和支持以及降低反對者的動員效果”為目的^[198]。群體行為的理性決策，是在互相依賴的情況下作出的。這是因為，人們的生活和命運互相交織在一起，相互

間的關係有道德和情感的投資。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人的關係網絡的一個部分^[199]，所以構框理論也可以視為是情感和網絡。

構框與意識形態（Ideology）不同。構框告訴我們該如何看待不義，意識形態則告訴我們為什麼不義是重要的^[200]。民眾對現實情況的理解，來自於自身的經歷、周圍的人群、媒體的廣播以及某些權威機構的宣傳等等。社會運動致力於締造另一種的解釋來影響民眾，學者把這種另類的解釋稱作為“群體行動構框”。這是鼓動民眾採取行動的動因^[201]。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營造氣氛，使更多的民眾行動起來參加運動。儘管存在反叛意識，存在可以利用的資源，政治機會的條件也具備了，有的時候運動卻不能成功。這是因為雖然反叛意識、組織力量和政治機會很重要，但如果民眾沒有充分地形成與運動組織者相同的意識，運動的動員仍有困難。

現代社會運動學理論深受四種傳統理論的影響。（1）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民眾是如何動員起來的問題，往往更注重外部的因素。他們很少想到是什麼原因使個人參與社會運動。他們把問題看成是社會結構發展的必然結果，不是個人的選擇。儘管他們認為社會運動植根於社會結構，卻低估了參與運動所需的資源（即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對於他們來說，民眾參加社會運動，是因為階級矛盾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2）列寧從歐洲的經驗看到了問題。列寧等不及客觀條件的成熟，提出創建一個專業的革命精英隊伍代替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這支先鋒隊代表工人階級的真正利益。對於列寧來說，組織是工人階級社會運動的解決方案。（3）葛蘭西（Gramsci）從俄國模式未能向西推進認識到，先鋒隊的組織形式不足以引起革命。葛蘭西認為，必須提高工人的覺悟。他把工人運動看成是群體性的知識分子。該群體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造就工人階級的文化。（4）美國的社會學家蒂利（Tilly）深受馬克思的影響，但他很快將注意力轉到國家結構和國家戰略規劃。早期的蒂利注重的是靜態的政治狀況。

受以上四種傳統理論的影響，分別發展出四種現代的社會運動學理論。首先是受馬克思影響的上世紀 60 年代的社會壓力論學派。該派學者注重對社會不滿的動員理論，認為民眾的不滿情緒來自結構的壓力。受列寧影響的 60 至 70 年代的資源動員論學派，關注運動的領導和組織。深受葛蘭西影響的 80 至 90 年代的構框和群體身份認同派，則注重運動的共識的來源。第四派的理論家，則從 70 年代開始跟隨蒂利，注重構成結構性抗爭政治的政治機會和限制（即政治過程論）^[202]。

以下是對上述理論的一個總結：

表14.2 社會運動學理論的分類

	非實利主義	實利主義
古典理論	壞人論 烏合之眾論	社會沖突論
宏觀理論	新社會運動論	社會壓力論 資源動員論 政治過程論
微觀理論	構框理論 群體身份認同論	理性選擇論 博弈論

上述的社會運動學理論可以分為三代：第一代（瘋狂）是壞人論、烏合之眾論；第二代（理性）在理性選擇的框架下，有社會沖突論、理性選擇論、博弈論、社會壓力論、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和新社會運動論；第三代（情感/網絡）是群體身份認同論和構框理論。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運動學經歷了從瘋狂到理性再到情感/網絡的螺旋形變化，使我們對社會運動的理解和認識更加深入。這些理論對於我們研究文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十五章 毛的動員

社會運動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運動的動員。運動的動員又可以分為兩個具體的問題：（1）為什麼動員？（2）如何動員？關於文革的動員，這兩個問題又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方向。所以文革的動員可以分為4個問題，即：（1）毛為什麼發動文革？

（2）毛如何發動文革？（3）民眾為什麼參加文革的群眾運動（即為什麼被動員）？（4）民眾如何參加文革的群眾運動（即如何被發動）？本章討論“自上而下”的兩個問題：“毛為什麼發動文革？”和“毛如何發動文革？”

15.1 毛為什麼發動文革

毛為什麼發動文革的問題，可以分為原因和目的兩個方面。對於文革發動的原因，國內外研究者已經作了大量的研究。歸納起來有十多種觀點，如“階級鬥爭必然說”、“黨內權力鬥爭總爆發說”、“封建遺毒說”、“毛澤東帝王思想說”、“奸臣禍國說”、“烏托邦碰壁說”、“群眾反官僚主義說”、“中西文化沖突說”、“人性獸化說”、“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等等^[203]。

對於毛發動文革的目的，著名的西方學者麥克法考爾（Roderick MacFarquhar）有過精辟的分析。他認為，文革的目的是要解決毛之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是規劃中國未來的一種嘗試。毛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一個雖然貧窮但卻保持社會主義純潔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權、更加集體主義、更少官僚主義的社會。為了實現這個規劃，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領導層，安排一個他能夠絕對信任，會堅持他的路線並繼承下去的新接班人。這個過程就是文革^[204]。中西方的學者們對於毛發動文革的目的提出多種觀點：（1）為了打倒劉少奇；（2）為了解決中國的官僚化問題；（3）為了實現理想的社會主義；（4）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5）為了防止修正主義的出現；（6）為了實現民主等等^[205]。有學者將以上這些觀點歸納為三種意見：（1）權力鬥爭說；（2）政策分歧說；（3）政策分歧與權力鬥爭混合說^[206]。

對於促使毛發動文革的原因，有一派觀點值得注意。該派學者認為，文革的根本原因是赫魯曉夫現象及其影響。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舉行的蘇共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中共黨內高層有不少人贊同赫魯曉夫的觀

點，對此毛澤東十分警惕。毛從心裏反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盡管他本人並不喜歡斯大林。這是因為，毛在中國推行的政治就是斯大林式的政治。所以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毛不得不竭力為斯大林辯護，並將赫魯曉夫看作為修正主義分子。繼蘇共二十大之後，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提出加強集體領導和反對個人崇拜。八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任何重大問題都由集體決定，同時使個人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207]八大對個人崇拜的限制以及加強集體領導的決議，引發毛的極大不滿。他擔憂失去“太上皇”的地位。

毛發動的大躍進運動以失敗告終。毛不得不作出姿態，辭去國家主席由劉少奇接任。這一人事變動加深了毛對當時中共領導層的疑慮，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大權旁落”。從1959年開始，中國經歷了連續三年的大饑荒，毛在黨內的威信降至穀底。這些對毛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黨內同志的不信任，是毛發動文革的原因之一。他把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當作“修正主義”和“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看待。斯大林死後受到赫魯曉夫的批判，給毛澤東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毛澤東認為，黨內的好人都死光了，把黨內的大多數人看作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毛認為自己是孤立無援的孤家寡人^[208]。毛發動文革的目的，是要樹立真正的接班人，以確保他的路線得以繼續，而且可以在他死後防止中國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對他進行清算^[209]。簡言之，文革是毛“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210]。近年來，該派觀點似乎在華人學界中得到不少學者的認同，成為普遍接受的共識。

15.2 毛的黨內思想動員

關於毛如何發動文革（按社會運動學的說法，“毛如何動員？”），Andreas 提出了官僚型動員（Bureaucratic Mobilization）和魅力型動員（Charismatic Mobilization）的分析模型。韋伯把官僚權威和魅力權威看成是互相對立的。官僚權威基於理性，遵循已經建立的規則，魅力權威卻反對這些規則。魅力本能地對體制的科層、規則和程序等存有敵意。從本質上說，革命黨需要同時依賴於兩者。一方面，為了吸引和保持追隨革命黨的目標，必須通過魅力加以美化和鞏固。另一方面，持續的動員需要紀律和協調，紀律和協調需要通過官僚科層才能實現。因此激進的社會運動（即魅力型的運動，因為它們挑戰現存的社會秩序）也需要官僚型動員。在這裏，魅力型動員指的是動員的方式，該方式依賴魅力而非官僚科層的理性。中共作為執政黨，負責管理中國的社會。這一社會卻是基於中共試圖摧毀的階級結構。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動蕩的管理，各種政治運動連年不斷。雖然這些運動具有高度破壞性的可能，但由於運動

都是自上而下地進行的，命令是從中央到地方一級一級傳下來的，所以運動基本上是官僚型的動員，實際破壞並不大。

在文革的初始階段，中共的領導層仍然采用派工作組的老辦法執行毛的旨意。但是毛此次的目的不僅僅是處理犯錯誤的幹部，還要摧毀整個黨組織的官僚權威。從外部派來的工作組，可以有效地打擊當地的官僚及其關係網，但是這樣的動員卻不能摧毀整個黨組織的結構，權力僅僅轉移到工作組手裏。當工作組一走，權力又重新回歸到原來的當權派手中。毛在文革初期同意中央派工作組到學校指導運動的作法，不過他很快通過報紙和電臺發表一系社論和文章打擊工作組的權威。毛後來召回工作組，號召民眾“自己教育自己”，成立造反組織，向當權派發起進攻。黨組織機構很快癱瘓，毛直接領導造反的民眾，反對處於中層的官僚階級。用 Andreas 的話說，是“上層和下層協力對抗中層”^[211]。

對於毛的自上而下的動員，我們試圖從黨內和黨外、思想和組織兩個不同的維度來進行分析。毛在黨內為文革做的動員準備，必須從大躍進說起。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領袖。此時在共產黨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與毛相比。毛具備了充當國際共運領袖的條件，但有一條不夠：前蘇聯是超級大國，中國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無法與蘇聯相比。毛下決心向蘇聯挑戰，使中國趕上蘇聯。這就是毛發動大躍進的背景和動機。當時中共對鋼鐵、煤炭、糧食和棉花等主要生產項目都提出具體指標，把產量看得非常重要。中共把物質生產的發達程度視為衡量社會先進與否的標準，中共的媒體充斥著不切實際的浮誇目標。許多中國人受此影響，真的以為共產主義近在眼前了。

然而大躍進不可避免地失敗了。如果毛繼續遵循生產力標準，中國的情況令人絕望。毛及時地轉移目標，提出了另外的價值標準。

“趕超英美”的口號悄悄地收起，取而代之的是“反修防修”的口號。這一轉變，可以用社會運動學中的構框理論來解釋。1986 年，Snow 等人提出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一場社會運動背後的目標或意識形態，由於種種原因可能會不為動員目標群體所理解或接受。為此，運動的組織者會創造出一些容易被接受的話語以達到有效動員的目的。在 Snow 等人看來，社會運動中的話語形成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運動組織者為了成功地動員參與者建立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的過程。為了能夠吸引參與者獲得更多的支持，必須創建新的價值觀、新的意義和理解^[212]。

為了擺脫困境，毛需要尋找新的目標、新的主意和新的基礎來整合他的黨。迫於黨內的壓力，毛不得不在 1962 年 1 月召開七千人

會。劉少奇坦陳經濟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被迫作了自我批評。雖然毛在黨內的職務並沒有變動，但是劉在黨內獲得巨大的聲望。然而僅僅 8 個月之後，在 1962 年 9 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奪回了話語權。毛在會上突然提出：“今天來談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中共的高層很快明白個中的原因。中共在大躍進的運動中犯下了巨大的錯誤，不改不行。可是正因為犯的錯誤太大，如果真的要徹底改正，發揚民主，讓民眾講話，人民會饒過中共嗎？中國在高壓統治下，消息受到封鎖，真相被掩蓋，民眾對實情並不了解。但是如果他們知道了真相，後果不堪設想。中共的高層明白，毛的講話不是沒有根據的臆想。毛接下來說的話更讓中共的高層擔心：“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個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毛看到的威脅是令人震撼的，深刻的危機感促成了中共高層的一體感^[213]。毛成功地通過告誡黨內高層所面臨的潛在威脅，把黨內的高層動員起來了。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威脅同時也是機會^[214]。有的時候運動更側重防止某些壞的方面，不是保住好的方面。因為群體對威脅反應更敏感，威脅比機會更能動員群體加入運動^[215]。

15.3 毛的黨內組織動員

當中共在“可能垮臺”的威脅下團結起來準備共度難關後，毛需要組織上的保證。1966 年 4 月 9 日至 12 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該起草小組後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簡稱“中央文革”）。5 月 4 日到 26 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也稱為“五月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還有有關部門負責人和該起草小組成員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 8 人。會議通過了文革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標志著文革的正式啟動。

5 月 28 日，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立。毛澤東任命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為副組長。中央文革直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實際上中央文革是毛直接領導下的特殊機構。毛甩開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

中央文革成立後立即做了以下三件事：（1）建立中央文革的辦公機構，把釣魚臺 16 號樓作為中央文革辦公室；（2）建立信息收集系統——辦《快報》，抽調 100 名團以上的政工幹部作為中央文革的聯絡員和巡視員，以《紅旗》、《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記者的名義到各地和各部門了解文革情況；（3）建立碰頭會制度，每天下午 3 點碰頭，中央文革全體成員參加。文革初期，中央文革碰頭會和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同時存在。1967 年 2

月以後，中央決定以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名義處理中央日常工作^[216]。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為指揮全國黨政軍的中心。毛在黨內的組織動員，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完成了。

毛通過秘書與常規的國家權力體制相抗衡並非偶然。早在合作化運動中，毛越過中央官員直接向省級領導人發出呼籲。為了保證省級領導人不受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限制，1955年夏天，毛將他以前的秘書陳伯達和陳正人安插到該部擔任副部長。為了保證通過秘書進行政治運作的有效性，毛澤東對秘書的基本要求是：他們絕對不能被國家和黨的常規權力體制所控制。在中國傳統政治體系中，專權（即“秦制”確立的“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原則）不僅是君主個人的主觀意志，與此相比更重要的是，它還必然演化出一整套可操作的權力運程序程和具體有效的制度架構。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政治稟賦和行為方式，其實無一不是對曆史上那種非常成熟的政治組織架構（“天子私人”）的承襲^[217]。

15.4 毛的黨外思想動員

毛不僅需要中共黨內高層的支持，而且需要億萬群眾參與，這樣才能實現他的目的。要使民眾動員起來，就必須消除民眾在心理上的恐懼。自從中共建國以來，各級黨組織和黨委書記成了黨的化身。誰反對黨委、反對黨委書記就是反黨，已經成了人們的“共識”。尤其是反右運動以後，人民已經失聲，知識界更是噤若寒蟬。正如奧爾森（Olson）指出的，鎮壓行動增加恐懼。因為大多數持不同政見者不願遭受騷擾、毆打、逮捕、動刑甚至死亡的危險^[218]，所以當聶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大字報批評校黨委對文革的態度以後，師生們的反應極為強烈。1957年參加鳴放後被打成右派的北京大學學生譚天榮，當年也是把大字報貼在大飯廳的東山牆上。這一巧合，使人聯想起當年的右派。對於毛來說，需要營造一個有利的氛圍，通過注入希望，激發群眾的情感，來減少人們心中的恐懼^[219]。

6月1日，毛澤東在杭州對聶元梓大字報作了批示。毛示意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毛還贊揚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的意義更大。6月1日晚8時，中央廣播電臺全文播放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毛澤東稱贊它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緊接著發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評論寫道：“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剝

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紀律徹底摧毀。”

《人民日報》的社論和聶元梓的大字報是文革的重要里程碑。正如我們在第一篇介紹的 12 個省的文革情況顯示的那樣，在《社論》和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的鼓舞下，各省相繼出現類似的大字報，矛頭直指當地的黨委。多年來植於中國民眾心中的恐懼在一部人心中開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敢於向當權者挑戰的勇氣。

然而文革的第一波群眾運動，很快在劉鄧主持的黨中央控制下轉向了。劉鄧派出的各級工作組，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他們拋出的替罪羊。例如在第一篇提到過的北京大學的陸平，清華大學的蔣南翔，北師大女附中的卞仲耘，天津的萬張集團，湖南大學副校長魏東明，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以及許多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和普通群眾。對於毛為什麼在文革的最初階段放手讓劉鄧來主持運動，華人學界似乎有共識：這是毛為劉設下的圈套^[220]。這一觀點與西方學者（如 Andreas）有所不同。毛有足夠的智慧，不至於愚蠢到真心讓劉來操控文革的進展。無論毛發動文革的真實目的是什麼，扳倒劉少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不爭的事實，讓自己的對手主持一個自掘墳墓的運動有點不可思議。唯一的合理解釋是：毛另有所圖。毛是引誘劉少奇犯錯誤，從而進一步動員群眾。毛接下來做的，就是進一步消除民眾的心中的恐懼。當地的黨委不可怕，上級派來的工作組也不可怕。毛要的是群眾敢於挑戰除了毛的最高統治外的中共體制。王年一把該階段的動員稱之為“文革的第二次發動”^[221]。

8 月 1 日，毛澤東寫信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贊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毛在信中說道：“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以熱烈的支持。”“造反”一詞過去主要用作貶義，指“犯上作亂”。即使是古代的造反者，一般也不敢在自己的旗幟上明目張膽地寫上“造反”二字，毛卻鼓吹起“造反”。當然毛的本意不是想鼓動民眾造他的反、造共產黨的反，而是向“修正主義”造反。8 月 5 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 50 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

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8月9日，中央公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宣稱要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十六條》強調要相信群眾，讓群眾運動用“四大”增長才幹，明辨是非，分清敵我。這就意味著中共放棄了多年堅持的所有政治活動必須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進行的傳統。經過17年強力壓制的人們有了《十六條》，就可以利用“四大”來表達自己的意願了。

毛和中央提出一個全新的理論，通過《人民日報》8月23日的社論傳達出來。社論破天荒地提出：“黨中央就是黨中央，一個地區和一個單位的黨組織，就是一個地區和一個單位的黨組織。任何一個地區和一個單位的黨組織，如果違背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為什麼批評不得？為什麼人家一批評就叫做‘反黨’、‘反黨中央’和‘反革命’？”這一理論對解除民眾多年的顧慮解放思想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恐懼終於開始從中國民眾的心中悄然退去。

15.5 毛的黨外組織動員

毛不僅在思想上為民眾解禁，而且採取果斷的組織措施保證民眾的動員。8月18日，毛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紅衛兵。為了表明對紅衛兵的支持，毛接受了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章。那張記錄了宋為毛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照片，成為文革的經典之作。以後《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刊載以宋要武^[222]為作者的文章《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此後毛又7次接見1,000多萬紅衛兵。

1966年7月18日毛回到北京後，公開批評派工作組的作法。7月25日，毛決定撤銷工作組。7月29日晚，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

文革中毛打出的“平反牌”，是他贏得人心的關鍵。對於毛的動員，民眾在文革初期的反應並不熱烈。一方面是他們有疑慮和顧忌，另一方面是他們可能對一些被指責為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東西或多或少有些好感。更重要的是，各級黨委和工作組依照以往的經驗搞運動，把自己視為黨的化身，把有不同意見的人打成“反革命”。工作組走了以後，老紅衛兵和工作組籌建的“文革會”，在壓制群眾方面

更加變本加厲。就在群眾受難之時，毛一反常態，出人預料地打出“平反牌”。不但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人得到平反，那些因為曆史問題、家庭出身問題或其他問題被批鬥被關押的群眾紛紛得到解放。這是中共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過去中共搞運動整群眾，搞錯了也不會認錯，搞的材料會永久地保留在個人檔案裏。這一次，毛卻允許群眾搶出“黑材料”並付之一炬。群眾揚眉吐氣，受到鼓舞，發誓永遠忠於毛，積極投身文革^[223]。許多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以後成了造反派的領導人和中堅。許多人認為，是以毛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解放了自己。人們感到站在群眾一邊的黨，不是壓制群眾的黨，才是真正的共產黨^[224]。沒有這一波的大規模平反運動，就不會有造反派在全國範圍內的出現^[225]。

與此同時，中央允許紅衛兵免費乘車和免費住宿，到全國各地串聯，到運動還沒有起來的地方煽風點火，沖擊官僚體系。開始是北京紅衛兵到外地去“煽風點火”，支持各地的造反派沖擊各地打擊造反派的領導人。因為當時各地造反派還是少數派，處於被壓制、被圍攻和被打擊的地位。幾千萬年青人在全國各地激蕩，發動群眾，交流經驗，沖擊官僚體制。文革的群眾運動開始風起雲湧了。

在1967年1月開始的奪權並未建立起新秩序，也並未帶來“抓革命，促生產”的新局面。相反奪權加劇了社會大動亂，生產急劇下降。面對這一混亂形勢，在毛和中央的指示下，各地區相繼開始“二月鎮反”運動，試圖恢復穩定秩序。然而毛卻發現，各地大有恢復舊秩序，結束文革的趨勢。毛發動文革的目的尚未達到，為了重新發動群眾，毛不得不轉舵，把“二月鎮反”打擊造反派的罪責全部推到其他高級領導人頭上。毛發起了第二波的大規模平反運動。毛批准發出中央文件，明確宣布：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抓人。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抓的一律釋放。

1966年10月開始的第一次平反運動，解救了被各級黨委和工作組迫害的群眾。1967年4月開始的第二次平反運動，解救了被各地駐軍和公安機關迫害的群眾。第一次平反導致黨政機關的癱瘓，第二次平反引發各地“揪軍內一小撮”和“砸爛公檢法”的高潮。沒有兩次大規模的平反運動，廣大的民眾不可能敢於起來造反。許多處於觀望和猶豫狀態的民眾，毫無顧忌地加入到造反隊伍中來。全國終於迎來“全民造反”的情景^[226]。

第十六章 民眾的動員

前一章我們討論自上而下的動員。討論圍繞著上層，以毛為中心。本章將轉而關注群眾的動員（即自下而上的動員）。本章的觀點是，群眾的動員與民眾參加文革中的哪個派別組織，是有區別的。前者只注重群眾為什麼參加、如何參加群眾組織（無論是保守派組織還是造反派組織），後者注重群眾因何種原因參加某派組織（如保守派或造反派）。

從第一篇12個省份的簡述中，可以看到群眾投入文革運動是有不同原因或動機的。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率先貼出大字報並被毛肯定為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她的首要動機是響應毛的號召。聶寫大字報的另外原因，是當時她受到陸平和彭真的整肅。因彭真被中央點名批判，聶就希望通過大字報澄清自己的問題。清華大學的高幹子弟貼出大字報，把矛頭指向他們的校長蔣南翔，與聶的動機則完全不同。這些高幹子弟或多或少從父輩那裏得知中央高層的動向。緊緊跟上形勢，打擊已經無力反抗的“死老虎”，對於他們來說不失為投機妙著。清華大學附中、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天津16中的幾位中學生、湖南長沙一中的黨員學生反黨委（支部）或反工作組，均屬此類。黑龍江哈爾濱師院的範正美因為不滿院黨委拋出替罪羊，貼了大字報。雲南大學的學生曹文康和保榮卿屬於與範正美同一類的造反。南京大學首先貼大字報造黨委反的溧陽分校的胡才基，是因為反對匡亞明搞極左的農村辦學，胡更多地是出於自身的利益。內蒙古的高樹華和西藏中學的陶長松帶頭站出來造反，更像是純粹地響應毛的號召。

凡此種種，各人有不同的原因、情況和動機。對於文革群眾組織及民眾造反原因（包括造反動機）的研究相當多，如Chan^[227]，Walder^[228]，徐友漁^[229]，王紹光^[230]，印紅標^[231]，唐少傑^[232]，荀偉華^[233]，葉青^[234]，徐海亮^[235]，葉長青等^[236]。王芳的研究值得一提。圍繞普通工人為何與如何參加一派組織的問題，王芳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她採訪多位“鋼工總”的領導人和一般成員。該研究發現，領頭造反者的動機有以下幾種：爭取個人權利，改變政治處境，對本單位的當權派不滿，同情受打壓者，響應毛的號召等。普通成員的動機則有以下幾種：發現“鋼工總”觀點與己吻合；把“鋼工總”作為一個發泄口；自我保護；泄私憤；撈政治資本；獲得經濟利益；好玩等^[237]。

迄今為止的研究均存在一個普遍的問題：大多數的研究僅限於研究者的推測分析。Chan等曾經收集過數據，可惜他們沒有把參加組織的動機包括在調查之中。因此，他們的調查結果僅僅是發現家庭出身與紅衛兵的派別有關。迄今為止，還沒有學者采用大規模地直接詢問文革當事人的方式，了解他們為什麼參加群眾組織。持“社會沖突說”的西方學者，發現了家庭出身與紅衛兵派別的關係，因此推斷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參加造反派是對現實的不滿。這種推斷非常符合邏輯也符合直覺，但是缺乏來自當事人的證實。有更多的學者通過研究其他地區（如北京、江蘇、浙江和上海等地）發現，家庭出身與派別的關係並沒有明顯的關係。這一現象是否說明，在這些地區的民眾中，參加群眾組織的民眾對現實並不存在抱怨？

參加一派群眾組織（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只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同一個手段可以服務於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手段也可以服務於同一個目的。黑五

類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處境，既可以參加造反派也可以參加保守派，因為參加保守派未必不能達到同樣的目的。我們將在第 18 章裏舉出清華大學範雨臣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這裏舉例來說明，旁觀者是如何錯誤地理解和分析當事人的心情的。1968年7月，清華大學的武鬥進入白日熱化階段。“團派”把“四派”包圍在科學館裏，蒯大富下令，“四派”必須交出凶手和肇事人員，否則凡出入科學館者格殺勿論。7月4日凌晨，樊思清開槍打死“四派”的一個人。蒯大富打電話問樊：“剛才是不是大禮堂那邊打的槍？”由於非常害怕和緊張，樊回答蒯大富說：“我不知道啊！”這段通話被“四派”錄了音。後來“四派”的人告訴樊思清：“我們的錄音對你有利，說明你開槍以後並沒有立刻向蒯大富去邀功。”一聽到此話後，樊即刻發愣了，當時不知道如何回答。過了一會心裏才想：“怕都來不及呢！還去邀功？”樊不禁感歎道：

旁觀者和當事人的想法的確大相徑庭啊！旁觀者可發奇想，隨意推斷。事不關己的旁觀者在事後所發揮的無窮盡想象力和無窮盡推斷力，不可小覷。我與蒯大富的電話內容，呈現出當事人本人的罪惡感。當事人的同夥也具有連帶罪惡感或怕被牽連感。其表現在，事發之後的第二天我就開始感覺到，大禮堂的同夥已經怕我回避我不理我了！也根本就沒有人拿我當英雄對待，去蒯大富那裏“報功”“慶功”^[238]。

我們曾設想，如果兩派分裂武鬥時，當事人能夠預見到最終結果是兩敗俱傷，他們是否會做出妥協和讓步？我們對清華大學“四派”領袖人物孫怒濤先生就這個問題，於2018年1月11日通過電子郵件進行了採訪。得到的回答卻出乎我們的預料：“在當年，我根本就沒有想過兩派會兩敗俱傷，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談不到因為預見有這樣的後果而怎麼樣。”

我們對全國第一張大字報的第一作者聶元梓女士進行一次遠程採訪，她的回答也出乎我們所料：

問：您寫大字報是不是為了平反？

答：社教（我）給領導提意見，給陸平提意見，到了國際飯店會議卻挨整，受了壓制。聽了傳達《五一六通知》，（我）覺得北京大學問題有希望澄清，自己和社教積極分子受到批判和冤屈有希望得到解決了，於是想給毛主席寫信報告。後來6個人商量改為寫大字報。當時沒有多想自己，沒有為自己打算。（我）覺得應該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

問：您寫大字報，是不是為了拼一下，奮力一搏？

答：當時我並不害怕，我有勇氣！但沒多想自己。覺得這樣正確，應該這樣幹，這樣做對。

問：彭真倒了，《五一六通知》下達了，您是不是覺得貼大字報勝算大？

答：考慮勝算？誰問這種問題？西方人、美國人才會這樣問問題。當時我沒有計算勝算有多大，現在的中國人可能會這樣思考。當時我想的是應該不應該這麼做？中央文件說幹部問題這麼嚴重，修正主義這麼猖狂，自己真誠地要保衛黨中央，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問：如果您知道後來會吃大苦，會入獄，您還會貼大字報嗎？

答：真奇怪，怎麼這樣問。我當然會！我想的是應該不應該，想的是響應號召，幹應該幹的事。我還會貼的！^[239]

幫助我們安排採訪的友人對我們說，聶老在回答我們的第三和第四個問題時，“顯得不太高興”。從以上兩位當事人的回答，可以看出研究者與當事人之間的思想差距。為了能夠更準確地理解民眾為什麼被動員的問題，我們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直接詢問當事人，試圖對民眾在文革中為什麼參加群眾組織進行分析。

16.1 關於參加群眾組織的問卷調查

我們於 2017 年 4 月 16 日，在 Survey Nuts 網站上啟動“關於民眾在文革中參加群眾組織情況的問卷調查”。該問卷調查目前仍然開放，數據仍在收集中。同時我們通過電郵、電話、微信以及面談的形式，對經歷過文革的親戚、朋友、同學和老師進行採訪。我們在美國的紐約、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和休斯敦地區，對部分華人進行採訪調查。在友人的幫助下，我們還從北京向國內的一些民眾發放問卷調查表。

考慮到大多數的受訪者已經進入垂暮之年，我們把問題設計得盡量簡單，並且明確告知問卷調查的參與者，可以在了解情況的條件下代親友填答。筆者曾考慮對參與者付費，以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在調查過程中，也曾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採用付費鼓勵的措施，有利也有弊。如果有人因金錢鼓勵多次反複填答，會影響調查的可靠性。在權衡利弊後，筆者決定寧缺勿濫，堅持本次調查以自願為宗旨^[240]。令人欣慰的是，仍有許多不知名的民眾積極參與此次調查。

我們的問卷調查共有 10 個問題：（1）文革開始時所在地（省、市）；（2）出生年份；（3）性別；（4）家庭出身；（5）政治面貌；（6）職業；（7）參加群眾組織情況（多選）；（8）群眾組織屬於社會哪一大派；（9）參加群眾組織的原因，（10）是否因參加群眾組織受到審查和迫害^[241]。

我們的問卷調查，很有可能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世紀絕唱”。因為文革開始時只有 12 歲的小孩子（這是問卷調查設定的最低年限），在 2017 年（問卷調查的起始年）時已經 63 歲了。當年 30 歲左右的年輕人，現在全都進入垂暮之年（80 歲左右）。再過十年，即使想對當事人進行大規模的調查，也將不可能了。我們的問卷調查是在文革結束後 40 多年進行的，受訪者在經歷了幾十年後，一般能夠以超脫的態度看待這段歷史。大多數人以匿名的方式，通過填寫網上問卷的方式受訪。沒有人（包括作為調查主持人的我們）能夠追蹤到受訪者，而且此次調查完全出於自願。受訪者不受任何政治和經濟因素的影響。當年的民眾由於大環境的壓力，對參與文革的真實動機不能直言，必須加以掩蓋；需要打著革命的旗號，把自己扮成忠誠的革命追隨者^[242]。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受訪者無需再掩飾自己，無需對自己當年的追求（包括私利）加以掩飾。

16.2 數據

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243]，共有 1,804 人參與此次問卷調查。其中有 3 人因填寫不完全無法使用，有效答卷為 1,801 人。問卷調查的參與者中有一些年齡偏小者，我們決定舍去，僅保留 1966 年時已進入中學或者年齡已經達到 12 歲或

以上者^[244]。因此，本問卷調查的實際有效受訪者人數為 1,670 人。其中網上受訪者為 1,477 人，其他方式受訪者為 193 人。以下是受訪者在 29 個省（當時的行政劃分）的分布情況：

表 16.1 問卷調查受訪者省、自治區分布

受訪者人數	省份數	省份
300 以上	1	北京（345）
201 — 300	1	江蘇（228）
101 — 200	2	上海（121）、四川（107）
51 — 100	5	湖南（68）、山東（67）、陝西（67）、河南（55）、廣東（52）
41 — 50	5	山西（48）、湖北（45）、遼寧（44）、河北（43）、浙江（42）
31 — 40	4	黑龍江（39）、甘肅（34）、新疆（33）、內蒙（31）
21 — 30	4	廣西（29）、安徽（27）、天津（26）、福建（22）
11 — 20	5	江西（20）、雲南（16）、吉林（15）、貴州（13）、青海（11）
6 — 10	1	寧夏（10）
1 — 5	1	西藏（2）
合計	29	實際有效受訪者 1,670，其中 10 人地區不明

表 16.1 顯示，受訪者來自全國 29 個省市自治區。受訪者最多的來自北京，超過 300 人。江蘇位於第二，達到 200 多人。其次來自上海和四川兩地，均超過 100 人。再次是湖南、山東、陝西、河南和廣東，均超過 50 人。山西、湖北、遼寧、河北、浙江、黑龍江、甘肅、新疆和內蒙 9 個省份均超過 30 人。除西藏自治區的受訪者較少（僅 2 人），其他 10 個省份的受訪者達到 10 至 30 人。受訪者不僅來自大城市和各省的省會（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慶、南京、武漢和長沙等），還來自中小城市和農村的專區、地區和縣。受訪者既有來自人口密集的華東地區，也有來自最北端的黑龍江的黑河和哈爾濱，西部邊陲新疆的烏魯木齊和阿克蘇，西南邊陲雲南的昆明，以及華南廣西的南寧和桂林等。問卷調查雖然在地區分布上存在著個別邊遠地區人數偏少的缺陷，但是從總體上看，還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受訪者來自 102 個大中小城市和 191 個地區、專區和縣（有些地區、專區和縣現在已經建市或成為城市的一個區，我們按當時的劃分）。本次調查涉及的城市和農村地區和縣的實際數字，可能超過我們統計的數字，因為受訪者中有 209 人沒有注明具體的城市、地區、專區或縣。下表是問卷調查地區分布：

表16.2 受訪者地區分布總覽

省	類別	城市或縣
安徽	市（3）	安慶、蚌埠、蕪湖
	地專縣（4）	池州、六安、壽縣、和縣
福建	市（2）	福州、泉州
	地專縣（10）	崇安縣、福清縣、古田縣、建甌縣、同安縣、上杭縣、長汀縣、建寧縣、莆田、三明
廣東	市（3）	廣州、江門、湛江
	地專縣（8）	從化縣、遂溪縣、封開縣、信宜縣、梅縣、汕尾、佛山、高鶴縣
甘肅	市（3）	蘭州、天水、玉門
	地專縣（12）	定西、渭源縣、會寧縣、靖遠縣、文縣、民勤縣、臨潭縣、正寧縣、隴南、慶陽、酒泉縣、永靖縣
廣西	市（4）	南寧、桂林、柳州、北海
	地專縣（3）	貴縣、廉州、欽州
貴州	市（2）	貴陽、都勻
	地專縣（4）	畢節縣、赤水縣、大方縣、遵義
河北	市（7）	保定、承德、邯鄲、石家莊、張家口、滄州、唐山
	地專縣（5）	定縣、魏縣、崇禮縣、南宮縣、衡水縣
河南	市（6）	鄭州、洛陽、三門峽、新鄉、焦作、開封
	地專縣（13）	寶豐縣、鄧縣、孟州、伊川縣、南陽、平頂山、信陽、唐縣、息縣、永城縣、固始縣、開封（地區）、周口
黑龍江	市（5）	哈爾濱、大慶、牡丹江、佳木斯、雞西
	地專縣（6）	蘿北縣、密山縣、黑河、綏化縣、伊春、寧安縣
湖北	市（3）	武漢、黃石、鄂城
	地專縣（9）	黃梅縣、隨縣、黃岡、洪湖縣、十堰、荊州、荊門縣、漢川縣、孝感
湖南	市（3）	長沙、衡陽、湘潭

省	類別	城市或縣
	地專縣 (19)	澧縣、桂陽縣、江永縣、黔陽、新寧縣、 溆浦縣、茶陵縣、邵東縣、零陵縣、常 德、醴陵縣、湘鄉、瀏陽縣、邵陽、武岡 縣、永州、益陽、嶽陽、津市
吉林	市 (5)	長春、吉林、四平、通化、遼源
	地專縣 (1)	磐石縣
江蘇	市 (10)	南京、常州、連雲港、南通、蘇州、無 錫、徐州、楊州、東臺、鎮江
	地專縣 (8)	灌雲縣、淮安縣、淮陰縣、沐陽縣、興化 縣、盱眙縣、鹽城縣、宿遷縣
江西	市 (2)	南昌、九江
	地專縣 (8)	修水縣、樂安縣、上高縣、贛州、德興、 臨川縣、新餘縣、撫州
遼寧	市 (6)	沈陽、丹東、大連、撫順、阜新、鞍山
	地專縣 (5)	本溪縣、昌圖縣、朝陽、阜新蒙古自治 縣、鐵嶺
內蒙	市 (4)	呼和浩特、二連浩特、集寧、包頭
	地專縣 (3)	固陽縣、鄂爾多斯、臨河縣
寧夏	市 (2)	銀川、石嘴山
	地專縣 (2)	中衛縣、巴音
青海	市 (1)	西寧
	地專縣 (2)	化隆縣、天峻縣
山東	市 (8)	濟南、濟寧、青島、臨沂、濰紡、煙臺、 淄博、棗莊
	地專縣 (10)	定陶縣、高密縣、惠民縣、昌樂縣、鄒平 縣、臨朐縣、平陰縣、德州、嶗山縣、新 泰縣
山西	市 (3)	太原、長治、大同
	地專縣 (10)	晉中、五臺縣、榆次縣、左權縣、晉城 縣、運城、候馬縣、臨汾、呂梁縣、朔州
陝西	市 (2)	西安、寶雞
	地專縣 (9)	戶縣、鹹陽、商洛、蒲城縣、漢中、鎮安 縣、延安、渭南縣、榆林
四川	市 (3)	成都、重慶、瀘州

省	類別	城市或縣
新疆	地專縣 (17)	敘永縣、平昌縣、萬源縣、儀隴縣、南溪縣、萬縣、安縣、夾江縣、德陽、綿陽、江油縣、南充、雅安縣、什邡縣、遂寧縣、西昌、宜賓
	市 (1)	烏魯木齊
	地專縣 (4)	伊犁、建設兵團、阿克蘇、五家渠
西藏	市 (0)	無
	地專縣 (1)	靈芝縣
雲南	市 (2)	昆明、東川
	地專縣 (5)	紅河州、開遠縣、景洪縣、騰冲縣、保山縣
浙江	市 (5)	杭州、金華、寧波、溫州、紹興
	地專縣 (10)	麗水、龍遊縣、吳興縣、天臺縣、海寧縣、紹興（地區）、臺州、義烏縣、湖州、舟山
北京	市 (1)	北京
	縣 (2)	大興縣、通縣
上海	市 (1)	上海
	縣 (2)	松江縣、白茅嶺農場（位於安徽境內的監獄）
天津	市 (1)	天津
	地專縣 (0)	無

受訪者中年齡最大的出生於 1916 年（年齡較大者多半由其子女或朋友代為填寫），最小的出生於 1954 年。受訪時（按調查起始的 2017 年計算），年齡最大的已有 101 歲，最小的也有 63 歲。他們在文革開始時，分別是 50 歲和 12 歲。正如有的學者所呼籲的，如果再不抓緊時間進行調查，文革的參與者將逝去，再也沒有機會對他們進行調查了^[245]。受訪者年齡分布如下：

表16.3 問卷調查受訪者出生年份分布

出生年份	受訪者人數
1916 — 1920	8
1921 — 1925	20
1926 — 1930	31
1931 — 1935	66
1936 — 1940	103

出生年份	受訪者人數
1941 — 1944	151
1945	96
1946	117
1947	95
1948	91
1949	118
1950	148
1951	125
1952	120
1953	113
1954	86
合計	1,488 (另有 182 人出生年份不明) [246]

我們在問卷表中詢問受訪者參加的群眾組織屬於社會上的哪一個大派。問卷調查對該問題採用開放式回答，回答中不乏一些較著名的群眾組織。受訪者中有 967 人參加過群眾組織，其中 557 人參加的組織比較有名。還有 410 人因填寫的組織較小或未填，無法確定它們的大派組織。以下是受訪者參加組織的情況：

表16.4 受訪者參加的群眾組織一覽表

省	群眾組織
北京	天派、地派、紅三司、清華大學四派、清華大學團派、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井岡山、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北京中學四.三派、北京中學四.四派、聯動
上海	工總司、紅革會、新複旦、紅上司、紅衛兵總部、柴油機廠東方紅、紅東北 [247] 、紅西南 [248] 、上海東方紅、松江縣炮轟派
天津	南開大學衛東、天津大學八.一三
安徽	P派、G派、九.二九、八.二七（G派）、蕪湖一中敢死團
福建	革造會、泉州縣八.二九、同安縣一中三司、莆田新派
廣東	東風派，旗派、湛江井岡山
甘肅	紅聯、聯總、革聯、紅三司、蘭州紅色長征團十八團（紅聯派），慶陽市合水幹秋子安置農場紅聯、民勤縣抗大派、文縣五.二三
廣西	四.二二、聯指、柳州工機聯、好派

省	群眾組織
貴州	四.一一、支紅派、遵義三.二五
河北	石家莊八.一八紅色風暴（擁軍派）、張家口聯總
河南	二.七公社、河造總、十大總部、開封八.二四、許昌市紅尖兵、三門峽八.一五、鄭州鐵軍（屬十大總部派）
黑龍江	炮轟派，哈爾濱市紅色造反團、黑河市紅色造反團
湖北	鋼派，新派，鋼二司、鋼工總、新湖大
湖南	高司，工聯，湘江風雷，長沙新派，長沙工人聯總、嶽陽紅造軍、嶽陽反到底、湘潭井岡山兵團
吉林	長春紅革會（紅二派）、長春公社（公社派）、吉林造反委員會
江蘇	好派、P派、八.二七（P派）、連雲港市人民公社派（對立派是反到底派）、東臺二.一五、南京紅衛軍
江西	（南昌）井岡山兵團、（共產主義大學武夷山分校）紅色兵團
遼寧	遼聯，八.三一、大連革聯、大連三聯部
內蒙	呼三司、內蒙東縱、呼和浩特工農兵革命委員會
寧夏	寧夏總指揮部、寧夏一月風暴兵團
山東	山東大學主義兵、濟南天橋區教育局第四野戰兵團、青島紅代會、青島紅衛兵第一總部、青島八.一兵團、青島反到底、濟寧紅色勞動者、平陰縣井岡山
山西	山西紅總站、山西紅聯指、山西紅聯站、山西兵團派、山西革命造反兵團、太原紅旗、長治紅字號，長治聯字號，晉中革命造反總部，晉中炮轟派，晉中總司、晉中東方紅（大寨派）、候馬市三.一八、臨汾五.二三、運城地區革聯/紅總、左權縣紅聯
陝西	工聯、工總司、西安交通大學派、榆林紅衛兵造反司令部、渭南工聯、渭南縛蒼龍
四川	成都紅成、成都八.二六、成都工人造反兵團、成都川油司、成都川大八.二六、重慶八.一五、重慶反到底、瀘州捍紅總（反到底派）、
新疆	紅二司、紅一司、紅三司、新疆人的一三師
雲南	八派、炮派
浙江	紅暴，聯總，杭州紅一司、寧波工聯，寧波工自聯，寧波紅革造總
軍隊	三軍沖派

16.3 參加群眾組織的比例

在 1,670 名有效受訪者中，參加群眾組織的情況可以用下表來總結：

表 16.5 受訪者參加群眾組織的情況

類別	參加組織的情況	人數	百分比
1	未參加過任何群眾組織	703	42%
2	文革初期參加過保守組織，後來未參加群眾造反組織	82	5%
3	文革初期未參加過保守組織，後來參加群眾造反組織	767	46%
4	文革初期參加過保守組織，後來又參加群眾造反組織	118	7%
合計		1,670	100%

由於本章的研究重點是民眾參加文革群眾組織的情況，我們並不區分受訪者參加的是保守派組織還是造反派組織。因此表 16.2 中第 2、3、4 類的受訪者，均視為參加過群眾組織（967 人）。只有第 1 類 703 人（占總數的 42%）從未參加過群眾組織。換言之，調查中約有 58% 的受訪者在文革中參加了群眾組織。下表是性別與參加群眾組織的關係：

表 16.6 性別與參加群眾組織的關係

性別	參加組織情況		受訪者人數
	否	是	
女	221（49%）	231（51%）	452（27%）
男	480（40%）	724（60%）	1,204（73%）
合計	701	955	1,656 ^[249]

如上表所示，女性參加本次調查的人數明顯少於男性，只占總數的約四分之一（27%）。女性參加組織的比例是 51%，相對於男性（60%），女性似乎沒有男性的積極性高。性別在參與群眾組織比例上差異，在統計學上有顯著意義（ $\chi^2=72.4$ ， $L^2=72.4$ ，自由度=1， $P<0.0001$ ）。受訪者的職業與參加群眾組織的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 16.7 受訪者職業與參加群眾組織的情況

受訪者的職業	未參加群眾組	參加過群眾組	人數
--------	--------	--------	----

	織	織	
中學生 ^[250]	283 (35%)	517 (65%)	800 (53%)
大學生	73 (31%)	163 (69%)	236 (17%)
工人	52 (46%)	62 (54%)	114 (6%)
知青	47 (46%)	56 (54%)	103 (6%)
農民	95 (71%)	38 (29%)	133 (4%)
幹部、教師、 科員	94 (50%)	94 (50%)	188 (10%)
軍人	10 (67%)	5 (33%)	15 (0.5%)
無業人員	29 (66%)	15 (34%)	44 (1.5%)
其他	20 (54%)	17 (46%)	37 (2%)
合計	703	967	1,670

上表顯示，學生（尤其是大學生）在文革中最積極。中學生和大學生參加群眾組織的人數，分別占學生總體的 65% 和 69%。僅次於學生的是工人和知青，占總數 54% 的工人和知青參加了群眾組織。幹部、教師和科員（以下簡稱“科員”）等參加的人數要少一些，約占總數的一半。農村的群眾運動不如城市普及，所以相對來說農民參與的人數最少，參加組織的只有 29%。軍人中也有些人參與了群眾運動。不同職業之間參與比例的差異，在統計學上有顯著意義（ $\chi^2=95.9$ ， $L^2=96.1$ ，自由度=8， $P<0.0001$ ）。

上表為我們提供了受訪者在文革中參加群眾組織的一些信息，但是還不能直接用來估算民眾參加群眾組織的比例。這是因為，女性參加調查的人數比例嚴重失調（僅占受訪者總數的 27%）。根據 1964 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當時的男女比例是 51.33% 比 48.67%，約為 1.05:1。此外，總體上說，受訪女性參加群眾組織的積極性不如受訪的男性（女性為 51%，低於男性的 60%）。因此上表中各職業的比例被無形中抬高了，沒有真實地反映文革的實際情況。同時全國的群眾運動發展不平衡，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為了能夠更準確地估算民眾在文革中參加群眾組織的比例，我們將受訪者分為兩組。第一組是來自省會城市的受訪者。由於四川的重慶雖然是非省會城市，但在四川文革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我們將該市也列入第一組。符合這一條件的受訪者共有 921 人。第二組包括明確說明具體地方但屬於非省會的受訪者，該組共有 539 人。那些沒有注明具體城市或地專縣的受訪者（210 人）未列入分析。以下是省會城市與非省會城市參加比例的分布以及調整後的估算：

表 16.8 民眾參加群眾組織的估算

	中學生	大學生	工人	職員	知青	農民	其他	人數
	調整前							
省會	66%	70%	55%	61%	—	—	50%	921
非省	63%	56%	61%	42%	56%	28%	36%	539

會								
	調整後							
省會	65%	67%	53%	56%	—	—	40%	—
非省會	57%	45%	56%	43% ^[251]	47%	28%	32%	—

具體的調整計算參見附錄 8。上表顯示，在大城市中參加群眾組織最積極的是大學生，參與率達到 67%。其次是中學生，達到 65%。工人和科員（即幹部、教師和科員）均超過半數。其他類較低，只有 40%。我們可以說，在省會城市（含重慶），平均有超過一半的民眾參加過群眾組織。在非省會城市和農村中，民眾的參與率要低一些。中學生和工人最高，分別達到 57% 和 56%。農民最低，不足三成的農民參加過群眾組織。

受訪者參加群眾組織與家庭出身的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 16.9 受訪者的家庭出身與參加群眾組織的情況

家庭出身	未參加群眾組織	參加群眾組織	人數（占總數 %）
革幹革軍	77（28%）	203（72%）	280（22%）
工人農民	217（46%）	257（54%）	474（28%）
灰五類	197（39%）	309（61%）	506（34%）
黑五類	181（56%）	146（44%）	326（16%）
合計	672	914	1,586 ^[252]

上表顯示，盡管同屬紅五類，革幹革軍子弟參加群眾組織的積極性比工農子弟高得多（72% 對比 54%）。黑五類出身的受訪者參加群眾組織的比例最低（只有 44%）。值得注意的是灰五類出身的受訪者，他們參加組織的比例（61%）高於工農子弟，僅次於革幹革軍子弟。革幹革軍和灰五類出身的受訪者參加組織的比例，超過總體平均值。工農子弟略低於平均值，黑五類大大低於平均值。不同的家庭出身之間參與比例的差異，在統計學上有顯著意義（ $\chi^2=53.2$ ， $L^2=54.1$ ，自由度=3， $P<0.0001$ ）。

受訪者參加群眾組織與本人政治面貌的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 16.10 受訪者的政治面貌與參加群眾組織的情況

本人政治面貌	未參加群眾組織	參加群眾組織	人數
紅類	147（30%）	337（70%）	484（30%）
中等類	426（44%）	537（56%）	963（59%）
黑五類	115（62%）	70（38%）	185（11%）
合計	688（42%）	944（58%）	1,632（100%） ^[253]

如上表所示，受訪者參加群眾組織的積極性與本人政治面貌成遞減關係。紅類的最高，達到 70%；中等類（即一般群眾）的受訪者次之，達 56%；黑五類最低，只有 38%。一方面，可能他們本人並不願意參加群眾組織。另一方面，群眾組織（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對他們均取排斥態度。不同的政治面貌之間參與比例的差異，在統計學上有顯著意義（ $\chi^2=59.6$ ， $L^2=60.2$ ，自由度=2， $P<0.0001$ ）。

在收集的數據中，我們發現家庭出身與本人政治面貌有著明顯的相關關係：

表 16.11 受訪者家庭出身與本人政治面貌的相關關係^[254]

1	2	3	4	5	6
本人政治面貌	紅類出身			灰五類出身	黑五類出身
	革幹軍幹	工農	合計		
紅類（黨團員積極分子）	127（45%）	144（30%）	271（36%）	155（31%）	41（13%）
中等類（一般群眾）	144（52%）	325（69%）	469（62%）	326（66%）	126（39%）
黑五類（地富反壞右）	8（3%）	4（1%）	12（2%）	17（3%）	154（48%）
合計	279	442	752	498	321

上表顯示，36% 的紅五類出身（第 4 列）的受訪者的政治面貌屬於紅類，62% 的紅五類出身的受訪者的政治面貌屬於中等類，只有 2% 的出身紅五類的受訪者在政治面貌方面屬於黑五類。出身灰五類（第 5 列）的大多數是一般群眾（66%），屬於紅類政治面貌的占 31%。成為黑五類的也不多，只有 3%。相比之下，出身黑五類（第 6 列）的受訪者，近一半（48%）本人的政治面貌也屬於黑五類，屬於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的只有 13%。從這個意義上講，血統論是“有根據的”。家庭出身好，本人政治面貌也會好。出身不好的人，則本人政治面貌多半也會屬差類。這一相關性是非常顯著的（ $\chi^2=525.6$ ， $L^2=424.7$ ，自由度=4，

$P < 0.0001$)。當然，這種情況不是由民眾自身造成的，而是由於中共長期推行的階級路線所造成的。

家庭出身事實上是父輩的社會地位，本人政治面貌是子女輩的社會地位。上表部分地反映了中國當時的代間社會流動（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情況。社會流動指的是社會階層體系中不同的地位間的流動。這些地位有的具有優勢，有的相對處於劣勢，為不同地位者提供不同的權益。個人和集團占有或者進入不同權力地位的機會並不均等。政治自由主義哲學認為，出於公平競爭或者依靠不同貢獻和成就獲得不同的地位是合法的。西方學者對由於家庭出身造成個人發展中的影響非常感興趣。隨著社會由前工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社會流動明顯增加。學者們認為，在沒有受到封建主義影響的國家或者沒有經歷過以階級為基礎劃線分層的國家裏，社會流動更加多一些[255]。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社會地位是世襲的。普通民眾很難有升遷的機會，有才能的人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雖然中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使一些讀書人有了點盼頭，但是有幸獲得上升機會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就有了範進中舉這樣的悲劇。受封建社會的影響，文革前的中國仍然是一個阻礙社會流動的社會，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不相同。有關社會流動歷史的研究表明，前蘇聯（在上世紀的 20 至 30 年代）和東歐國家（在上世紀的 40 至 50 年代）均出現過明顯的向上流動的現象。當然，這些向上流動只限於這些國家的初期階段。對上世紀 70 至 80 年代的研究表明，該時期的蘇聯和東歐國家向上流動現象已不復存在。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管理精英開始自我封閉並貴族化了[256]。

教育為進入更好的社會階級並保持較高的社會地位提供了機會，但是社會階層和財富的不平等卻直接影響著人們受教育的機會[257]。在美國，由於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正在進一步擴大，位於社會地位兩端的人們更有可能原地踏步，並無社會流動可言。當時的中國也是如此，特別是位於社會底層的人們（即灰五類和黑五類出身的人們）。

在表 16.10 中，從左上角到右下角的對角線（即表中粗體字的 3 個格子，271，326，154）代表父輩和子女輩處於同樣的社會地位。子女輩保持父輩社會地位的人數，占了總人數的 48 %。處於最低端的兩檔（即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繼承父業的最多，分別占了各自人數的 65% 和 48%。這些人走出父輩的陰影非常困難。

鄰近對角線上方一格，表示子女輩比父輩的社會地位上升了一步（即表中人數分別是 155 和 126 的格子）。鄰近對角線下方一格，表示子女輩比父輩下降了一步（即人數為 469 和 17 的兩個格子）。這兩類情況占了總人數的 49%。剩下的上升或下降兩檔（即人數為 36 和 12 的兩個格子）是少數，僅占總人數的 3%。需要指出的是，本問卷調查中有許多中學生（占總人數的 48%），其中又有許多是初中生。他們中的紅五類子弟，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入黨或入團，成為紅類政治面貌的人員。

本章採用對數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分析性別、家庭出身、本人政治面貌和職業對參加群眾組織的影響（關於對數回歸模型的解釋請參見附錄 5）。也許有讀者會問，既然已經對影響參加群眾組織的各因素逐個分析，為什麼還要用對數回歸模型來分析？這是因為，上面章節討論的各因素與參加組織的關係是孤立靜止的，沒有全面地觀察各因素同時對參加組織的影響。用對數回

歸模型分析可以同時考慮各種因素，獲得對這一問題更全面的理解。以下是對數回歸模型分析結果（N=1,559^[258]）：

表 16.12 受訪者是否參加群眾組織的對數回歸模型分析

變量編號	變量	對數系數	OR 比值比	P 值
X0	截距	-0.2544		0.7811
X1	男性	0.5446	1.724	<0.0001
X2	學生	1.3954	4.037	<0.0001
X3	科員	0.8393	2.315	<0.0001
X4	工農出身	-0.5623	0.570	0.0013
X5	灰五類出身	-0.5089	0.601	0.0028
X6	黑五類出身	-0.7588	0.469	0.0002
X7	中等類政治面貌	-0.5378	0.584	<0.0001
X8	黑五類政治面貌	-0.8750	0.417	0.0001

OR（Odds Ratio）常譯為比值比（也譯為優勢比）。這是描述概率的另一種方式，告訴我們相對於參考類，某種推測的概率比其反向推測的概率大多少（更詳細的解釋請參見附錄 5）。簡單地說，如果比值比大於 1 則表示概率大，超過 1 越多概率越大。比值比小於 1 則表示概率小，越接近零表示概率越小。例如上表顯示，男性是 1.724，就是說，相對於女性，男性參加運動的積極性要高些。這一點從本次問卷調查的情況也可以看出。參與調查的男性比女性的人數多許多，似乎中國的女性對政治感興趣的要少於男性。

關於性別，只有兩種情況：男性或女性。我們在計算中把女性作為參考類，比值比計算比較方便和直觀。但是在許多情況下，一個變量會有兩個以上的數值。如政治面貌有 3 類人：紅類、中等類和黑類。通常的做法是任意選擇其中的一類作為參考類，與其他類進行逐個比較。如上表中，紅類政治面貌被選作為參考類，逐個與中等類和黑類進行比較。相對於紅類政治面貌，中等政治面貌的受訪者參加文革群眾組織的可能性較小些（比值比是 0.584），屬於黑五類的人員則更少（比值比是 0.417）。這一發現符合常理。文革中本人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參加群眾組織的並不多。一則是因為他們自己不敢參加，二則是因為即使他們想參加，造反派和保守派組織也會將他們拒之門外，生怕被對手抓住把柄^[259]。

文革期間（尤其是文革初期），學生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廣大學生積極投入文革的群眾運動，他們的革命熱情是有目共睹的。學生在群眾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們將人群的職業分為三大類：（1）學生；（2）工人／科員／知青^[260]；（3）其他，並將其他作為參考類。相對於其他類，學生最具有革命熱情（比值比是 4.037），工人／科員／知青次之（比值比是 2.315）。這就是說，如果其他情況不變，假設其他民眾參加與不參加群眾組織的比是 2:5，那麼學生參加與不參加之比約為 8:5；工人／科員／知青的參加與不參加比是 4.6:5。

家庭出身有 4 類：革命家庭（即革幹革軍家庭），工農家庭，灰五類家庭和黑五類家庭。我們選擇革命家庭作為參考類。相對於革命家庭出身的受訪者，灰五類子弟參加群眾組織的概率次之（比值比是 0.601），工農子弟又稍次之（比值比是 0.570），黑五類子弟則更低（比值比是 0.468）。假設革幹革軍子弟參加與不參加群眾組織之比是 6 比 4 的話，推測黑五類子弟參加與不參加之比約是 2.8 比 4。值得注意的是，灰五類子弟比紅五類中工農子弟參加群眾組織的積極性稍高一些，也許灰五類對於改善自身狀況的迫切性更高一些。

我們採用的對數回歸模型是線性的。換言之，這些因素是線性疊加的關系。舉例來說，如果有一位男性學生和一位女性工人，男性學生參加群眾組織的可能比那位女性工人的可能要大得多。這是因為，不僅男性比女性參加的可能大，而且學生比其他職業的人可能也大。這是一個雙重的關系。由於具體計算較複雜，此處不贅，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本書的附錄 5。

總之，男性、學生、革幹革軍子弟、紅類政治面貌的更容易參加群眾組織。黑五類子弟和黑五類政治面貌的人參加群眾組織的可能最低。

16.4 參加群眾組織的原因

前一小節分析受訪者參加群眾組織的情況，接下來的問題是，受訪者為什麼參加群眾組織，他們的動機是什麼，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投入到文革的群眾運動中去？這分析需要通過那些參加過群眾組織的受訪者。我們的問卷調查，符合這一條件的有 967 位受訪者。以下是幾個原因與家庭出身關系的情況。因有 53 人未填寫家庭出身，因此下表的總人數為 914 人。

表 16.13 受訪者參加群眾組織的原因與家庭出身關系

變量	原因		革幹革軍 (203) [261]	工農 (257)	灰五類 (309)	黑五類 (145)	χ^2 P 值
Y1	響應毛號召	是	77%	68%	61%	43%	<0.0001
		否	23%	32%	39%	57%	
Y2	爭取改變處境 [262]	是	6%	11%	19%	34%	<0.0001
		否	94%	89%	81%	66%	
Y3	對當權派不滿	是	4%	12%	12%	17%	0.0027
		否	96%	88%	88%	83%	
Y4	同情受打壓者	是	7%	12%	19%	20%	0.0005
		否	93%	88%	81%	80%	
Y5	受周圍影響	是	12%	18%	17%	19%	0.3270
		否	88%	82%	83%	81%	
Y6	好玩	是	0%	1%	1%	1%	0.5137
		否	100%	99%	99%	99%	
Y7	其他原因	是	2%	2%	2%	3%	0.9514
		否	98%	98%	98%	97%	
Y8	不滿 / 爭	是	9%	18%	27%	40%	<0.0001

取 改 變	否	91%	82%	73%	60%
[263]					

問卷調查在關於參加群眾組織問題上採用多項選擇，受訪者可以同時選擇多個原因，所以原因 8（Y8 對當權派不滿和 / 或爭取改變）的人數小於或等於原因 2（Y2）與原因 3（Y3）的總和。上表顯示，革幹革軍子弟參加群眾組織的主要原因是響應毛的號召。在這一原因上，按照革幹革軍、工農、灰五類、黑五類出身順序，呈現依次遞減的關係：77%、68%、61%、43%。

但是在對當權派不滿（Y2），爭取改善處境（Y3），以及兩者之和（Y8），則呈現反向的遞增關係。爭取改善處境（Y2）的比例分別是：6%，11%，19%，34%。對當權派不滿（Y3），則依次為4%，12%，12%，17%。兩者合一的原因（Y8），依次為9%，18%，27%，40%。同情受打壓者的原因（Y4），也呈現相同的上升趨勢。作為受傷害最重的黑五類子弟有切身體會，他們同病相憐，對受打壓者最具有同情心。他們參加組織不僅為自己，也為了幫助與自己一樣的受迫害者。

統計檢驗結果拒絕以下變量的零假設：響應毛的號召（Y1），爭取改善處境（Y2），對當權派不滿（Y3），同情受打壓者（Y4），不滿和 / 或爭取改變（Y8）。換言之，在這幾個原因方面，家庭出身之間的差別是顯著的（P 值均小於 0.01，有的甚至小於 0.0001）。但是在受周圍影響（Y5）、好玩（Y6）、其他原因（Y7）上，家庭出身未顯示出明顯的作用。

以下是幾個原因與本人政治面貌的關係。因有 23 人未填寫本人政治面貌，因此下表的總人數為 944 人。

表 16.14 受訪者參加群眾組織的原因與本人政治面貌關係

變量	原因		紅類 (337)	中等類 (537)	黑五類 (70)	χ^2 P 值
Y1	響應毛 號召	是	69%	62%	43%	0.0002
		否	31%	38%	57%	
Y2	爭取改 變處境	是	14%	15%	39%	<0.0001
		否	86%	85%	61%	
Y3	對當權 派不滿	是	10%	12%	13%	0.5516
		否	90%	88%	87%	
Y4	同情受 打壓者	是	13%	14%	23%	0.1013
		否	87%	86%	77%	
Y5	受周圍 影響	是	13%	19%	21%	0.0574
		否	87%	81%	79%	
Y6	好玩	是	0%	1%	1%	0.4455
		否	100%	99%	99%	
Y7	其他原 因	是	1%	2%	3%	0.5840
		否	99%	98%	97%	

如上表所示，紅五類和中等類政治面貌的人們參加群眾組織以響應毛的號召（Y1）為主，紅五類、中等類、黑五類依次為69%，62%，43%。在爭取改變處境（Y2）問題上，依次為14%，15%，39%。顯然，黑五類對於改善自身處境最為迫切。對當權派不滿（Y3），同情受打擊者（Y4），受周圍影響（Y5）、好玩（Y6）和其他原因（Y7），似乎不分紅五類、中等類或黑五類，他們之間的差別並不大。由於本人政治面貌與對當權派不滿沒有明顯關係，所以沒有把不滿與爭取改變處境合起來作為一個綜合原因進行分析。

統計檢驗結果拒絕以下變量的零假設：響應毛的號召（Y1），改善處境（Y2）。也就是說，在這兩個原因方面，政治面貌之間的差別是顯著的（P值至少小於0.001）。在對當權派不滿（Y3）、同情受打壓者（Y4）、受周圍影響（Y5）、好玩（Y6）、其他原因（Y7）方面，政治面貌未顯示出明顯的差別。

我們對上述的幾個原因，分別用對數回歸模型進行分析。由於“好玩”（Y6）參加群眾組織的人數太少，我們就不作分析。在分析模型中，因變量分別是7個原因（Y1至Y5，Y7，Y8），自變量是家庭出身、本人政治面貌、性別和職業^[264]。為方便起見，以下表中只列出P值小於或等於0.20的自變量。因為P值過大的自變量，在統計學上一般認為推測不太可靠。

表 16.15 受訪者參加群眾組織原因對數回歸分析模型結果

應變量	參加組織的原因	自變量	指數系數	OR 值	P 值
Y1	響應毛的號召	工農家庭	-0.3654	0.694	0.1014
		灰五類出身	-0.7444	0.475	0.0004
		黑五類出身	-1.4053	0.245	<0.0001
		中等政治面貌	-0.2846	0.752	0.0696
Y2	爭取改變處境	男性	0.5890	1.802	0.0205
		工農家庭	0.5043	1.656	0.1675
		灰五類出身	1.2286	3.417	0.0002
		黑五類出身	1.7512	5.762	<0.0001
Y3	對當權派不滿	學生	-0.6364	0.529	0.1179
		工農出身	0.8178	2.266	0.0413
		灰五類出身	0.9385	2.556	0.0159
		黑五類出身	1.4279	4.170	0.0013
Y4	同情受打壓者	學生	1.3151	3.725	0.0320
		工農出身	0.6725	1.959	0.0460
		灰五類出身	1.1190	3.062	0.0003
		黑五類出身	1.0301	2.801	0.0080

		黑類政治面貌	0.5473	1.729	0.1835
Y5	受周圍影響	中等政治面貌	0.4367	1.548	0.0348
		黑類政治面貌	0.7670	2.153	0.0722
Y7	其他原因	—	—	—	—
Y8	不滿 / 爭取改變	男性	0.4871	1.628	0.0237
		學生	-0.6114	0.543	0.0610
		工農家庭	0.4742	1.607	0.1141
		灰五類出身	1.1837	3.266	<0.0001
		黑五類出身	1.6382	5.146	<0.0001

上表顯示，本人政治面貌在有的分析模型中影響不明顯（Y1、Y2、Y3、Y4、Y8）。這是因為，由於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有極為密切的相關性（統計學中叫做多重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當它們同時進入一個模型時會產生幹擾，使得其中的一個自變量變得似乎無足輕重。例如在單個分析時，本人政治面貌對於響應毛的號召和爭取改變處境的因變量均呈顯著相關關係。但是當該變量與家庭出身同時放入模型時，作用卻不明顯了。這是多重共線性造成的結果。因為這一現象涉及較深的統計理論，此處不贅，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附錄 5 的解釋。在解釋上述對數回歸模型時，需注意這一情況：本人政治面貌並不是不起作用，而是因為家庭出身已足以解釋它們之間的區別。

對於響應毛的號召這一原因（Y1），工農子弟、灰五類子弟和黑五類子弟與革幹革軍子弟是有差異的。出身越是不好，對響應號召的反應越低（估算的比值比分別是 0.694，0.475，0.245）。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黑五類子弟響應毛的號召與非響應毛的號召之比，僅為革幹革軍子弟之比的四分之一左右。

在爭取改變處境的原因（Y2）方面，工農、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顯示出與革幹革軍子弟的明顯不同（估算的比值比分別是 1.656，3.417，5.762）。尤其是黑五類子弟，他們爭取改變與非改變處境之比，是革幹革軍子弟之比的近 6 倍。這一結果突顯出身不好的人群要求改善自身處境的強烈願望。相對於女性，男性顯示了更強烈的爭取改善自身處境的願望（估算的比值比是 1.802）。

在對當權派不滿方面（Y3），工農子弟、灰五類子弟和黑五類子弟因對當權派不滿參加組織與非因對當權派不滿參加組織之比，至少是革幹革軍子弟之比的 2 倍以上，黑五類子弟則更高達到 4 倍多（比值比分別為 2.266，2.556，4.170）。革幹革軍子弟的大多數成為“保爹保媽派”，在這裏得到證實。他們對當權派不滿的程度，明顯小於其他出身的受訪者。

在同情受打壓者方面（Y4），相對於革幹革軍子弟，工農、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比值比分別為 1.959，3.062，2.801。灰五類和黑五類由於同病相憐，憤而參加群眾組織造反的比例，要比紅五類高得多。本身是黑五類的受訪者，因同情受壓者參加群眾組織的傾向也較明顯（比值比是 1.729）。這裏要特別提一下學生。在同情受壓者方面，學生比其他職業者顯得態度更加鮮明，行為更加激

烈，比值比達到近 4 倍。由此可見，學生因為年輕，更富有同情心，也更加仗義。

在對當權派不滿和 / 或爭取改善處境方面（Y8），工農、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在這個問題上比革幹革軍子弟更迫切，估算的比值比分別是 1.607，3.266，5.146。男性比女性更加迫切，比值比是 1.6 倍多。學生缺乏因不滿希望改善自身處境的熱情，估算的比值比是 0.543。因為學生還沒有步入社會，他們對自身的處境和當權派的官僚主義、搞特權、壓制群眾尚無切身的感受。他們投入群眾運動，更多的是革命熱情。

在受周圍環境影響方面（Y5），相對於紅五類政治面貌，灰五類和黑五類的估算比值比分別是 1.729，1.548。這一情況顯示了灰五類和黑五類政治面貌的受訪者參加群眾運動時的狀況。由於自身的政治面貌不容樂觀，他們需要外界的鼓動和消除恐懼。當周圍參加群眾組織的人多時，他們會有“法不責眾”和“抱團取暖”的想法，恐懼減少，勇氣增加。

歸納起來，因對當權派不滿和 / 或爭取改善自身處境參加群眾組織，相對於革幹革軍出身的受訪者來說，工農子弟、灰五類子弟和黑五類子弟的比值比呈現依次遞增。這說明，民眾參加群眾運動，除了我們通常講的響應毛的號召外，還另有原因。這些原因與個人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性別和職業有著密切的關係。忽略這一情況，我們就不能正確地理解文革的群眾運動。

16.5 民眾參加群眾組織的原因分析

從上一節對民眾參加群眾組織的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窺見當時中國社會的一斑。在響應毛的號召方面，革幹革軍子弟尤其多，工農子弟、灰五類子弟和黑五類子弟依次遞減。在爭取改變處境和 / 或不滿當權派方面，卻是朝相反方向依次遞增。這看似不同，實質上卻是一回事，即都與自身的處境有關。作為紅五類子弟，特別是革幹革軍子弟，是共產主義事業的當然接班人。他們只要聽從黨和毛的號召，前途是有保障的。通過曆來的運動，人們明白這是鐵定的規律。所以響應毛的號召只是表面的原因，實際上與紅五類的前途密切相關。當然，是否響應毛和黨的號召，也與灰五類、黑五類的前途命運相關。如果他們膽敢與黨和毛唱反調，下場是可想而知的。所以這些人也需要打著響應毛的號召的旗號，或主動或被動地順應當時的潮流。民眾的心裏是清楚的，他們不能在文革中被曆史的列車甩出車外。

對於爭取改變處境這一目的動機，紅五類子弟可能不屑一顧。也許他們會認為，出於這樣的動機參加群眾組織未免太自私了。但是對於非紅五類子弟來說，這是非常實際的目的。文革前的 17 年裏，中共執行的階級路線把灰五類和黑五類劃為二等公民。他們在升學、就業、提幹、事業發展和生活等各方面受盡歧視。文革的發動，使他們看到從未有的機會。他們帶著這一目的積極投入文革，希望能在文革中打個翻身仗。紅衛兵第二號領袖蒯大富的“三十六條權經”，最後一條道出了造反群眾當時的心態：“得到政權後就得運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猶豫，正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265]

所以，響應毛的號召是紅五類子弟的一種積極防守性的心態和舉動，目標是保住他們已有的特權和益處。爭取改變處境，則是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的一種積

極進攻型的心態與舉動，旨在爭取獲得自己以前沒有的權力和益處。兩種心態與舉動只是從不同側面展現相同的動機，殊途同歸。

從受訪者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可以看到當時的中國分裂成為兩大陣營：紅色陣營和非紅色陣營。在紅色陣營裏，有革幹革軍子弟、工農子弟、黨團員積極分子以及中共的各級幹部等。在非紅陣營中，有黑五類子弟、灰五類子弟和本人是黑五類或灰五類的人們，以及被淘汰下來的原來屬於紅色陣營中的少數人們。

即使在同一陣營裏，還有更細化的分層（Strata）。紅色陣營中，還可細分為革幹革軍子弟、中共的幹部、黨團積極分子、工農子弟等不同的階層。在非紅陣營中，最為底層的是本人屬於黑五類的人們，其次是黑五類子弟，再其次是灰五類等階層。社會階層（或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是社會學的一個概念。它指的是一種依照不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狀況，將人們區分為不同群體的分類方式。它牽涉一系列關係性的社會不平等，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和意識型態等方面。

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中國不僅以階級劃線，還存在著不同的階層。社會階層的歸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在文革中的思想和行為。如前所示，越是處於底層的人們，越具有改變自身處境的願望。處在上層的人們，則力圖保住已有的地位和特權。在文革初期，革幹革軍子弟把鬥爭的對象鎖定在黑五類，正是一種力保已有地位的表現。當這些人的爹媽被打成走資派成為革命的對象以後，他們力圖反抗，不再聽從毛的號召，轉而成為保爹保媽派。當他們的努力失敗後，許多人成了逍遙派（在以後的章節會專門討論這一問題）。

處在下層和底層的民眾，將鬥爭的矛頭對准他們往日所憎恨而又懼怕的走資派，美其名曰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的目的非常清楚，希望通過文革打倒過去整肅過自己的當權派，奪取他們手中的權力，從而改變自己二等公民的處境。在憎恨當權派方面，相對於紅五類子弟，工農子弟、灰五類子弟和黑五類子弟依次遞增，比值比分別是 2.3，2.6 和 4.2，足見黑五類子弟對當權派的痛恨程度。

總之，無論民眾參加的是哪個派別，都是為了改變自身的處境而戰，或者為了保持自身的處境而爭。

16.6 民眾如何被動員起來

前面章節討論民眾為什麼動員的問題，現在研究民眾在文革中是如何動員起來的。福柯（Foucault）的關於話語（Discourse）和權力（Power）的概念，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社會運動的新視角，從而避免使用過於簡單化的理性人概念。從這一新的視角，我們可以研究抗議的非策略性方面，例如社會運動參與者（或潛在的參與者）的主觀先決條件和世界觀。相對於主流的社會運動研究，福柯更注重社會運動背景的各個方面。在可以想象的範圍內，我們可以分析社會運動的構框。對構框的共鳴不僅取決於文化因素，還取決於場所和演講者的作用。運動能夠影響話語的限制範圍，通過促進建立主流話語中沒有出現的或者是與主流話語敵對的思想，還可以通過運動實踐建立新的觀念。話語還塑造人的主觀意識。用福柯的話來說，話語能夠塑造個人與話語的關係，從而影響潛在的社會運動的動員。一個社會運動要想成功，它的構框必須在文化上產生共鳴，與主流構框相適應^[266]。

社會運動的研究，很長一段時間注重構框和建立群體行為的框架，從而使運動能夠發現不滿、招募運動成員並組織群體行為^[267]。近期的社會運動注意到情緒共鳴在促進構框有效性方面的重要性。這是因為，群體構框不僅需要組織得緊密，混然一體，還需要能夠刺激民眾參與行動，造成團結的感覺，幫助排除恐懼心理^[268]。

本節在研究文革中民眾是如何被動員起來時，試圖從構框和構框共鳴的視角來分析。因為大躍進的失敗，毛在黨內與高層領導人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下層的普通民眾對此一無所知。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發生在中國頂尖的大學裏，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毛看到了這張大字報的潛力。這張大字報的批評，遠比此前新聞媒體上的批判更有威力。毛立即下令在1966年6月1日晚廣播這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看似有點偶然，其實毛早就為紅衛兵運動的構框進行了鋪墊。即使沒有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也會有其他人的大字報或者事件被毛選中，作為發動紅衛兵運動的工具。毛不僅發表給紅衛兵的信，還派出中央文革成員促進大字報的普及，以便使廣大的民眾吸收消化。

文革前開始的造神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林彪通過軍隊搞的那一套迅速擴散到全國各地，觸發了激進的紅衛兵運動。紅衛兵們急於表現對毛的忠誠，向一切不利於毛澤東思想的事物和現象開戰，這就為創建新的話語開啟了大門。紅衛兵和造反群眾利用具有魅力的領袖話語，為他們自己的構框和造勢提供了合法性^[269]。群眾運動的積極分子們把毛的話語充填到他們的構框中，成功地把毛的權威和威望轉換成他們發動民眾、壯大自己隊伍的有力工具^[270]。

例如以黨言川為領袖的河南紅衛兵組織，接過毛的打擊走資派的號召，向河南的民眾發出呼籲：多少年來，河南省搞得很不像樣子，五千萬河南人民被窮白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把根子挖出來！他們成立了一個專門的戰鬥隊，並派人專程赴廣州去，揪回原河南省第一書記吳芝圃。他們在河南的省會鄭州市召開大會，指控省委領導是曆史反革命，因為河南大搞浮誇風，造成數十萬人餓死的悲劇。黨言川等人的構框非常成功。他們利用曆史悲劇和毛的打擊走資派的號召，實現了一呼百應的效果。他們的構框，在廣大河南民眾中引起強烈的共鳴。民眾們紛紛站出來，投入到批鬥省委領導的洪流中去。河南省的群眾運動，是以黨言川揭批原河南省委在1958至1961年間大搞“左”傾蠻幹的錯誤政策開始的。這是文革中一個典型的成功構框引起巨大共鳴的案例。

南京的“王金事件”也是一例。南京外國語學校的老紅衛兵無故打死工人王金，死訊傳到王金生前的單位，同事們憤怒了，立即貼出“強烈抗議南京外國語學校的學生打死工人”的大字報。一夜之間，全城的大街小巷布滿大字報和大標語，引起全城巨大的震動。他們迅速成立有40多個單位的工人和紅衛兵參加的聯合調查團。調查團派人四處請願告狀，在本市和周邊城市大造輿論，組織集會，抗議紅衛兵的暴行。工人們沖破校門，湧進學校並占領禮堂，召開大會，要求懲辦凶手。工人們的造反行動得到全市民眾的同情和支持。南京曾是中華民國的首府和國民黨的老巢。國民黨敗退臺灣時，百姓並沒有撤離，這一強大的社會基礎保留了下來。同時，南京地區過去比較富裕，中共建政後生活並沒有得到太大的改善，民眾心中存在不滿。盡管當局想方設法平息民眾的憤怒，但造反的工人不依不饒，堅持必須嚴懲凶手。工人們非常策略地避開某些不利於引起共鳴的方

面，沒有把矛頭指向紅衛兵全體，而是突出打擊少數涉事的紅衛兵。工人們聲稱，廣大紅衛兵是好的。這樣做，使得他們得到部分紅衛兵（包括南京外國語學校內的部分紅衛兵）的支持，變可能的反對力量為友軍。更重要的是，工人們把矛頭對准當權派和走資派。他們接過毛提出的打擊走資派的號召，用以實現自己的最終目的。他們牽強附會地說，走資派才是真正的凶手，把禍水引向本已搖搖欲墜的省市委領導。他們的口號非常巧妙：“殺人償命”是任何國度和任何制度都說得通的要求，這一要求引起一大批對現實制度不滿的人們的強烈共鳴，形成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抗議運動終於以造反群眾的暫時勝利告終。這一單獨存在，為期5個月的群眾運動，在文革中極為罕見，有著特殊的意義。

對構框的共鳴還取決於演講者的口才。文革中造反群眾人才濟濟，不乏雄辯之人。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就是一位傑出的辯論家^[271]。1966年6月9日，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6月16日，蒯大富等人貼出大字報，批評工作組的方向問題。6月23日，蒯大富因為王光美未踐約參加座談會，卻派了個助手來摸情況，大為不滿，貼了大字報。24日凌晨2點左右，工作組把一些可靠的同學從床上叫起，讓他們趕寫圍攻蒯大富的大字報。很快，以工化系為主的反蒯鬥爭開始了。工作組把清華大學文革的鬥爭方向指向蒯大富，把蒯大富罵成“牛鬼蛇神”和“反革命”。

工作組讓賀鵬飛出面，組織全校大辯論。6月24號，清華大學的學生們把沒有空調的禮堂裏面擠得滿滿的，樓上樓下全是人。本來只能容1,700多人的禮堂，至少擠進了2,000多人。晚7點半，辯論開始，王光美親自拿著話筒坐鎮。有工作組撐腰的賀鵬飛一派以勢壓人，想把蒯大富他們嚇倒。他們上來就說：蒯大富，你總貼大字報，攪亂文化大革命秩序，把矛頭指向我們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新市委是我們黨中央剛剛任命的，工作組是新市委直接派來的，是代表黨的。你這樣處處與工作組為難，是什麼意思？

蒯大富應聲做第一次發言。蒯首先念一段毛主席語錄：“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蒯繼續說道，我們自己認為，我們是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我們要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事情，對任何一個可疑的事情都要追查到底。王光美同志來我校，這已是不小的事情，而且她要參加某個具體班級的討論。我們認為根本不是簡單的事情。我們不知道是誰使用了偷梁換柱之計，竟對王光美同志也來了個冒名頂替。這個人是誰？抱著什麼目的？這個難道只是政治上的不嚴肅嗎？這難道只是對領導同志的侮辱嗎？我們認為這裏可能有陰謀。

王光美在後臺氣極了，說蒯大富簡直是頂級的打著紅旗反紅旗，一定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賀鵬飛又上來發言。他說：很多同志質問蒯大富，為什麼在大字報上不提王光美同志可能來也可能不來這一重要事實？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想達到什麼目的？

參加辯論會的學生當時並沒有派性，都是沖著真相而來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認為蒯大富的話不是沒有道理啊。你說王光美要到蒯的班上來聽取對工作組的意見，不來又不解釋原因，這不是搞欺騙嗎？學生們要求工作組解釋這個問題。

蒯大富上臺做了第二次發言。他說，我們要求解決的問題非常簡單，就是要求解釋清楚這個問題。我們的這個要求不合理嗎？聽眾們嘩啦啦地全鼓掌了。從

那個時候開始，只要蒯大富一上臺學生們就鼓掌。只要賀鵬飛他們一上臺，學生們就跺腳說下去！賀鵬飛他們無話可說，工作組的人上臺做解釋。

蒯大富做第三次發言。他說，他們從來沒有說過這是一個大陰謀。剛才工作組的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工作組只好讓副組長楊天放上臺來解釋，他是林業部副部長。楊天放說，他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代表黨中央的。蒯大富企圖奪工作組的權，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楊天放的話有點莫名其妙，答非所問，同學們又把他轟下去了。不得已，工作組的周赤萍上臺發言，他是國家經委副主任。周赤萍上來說，他們都是長征過來的老紅軍，跟著黨走了多少年。他們是黨培養的幹部，現在受黨的委托，到這裏領導清華大學的文革。可是有蒯大富這樣的少數人，處處和工作組為難，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工作組實在沒有人才。周赤萍這樣大講光榮經歷，與當時的辯論風馬牛不相及，他也被學生趕下了臺。最後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國家計委副主任葉林出場了。葉林本來不想出面的，可是不出面無法收場。葉林有點抖索，是因為激動、生氣還是害怕，不得而知。他知道自己壓不住陣了，念了一段《人民日報》的社論，講了幾句空話，毫無效果。

蒯大富做第四次發言。他對工作組的大方向提出質疑，提出判斷工作組的大方向是否有錯，需要全校同學來證明。有些學校的工作組已經證明有問題，撤走了。工作組說是毛主席派來的，他們代表黨中央。誰能代表黨呢？只有黨中央。誰能代表毛澤東思想呢？只有黨中央能代表。工作組只是新市委下面的一個辦事機構，我們不承認你代表黨。關於王光美到班級聽取匯報的事，如果工作組解釋不清楚，我們不會放過這個問題。

學生們在下面鼓掌，根本就不把工作組當回事。辯論進行了4個小時，以蒯大富的勝利告終。沈如槐在《清華大學文革紀事》^[272]一書中寫道：工作組的做法不僅沒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卻激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反感，同學們紛紛貼大字報反對工作組。……我們班一共30人，有26人貼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足見工作組在辯論會上的表現多麼拙劣，多麼不得人心。

這一次辯論使蒯大富贏得了人心，為他日後成為中國的第二號紅衛兵領袖奠定了基礎。在辯論中，蒯大富並沒充分展示出他的辯才，只是因為他的對手實在太愚蠢，成全了蒯大富。其實問題原本很簡單。王光美沒有按原先計劃參加會議，認一個錯或道個歉就可以完事的，卻因為放不下面子，把事情搞砸了。

蒯大富不僅有辯才，而且還有令人佩服的勇氣和氣魄。辯論會後，工作組把700多名學生或其他人員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或“蒯氏人物”等等。校園內還發生數起自殺事件以及自殺未遂事件。蒯大富忠實的追隨者樊思清回憶道^[273]：

7月6日，蒯大富寫出《向黨、向全校革命師生承認和檢討錯誤》的這一天，我已經被我班的工作組作為重點學生，由我班上的兩位同學“陪伴”著到大禮堂去聽蒯大富作檢查。會議開始，鮑長康、劉泉先認錯了。之後，絕食多天的蒯大富病懨懨地出場。從蒯“假裝要檢討”到“當場反口”的那一時刻，我的第六感官告訴我：重點學生們的呼吸和表情明顯發生了“同步共振感應”。

正是這一天聽蒯大富假借檢查之機，行控訴和反擊之實，才開了我的眼界，當場就對蒯的精神佩服之至，有極大的崇拜感！這一天幾乎完全決定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以至於整個這一生的命運。估計去大禮堂的重點學生都受到了被蒯大富鼓舞的反向教育。過去佩服右派分子不如今天佩服蒯大富。我沒有說出來，但已潛入我的思想。

在工作組的重壓下，曾經支持蒯大富的人全都被迫作檢查，承認犯了錯誤，作出戰略性退卻。而蒯大富死守陣地，孤軍奮戰，以一當萬。正是由於蒯大富具有過人的辯才和勇氣，日後他成功地動員清華大學的許多學生乃至全國的許多紅衛兵，成為他的忠實追隨者。蒯大富成為文革中叱吒風雲的紅衛兵領袖決非偶然，辯論會和大字報是幫助文革群眾運動領袖號召、動員民眾的最有力的工具。

第十七章 省級群眾組織的分類

當人們談論文革的群眾組織或派別時，常會使用“造反派”和“保守派”這兩個名稱。這是文革中群眾組織最常見的兩個類別。對於群眾組織派別的分類，不少學者有過研究。如周倫佐將紅衛兵分為“保守紅衛兵”和“造反紅衛兵”。三年大饑荒以後，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有所調整，大學和中學裏那些品學兼優但曆來遭受等級歧視的灰五類子女逐漸受到重視。這就使得缺乏文化根基的紅五類子弟深感憤怒，認為自己在學校裏的特權受到了侵犯。文革的發動給他們帶來機會，他們的鬥爭鋒芒指向誰就不難想象了。這些保守紅衛兵的鬥爭目標可以歸納為：教育路線、四舊、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他們大搞血統論，以家庭成份劃線，大搞紅色恐怖。他們的背後有各級黨委的支持。真正意義上的造反紅衛兵的出現，是1966年8月4日周恩來親自到清華大學為蒯大富平反，並推薦蒯擔任清華大學造反組織司令為正式標志。但是這些造反紅衛兵開始時普遍處於被壓制、打擊和圍攻的少數派地位。各地的黨委組織號召保守的學生、工人和機關幹部出面，圍攻、批鬥和打擊造反紅衛兵。到了1966年10月，這些造反紅衛兵才在毛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開始支配運動的局勢。造反紅衛兵的成員主要是灰五類的子女，他們的造反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274]。

徐友漁認為，紅衛兵組織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區別是它們分為保守派和造反派。當北京的第一批紅衛兵（即老紅衛兵）發現毛的意圖並非要他們造牛鬼蛇神的反，而是造走資派（即他們父輩）的反時，他們不幹了，當起了“保爹保媽派”。在外地，各級黨委操控紅衛兵打擊其他學生造反。毛和中央文革不得不改弦易轍，倚重被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以及被老紅衛兵的血統論排斥的灰五類學生。於是保守派和造反派壁壘分明，誓不兩立^[275]。

印紅標提出，應該對紅衛兵的概念做出細致分析。他在《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一文中指出，紅衛兵有許多整體特征。聚集在紅衛兵大旗之下的，並非始終如一的統一整體，而是具有不同思想和行為傾向、互相矛盾和沖突的派別。他把紅衛兵細分為老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極左派等不同的群體，並對其中具有鮮明政治個性和突出思想特征，先後在紅衛兵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進行分析^[276]。

董國強對造反派的概念提出幾點重要的限定，即時間限定（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社會身份限定（學生、工人、農民、其他社會底層民眾和一部分中下層機關幹部），政治傾向限定（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奉旨造反）和軍地限定（主要指地方）^[277]。

陳益南提出的造反派定義是：那些對17年來體制的某些方面不滿、文革初曾被官僚傷害或者對受害者極感不平，借文革之機反抗但又接受當時官方政治意識形態的人們。造反派有兩個特征，一是反抗與批判地方官僚集團，二是依然接受當時的官方政治意識形態^[278]。

張光渝定義的造反派是，響應文革號召，以奪權為目的，發起或參加群眾造反組織並在其中擔任一定職務，在有影響有代表性的造反活動中起骨幹作用的人^[279]。周倫佐對造反派的定義是：凡受壓而反者為造反派。這些人多少對個人處境和社會現實感到不滿，不太喜歡用階級出身標準看人，用階級鬥爭觀點看事，用階級分析方法看書^[280]。何蜀認為，一般所說的造反派，主要是指出現於1966年秋冬至1968年秋冬期間的造反派群眾組織。這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動最具代表性的時期^[281]。

盡管以前對群眾組織的派別分類有不少研究，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對全國各省級群眾組織的派別進行系統性的分類。由於派別存在不同的類型，派別鬥爭分屬不同的性質，研究結果莫衷一是也就在預料之中。本章試圖先從最基礎的工作開始，對全國各省的群眾組織進行系統的、客觀的和定量的分類，然後再討論派別鬥爭的有關問題。

17.1 各省級群眾組織派別

文革中各省級的群眾組織可以歸納如下表：

表17.1 各省級群眾組織派別一覽表

編號	省份	派別簡稱	組織派別全稱/主要成員/名稱來源	類別 ^[282]
X1	安徽	安徽好派	安徽一.二六奪權好得很	激
X2	安徽	安徽P派	安徽一.二六奪權好個屁	溫

編號	省份	派別簡稱	組織派別全稱/主要成員/名稱來源	類別 [282]
X3	北京	北京天派	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為首	激
X4	北京	北京地派	以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為首	激
X5	北京	新北大公社 [283]	新北大公社	激
X6	北京	新北大公社井岡山	新北大公社井岡山	溫
X7	北京	清華大學團派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激
X8	北京	清華大學四派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	溫
X9	福建	福建八.二九	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溫
X10	福建	福建革造會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員會	激
X11	福建	福建四.二零革造會	福建省四.二零革命造反委員會	激
X12	甘肅	甘肅紅三司	甘肅省紅色造反派聯合第三司令部	激
X13	甘肅	甘肅紅聯	甘肅省紅色造反派聯絡委員會	保
X14	甘肅	甘肅革聯	甘肅省革命造反派聯絡委員會	保
X15	廣東	廣東旗派	中大紅旗、華工紅旗、廣醫紅旗、紅旗工人等	激
X16	廣東	廣東東風（總）派	廣東地總、廣東紅總	保
X17	廣西	廣西四.二二	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	激

編號	省份	派別簡稱	組織派別全稱/主要成員/名稱來源	類別 [282]
X18	廣西	廣西聯指	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	保
X19	貴州	貴州四. 一一	貴州四. 一一	溫
X20	貴州	貴州支紅派	支持紅代會派	激
X21	貴州	貴州紅衛軍	貴州省毛澤東思想工人紅衛軍	激
X22	河北	河北保定工總	保定工人革命造反總部	激
X23	河北	河北保定工籌	保定工代會籌委會	保
X24	河北	河北石家莊（東派）反軍派	石家莊狂人公社總社，或稱狂派	激
X25	河北	河北石家莊（西派）擁軍派	河北石家莊擁軍派	溫
X26	河南	河南二. 七公社	河南二. 七公社	激
X27	河南	河南河造總	河南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	溫
X28	河南	河南十大總部	河南十大總部	保
X29	黑龍江	黑龍江捍聯總	捍衛革命三結合總指揮部	激
X30	黑龍江	黑龍江炮轟派	炮轟聯絡站	溫
X31	湖北	湖北鋼派	鋼工總、鋼九. 一三、鋼二司	激
X32	湖北	湖北新派	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	溫
X33	湖北	湖北百萬雄師	湖北百萬雄師	保
X34	湖南	湖南湘江風雷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湘江風雷挺進縱隊	激

編號	省份	派別簡稱	組織派別全稱/主要成員/名稱來源	類別 [282]
X35	湖南	湖南工聯	長沙市工人造反聯合委員會	溫
X36	湖南	湖南高司	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	保
X37	吉林	吉林紅二派	二總部、紅革會	溫
X38	吉林	吉林公社派	長春公社、東方紅公社	保
X39	江蘇	江蘇好派	江蘇一.二六奪權好得很	激
X40	江蘇	江蘇P派	江蘇一.二六奪權好個屁	溫
X41	江西	江西大聯籌	江西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	激
X42	江西	江西聯絡總站	江西省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總站	保
X43	遼寧	遼寧八.三一	遼寧八.三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激
X44	遼寧	遼寧遼聯	遼寧省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	溫
X45	遼寧	遼寧遼革	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	溫
X46	內蒙	內蒙呼三司	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紅衛兵司令部	激
X47	內蒙	內蒙紅、工、無	內蒙紅、（衛軍）工（農兵）無（產者）	保
X48	寧夏	寧夏總指揮部	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	激
X49	寧夏	寧夏總司	寧夏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	溫

編號	省份	派別簡稱	組織派別全稱/主要成員/名稱來源	類別 [282]
X50	寧夏	寧夏三司	寧夏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	溫
X51	寧夏	寧夏籌革造	寧夏籌革造	保
X52	青海	青海八.一八	青海省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總聯絡站	激
X53	青海	青海捍衛隊	青海省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	保
X54	山東	山東四.二八	支持王效禹派	激
X55	山東	山東四.二二	反對王效禹派	溫
X56	山西	山西紅總站	山西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	激
X57	山西	山西紅聯站	山西省大中院校紅色造反聯絡站	溫
X58	陝西	陝西東派	西安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等	溫
X59	陝西	陝西西派	西安工人聯合會等	激
X60	上海	上海工總司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激
X61	上海	上海紅革會	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	溫
X62	上海	上海支聯站	支援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絡總站	溫
X63	四川成都	四川成都八.二六	八.二六戰鬥兵團	激
X64	四川成都	四川成都紅成	紅衛兵成都部隊	溫
X65	四川成都	四川成都產業軍	成都產業工人戰鬥軍	保

編號	省份	派別簡稱	組織派別全稱/主要成員/名稱來源	類別 [282]
X66	四川重慶	四川重慶八.一五	重慶大學八.一五為首	溫
X67	四川重慶	四川重慶反到底	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工人造反軍等	激
X68	西藏	西藏造總	拉薩革命造反總部	激
X69	西藏	西藏大聯指	拉薩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指揮部	保
X70	新疆	新疆三新派	新疆職工總司、新疆紅二司、新疆農民造反司令部	激
X71	新疆	新疆三促派	新疆革命工人大聯合促進會、新疆紅衛兵革命大聯合促進會、新疆農民大聯合促進會	保
X72	雲南	雲南八派	以昆明工學院八.二三造反兵團為首	激
X73	雲南	雲南炮派	以雲南大學炮兵團為首	溫
X74	浙江	浙江省聯總	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	激
X75	浙江	浙江紅暴會	浙江省紅色暴動委員會	溫
X76	天津	天津大聯籌	天津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	溫
X77	天津	天津五代會	工代會、幹代會、農代會、大專院校紅代會、中學紅代會	激

17.2 分類指標和分類

對省級的群眾組織派別分類需要分類指標。我們採用以下 6 個客觀指標進行分類：

表17.2 派別分類指標

指標	分類指標內容
Y1	文革初期的保守派，或改頭換面，或成員主要來自文革初期的保守派
Y2	受軍隊打擊（特別是二月鎮反）
Y3	組織代表進入省革會常委會
Y4	進入省革會常委會的代表文革後受到整肅
Y5	支持該派的領導在文革後受到整肅
Y6	支持該派的領導在文革後複出重新上臺

如前所述，我們對派別的分類不包括文革初期有明顯官方色彩的保守組織。因為對此類保守組織的分類，學界沒有分歧意見，而且這些保守組織在“一月革命”中大多解體不復存在。有些省的保守組織在省委倒臺後改頭換面，繼續與造反派組織抗衡，但是在革委會成立前解體，如湖北的“百萬雄師”、江西的“聯絡總站”。在有些省，保守派得以幸存，一直與造反派對峙到省革會成立，如廣西的“聯指”、廣東的“東風派”等。指標 Y1 用來衡量這一情況。

1967 年“一月革命”以後，各級官僚機構癱瘓，黨的組織活動停止，天下大亂。中共的元老們開始抗爭，這就是史稱的“二月逆流”。伴隨著北京的“二月逆流”，全國各地的軍隊對造反派施行新的一輪鎮壓（即“二月鎮反”）。這一輪對造反派的鎮壓，從 1967 年 2 月開始一直持續到夏天^[284]。許多省的造反派組織在“二月鎮反”中深受其害，不少人進了監獄，更多的人受到審查批鬥。這些組織的階級成份一般都存在問題，用當時的話來說，是“階級成份複雜”或“階級成份不純”。在中央為其平反後，這些組織造反更加激烈。因此，是否遭到軍隊鎮壓（尤其是“二月鎮反”），是衡量群眾組織的一個重要標準。只要該派組織或其部分下屬組織被軍方取締或遭到軍方打擊，Y2 指標均記為肯定。如“江蘇好派”下屬的部分組織被聯締，受到不利的影響，所以“江蘇好派”的 Y2 指標記為肯定。

不少群眾組織的領袖在成立省革委會時有幸進入省革會常委會。由於一些省的革委會名單中無法區分其派別，我們採用定性（Attribute）記法（即該派組織只要有人進入常委會，Y3 指標則記

為肯定）。同理，只要該派組織進入革委會常委的成員有人在文革後受到整肅，Y4 則記為肯定。如“江蘇 P 派”進入省革委會常委代表中，只有曾邦元一人被判十年徒刑。其他人雖然也遭到清洗，但沒有被判刑。該組織的 Y4 指標也記為肯定。由於絕大多數成為省革會常委的群眾代表在文革後均遭到解職，這裏所說的整肅指的是被判刑、免於刑事處分和開除黨籍等更為嚴重的處罰。Y5 指的是背後支持該派群眾組織的領導幹部或上層人物。支持者受整肅與 Y4 一樣，指的是判刑、免於刑事處分或開除黨籍的處罰。指標 Y6 指的是支持該派組織的領導幹部文革後複出重新上臺。如支持“青海捍衛隊”的趙永夫，因為下令開槍屠殺無辜學生被審查關起來。但是文革結束後，趙永夫鹹魚翻身，很快被放出來。他不僅沒有受到處罰，還擔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顧問，最後以正軍職幹部離休，所以青海捍衛隊 Y6 記為肯定。

在附錄 9 裏，我們對各省的大派組織進行簡明扼要的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附錄 9。分類數據是根據這一介紹整理的。我們把省級大派組織分為 3 類（如表 17.1 所示）。具體的數據和分類計算請參見附錄 6。

17.3 基於派別對立的省市自治區分類

曾有學者對各省群眾組織派別對峙的情況做過討論（如徐友漁[285]），但是沒有學者進行系統的分類。我們根據以上派別的分類，對各省進行分類。從上述的派別分類中可以看到，有些省的鬥爭是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沖突，有些省則是分裂的造反派之間的爭鬥。也有少數省是造反派“一家天下”，局勢基本上由一個大派群眾組織控制，沒有嚴重的矛盾沖突。如果以 1968 年下半年各省級組織最終解散時為參照點，各省可以分為以下 3 類：

表17.3 各省文革中派別鬥爭的分類

編號	類型	數量	成員
1	造反派一派掌權	3	上海、內蒙、青海
2	分裂的造反派爭鬥	16	安徽、北京、福建、貴州、湖北、黑龍江、湖南、江蘇、遼寧、四川、山東、山西、陝西、天津、雲南、浙江、（河北石家莊）
3	保守派與造反派	9	廣東、廣西、甘肅、河南、吉

	冲突		林、江西、寧夏、新疆、西藏、 (河北保定)
--	----	--	--------------------------

注：由於河北省沒有形成全省統一的群眾組織和派別，我們分別對石家莊和保定兩市進行分類。

第一類是造反派“一家天下”的省（直轄市），最突出的例子是上海。上海“工總司在上海處於主導地位長達近十年之久。在第二類省中，分裂的造反派進行殊死的搏鬥和廝殺，死傷無數，最後是兩敗俱傷。在此類省中，有的是兩大造反派對抗，如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和江蘇；也有的省是三派混戰，如遼寧。在第二類省中，四川的武鬥相當慘烈。這是由於四川有不少軍工廠，文革中成了兩派武鬥的軍火庫。第三類省中的保守派，一直堅持下來與造反派對峙，如廣東、廣西、新疆和西藏。盡管此類省中有的省的造反派曾有分裂傾向，但迫於外部保守派的壓力，不得不攜手共同對付保守派。在第三類省中，有些省的派別是一對一的對抗，換言之，是一個大的保守派與另一個大的造反派並存，如廣東和廣西。保守派“廣東東風派”和“廣西聯指派”，分別與“廣東旗派”和“廣西四·二二派”對抗。也有的省是一對多的混戰，即一個保守派組織與多個造反派別混戰。如河南的保守派“十大總部”與“二·七公社”、“河造總”對峙，寧夏的保守派“籌備處”與造反派的三大組織分庭抗禮。也有的省是多對一的鬥爭形勢，即兩個保守派組織與一個造反派組織對抗，如甘肅的保守派“紅聯”和“革聯”與“紅三司”對壘。

第一篇介紹的 12 個省市自治區中，包括以上三個類別的省。如第一類造反派“一家天下”的 3 個省（上海、內蒙和青海），均在第一篇作了介紹。第一篇還介紹分裂的造反派對峙的省份：北京、湖北、黑龍江、湖南、江蘇、天津。屬於第三類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的省，介紹了新疆和西藏。這一著意的安排，體現了筆者對第一篇中代表性問題的關注。

綜上所述，各省的派別鬥爭是不同的。所以當我們分析民眾為什麼參加不同的派別時，應該注意到各省的差別。下一章將進一步討論這一問題。

第十八章 群眾組織的派別

前一章敘述各省級群眾組織的分類以及根據派別鬥爭對各省的分類。本章首先分析討論民眾為什麼會加入不同的派別組織，其次再討論他們又是如何組織起來的。有學者認為，群眾組織的分派與家庭出身有著密切的關係。家庭出身是中共建政後制造出來強加在民眾頭上的政治標籤。中國人被分為三大類，即紅五類、黑五類和灰五類。這些身份決定每個中國人的社會地位、受教育的機會、政治前途、事業發展和家庭生活；也就是說，決定一個人的一切。文革中家庭出身，在派別決擇中起了重要作用。Chan 等人調查廣州中學紅衛兵的情況，發現出身好的學生傾向於參加保守派組織（即“東風派”），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則傾向於參加造反派組織（即“旗派”）。而且出身好的學生參加群眾組織的積極性高，如革幹革軍子弟達到 92%，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大多選擇或被迫做逍遙派（高達 60%）^[286]。我們將認為家庭出身與組織分派密切相關者稱為“社會沖突派”。

“社會沖突派”很快遭到質疑。Andreas 在研究清華大學和清華大學附中的分派情況時，通過分析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發現，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派別受家庭出身的影響，但清華大學的學生派別卻與家庭出身無關。清華大學附中的派別依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劃線，與 Chan 等人的發現相似，但是清華大學的派別劃線的情況卻完全不同。激進派既攻擊政治領導層，也攻擊文化領導層；溫和派卻既保護政治領導層，也保護文化領導層。這是因為兩校的學生構成不同：清華大學有大批的工農子弟，使得派別的選擇機制有別於清華大學附中。工農子弟既不被血統論完全排斥，也不被血統論完全接受。因此，以文化資本和舊知識分子為攻擊目標的血統論在清華大學不占主導地位。激進派既攻擊政治領導層，也攻擊文化領導層^[287]。

Walder 在研究北京大學紅衛兵時發現，紅衛兵的權力和特權的狀況，對文革中的派別沒有影響。北京大學的派別沖突，實質上反映了運動各方為反對黨的舊領導展開的一場競爭。他們並沒有提出對抗的綱領，表達不同的政治觀，也沒有否定反對現存的政治和社會格局，或表現出不同的政治取向。在兩派沒有重大政治分歧的情況下，很難想象學生會根據自身的既得利益和政治觀點去選擇加入哪一方。派別沖突產生於造反突然轉向奪權和再掌權這一過程中。“天派”和“地派”，正是源於組織中錯綜複雜的聯盟關係。這些特征有助於我們理解，不同的利益集團在對政治格局不具有明顯的立場分歧，沒有依據自身所處的社會狀況採取行動的情況下，派別鬥爭是如何升溫並最終演變成暴力沖突的^[288]。Walder 對北京的紅衛兵運動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他認為，把北京的分裂說成是先前社會地位分裂的表現是不對的。社會分裂只適合初期，“天派”和“地派”

不是溫和與激進的問題。北京的派別鬥爭，並非不同取向的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他們有相同的背景，其身份和利益是一系列互動中形成的^[289]。

董國強和 Walder 對江蘇南京的分析發現，南京派性鬥爭的起源，與利益集團的政治類型相似之處很少。盡管利益集團政治孕育了文革期間沖突的觀點在學界頗為流行，但南京的派別卻顯示出是官僚政治語境中的不同派別。那些在現行體制中獲益的人們並未團結一致地捍衛它，從而與那些受排斥試圖顛覆現行體制的人形成對抗。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的人們，在局勢瞬息萬變、各方信息含混不清的情況下，陰差陽錯地采取不同的政治立場，形成相互敵對的陣營。他們的分野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沖突的每個階段都會產生一批贏家和輸家，促使人們不斷地變換政治歸屬，派性的分野也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江蘇和南京的運動，是伴隨著官僚政治的變動展開的。官僚政治促使效忠現行政治體制的人們相互鬥爭，從內部瓦解了現行政治體制的權力架構^[290]。Forster 對浙江的研究^[291]，Perry 和李遜對上海工人運動的研究^[292]，也對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之間的關係說提出挑戰。我們將這一派學者稱為“政治過程派”。

也有學者試圖彌合兩派的觀點分歧，認為以往的研究主要關注文革前存在的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和 / 或階級關係。從資源動員論的視角觀察，無論是恩庇侍從關係還是階級關係，本身並不會導致派別間的暴力，派別暴力依賴於這些關係是如何動員的。該學者對山西省的一家紡織廠的研究有以下三個發現。首先，該研究發現兩個主要的動員形式：政治領導的政治動員（來自上層）和派別領導人的資源動員（來自當地）。暴力往往是政治領導與派別領導之間互動的結果。第二，派別領導人在派別形成以及與其他派別的競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暴力不僅是來自上層政治動員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來自下層資源動員的結果。第三，派別組織的形成是政治的。文革前來自上層的動員和文革中來自下層的動員，產生了社會群體之間巨大的矛盾。這些矛盾成為派別形成和派別鬥爭中重要的工具。在這些派別鬥爭中，恩庇侍從關係的人們或階級關係的人們，能夠動員起來爭取某種政治目標^[293]。

第三方的觀點似乎並沒有真正解決兩派學者之間的分歧。那麼，造成以上兩派學者觀點分歧的根源在哪裏呢？

18.1 家庭出身和派別之間的四種因果關係

以上兩派學者盡管觀點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均把家庭出身與派別抉擇作為因果關係來分析；家庭出身是因，派別選擇是果。因果關係的分析，是社會科學中最常見的分析之一。一個變量（自變量 Independent Variable）的變化導致另一個變量（因變量 Dependent Variable）的變化，這種關係叫做因果關係。可以用下表來體現這一關係：

表 18.1 各種可能的因果關係

關係類別	自變量取值	因變量取值
1	a	m
	b	n
2	c	p 或 q
	d	p 或 q
3	e	r
	f	
4	g	s
		t

上表中的第一種關係是常見的因果關係。自變量可能出現兩種變化：a 和 b。如果自變量的值是 a，因變量的值則為 m。如果自變量的值是 b，因變量的值則為 n。運用到家庭出身和派別選擇的因果關係上，當家庭出身是紅五類（a）時加入保守派（m），當家庭出身是黑五類（b）時則參加造反派（n）。這樣的情況，我們稱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在第二種關係中，自變量的值是 c 時，因變量的值有時會是 p，有時會是 q。當自變量的值是 d 時，因變量的值也是有時會是 p，有時會是 q。自變量的變化並沒有給因變量帶來固定的變化。因此，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係。第三種關係中，儘管自變量的取值有變化，有時會是 e，有時會是 f，但是因變量的值永遠是 r，並不隨著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因果關係。第四種關係中，雖然因變量的值有變化，可能會是 s 或 t，但是自變量的值永遠是 g，沒有任何變化。這種自變量與因變量的關係，也不是因果關係。

雖然第二、第三和第四種關係均屬於非因果關係，但是它們的性質是不同的。在第二種關係中，自變量和因變量都有足夠的變化空間，但是它們的變化並沒有直接的聯系。聯系家庭出身與派別抉擇的關係，儘管家庭出身分為紅五類和黑五類，儘管派別存在著保守派和造反派，但是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紅五類既會加入保守派，也會參加造反派。黑五類有的與保守派為伍，有的卻與造反派為伍，之間的關係是隨機任意的，沒有固定的模式。

但是第三和第四種的因果關係，自變量或因變量根本沒有變化的空間。在第三種關係中，無論自變量的值如何變化，因變量的值只有一種情況。第四種關係中，無論因變量如何變化，自變量也只有一種情況。聯系家庭出身和派別選擇之間的關係，北京紅衛兵的派別屬於第三種關係，北京的“天派”和“地派”同屬激進派。無論學生出身如何（紅五類或者黑

五類），他們在參加派別的問題上，其實並沒有選擇的餘地。因為無論是“天派”或“地派”，都是激進的造反派。兩派並沒有對抗的綱領，沒有不同的政治觀，也沒有不同的政治取向。兩派的分裂不是社會地位的分裂。

必須指出的是，北京全市性的派別分為“天派”和“地派”，但按照我們在前一章的分類，都屬於激進派。不過，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校內的兩派，分別屬於激進派和溫和派。“新北大公社”和“清華大學團派”是激進派，“新北大公社井岡山”和“清華大學四派”是溫和派。這一現象說明，低層、基層單位的派別與省市更高層單位的派別不一定同步。學校的溫和派可能與全市性（或全省性）的激進派聯盟。

有的單位因為出身好的人員占絕大多數，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之間也不形成明顯的因果關係。這類情況是上表中的第四種關係。盡管對於派別有選擇，但是參加派別的人卻是清一色的相同家庭出身，例如中共的軍隊院校和許多軍工廠就存在這樣的現象。由於保密的需要，這些工廠的成員經過嚴格的政治篩選，大多由成份好的複員轉業軍人和年輕畢業生所組成。尤其是中共的軍隊院校（如本書第一篇提到的南京軍事學院），學員經過嚴格的政治篩選，成份均為清一色的紅五類。在這些單位裏，出現家庭出身與派別沒有直接的關係的現象，不是家庭出身不起作用，而是由於自變量沒有變化而已。所以，第三種、第四種關係中的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不存在因果關係，不是它們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而是自變量（即家庭出身）或因變量（即派別）缺乏變化的緣故。

概言之，北京“天派”和“地派”間的區別，與廣州“旗派”和“東風派”之間的區別，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前者是同一陣營裏不同派別之爭，我們把它叫做“派性派別”。後者是不同階級陣營的對峙和沖突，我們把它叫做“階級性派別”。忽略派別鬥爭存在著不同性質的類別，將兩者混為一談，是產生兩派學者不同觀點的主要原因。

18.2 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省份的情況

Walder 在研究北京紅衛兵的分裂時，承認社會分裂只適合文革初期[294]，即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時期。徐友漁認為，紅衛兵的派別對立首先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保守派失敗後，造反派內有溫和派和激進派的嚴重對立。大武鬥往往發生在造反派內部，派性鬥爭長久不能解決[295]。印紅標在分析北京紅衛兵派別時指出，在紅衛兵運動的派別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會意義的主要流派有四個：老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極左派。在四個主要政治流派中，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先後充當了紅衛兵運動的主導流派，先後成為運動中的主要派別[296]。向前則認為，在北京之外的很多省市，保守派和造反派才是紅衛兵組織的主要派別[297]。社會分裂不僅存在於文革初期，而且始終存在於整個文革時期。只是由於各省運動發

展的軌跡不同，有些省成為上節中提到的第三種因果關係，社會分裂被掩蓋了。

我們對文革中始終存在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的 9 個省（見表 17.4）的受訪者進行分析。在這些省，凡是能夠明確回答參加的群眾組織屬於保守派或者造反派的受訪者加以保留，共有 92 人符合以上條件^[298]。以下是他們的家庭出身與派別的關係：

表18.2 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省的家庭出身與派別的關係

派別	家庭出身				合計
	革幹革軍	工人農民	灰五類	黑五類	
保守派	12（80%）	11（38%）	3（12%）	11（48%）	37（40%）
造反派	3（20%）	18（62%）	22（88%）	12（52%）	55（60%）
合計	15	29	25	23	92

上表顯示，革幹革軍子弟鐘情於保守派（80%），工農子弟以及灰五類參加保守派的比例遞減，分別是 38% 和 12%。盡管黑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的比例高於工農子弟和灰五類子弟，但是他們的比例（48%）還是大大低於革幹革軍子弟。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的關係有顯著差別（ $\chi^2=18.8$ ， $L^2=20.3$ ，自由度=3， $P=0.0003$ ）。由於數據量較小，我們還採用費雪爾的精確檢驗法（Fisher's Exact Test，P 值 <0.0001 ），說明家庭出身與派別之間關係純屬偶然的可能小於 0.0001（即小於萬分之一）。如上表所示，絕大多數革幹革軍出身的受訪者參加了保守派，遠高於其他出身的受訪者，工農、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大多參加了造反派。可以說，在階級性派別鬥爭的省中，家庭出身在“階級性派別”的抉擇中起了明顯的作用。以上結果支持“社會沖突派”的觀點。

18.3 造反派內鬥省份的情況

在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的省裏，家庭出身與派別的選擇有著明顯的關係；但在造反派分裂對壘的省份，情況卻有所不同。在問卷調查中，我們選取 16 個造反派對峙省份的受訪者。有 394 位受訪者能夠確定他們參加的是激進派還是溫和派^[299]。以下是受訪者的家庭出身與派性派別的關係：

表 18.3 分裂的造反派對峙省的家庭出身與派別關係

派別	革幹革軍	工人農民	灰五類	黑五類	合計
激進派	38 (63%)	47 (53%)	113 (64%)	50 (71%)	248 (63%)
溫和派	22 (37%)	41 (47%)	63 (36%)	20 (29%)	146 (37%)
合計	60	88	176	70	394

如上表所示，工農出身的受訪者參加激進派，比革幹革軍、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稍少一些。但是，各類家庭出身的受訪者參加激進派與溫和派的比例相差並不大（ $\chi^2=5.71$ ， $L^2=5.70$ ，自由度=3， $P=0.1264$ ）。從統計學的角度看，各類出身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這就印證了“政治過程派”的觀點。自身的社會地位和階級屬性與派別（此處是“派性派別”），沒有明顯的因果關係。因此，派性派別的選擇與其說是與受訪者的家庭出身有關，不如說與運動的走向及過程更有關聯。正如何蜀指出的，到了奪權時，群眾組織中文革初期的“革”與“保”、“造反”與“保守”的區分，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此時兩大派群眾組織的性質，已經不能再以文革初期的“革”與“保”、“造反”與“保守”的概念來簡單區分^[300]。

從以上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有把握地預測，如果未來有研究者對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的 9 個省進行研究，一定會發現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之間存在相關關係，其中廣州^[301]已經被證實。但如果是研究其他 16 個造反派內鬥的省和三個造反派一派獨大的省的話，一定會發現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之間沒有關係，或關係甚微，其中北京^[302]、上海^[303]、江蘇^[304]和浙江^[305]已經被證實。以下是我們的預測：

表 18.4 兩種理論各自適合的省

	適合的理論	
	社會沖突說	政治過程說
省	廣東、廣西、甘肅、河南、吉林、	上海、內蒙、青海、安徽、北京、福建、貴州、湖北、黑龍江、湖南、江

	江西、寧夏、新疆、西藏、（河北保定）	蘇、遼寧、四川、山東、山西、陝西、天津、雲南、浙江、（河北石家莊）
--	--------------------	-----------------------------------

18.4 清華大學紅衛兵派別分析

我們的調查，收集到 59 名來自清華大學兩派組織受訪者的問卷。他們的家庭出身與派別之間的分布如下（因人數較少，我們把出身分為紅類和非紅類）：

表 18.5 清華大學紅衛兵的家庭出身與派別關係

派別	紅類	非紅類	合計
四派	12 （ 71% ）	16 （ 40% ）	28 （ 49% ）
團派	5 （ 29% ）	24 （ 60% ）	29 （ 51% ）
合計	17	40	57 ^[306]

上表顯示，“四派”的紅類出身稍多一些（70%），“團派”中非紅類出身稍多一些（60%）。基於這一樣本，“四派”與“團派”的差異呈顯著關係（Fisher’s Exact Test, $P=0.0454$ ）。清華大學“團派”與“四派”的派別，與家庭出身的關係是顯著的。我們推斷兩派家庭出身的比例如下（95% 的置信水平 Confidence level）：

表 18.6 清華大學四派和團派與家庭出身關係的推算

派別	紅類	非紅類
四派	不低於 48%	不高於 54%
團派	不高於 52%	不低於 46%

根據上表的推算，清華大學兩派的家庭出身有可能相差不大（如“四派”在紅類出身中為其最低可能的 48%， “團派”在紅類中為其最高可能的 52%），但是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更大的可能是，“四派”的成員家庭出身好的多，“團派”的成員出身不好的多。

關於清華大學兩派的本人政治面貌與派別的關係，可以參考文革時期的統計。1967 年 4 月至 5 月間，清華大學“團派”發表一系列調查報告

[307]。有一份調查報告說，學生幹部黨員中“四派”占了62.6%，“團派”僅占27.4%（筆者理解，餘下的10%為中間派）。雖然由於缺乏具體數據，無法對學生的幹部黨員與派別進行統計分析，但是另一份教職員工統計卻有具體數據。以下是教職員工黨員與派別的分布：

表18.7 清華大學教職員工的政治面貌與派別關係

派別	黨員	非黨員	合計
團派	338（25%）	988（75%）	1324
四派	528（53%）	471（47%）	999
中間派	249（26%）	694（74%）	943
合計	1,113	2,153	3,266[308]

上表顯示，“團派”成員中黨員比例為25%。中間派成員中，黨員比例與“團派”相近（26%）。“四派”成員中黨員卻較多，是兩者的2倍多（53%）。這一差異，從統計學角度上說是顯著的（ $\chi^2=226.1$ ， $L^2=220.3$ ，自由度=2， $P<0.0001$ ）。如果除去中間派，僅分析“團派”與“四派”的差異，兩者間的差異仍然是顯著的（ $\chi^2=184.0$ ， $L^2=184.6$ ，自由度=1， $P<0.0001$ ）。“四派”的學生黨員比例比教工更高。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清華大學的兩派在政治面貌與家庭出身之間的差異是顯著關係。

我們的發現與其他西方學者（如 Andreas 和 Walder）的發現有不同之處。為什麼清華大學的派別與北京其他高校有區別呢？文革研究學者、清華大學文革的直接經歷者孫怒濤先生認為：清華大學造反派的分裂是伴隨著對17年的估計（黑線主導還是紅線主導）以及對幹部隊伍的分析（是多數好的還是基本壞的）的爭論而發生的，因而紅五類及黨員幹部在這兩個問題上的表態有明顯的傾向性也是很自然的。其他單位和地區兩派分裂的原因與清華大學有所不同。清華大學有點特殊，這是因為清華大學兩派爭論的焦點層次更深一些[309]。

以前的研究存在著樣本小，僅憑肉眼分析，沒有採用統計工具的缺陷。這些問題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裏進一步討論。

18.5 運動初期保守派的流向

運動初期的保守派重新站隊，也是造成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關係複雜化的原因之一。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有 188 人^[310]曾在文革初期參加保守派組織。隨著運動的發展，有 77 人（41%）退出運動變成了逍遙派，另有一部分人分別參加了激進派和溫和派。以下是這部分人的分布：

表 18.8 文革初期保守派重新站隊的情況

重新站隊 後的派別	家庭出身				合計
	革幹革軍	工農	灰五類	黑五類	
保守派	17 （18%）	14 （29%）	3 （11%）	2 （12%）	36 （19%）
激進派	9 （9%）	0 （0%）	7 （25%）	8 （47%）	24 （13%）
溫和派	5 （5%）	5 （10%）	4 （14%）	2 （12%）	16 （9%）
派別不明	19 （20%）	8 （17%）	6 （21%）	2 （12%）	35 （19%）
逍遙派	45 （47%）	21 （44%）	8 （29%）	3 （18%）	77 （41%）
合計	95	48	28	17	188

上表顯示以下兩點：（1）運動初期參加保守派的民眾在遭受挫折後，有近四成以上的人（41%）成了逍遙派。在保守派變成逍遙派的人群

中，紅五類子弟占了絕大多數（86%），即77名逍遙派中有66人是紅五類子弟（45+21=66）。（2）初期的保守派中約24%是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 $[28+17]/188=24\%$ ）。這一點值得注意。因為按照“社會沖突派”的觀點，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更應該投身到造反派的隊伍之中。

事實上正如我們在下面章節要討論的，參加一派組織只是一個政治手段，並不是目的。黑五類和黑五類子弟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處境，既可以參加造反派也可以參加保守派。參加造反派可以直接向曾經欺壓過自己的走資派和當權派發動攻擊，趁機出口惡氣，參加保守派未必不能達到同樣的目的。他們吸取1957年的反右鬥爭和其它政治運動的教訓，心存恐懼，不敢反對黨委和工作組。由於多年的宣傳，他們對革命領導幹部心懷崇敬，一直把領導幹部當作神聖不可侵犯者。根據以往的經驗，運動過後提意見的人不會有好下場。所以，不如現在向當權派示好，表示忠心，或許今後的日子好過些。因此從長遠的觀點看，也可以達到改善處境的目的。

不僅如此，即使是出身好的參加了保守派（或相對保守的溫和派），也有不同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的出身好的人在文革前已經淪為受壓迫的一類，因此會加入造反派或激進派的行列。這一點與文革的發展進程並無關係。例如清華大學的學生範雨臣雖然出身工人，但是由於清高，沒有巴結班內的黨員，遭多人誣陷，小報告進入他的檔案。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看到自己檔案裏的“黑材料”，他已經淪落為眾矢之的的另類。他所在班裏，文革前已經分裂成兩派，且十分對立。一派是黨員和準備發展入黨的，另一派是班內一群“臭魚爛蝦”。有人把前者叫做“優質生”，後者叫做“差質生”^[311]。盡管後來學校文革起伏跌宕，不斷分派，但是班裏的兩派一直同步跟進，陣容從未錯亂。優質生基本上是“四派”，差質生全是“團派”，但範雨臣是個例外：他本是鐵杆“團派”。文革開始後，長期感到壓抑的差質生們終於有了說話權。他們仿照“四清”，把班幹部通通都轟上“樓”，指控他們忠實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並成立批判優質生小組。在批判優質生之初，範作為一名典型的差質生，出自本能立即投入批判。但是他很快意識到此舉的危險性：他的檔案已經十分嚴重，再參加批判，會激怒檔案掌管者，從而添加更嚴重的誣陷材料。經過再三考慮，他退出了批判。他的這一行動，引來差質生們的唾罵。此時，他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媾和。班裏優質生們最後都成了“四派”，範雨臣這位投降者也跟隨他們成了“四派”，一個不積極的“四派”^[312]。範雨臣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它說明，在文革前，有些人雖然家庭出身尚可，但因為被認為表現不好，已成為落後分子，近似黑五類。同時也說明，即使是黑五類或已經滑到黑五類邊緣的人，也會出於政治考量參加保守派。在這裏，派別的選擇與文革的發展進程沒有關聯。

18.6 對廣州中學紅衛兵的計算機模擬分析

以上的討論，部分地解釋了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之間出現的不同情況。家庭出身對於“階級性派別”的選擇仍起作用，但在“派性派別”的選擇中，家庭出身失去了影響。在這一節裏，我們試圖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這一問題。廣州中學紅衛兵的家庭出身，對於派別的選擇作用是顯著的。以下是我們基於 Chan 等人 1980 年發表的文章中的數據，將家庭出身分為四類得出的結果^[313]：

表 18.9 廣州中學紅衛兵派別與家庭出身的關係

派別	革幹革軍	工農	灰五類	黑五類	合計
旗派 (造反派)	55 (19%)	181 (34%)	525 (54%)	143 (36%)	904 (41%)
東風派 (保守派)	208 (73%)	215 (40%)	76 (8%)	17 (4%)	516 (24%)
未參加 任何派別	22 (8%)	141 (26%)	365 (38%)	239 (60%)	767 (35%)
合計	285	537	966	399	2187

如上表所示，革幹革軍子弟傾向參加保守的“東風派”（73%），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參加造反的“旗派”更多一些（分別為 54% 和 36%）。黑五類子弟有 60% 沒有參加派別組織，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逍遙派。家庭出身與派別的關係，在統計學上有顯著差別（ $\chi^2=749.0$ ， $L^2=723.0$ ，自由度=6， $P<0.0001$ ）。

假如這些學生成為諸如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的學生，情況會是怎樣呢？盡管曆史沒有“如果”，但是現代化科技手段可以幫助我們實現這一假設，這就是計算機模擬。假設 Chan 等人調查的廣州中學生升入大學，我們對其進行調查。進一步假設，這些學生在大學中按家庭出身比例如下：紅五類子弟占 85%，灰五類子弟占 10%，黑五類子弟占 5%。也就是說，如果採訪 100 名這些假設升入大學的廣州中學生，其中有 85 人來自紅五類家庭，10 人來自灰五類家庭，5 人來自黑五類家庭。以下是我們用計算機模擬 10,000 次得出的平均分布：

表 18.10 計算機模擬的 100 人隨機採訪

派別	革幹革	工農	灰五類	黑五	合計
----	-----	----	-----	----	----

	軍			類	
旗派（造反派）	6	19	5	2	32
東風派（保守派）	21	22	1	0	44
未參加任何派別	2	15	4	3	24
合計	29	56	10	5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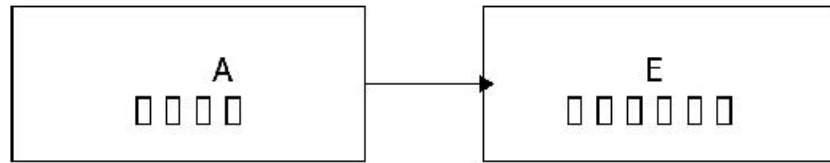
上表顯示，盡管紅五類子弟傾向保守的“東風派”的趨勢隱約可見，但是已經不太明顯。工農出身的學生有 19 人參加造反派，有 22 人參加保守派，還有 15 人未參加任何派別。參加造反派與保守派的人數幾乎勢均力敵。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因為人數太少，幾乎無法引起人們的注意。為什麼原來非常明顯的家庭出身與派別之間的關係消失了呢？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大學的入學篩選。大量的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被排除在大學校門外，根本無法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階級矛盾被掩蓋了。其次是樣本較小的緣故。由於樣本小，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的人數不足以引起關注。

綜觀中西方學者對文革的研究，除了 Chan 等人對廣州中學紅衛兵采用較大規模的統計，大多數研究者僅小規模地採訪了一些當事人。數量太小的樣本，在代表性方面容易出現問題。對於像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這樣擁有萬人左右的學校，所需的樣本最好應達到 187 人；如果條件允許的話，研究者一般應爭取達到 386 人（具體計算請參見附錄 1）。顯然，很少有學者進行如此規模的調查。更為遺憾的是，至今為止，很少有人運用統計學工具對家庭出身與派別抉擇的關係進行定量分析^[314]。雖然是小規模的調查，統計分析也能說明一些問題。如表 18.10 中顯示的計算機模擬數據，如果我們采用統計工具分析的話，出身與派別之間的關係差別仍是顯著的（ $\chi^2=20.3$ ， $L^2=23.2$ ，自由度=6， $P=0.0025$ ）。僅憑感覺和肉眼估計，缺乏統計學工具分析，以致於調查結論失真，是文革研究中的重要缺陷之一。

18.7 階級分裂與派別選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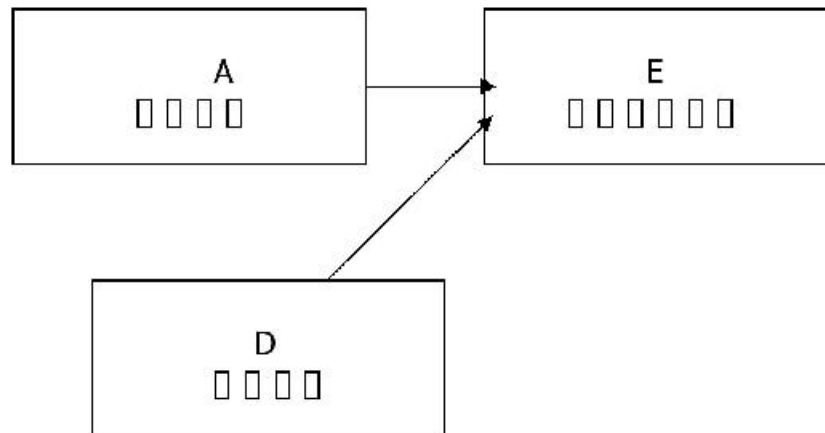
以上討論，從幾個方面探討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之間存在不同觀點的原因。由於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家庭出身（即階級地位）與派別選擇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忽略了不同派別之爭的類型，沒有分清“階級性派別”和“派性派別”之間的重要區別，以致於將兩者混為一談。以往的研究均試圖采用過於簡化的因果模型（Causal Model）來解釋派別現象，因此結論莫衷一是。我們先來討論過於簡化的因果模型的問題。“社會沖突派”學者對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的研究，可以歸納成以下的因果模型：

圖 18.1 “社會沖突派”的因果模型



在以上的模型中，“社會沖突派”的學者試圖以家庭出身來預測派別組織的歸屬。“政治過程派”的學者發現該模型存在缺陷，提出以下改進型因果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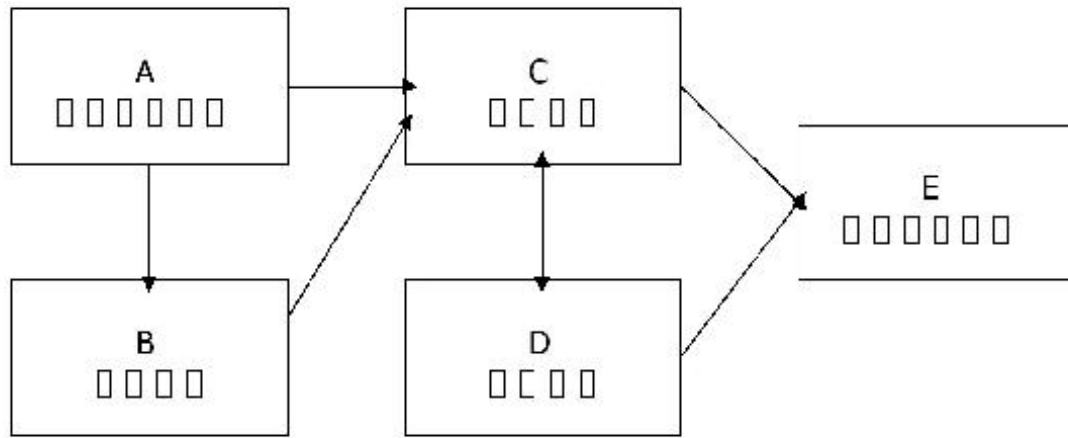
圖 18.2 “政治過程派”的因果模型



“政治過程派”的模型，相對於“社會沖突派”的模型有所改進。民眾在進行派別選擇中，不僅家庭出身起了作用，運動的進程也發揮了影響。有的時候，運動進程發揮的作用較小。如文革初期保守派和造反派階級界線分明時，家庭出身與派別的區分非常明顯。當運動深入發展，在有的省和地區，運動進程的作用大於家庭出身的作用。所以僅從家庭出身很難預測派別的選擇，此時它們的關係模糊了。

從家庭出身到最後做出省級大派別的選擇（無論是“階級性派別”還是“派性派別”），遠非像以上兩個因果模型顯示的關係那麼簡單。派別的抉擇，是在多層次多因素的影響下的結果。需要指出的是，在文革中，極少有人以個人的名義直接加入大派組織，個人都是通過參加本單位（如系、科、車間、班級等）的基層群眾組織加盟於大派組織。以下是我們提出的個人與派別之間的因果模型圖：

圖 18.3 個人與派別實際關係的因果模型圖



在上圖中，個人自然情況（即變量 A）包括年齡、性別、職業、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社會地位、個人的性格、道德水準等。個人動機（即變量 B）包括響應毛的號召、改善政治處境、改善經濟處境、對當權派不滿、同情被打壓者、受同事影響和隨大流等。個人的自然情況與參加基層單位群眾組織之間關係（即變量 A 與變量 C 間的關係），同時受到個人動機（即變量 B）的影響，不同的動機決定著是否參加群眾組織。如果個人做出參加的決定，個人動機又決定參加基層單位的哪一派群眾組織。個人自然情況（變量 A）對個人動機（變量 B）也有影響。正如在前一章裏提到的，出身不好社會地位低下的民眾，往往具有強烈的改變自身政治處境的願望。出身好的民眾，則多半希望保持現狀。他們之所以響應毛的號召，是因為對於出身好的民眾來說，只要聽從黨跟隨黨，後果一定不會差。個人情況與個人動機，決定一個人參加基層的派別組織。一旦個人參加了基層組織，在選擇更高層的大派組織（即變量 E）的決斷中，個人的自然情況（變量 A）和個人動機（變量 B）的影響力就變得十分有限。此時具體選擇哪個大派，在很大程度上受基層派別（變量 C）和運動進程（即變量 D）的影響。基層派別與運動進程之間，是互相影響的。在基層組織（變量 C）加入高級大派（變量 E）的抉擇中，與其說是個人選擇，不如說是團隊抉擇（Block Selection）和運動進程的影響。團隊抉擇和運動進程與個人的家庭出身的關係，就不是那麼直接了。

以北京為例。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觀點相近，形成“天派”。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形成“地派”。“天派”和“地派”沒有什麼大的原則差別，同一派的內部則往往看法不一樣。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和清華大學的“團派”觀點比較接近，清華大學的“四.一四派”卻參加“地

派”。作為個人，民眾一般不會輕易地公開宣布退出某個組織投奔另一個組織，除非該組織面臨倒臺和解散。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對於投降和叛變者相當排斥。浙江著名的造反領袖翁森鶴，原是浙江“聯總派”的。他後來改變立場，成為浙江“紅暴派”，被造反派譏笑為“叛徒”，不受待見。清華大學的範雨臣考慮再三，退出差質生對優質生的批判，遭到差質生們的痛罵。作為個人，“新北大公社”、“清華大學團派”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的一般成員，無論出身與政治面貌如何，是整體加入北京市的大派組織（即“天派”或“地派”）的。換言之，是聶元梓、蒯大富和韓愛晶等領袖人物，決定了他們的大派別選擇。

在江蘇，最早起來造反並成為工人運動領袖的一批工人造反派（“省工總”），來自市政建築公司、碼頭貨運公司和人力三輪車行業協會的小企業。這是一批被邊緣化的，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物。儘管也算作工人，但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與大工廠裏的產業工人相比天差地別。他們的造反激情最高漲，革命精神最為徹底。但張春橋認為“省工總”組織不純，不是以產業工人為主力軍，建議改組。“省工總”改組後，新當選的領導人（後來稱為“新工總”）表示支持“好派”。老的“省工總”領導人堅決反對改組，所以帶領一些下屬組織（後來稱為“老工總”）投靠“好派”的死對頭——“P派”。在南京市民的眼裏，江蘇的溫和派（即P派）是保守派，因為該組織力挺軍區司令許世友鎮壓激進的造反派。

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是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兩大派別。文革初期，校園裏出現5個紅衛兵組織。3個是由革幹革軍子弟為主要成員的保守派組織，2個是以平民子弟為主的造反組織。經過“一月革命”，幾個組織重組，形成兩大派別：以革幹革軍子弟為主的保守派“造反軍”和以平民子弟為主的造反派“紅聯”。保守派“造反軍”並未與社會上的大派結盟，造反派“紅聯”在與社會上的大派結盟時發生分歧。一小部分人與江蘇的P派（溫和派）結盟，大部分人與江蘇的好派（激進派）結盟。在南京師範學院附中的校園中出現了奇特的現象：校園內“造反軍”與“紅聯”是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在校園外則是造反派內部分歧造成的兩派對壘。

“社會沖突派”只能解釋校園內的鬥爭，“政治過程派”只能解釋校園外的鬥爭。事實上，南京師範大學附中校園內的鬥爭是階級性派別鬥爭，校園外的則是非階級性的派性派別鬥爭。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這是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派別鬥爭。

“社會沖突派”和“政治過程派”的因果模型存在兩個問題。首先，兩派的模型均忽略了中間變量（Intermediate Variable）——基層派別組織（變量C），直接研究變量A與變量E之間的關係。此舉使得中間過程變成了“黑箱”，從而使家庭出身與派別的選擇關係蒙上神秘的色彩，導致這一關係難以預測。一般來說，基層組織派別的階級界線比較清晰，尤其是小戰鬥隊或戰鬥組。較高層組織派別的變數就大得多。其次，兩派的模型混淆了派別的類型，忽略了“階級性派別”與“派性派別”的區別。

由於廣州中學紅衛兵的大派（變量E）與基層單位組織（變量C）屬於同一性質的“階級性派別”，“社會沖突派”發現家庭出身（變量A）與大派組織（變量E）之間有正向關係。“政治過程派”學者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運動過程（變量D）上，忽略了基層組織的派別（變量C）與高層組織派別（變量E）分屬不同性質的派別。該派學者誤以為運動過程（變量D）是唯一的因素，忽略個人原因（變量B）和基層派別組織（中間變量C）的派別性質。由於“社會沖突派”只注重個人情況（變量A），“政治過程派”僅關注運動過程（變量D），兩派均未找到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之間真實的因果關係。

這裏的關鍵是基層派別（變量C）與大派別（變量E）之間的關係。當它們同屬“階級性派別”時，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的因果關係可以順延，體現在大派別的選擇上，從而使家庭出身與大派別選擇顯示出明顯的關係。當兩者分屬不同性質的派別時（即一個屬於階級性派別，另一個屬於派性派別時），家庭出身與大派別選擇就成為表18.1中的第三種因果關係，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派別（即“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井岡山”、“清華大學團派”和“清華大學四派”）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戰鬥組和戰鬥隊組成的。我們的模型為了討論方便，基層派別被簡化為一層，實際情況可能更為複雜，此處不贅。

總之，“社會沖突派”和“政治過程派”只是部分地解釋了民眾為什麼分派的原因。我們提出“兩類派別鬥爭”的解釋（Two-Type Faction Struggles Explanation），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文革中的派別鬥爭，所以我們的解釋可以稱為“兩類派鬥說”。

18.8 為什麼會分派？

前面的章節已經分析了個人層面上參加派別的原因（變量B），本節分析組織層次上的分派原因（變量D）。在群眾組織的派別鬥爭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分派，是保守派與造反派的分裂，這是階級性的分裂。建政以來，全國各地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標準，使得人們逐漸地分成界線不很分明的兩個群體：一部分人家庭出身好，另一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前者是優勢群體（Privileged Group），後者是劣勢群體（Deprived Group）。前者在入黨、提幹、分配工作、晉級等方面都占有優勢地位，後者則受到歧視，處於下風。在優勢群體中，雖然都是紅五類出身，但是革幹革軍子弟要比工農子弟更具有優越性。在劣勢群體中，灰五類子弟要比黑五類子弟稍好一些。處於最底層的是黑五類子弟，他們幾乎沒有出頭之日。

優勢群體和劣勢群體內的成員不是一成不變的，也會發生變化。我們把這一人為地製造人與人之間差別的過程，叫做“篩選差分”過程。原清華大學的孫怒濤先生提出優質群體和差質群體的概念，我們分別稱之為先

進群體（Advanced Group）和落後群體（Backward Group）。孫怒濤以他所在班級為例，說明這一篩選差分的過程。剛進校時，他的同班同學幾乎全都是優質生。要說差別，也僅是優秀還是優良的程度差別，沒有明顯的差質生。因為在高中時，學生們已經形成明顯的兩個群體。凡是政治可靠、思想進步、出身好、成績優秀的學生，通過高考送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軍工院校及其他一些知名的大學。家庭出身不好的大多落榜，個別幸運一點的也只能上不入流的大專。高考就像是一架甄別篩選機，把兩類不同的人送入不同的人生軌道。能進清華大學這樣名牌大學的，絕大多數都是品學兼優的優質生。

在大學6年中，各種政治運動和繁多的活動從未間斷過。如紅專辯論、學《毛選》、憶苦思甜、學雷鋒、評功擺好、學《九評》、農村“四清”、批“三家村”等等。這些運動和活動，基本上以正面教育為主，多數比較溫和，偶爾也有點激烈。逐漸地，班上同學分成兩個界線不很分明但是大致有點輪廓的群體：先進群體和落後群體。先進與落後的差別，主要在政治表現方面的不同。對黨忠心耿耿，對毛主席無比熱愛，無產階級立場堅定，階級鬥爭觀念強，階級感情深等等，都是政治表現好的重要標志。出身於革幹革軍及工人和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當之無愧地成為先進群體的主體。政治輔導員、黨員、黨支部委員、團支書、班長等學生幹部，則是其中優秀的先進生，是先進生中的佼佼者，先進群體的核心和中堅。“思想反動”和“對黨不滿”的右派學生，是最落後的群體。在層次政治運動中認識模糊和立場動搖的學生，也淪入落後群體之中。出身於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小業主、四不清幹部家庭的學生，有個性、有棱角、善於獨立思考、不大愛聽組織話的學生，都有成為落後群體成員的可能。在政治上表現不上進、不緊跟，以致給組織上留下政治落後印象的，個人品行（譬如有點小偷小摸）、思想意識（譬如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比較嚴重）有點問題的學生，還有極端散漫、吊兒郎當、不求上進的學生，也可能屬於落後群體，雖然這些與政治思想上犯錯誤、有問題有程度上的差別。

在先進群體與落後群體之間，有不少既算不上先進生也不算落後生的同學。所以在兩個群體之間，有一片模糊的中間地帶，這兩個群體是動態存在的。本屬於先進群體的先進生如果犯了政治錯誤，會掉入落後群體中去。落後群體的落後生中，有些僅僅出身不太好，但在政治上有突出表現，積極靠攏組織，能“徹底背叛剝削階級”，會上升到先進群體中去，甚至有可能入黨。這叫做“重在表現”。組織上對先進生的政策，是信任、培養和重用，他們的前途光明，前景美好。所以，已經處在先進群體中的學生，想的是要不斷地為黨立新功，以確保在先進群體中的位置不斷上升，至少不能下跌。組織上對落後生的政策，是幫助、團結和教育，使之脫離落後群體，上升成為先進生。對於極少數性質嚴重的落後生，則要進行批判、監督和改造，以防再往下滑，成為敵對分子。落後生都明白自

己的前途暗淡，命途多舛，所以總是想方設法地抓住機會（特別是政治運動的機會）表現自己，以求擺脫落後群體的苦海，改變落後生的悲慘命運，力求進入先進群體。

這種人為的篩選差分過程，就像是一臺高速旋轉的離心機，不斷地把一部分不能緊跟黨的分子甩出核心圈，落入落後群體。先進群體在政治地位、社會地位方面占優勢，落後群體在政治上受歧視，精神上受壓抑。雖然從來沒有明文公布過先進生和落後生的標準，也沒有給哪個人貼上先進生或落後生的標籤，但是組織上（輔導員們、黨團幹部們）實際上是有一個潛在的心照不宣的標準的。他們不斷地給學生摸底排隊，進行動態管理。到底是先進生、落後生還是中間生，他們心裏很清楚，每個學生自己也能感覺得到^[315]。這一動態的先進群體和落後群體的劃分，與以階級分裂為界線的優勢群體與劣勢群體的劃分並不完全吻合，兩者之間的關係可以用下表來表示：

表18.11 階級劃線與篩選差分劃線的關系

		階級劃線	
		優勢群體	劣勢群體
篩選差分	先進群體	I	II
	中間群體	III	IV
	落後群體	V	VI

第I類群體是最好的。他們出身好，經過篩選差分進入先進行列，各方面占盡先機。第II類次之。他們雖出身灰五類或者黑五類，由於積極表現，也進入先進行列；表明他們已經背叛了原來的階級，成為先鋒隊的一分子了。當然，此類群體的人數比較少。第III類是出身好的中間群體。他們有可能上升為第I類，也有可能下降為第V類。第IV類是出身不好的中間群體。他們與第III類一樣，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這兩類人相對來說不穩定。第V類是落後群體，僅比出身不好的落後群體略好一點，他們被看成是忘本者。第VI類是社會的底層。他們出身不好，表現也不好，故最受歧視和打擊。

篩選差分過程不僅發生在清華大學的班級裏，也發生在中國的每個角落。這種動態的不斷變化的篩選差分過程，把中國民眾分為對立的兩類人群。篩選差分過程並不完全以階級劃線，但與階級有著密切的關系。家庭出身不好的民眾脫離落後群體升入先進群體，可能性是很小的，大多數人只能在原地踏步。帶有階級分裂色彩的黑五類有明顯的標籤，是很明確的，經過篩選差分被淘汰的落後群體則是暗的、不明顯的。盡管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確實存在。人們的社會地位，依類別順序，第I類最高，第VI

類最低。文革時的中國社會，可以說是一個以階級劃線分為優勢群體和劣勢群體，以篩選差分劃分為先進群體和落後群體的分裂的社會。

處於較高地位的人，包括黨員、團員、靠近領導的人、勞動模範，以及出身於革命家庭和工人貧下中農家庭，或表現積極的人。這些人在提拔、分配工作和調整工資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而且有整別人、自己不會挨整的特權。他們是黨和政府信任和依靠的對象，是黨組織多年培養訓練的積極分子。他們的優勢地位，是文革前的制度賦予的，理所當然地是文革前制度的維護者。他們肯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肯定文革前的官僚集團。處於較低地位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表現不太好的人，或者出身雖好但表現不理想的人，還包括在分配工作、調整工資和分配住房等方面因掌權者的壓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或在某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打擊的人。這些人一直感到官員領導對他們的壓制，看到官員被打倒，有一種痛快的感覺^[316]。各省有一個共同的現象：保守派有“五多”，即紅五類多、黨員多、團員多、幹部多和積極分子多，他們是文革前秩序的受益者。造反派中則包括從紅五類到黑五類的各種人，其中有不少是曆次政治運動中各單位的受害者或受牽連者^[317]。不同的等級地位和現實處境所產生的不同等級利益，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根本區別^[318]，兩派都極力維護自身的根本利益^[319]。優勢群體和劣勢群體是以階級劃線的兩個群體，它們之間的沖突基於階級矛盾。

當今的中國，仍被這一階級矛盾困擾。當年的保守派與造反派，直至今日在政治訴求上完全對立，沒有共同語言。例如本書第一篇提到的南京師範大學附中，經過半個世紀，當年的兩派仍沒有相同的理念和價值觀。保守派的多數人還在懷念毛時代，仍然贊同共產專制。

除了保守派與造反派的鬥爭以外，在同一陣營裏的造反派內部，也存在著分裂和鬥爭。造反派為什麼要鬧分裂打內戰，甚至發展到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地步？按照當時流行的解釋，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三條：一是走資派的幕後挑動，二是混入群眾組織的壞人搗亂破壞，三是造反派自身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文革中的全面內戰，兩大派都有後臺。除了中央文革到處插手外，地方上的實力派（即那些在中央有保護者和支持者的當權派）也不甘寂寞，尤其是軍方。軍方的立場並不一致，地方軍區的立場和野戰軍的立場常常不一樣。群眾間的派別鬥爭，往往反映上層各派的權力之爭。在兩派惡鬥不休的地方，恰恰因為雙方的後臺都紅都硬。上層的鬥爭相持不下，下面的鬥爭也就沒完沒了。胡平提出：“造反派鬧分裂打內戰，其源蓋出於競爭，出於比賽革命。”造反派中的激進派，未必都是因為激進才分裂，有不少是因為鬧分裂才變得激進，因為分裂總得有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整個文革的氣氛是寧左勿右，所以分裂出來的一派大多以更激進的面目出現。一旦你扮演了激進的角色，以後的戲就得接著唱下去。到頭來，連自己都弄不清楚究竟是因激進而分裂還是因分裂而激進^[320]。

造反派組織出現“山頭”，是自然的過程，根本原因是造反派的指導思想和制度根源。造反派一旦成為領導人，路線鬥爭的觀念、權力鬥爭的手腕、個人英雄主義和“以我為中心”的權欲就會表現出來。沒有民主法治的觀念，沒有制度創新的合理目標，造反派組織一旦壯大起來，就會成為獨霸一方的“山大王”^[321]。此類派性矛盾的激烈性，不亞於“階級性派別”之間的鬥爭。這類分裂大多因“一月革命”奪權引發。我們可以把這些“派性派別”的分裂劃分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排斥型”分裂。當“一月革命”風暴席卷全國時，許多地區的保守派已經被打垮，取得勝利的造反派進入奪權階段。在奪權中，造反派通常為在奪得的權力中分一杯羹翻臉。這些造反派的領導們，當初沖破壓力挺身造反時，並未想到能夠奪權掌天下。當造反派真正開始奪權了，他們的野心和權欲就被誘發出來。如果他們聯合與自己旗鼓相當的戰友，意味著自己只能分享一半的權利。如果單獨動手，就可能奪到完整的大權，也不枉冒風險造反一場。這是涉及一派人重大利益的大事，誰也不甘落後。例如江蘇的造反派在打垮保守派“赤衛隊”以後商議奪權，會議期間成立以“南大紅色造反隊”領導人文鳳來為首的“奪權委員會”。有代表指責會議缺乏民主，宣布退出會議，因為“南大八.二七”的領導（曾邦元等）竟被排除在委員會之外。雖然“南大八.二七”原是“南大紅色造反隊”的外圍組織，由於它對成員的政治條件要求較低，吸引了大量的南大師生，其規模超過“南大紅色造反隊”。此時的“南大八.二七”已經今非昔比，再也不甘心屈居外圍組織了。憑借強大的實力，“南大八.二七”和“南京八.二七”原以為能在奪權中分享勝利成果。然而，文鳳來等人根本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商議奪權分享成果根本不讓他們染指。這種排斥昔日的戰友、獨吞勝利果實的做法，理所當然地遭到對方的強烈反彈。以“南大紅色造反隊”為首的“好派”奪權，遭到“南大八.二七”為首的“P派”的堅決抵制。過去同一戰壕的戰友成為死敵，雙方大打出手，死傷無數。安徽省也發生類似的情況，連派別的叫法都相同：反對奪權的叫“P派”，支持奪權的叫“好派”或“好極了派”（即“G派”）。我們把這類分裂稱為“排斥型”分裂，因為一派在奪權圈內，另一派在奪權圈外。

第二類是“爭核心型”分裂。此類分裂，是造反派內部爭奪核心地位和領導地位引起的。湖南的“高司”與“湘江風雷”之爭就是一例。湖南的保守派因中央表態瓦解，面對大好形勢，湖南的造反派卻在奪權的問題上分裂了。“高司”由長沙8所高校的紅衛兵組成，約2萬多人。“湘江風雷”在全省約有百萬之眾，主要由工人組成，還有社會各界人士。“高司”在文革初期充當造反先鋒，是他們率先起來造反，喚醒了民眾。日益壯大的工人造反組織是他們幫助建立的，“高司”首領們理所當然地自視為湖南省的造反派首領。羽翼豐滿的“湘江風雷”的工人造反派們雖然承認“高司”的貢獻，但已不再把這些學生放在眼裏。他們認為，知識分子

雖然有先鋒和橋樑的作用，但只有工人階級革命最徹底，是當然的領袖。“湘江風雷”拒絕承認“高司”在造反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高司”自然不能接受。昔日的盟友成為敵手，打得不可開交。

第三類是“爭席位型”的分裂。此類分裂，是造反派內部為爭奪在新政權中的席位造成的。爭奪席位的現象全國各省普遍存在，例如湖北的“鋼新之爭”。“七·二零事件”使“百萬雄師”瞬間瓦解，“鋼派”與“新派”隨即陷入激烈的權力鬥爭，矛盾的主要焦點在於席位。寧夏的保守派瓦解後，造反派很快與軍人在革委會人選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一分歧導致造反派內部的分裂。四川的成都也是如此。隨著對立的保守派的倒臺，成都的局勢並未走向安定，造反派發生重大分裂，原來一條戰壕裏的戰友變為誓不兩立的死敵。雙方如同當初與保守派對抗一樣，各自搶奪地盤，爭權奪利。造反派的“派性派別”鬥爭主要表現在爭奪權力上，原因有二。（1）害怕對手一旦掌權，使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2）渴望通過掌握權力擁有各種好處。這是因為，各種資源和權力對於他們來說非常稀缺。計劃經濟時代的普通老百姓，賴以生存與發展的一切，幾乎完全受控於那個高度集權的政體。只要舊有的體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他們不可能改變這種境遇。一旦讓對手掌了權，就意味著會與文革前一樣。曾是同一戰壕的戰友，此時成為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對立的任何一方感受到來自對方的威脅時，權力之爭變成維護自身生存權力的鬥爭^[322]。權力鬥爭源於下層等級中相對不同的社會地位所產生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的分歧，文革使這種權力鬥爭無一例外地演變為慘烈的武鬥。

第四類是“官僚介入型”的分裂。地方黨政官員及軍隊勢力對造反派的分裂產生了重要作用，因為他們是權力的象征，具有重要的影響和作用。中國權力的本質，來自於毛為首的官僚體制。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局勢或實現某種目的，這些官僚往往打著毛和中央的旗號。毛有意無意地在他的話語中留下相當大的模糊空間，為這些官僚的一些行為提供了較大的合法性，他們實際上分享了毛的部分權力。例如浙江省的造反派在中央表態後聲威大振，但在奪權問題上分裂為兩派。一派堅持要打倒原省委書記江華，另一派則要保江華。反江華的一派得到中央文革、空5軍和20軍的支持，保江華的一派得到省軍區的支持。福建省也是如此：福建省委隨著省委書記葉飛的倒臺出局了，軍區和當地駐軍分裂成兩派。福建軍區司令、31軍和空軍支持一派，軍區副政委、28軍和高炮支持另一派。兩派之爭，實際上演變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角力。處於前臺的兩派群眾組織你死我活地搏鬥，深受處於後臺的官僚的介入和指使。不幸的是，最後的事實證明，造反派只是為人火中取栗的“倒黴蛋”。這些官僚在文革結束後大多複出，得以善終，造反派則受到嚴厲的懲罰。

最後一類是“掌權宗派型”的分裂。造反派進入權力機構以後，在掌權過程中發生分裂，例如江西省革委會中的造反派。勝利後的造反派在省革會中很快分裂為兩派，一派叫做“好派”，另一派叫做“P派”。“好

派”人多勢眾，得到一些地方高級領導幹部的支持。“P 派”雖然是少數派，卻有個強硬的後臺。黑龍江省也是如此，革委會的成立並不意味著矛盾的結束。省革委會的副班長暗中整省革會主任潘複生的材料，結果被後者以反革命罪抓進監獄，與副班長一派的造反派則公開打出反潘旗號。盡管此類分裂並不以權力鬥爭的面目出現，但在實質上與權力鬥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無論是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階級性派別”鬥爭，還是造反派之間的“派性派別”鬥爭，都圍繞一個“權”字。“湖北鋼二司”主辦的一份小報赤裸裸地說穿這個要害問題：“革命大聯合以誰為核心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革命的領導權掌握在誰手中的問題。‘權’是革命的根本問題。……鋼工總是久經考驗的，是江城文化大革命的頂梁柱。她來為革命掌權和用權，我們就一百個放心！作為鋼工總人，為個人爭權，為小團體爭權，當然是錯誤的。但是為革命掌權，為無產階級掌權，就是要當仁不讓，理直氣壯！決不要怕人議論譏笑，絕不能手軟！也絕不能糊塗。”^[323] 聲稱“為無產階級掌權”，是為了使“爭權”合理化。“湖北鋼派”與“湖北新派”的權力角逐打著革命的旗號，其實是出於各自切身利益的需要。

造反派的分裂類型不是排他性的（Exclusive）。一個省的造反派分裂，可以同時有幾種類型。例如，“官僚介入型”分裂在許多省中均有體現，同時這些省的造反派分裂，還有諸如“排斥型”和“爭席位型”等其他原因。一言以蔽之，“階級性派別”和“派性派別”的鬥爭都是圍繞權力進行的。前者是既得利益者與挑戰者間的矛盾，後者是挑戰者之間權力再分配之爭。

如何避免以上的各類分裂，對未來具有借鑒意義。處理解決第一類“排斥型”分裂的矛盾，體現領袖人物的政治水准。張春橋處理上海奪權時的矛盾和問題的表現，讓人叫絕。上海奪權時，在成立宣言的署名上遇到難題。上海當時有 32 個較有影響的群眾組織參與奪權和宣言的起草，署上它們的名字是很正常的事，但這一行動遇到來自兩方面的壓力。在內部，32 個組織中，有的對排名順序不滿意，要求把本組織的名字排在前面。在外部，聽說要成立上海市新政權，600 多個群眾組織一下子冒了出來，都想擠進權力機構，占一席之地。面對這一困境，張春橋沒有像江蘇的文鳳來那樣獨斷專行，而是召集 32 個群眾組織的代表開會。張提出，宣言上不署具體組織的名，但是許諾 32 個組織的代表是當然委員。就這樣，張春橋成功地化解了危機，避免了因奪權引發的造反派分裂，其領導藝術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可見一斑。這也是上海局勢一直比較穩定的原因之一。

解決第三類“爭席位型”分裂，最有效的辦法是選舉。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則，誰得票多誰當選，無論輸贏都會服氣。北京大學進行的全校選舉中，有選舉權的是 13,836 人，實際在校參加投票的為 9,609 人。聶

元梓順利當選北京大學文革主任，42名校文革委員由各系選舉推出。但是這樣的選舉也有問題。天津的革命委員會奪權籌備小組是經過選舉的，林啟予進入籌備組。天津市作為試點，成立了“五代會”。選舉中落選的造反派領導人張承明公開站出來另立山頭，與“五代會”分庭抗禮。由於此次選舉帶來的問題，中央文革認為“選舉不如協商”。因為協商可以讓大家討論，有進退的餘地，選舉一唱票，誰也沒法改。所以，其他各省的革委會組成都是采用協商的方法，很少通過選舉。采用協商的辦法，又為無休止的爭席位開啟了大門。關鍵在於沒有設立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不能因為沒有選上就破壞規則，另起爐灶。

“一人一票”選舉原則的另一個問題，是無法照顧山頭的利益。這是解決第二類“爭核心型”、第四類“官僚介入型”和第五類“掌權宗派型”易造成分裂必須考慮的問題。如果只有一個席位（如革委會主任），問題相對簡單，誰得票最多誰當選。如果有多個席位時，問題就複雜了。相應的辦法有幾種。第一種是比例代表制。譬如，革委會有50個席位，有三個群眾組織分別獲得20%、30%和50%的選票，三個組織瓜分的席位為10席、20席和30席。第二種是簡單全票制。所有具有選舉資格的人投票選50人，誰得票最多誰當選。簡單全票制的問題是，很有可能那個占總人數最多的組織拿下全部的席位，所以在選舉中一般不采取這一方法。遺憾的是，當年偌大個中國，沒有人想用選舉的辦法來解決席位的爭端，而是用拳頭、刀劍和槍炮說話。

18.9 並非逍遙的逍遙派

“社會沖突派”和“政治過程派”學者們，試圖通過社會分裂、階級差別與派別選擇之間的關係，推測民眾參加派別的原因。這是一種間接的方法。必須強調的是，參加某派組織僅僅是一種手段，並不是民眾參與文革的目的。盡管在許多情況下，參加某派組織能夠部分地體現個人的目的，但這終究只是一個近似的替代變量（Proxy）。

前面的章節對個人參加群眾組織的原因進行分析，獲得更直接的發現。由於各種原因，文革中有部分民眾沒有參加群眾組織，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文革中置身事外。在我們的問卷調查受訪者中，有42%的受訪者明確地表示沒有參加任何群眾組織（共計703人^[324]），可是有些受訪者卻在“為什麼參加群眾組織的原因”一欄裏仍然做了選擇。根據分析，我們判斷他們並沒有參加組織。以下是那些雖未參加組織派別卻仍回答參加原因的受訪者情況：

表 18.12 未參加過群眾組織的民眾的原因分布

	家庭出身				Fisher' s P 值
	革幹革	工農	灰五	黑五	

		軍 (77)	(217)	類 (197)	類 (181)	
響應毛的號召 (Y1)	是	16 (76%)	43 (56%)	24 (46%)	15 (35%)	<0.0001
	否	5	34	28	28	
改善政治經濟 處境 (Y2)	是	1 (5%)	8 (10%)	8 (15%)	9 (21%)	0.0017
	否	20	69	44	34	
對當權派不滿 (Y3)	是	0 (0%)	2 (3%)	5 (10%)	7 (16%)	0.0003
	否	21	75	47	36	
同情受打壓者 (Y4)	是	3 (14%)	15 (19%)	13 (50%)	15 (35%)	0.1879
	否	18	62	39	28	
受親友影響 (Y5)	是	2 (10%)	17 (22%)	8 (15%)	4 (9%)	0.0014
	否	19	60	44	39	
其他原因 (Y7)	是	0 (0%)	0 (0%)	2 (4%)	1 (2%)	0.0483
	否	21	77	50	42	
不滿和 / 或改 善 處 境 (Y8) [325]	是	1 (5%)	10 (13%)	12 (23%)	13 (30%)	0.0001
	否	20	67	40	30	
無回答 (正確回 答)		56	140	145	138	

上表顯示，有些受訪者雖沒有參加派別組織，但並沒有完全置身事外，內心是有企圖有目的的。在響應毛的號召上，呈現革幹革軍、工農、灰五類、黑五類子弟依次下降的現象，各類之間的差別有顯著意義。在改善處境（Y2）、對當權派不滿（Y3）及改善和 / 或不滿（Y8）這些方面，則呈依次上升現象。換言之，紅五類子弟以響應毛的號召為主，黑五類和灰五類子弟則以心懷不滿、改善處境為主。這一結果，與參加群眾組織的受訪者是一致的。盡管這些屬於誤答，不能作為依據，但是民眾的訴求卻可以從中略見一斑。

18.10 群眾運動的組織形式

前面探討群眾組織的派別問題，現在討論群眾組織是如何操作運行的。文革期間的群眾組織同一些正式組織一樣，有自己的章程和組織制度，但是極具有文革色彩。較大型的群眾組織一般都會有個宣言，表明該組織的立場和鬥爭目標，通常用當時最流行的語言。如“湖北鋼工總”的宣言用了“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等一類的話。湖北的造反派把“打倒王任重”作為戰鬥目標。這些組織還會有一個組織綱領，如實行民主集中制、堅持“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原則、要求個人服從組織和小局服從大局等^[326]。對於參加組織者，也有明確的規定。如雲南的一個造反派組織規定，凡參加該兵團的成員必須具備下列條件：（1）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遵循林彪副主席的教導，既要把自己當成革命的對象，又要把自己當成一份革命力量，參加革命鬥爭，並在鬥爭中改造自己。（2）認真並堅決貫徹執行本兵團的聲明和組織章程。（3）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而又堅持不改的幹部，都可申請參加。參加手續是：（1）本人申請，（2）經團隊批准。對於下屬組織也有規定，如各單位戰鬥兵團和隊組織需經兵團團支部批准^[327]。

其次，群眾組織有完備的機構，與官方的黨政軍部門相似。規模較大的組織一般會有總部或委員會。總部負責組織的日常領導工作，設有中心組或勤務組，領導人或骨幹都稱“勤務員”。中心組一般下轄辦公室、政治部、組織部、宣傳部、作戰部、對外聯絡部、秘書組和後勤組等常設部門。也有的組織模仿軍隊編制，把成員編為團、連、排和班。大組織還會有多層機構，以便於管理。如“湖南湘江風雷”建有四級機構，第一級是總司令部，第二級是分司令部和戰團，第三級是支隊，第四級是分隊。分司令部和戰團是地區級的，支隊是單位級的。有的支隊因為本單位不大，所以沒有下屬的分隊^[328]。福建的紅衛兵組織也是如此，他們十分重視基層建設，下設較完整的直屬分部（或稱分隊）。“毛澤東思想福建革委會”（簡稱“革委會”）有十個直屬分部，各直屬分部內部具備健全的組織機構，內設勤務組以及分管組織、宣傳、秘書和外事。除總部直屬分部外，各組織在大學中學均設有分部。每個組織還在全省各地設有指揮部，以便統一指揮^[329]。

清華大學“四派”的組織機構分為四個層級。最高層為總部委員會，下轄總部辦公室、作戰部、政治部和行政總勤務站。在第二級層面上，作戰部下轄校內外運動常務部、鬥蔣作戰部、鬥批改辦公室、保衛組專政組、全國動態組。政治部下轄幹部辦公室、幹部參謀組、組織部、宣傳部和聯系各系分部。在第三級層面上，全國動態組下轄辦公室、軍事口和各地動態。宣傳部下轄廣播臺、井岡山四·一四報、動態組、簡報組和宣傳隊。

清華大學“團派”的組織機構分為五個層級。最高層為總部委員會，下轄總部辦公室、作戰部、政治部和後勤部。第二級層面上，作戰部下轄對內作戰部和對外作戰部。政治部下轄辦公室、學生部、教工部、二辦（幹部辦）、組織部、宣傳部、科技、財務和生活。在第三級層面上，對內作戰部下轄辦公室、保衛部、羅－李專案、鬥蔣兵團、八五支隊專案組、第三編輯組、鬥批改辦公室和文攻武衛指揮部。對外作戰部下轄辦公室、動態組和全國聯絡站。教工部下轄工總司和教工分部。宣傳部下轄井岡山廣播臺、前哨廣播臺、井岡山報和井岡山雜誌。在第四級層面上，保衛部又下轄政保組、保衛組和一科。動態組下轄一動（井岡山通訊）、二動（四．一四動態，校內）、三動（全國首長）、四動（中學動態）和五動（軍事動態）。可見，大學群眾組織的機構相當嚴密^[330]。

第三，群眾組織的成員構成有兩大特點。領導層的成員（即勤務員），大多由出身好（紅五類子弟）、本人政治面貌好（黨員）的成員擔任。在選擇這些成員時，會考慮平衡各個山頭間的關係。頭面人物一般由出身好、造反早和影響大的人物擔任。如福建的鄭火排家庭出身貧民，又是學生黨員。湖北的胡厚民、朱鴻霞和江蘇的文鳳來等，都是出身好、本人政治面貌好、影響力巨大的造反人物。對於組織的一般成員的要求相對低一些。有的組織（如山西的“決死縱隊”）甚至不要黨員，是“清一色的工人階級”。但是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對於刑事犯都是不歡迎的^[331]。領導人的選擇，有的遵循“巴黎公社”選舉原則，各級代表由群眾充分討論，選舉產生。如北京大學的校系兩級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民主選舉，採取“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聶元梓當選北京大學文革主任，其他42名校文革委員由各系選舉推出。也有的採用推選領袖的方法。如上海“工總司”的王洪文被推選為一號領袖，湖北“鋼派”領袖胡厚民和朱鴻霞等人也是通過推舉產生的。原則上，各級代表和領袖人物如果不稱職，通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每個成員有申請加入和自由退出的權利。

第四，組織的名稱雖然五花八門，但仍有一定的規律可尋。無論是大派組織還是基層的小組織，一般按照以下幾種方式命名。（1）使用中國革命的詞句和術語。如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北京航空學院的“紅旗”、南京大學的“紅色造反隊”、湖南的“湘江風雷”、山西的“敢死縱隊”、北京大學的“延安戰鬥隊”和廣州的“東風派”等。（2）以偉人或烈士的名字或革命聖地來命名。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魯迅兵團”和“井岡山兵團”等。（3）以具有特殊意義的日期命名。如南京大學的“八．二七”、福建“四．二零革造會”、四川重慶的“八．一五”和四川成都的“八．二六”。（4）取用毛的詩詞命名。如北京大學的“橘子洲戰鬥隊”、南京市下關區服務行業的“下五洋捉鱉戰鬥隊”等。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名稱，生動地反映了文革話語體系的特征和屬性。

文革時期，中國的通信聯絡技術相當落後。本市主要通過有線電話，外地主要依靠長途電話和電報。對於瞬息萬變的文革形勢，尤其是武鬥期

間的調兵遣將，遠遠不能適應。一個單位被對方包圍，從消息的發出、求救信號的傳送、上級指揮部發出增援令、隊伍的集結、增援部隊的行進，到最後的解圍，無不需要準確和及時的同步協調。當時的人們，充分運用土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許多大型工廠、機關和單位人員居住相對集中，出現情況時人們可以一呼百應，不需要一家一家地通知。例如新疆的保守派人員包圍毛紡廠的工人住宅區，強行搜查丟失的步槍。但是他們很快被毛紡廠的對立派團團圍住，無法輕易脫身。另一個有效的通訊聯絡工具是有線廣播。這是文革中最常見的宣傳工具，同時也是最有效的聯絡工具。一旦需要發出緊急通知，召集人馬，平時的宣傳工具立即成為召集成員的集合號。集中的居住和簡陋的有線聯絡網，為派別鬥爭（特別是武鬥）帶來便利，彌補了通訊技術落後的不足。

文革前夕，中國的社會經過建政以來 17 年一系列的政治鬥爭，已經兩極分化，充滿以階級為線和不斷篩選差分所造成的社會矛盾。文革的發動，給了中國民眾（尤其是受壓迫的低層民眾）一次絕好的翻身機會。抱有不同目標的民眾為了自身的利益，形成三大群體：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這三個群體與黨內的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進行了一場非合作式的、不完全信息的博弈。這是一場混戰。由於中國的經濟落後，資源極為匱乏，這 6 個群體間的搏鬥異常劇烈。他們之間沒有真心的合作，也沒有持久的聯盟，關心的只是自身的利益。1967 年初，在“一月革命”的影響下，各省的保守派基本被打垮。造反派在大好形勢下，未能充分利用機會鞏固來之不易的勝利，而是立即陷入分裂和你死我活的派戰。中國陷入激烈的內戰，天下大亂。如果沒有分裂，沒有造反派的內訌，中國的這段曆史或將改寫。可惜曆史沒有“如果”。

第十九章 文革群眾運動的自毀

前一章論述群眾組織為什麼分派，以及是如何組織的。由於各省的分裂，群眾組織陷入你死我活的派戰，中國處於內戰狀況。這一形勢是毛及其追隨者沒有預料到的。這一章將討論文革群眾運動的內鬥和自毀，試圖回答群眾運動“為什麼”和“如何”走向自毀的結局。

19.1 文革的武鬥^[332]

文革結束後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鬥事件調查組”，於1978年6月至1979年8月，經調查後統計得出：從1966年至1975年間，向當地革命委員會、政法部門和軍管會（組）報案備案傷亡10人及以上的武鬥事件有57,227件，其中傷亡100人及以上的武鬥事件有9,790件。地方駐軍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報親屬失蹤的有227,300多人。

以下僅舉幾個有官方檔案可查的地區為例。《黑龍江省文革大事記》記載，1967年8月27日下午2時許，哈爾濱674廠和港務局等單位的造反組織出動裝甲車一輛、坦克3輛共1,000人，在市內舉行武裝遊行。28日下午2時多，674廠和港務局200餘人手持機槍、步槍和手榴彈等，在兩輛坦克的配合下，用機槍掃射另一派造反派組織人員，造成12人死亡20人受傷。《寶雞市志》記載，1968年6月6日，陝西寶雞岐山縣蔡家坡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涉及岐山、扶風、眉縣、隴縣、鳳翔和寶雞等6縣1市的30多個單位。參加武鬥的有800多人，動用不同口徑的土炮40門，各類槍支500餘支，手雷近千枚以及坦克等重型武器，當場打死20人，打殘32人。湖南懷化的《懷化大事記》記載，1967年8月1日，黔陽地區兩派群眾組織展開武鬥。在其後的3個月時間裏，發生全區性武鬥18次。武鬥期間，兩派都成立指揮機構。全區12個縣和地直機關、單位和廠礦，共有3,000多人分別在不同場合參加武鬥。黔陽軍分區、各縣武裝部和47軍415團等單位的部分支左人員，也介入武鬥事件。武鬥中，兩派動用各種槍支6,700多支，子彈75萬多發，60炮12門和手榴彈5,000多枚。武鬥中共死亡268人，耗費糧食220萬斤，資財508萬元。

文革中，武鬥雙方使出渾身解數，試圖打垮對方。凡是能得到的常規武器都用上了，從冷兵器的刀、劍和長矛到熱武器的手槍、步槍、機關槍、手榴彈、火炮和坦克。從這個意義上看，說文革是一場“內戰”並不為過。

19.2 文革中獨一無二的“海戰” ^[333]

文革中的武鬥基本上屬於陸戰，1967年8月8日發生在四川省重慶市的一次武鬥卻是例外。兩派在水上進行戰鬥，被稱為“重慶八·八海戰”。當日下午4時，一支由3艘武裝艦艇組成的“重慶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第一艦隊”沿長江溯流而上，向上遊的九龍坡駛去。艦隊此行的目的，是給國營建設機床廠的“反到底派”的戰友送去4門陸用三七炮（配備數百箱炮彈）、大批藥品、香煙、生豬和糧食。艦隊還打算運回一萬多支半自動步槍。打頭陣的“望江101號”原是國民黨的江防艦，艦長約40米，本是望江機器廠的交通艇。經過改裝，該艦前段裝有一門雙聯海三七高炮和一挺海四聯14.5毫米高射機槍，後段裝有一門雙聯海三七高炮和一挺海二聯高射機槍。緊隨其後的是“人民5號”。該艦過去是一艘美制登陸艇，在運輸物資途中，被劫來重新裝上鐵甲。該艦船頭駕駛臺左右兩側，各安裝一門陸三七高炮。駕駛臺前裝重機槍一挺，駕駛臺後裝高射機關炮一門，船尾裝海三七高炮一門。該艦的旗杆上高懸“反到底一號”的標志，是艦隊的旗艦。墊後的“嘉陵1號”，原是國營嘉陵機器廠的運輸船，由望江廠改裝成炮艇，參與艦隊的行動。

從望江廠到建設廠40餘公里的長江航道兩岸，是“八·一五派”的勢力範圍。艦隊駛達唐家沱，這裏有一個東風造船廠，是西南最大的造船工業基地，此地的“八·一五派”有一定的實力。艦隊的炮手們，對著岸邊龐大的浮船塢和輪船一陣猛轟。隨著陣陣爆炸濃煙的升起，岸邊的“人民6號”等多艘輪船起火，多人死傷。

艦隊來到兩江交匯的朝天門，這裏是進入重慶市區的門戶，“八·一五派”的鐵杆組織“長航兵團”和“港口兵團”總部駐紮在這裏。“八·一五派”拉響緊急警報，十萬火急呼叫“長江207號”、“人民28號”和“人民30號”等幾艘船只馬上駛向長江，武裝攔截即將抵達的“反到底派”艦隊。艦隊的炮手們朝對方船只和港口陣地開炮，民用拖輪“長江207”顯示大無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被無情的炮彈擊中，迅速起火燃燒，僥幸未死的勇士們只得棄船跳水逃命。他們遭到艦載機槍的瘋狂掃射，不少人腦漿迸裂，葬身魚腹。兩艘非武裝的小型火輪“水運104號”和“水運204號”看見“長江207號”起火，迅速開進長江，企圖對其施救，但被機槍子彈擊穿頂篷，只得被迫退回小河，以求自保。隨後趕到的“人民28號”從嘉陵江口駛出。“八·一五派”戰士手持步槍和沖鋒槍，面對旗艦“人民5號”一陣狂射。無奈密集的子彈在艦艇厚實的鐵甲鋼板面前無能為力。在“反到底艦隊”的三七高炮平射下，“人民28號”頃刻中彈傾

斜。船的高壓油箱被打壞，熊熊烈焰直沖天空。船體隨波逐流，到下遊數百米處的岸邊沉沒。“反到底艦隊”又集中火力，猛攻剛剛趕到的“人民 30 號”。數十發炮彈在該船周圍爆炸，船尾受傷，不得不帶傷拼命退回嘉陵江內，躲避鋒芒。

“望江 101 號”完成護航任務後返航，沿途又擊傷多艘輪船。

“反到底艦隊”的旗艦和“嘉陵 1 號”逆長江繼續上行，到達黃沙溪江面。艦隊遭到南岸國營長江電工廠“八一兵團”的猛烈射擊，旗艦上出現多起傷亡。艦隊立即開炮，長江電工廠的油庫被擊中燃爆，拖輪“長江 1 號”被擊沉。

因武鬥交戰被圍困多日的建設廠“反到底派”，早已陷入斷炊境地。隨船送來的 4 門陸用三七炮以及活豬、罐頭和其他日用品，無異於雪中送炭。絕地逢生的他們，後來把“八·一五派”趕出該地區，取得“八月戰爭”的階段性勝利。

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海戰”中，“反到底艦隊”共發射炮彈 1,975 發，機槍子彈難以計數。據文革後官方出版的《重慶大事記》記載，“當場打死 24 人，打傷 129 人，打沉‘長江 207 號’等船只 3 艘，打壞 12 艘，長江航運為之中斷數月之久。”

19.3 武鬥的戰場紀律

文革期間的兩派武鬥雖然堪稱內戰，但是與真正的戰爭還是有差別。無論在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壘的武鬥中，還是在分裂的造反派的沖突中，大多數參加武鬥的兩派群眾，最多只是業餘級的戰士。武鬥人員未受過正規訓練，有的只是在戰前受簡單的訓練，於是在戰場上洋相百出。有後面的人胡亂開槍，打死前面沖鋒的自己人，有投手榴彈不拉弦，還扔到戰友面前的。戰場上沒有嚴格的紀律，來去自由；打累了打怕了，可以自行退出戰鬥，沒有人會硬逼著隊員上戰場。

更要命的是，大的戰役往往缺乏統一的指揮，下屬部隊不知如何打。陳益南在回憶中講述他的一次武鬥經歷。一路上，向湖北省湘潭市進軍的汽車，遠不止“青年近衛軍”一個組織的人。有幾十個造反組織的旗幟，出現在一輛又一輛飛馳的汽車上，車上是荷槍實彈、情緒高昂的武鬥人員。武裝車隊在離長沙市 20 多公里的一處高山邊停下來，這時天已全部黑了。只見長長的车隊像一條烏龍，汽車燈光組成了兩串平行的星鏈，一直向後延伸，彎彎曲曲，直到看不見的地方。後來車隊又前進，其實並沒有人發出繼續前進的命令。前面那輛汽車開動了，後面的汽車馬上啟動跟了上去。後來車隊又停下不動，同樣沒有人來通知是該休息，還是在車上待命，一停就是幾個小時。如果

此時對立派“高司”來襲擊，這批造反派肯定會遭受重大傷亡。很幸運，“高司”的軍事指揮水平也不高^[334]。

武鬥中的人們殺紅了眼，時有殺俘現象。四川省西昌鐵路退休職工楊里克曾記敘過一件殺俘事件。武鬥期間的一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口渴，就到工廠食堂找水喝，看見4個武鬥隊員在悄悄商議什麼。工廠食堂裏關押著一個成都知青，是對立派的武鬥隊員，是被當地農民捉住後交給他們的，據說他對當地農民很凶悍。他20出頭，中等身材，身體非常強壯。但是送來時被暴打一頓，已經奄奄一息。武鬥隊員騙他說，準備釋放他，他強打精神，勉力而行。在漆黑的夜裏，一行人向工廠旁的海河邊走去，周圍都是齊腰深的荒草。那位知青發覺情況不妙，便開始哀求饒他一命。他說家裏還有一個孤苦無靠的老母親，非常可憐，說著說著就停下不走了。武鬥隊員們威脅他，不走就當場打死他。事已至此，插翅難逃。他絕望地抬頭仰望星空，發出一聲長歎：“難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後一天嗎？”說完後他就再也不說話，默默隨著他們來到河邊。他一個人站在海河岸邊，身後是4名武鬥隊員。楊里克站在一群人後邊幾米遠，抱著看熱鬧的心態。突然，“砰、砰、砰”，幾聲手槍聲劃破夜空。成都知青身中數彈，應聲落入水中。沉入水中的知青慢慢浮出水面，無聲無息地順流向下游漂去。殺完人後，5個人默默返回。中途，沒有開槍殺人的楊里克說了一句：“這年頭，殺個人比殺只雞還容易！”^[335]

19.4 一個葬送一線希望的爆炸

清華大學的“百日武鬥”，是文革曆史中的一個重大事件。這是因為，首先，它作為文革中的武鬥典型曾經轟動全國。雖然在規模上，該武鬥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它發生在首都北京，全國的最高學府，曆時3個月，死傷數百人，戰況十分慘烈。尤其是1968年5月30日一仗。雙方近千名現代大學生，身穿護甲，手持長矛，在東大操場擺開原始陣形，血淋淋地相互搏殺，實在是驚心動魄。其次，它是全國文革曆史的一個轉折點。清華大學武鬥進行到1968年7月27日，數萬首都工人進清華大學制止武鬥，發生大規模的流血事件。這一事態，使得全國文革從群眾運動時期轉換到工宣隊時期。工人和軍隊開始占領上層建築，從而導致轟轟烈烈，曆時兩年多的文革群眾運動全面終結^[336]。

“百日武鬥”中，“四派”的100多位戰友被圍在科學館，情況十分緊急。“四派”總部決定從動農館與科學館雙向對挖地道，以解救被圍的戰友。“四派”還采取一系列措施向中央施壓求救，但未果。面對困境，“四派”的領導人沈如槐做出決定，如果被圍的“四

派”人員能夠脫離險境，他將帶領全體“四派”人員撤出清華大學。就在“四派”的地道即將挖通時，“團派”的一位綽號叫做“狗熊”的隊員用地下埋缸法，居然測出了地道的方位，用炸藥把地道炸塌了。有的“老團”聽到這個消息後，大罵“狗熊”是蠢蛋。“老四要逃走，就讓他逃走不好嗎？打了半天，不就是要把老四趕出清華大學嗎？”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狗熊”改寫了清華大學武鬥的結局。如果讓科學館的老四逃出去，沈如槐也跟著撤離學校，也許工宣隊就不會進校了^[337]。

19.5 群眾運動的終結

1968年，全國的武鬥達到頂峰，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採取一些極端的對抗行動。“廣西四·二二派”為了對抗部隊暗中支持和武裝起來的“廣西聯指派”，攔劫援助越南的武器。中央為此發出嚴厲的針對廣西和全國造反派的“七·三布告”。中央要求恢復秩序，態度十分強硬。7月24日，中央又頒布針對陝西和全國各地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要求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必須堅決、徹底和認真地執行毛親自批准的“七·三布告”。

造反派當初作為毛整治官僚們的“石頭”，現在成了實現“天下大治”的絆腳石，成了新生政權革委會的對立面。造反派預感到末日的來臨，在走途無路的情況下，一些省的造反派領袖們聚集北京尋找對策。1968年7月17日，“廣州旗派”負責人武傳斌等在北京航空學院聚會。參加者有“貴州四·一一派”、“廣西四·二二派”、“青海八·一八派”、“遼寧八·三一派”、“河南二·七公社派”、“廣東旗派”和“四川反到底派”等全國著名的造反派。造反派商討對策的聚會，被中央定性為“黑會”。毛對造反派已經失去耐心，決定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群眾組織的問題。軍管和派龐大的工作隊是最有效的辦法。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3萬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強行結束武鬥並接管清華大學的全部權力。兩派群眾組織在內戰中終於同歸於盡。從這一天起，毛利用造反派的戰略終於結束。毛澤東告別了造反派^[338]。

文革結束以後，參加群眾組織的民眾結局如何呢？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最後一個問題是受訪者是否因為參加群眾組織受到審查和處理。我們並沒有明確定義何為“受到審查和處理”，因為各省在處理造反派的問題上有很大的差別，有的省處理較重，而有的省相對輕一些，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此，受訪者的回答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這裏的審查和處理，不僅僅指受到判刑那樣的嚴重處罰。以下是因參加群眾組織文革後受整的情況：

表 19.1 受訪者因參加群眾組織文革後受到迫害的情況

	類別	χ^2 P 值
家庭出身	革幹革軍（16%），工農（19%）、灰五類（23%）、黑五類（28%）	0.0380
政治面貌	紅五類（24%）、中等類（17%）、黑五類（33%）	0.0022
性別	男性（23%）、女性（14%）	0.0115
組織派別	激進派（30%）、溫和派（23%）、保守派（18%）、派別不明者（14%）	<0.0001

上表顯示，家庭出身不同，受整的情況是不同的。受整比例依革幹革軍、工農、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順序逐步上升。從革幹革軍子弟的16%逐步上升至黑五類子弟的28%，且他們之間的差別在統計學上呈顯著意義。政治面貌與受整也呈顯性相關。我們可以看到，政治面貌的作用是兩頭大中間小，即黨團員的紅類和黑五類在文革後受整程度比一般群眾要高。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的身份未能成為護身符，反而是一般群眾的身份能夠逃脫受整治的命運。派別組織的參加，對受整也有關係。激進派受整的最多（30%），其次是溫和派（23%），最少的是保守派（18%）和派別不明者（14%）。所謂派別不明者有兩種情況。一是受訪者沒有填寫派別組織，另一種是本單位的小組織或者自己搞的小組織。此類組織的成員一般活動不多，所以受整程度也低。

下面進一步討論職業與文革後受整的情況。以下是各職業受整的比例：

表 19.2 不同職業的受訪者因參加群眾組織受迫害的估算

中學生	大學生	工人	職員	知青	農民	其他	人數
調整前							
14%	29%	37%	38%	20%	16%	35%	967

調整後							
12%	26%	27%	37%	11%	23% ^[339]	38% ^[340]	959 ^[341]

由於女性參加本次調查的人數大大少於男性，而且大多數職業中女性受整比例低於男性，我們根據女性人數和受整比例進行了調整^[342]。從總體上說，受訪的中學生受整比例最低，只占全體學生的12%，而且我們判斷受整的大多是高年級的學生。由於其他類的人員總體人數（37人）不多，我們不作討論。受訪的大學生受整的比例，相對於知青和農民要高些。但是相對於工人和科員，大學生受整的比例還算是低的。這是因為，文革後大多數的大學生畢業，換了單位，所以受整的機會要小些。工人和科員的單位歸屬相對固定，如果他們在文革中沖擊當權派，文革後容易受到整肅。科員（即幹部、職員和教師）受整是最高的。按照調整後的比例，受訪者因參加群眾組織文革後受整的，工人、農民和大學生大約在四分之一左右，科員受整比例高達近4成。其他人，如中學生和知青，約有十分之一的人受到整肅。總之，文革後受訪者的受整面相當大。

我們建立對數回歸模型，對受訪者是否因為參加群眾組織受到審查和處理進行分析。受訪者的家庭出身（革幹革軍出身作為參考）、本人政治面貌（中等類作為參考）、職業（中學生、知青、農民、無業等作為參考），以及參加的派別（派別不明者作為參考）作為自變量。下表是回歸模型的計算結果（N=704^[343]）。

表 19.3 受訪者因參加群眾組織受審查和處理的對數回歸結果

編號	變量	對數系數	OR 比值比	P 值
X0	截距	-2.6958		<0.0001
X1	工農出身	-0.0963	0.908	0.7217
X2	灰五類出身	0.0074	1.007	0.9771
X3	黑五類出身	-0.0197	0.981	0.9530
X4	紅五類政治面貌	0.1969	1.218	0.3098
X5	黑五類政治面貌	0.5524	1.737	0.1282
X6	男性	0.5845	1.794	0.0080
X7	大學生	0.5691	1.767	0.0152

X8	工人	1.1092	3.032	0.0005
X9	科員	1.1452	3.143	<0.0001
X10	參加過激進派	0.9494	2.584	<0.0001
X11	參加過溫和派	0.4112	1.509	0.1219
X12	參加過保守派	0.3263	1.386	0.3775

如上表所示，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在統計模型中，均變得不顯性相關了（P 值大於 0.05）。這是因為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與其他變量有多重共線性相關的原因，所以在回歸模型中未顯出相關性，具體說明請參見附錄 5。男性比女性更易受到整肅（P 值 = 0.0080）。文革中，大多數造反的領袖（尤其是知名的領袖）還是男性占多數，他們在後來都受到嚴厲的整治。職業與受整的關係，仍保持表 19.1 中顯示的那樣（P 值均小於 0.05），大學生受整比例比其他人高（比值比為 1.767）。工人比大學生高（比值比為 3.032），最高的是科員（比值比為 3.143）。幹部、科員和教師受整的比例較高，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們參加群眾組織，很容易被推舉成為組織的領導人。例如“上海工總司”開始的領導人是潘國平，號稱“潘司令”，但他不是幹部。王洪文不僅是黨員，而且是科室幹部。這樣的人才，在群眾組織中並不多見，所以王洪文一舉成為叱吒風雲、響當當的造反領袖。雖然王洪文缺乏治國安邦的能力和水平，但管理百萬人的工總司綽綽有餘。再如江蘇“好派”的一號領袖文鳳來，是位黨員轉業幹部，擔任南京大學的輔導員。這一根紅苗壯的政治背景，使他順理成章地成為江蘇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第一號領袖。造反派領袖在文革後的遭遇，是路人皆知的，他們幾乎全軍覆沒，幾乎無人逃脫被整肅的下場。其次，由於科員本來是舊體制中的成員，深知內情，所以他們的造反對當權派的殺傷力更大，這樣的人更遭當權派的記恨。一旦昔日的當權派重返政壇，這些當年曾是同盟的科員的下場就可想而知了。相對於不明派別的受訪者來說，參加過激進派的人員更容易受到秋後算賬（比值比為 2.584）。這一結果符合常理，是可以預見到的。溫和派和保守派的受整，較激進派要少一些，相對於不明派別要多一些，比值比分別為 1.509 和 1.386。所以，激進派是最大的受害者。

綜合所有的因素考慮，受訪者中男性（相對於女性）、科員、工人、大學生（相對於其他職業）、激進派（相對於保守派、溫和派和不明派別）更容易受到整肅。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因為有其他因素同時考慮，所以顯得並不重要。我們的調查是全國性的，並具有較好的代表性，有理由相信以上的分析適用於全國的民眾。

19.6 群眾運動內訌自毀的原因和教訓

雖然文革的群眾運動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民眾並非一無所獲。民眾在文革初期對基層黨組織的沖擊，對黨組織的癱瘓起了重要作用。黨組織的癱瘓帶來黨支部專政體制的崩潰，特別是身份等級制度的結束。在文革期間黨組織癱瘓以後，代替掌權的依次是紅衛兵、造反派、革委會和工宣隊。後者力圖恢復文革前的秩序，但是都不成功，群眾中未形成相對固定的等級結構。文革後期黨組織恢復，但已不再是當年的黨組織了。這張由中共各級黨團組織十幾年來苦心經營織成的巨網，一旦破壞就再也無法重新織成了。由於文革的首要目標是解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問題，各級黨委同仇敵愾、一致對敵的局面不再。當群眾運動以空前的氣勢洶湧而來時，一些領導為了自保，往往將同為黨委成員的同事拋出來“頂缸”，即所謂“舍車保帥”，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它使各級黨委成員離心離德，嚴重削弱了黨委的領導能力，黨和黨員的威信和作用均受到嚴重挑戰。就這一點而言，民眾的基本政治訴求得以實現。造反派沒有完全失敗，它完成了這一曆史任務，儘管很多群眾運動的領袖在文革中和文革後遭到迫害。從文革後期開始，基層不再進行劃分左中右的政治排隊，也沒有聽說什麼人被黨支部打成反革命。老百姓有了相對自由支配的生活空間，不再在政治學習會上說些言不由衷的假話。政治迫害當然還有，但是與文革前不可同日而語^[344]。

遺憾的是，群眾運動最終還是失敗了。造反派是被自己的內訌打敗的。他們的失敗，加之中共的故意歪曲，使得造反派的聲名狼藉。1989年發生舉世聞名的民主運動，當年的紅衛兵領袖蒯大富來到天安門廣場，問學生領袖王丹：“假設我支持你們，會不會歡迎？”王丹答道，“你千萬不要支持我們。……你們在我們心目中是什麼形象？你們在我們心目中如果不是壞蛋，至少是笨蛋！……你們在我們心目中始終不是好人。”^[345]

事實上，當年的大多數造反群眾既不是壞蛋也不是笨蛋，他們是犯有錯誤的平常人。造反群眾是文革中出現的“史無前例”的特殊群體。雖然其組成形形色色，因為各地的發展不平衡，表現千差萬別，由於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們의思想和行為有著許多共性。總結他們

的失敗教訓，需要發現他們自身的問題。有學者對此做過研究和總結。

首先，造反群眾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沒有獨立的思考，更沒有人成為出色的政治家，為群眾運動“指點江山”。文革前 17 年形成的思想禁錮，是多層次多方面的。這些桎梏，不是以暴力的形式強制施加於中國的民眾，是通過長期強制性的教育，使民眾自願接受的。在文革中，人們破除思想桎梏，只能從最低的層次開始。民眾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擺脫 17 年以來形成的思想桎梏，達到完全的獨立思考與思想自由。民眾的要求很低，造反群眾的最低政治綱領，就是不要再區分“左、中、右”，不要隨便把群眾打成“反革命”。這種造反的局限性，必然導致他們奪權之後，除了維護既得權益，無所作為甚至走向反面^[346]。

文革中，盛行“懷疑一切”。這是對文革前日益強化的思想禁錮的反彈，是社會政治生活從“聽黨的話”突然轉變為“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轉折時期必然出現的現象。“懷疑一切”在群眾運動形成之初達到頂峰。造反群眾當時最常引用的毛語錄是：“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一定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造反群眾敢於對許多權威進行懷疑，各級黨政軍的領導幹部幾乎都遭到懷疑和炮轟，甚至包括中央文革的成員。但是造反群眾並不是什麼都懷疑，什麼都不相信的。他們迷信毛的絕對權威，有人甚至提出：懷疑一切，就是用毛的思想檢驗一切。符合毛的思想的就要相信和擁護，違背毛的思想的就要批判和打倒^[347]。

其次，造反群眾（包括當時絕大多數的民眾）缺乏正確的思維方式，信奉“非白即黑”的邏輯。這一思維方式過度簡化了複雜的處境。“非白即黑”的思維方式在中國由來已久。建政以來，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在政治運動期間，“非白即黑”邏輯謬誤特別泛濫，它的特點是“一刀切”。在“三反五反”、“反右”和“大躍進”等運動中，許多失誤都是由此而起。不加分析、不作區別、不分青紅皂白，只講左右；左就是正確的，右就是錯誤的。主觀主義和命令主義泛濫成災，給全國的經濟造成嚴重混亂，甚至造成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一刀切”是“非白即黑”邏輯謬誤的一種表現形式。一刀下去切成兩塊；一塊是對的，一塊是錯的。文革從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批黑《修養》到批林批孔批鄧，無不是為了消滅不同意見，全國民眾只能有一個腦袋。文革中對立的雙方互相攻擊都很厲害，但有一個共同點，即都自稱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競相表忠心。文革中極端行為的原因很多，“非白即黑”的思維方式是其中的

一個重要原因。造反群眾內戰不休，是因為思想一元化和獨尊一家的思維方式。這是兩派不能聯合，只能以兵戎相見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哪一派，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權力，有了發言權，就會不容異端^[348]。

文革中雖然官方宣稱實行“大民主”，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不可能享受的大民主，但這只是假象。所謂的“大民主”，是沒有法制保障的虛假民主，只是毛動員群眾的一種手段。毛從來認為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由於長期以來接受階級鬥爭教育，被灌輸“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造反群眾普遍不懂得民主的真實含義。大字報、傳單、小報和廣播中，時常出現不負責任的危言聳聽的內容。對批判對象進行人身攻擊，剝奪對方的發言權、辯護權，甚至以武力使對方屈服^[349]。

第三，擔心秋後算賬的恐懼，始終籠罩著造反群眾的心頭。恐懼的結果是，無論在保守派與造反派對陣的地區，還是在造反派與造反派搏殺的區域，雙方均不能停手，直至自毀。一位西方學者分析北京的大學生運動，認為大學生們鬥得死去活來，既不是為了保護應有的權利，也不是為了爭取新的更多的權益。他們鬥來鬥去，只是為了不輸（Not to lose）。在中國當時的語境下，如果在政治鬥爭中輸了，最輕的結果是事業發展的機會大大減少，最嚴重的結果則是坐牢或身體上的傷害^[350]。

文革前，清華大學學生早已把“黨員的政治優勢”對自己政治生命的價值，鎖定在“共產黨員政治面目（身份標籤）”上。人性的趨利本質，導致聚焦於申請入黨。文革期間黨團組織生活沒有恢復正常，於是他們只能抱住派別集體，趨利避害，爭取進步、當左派。這是兩派紅衛兵共同的秋後夢。雙方在內心深處都在想：“秋後我是共產黨，你是國民黨，我找你算賬！”因為紅衛兵是臨時的，共產黨員才是穩定的正規名稱。先爭取進步當左派，秋後就會成為共產黨員。雙方舉起派性的大旗，只是暫時抱團趨利避害。有人坦言，如果文革重複1957年反右鬥爭的結局，他就會是一個可憐淒慘的右派分子，因此他有一種害怕秋後算賬的恐懼。正是這一恐懼，使他義無反顧地一頭紮進武鬥的深淵^[351]。

第四，造反群眾的失敗，還在於缺乏包容和妥協。按照著名的政治學家拉斯韋爾（Lasswell）^[352]的說法，“政治決定何人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法得到何物。”換句話說，政治通過非暴力的方式決定權力和資源的分配。無論一個人的目的多麼崇高（例如為了天下勞苦大眾的幸福），或者多麼渺小（例如為了一己私利），爭奪有限的權力和資源的鬥爭都是政治行為。要想做到在爭奪有限的權力和資源的過程中不使用武力，只有通過妥協、合作、協商和爭論（有時甚至通

過賄賂和欺騙)來實現。由於資源有限，每個人對權力和資源的願望不可能全部實現，因此在爭奪資源的鬥爭中會有輸有贏。“妥協”和“勝負難料”是政治的兩大特點，但是造反群眾卻很少有人願意通過妥協、合作和協商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

清華大學“四派”第二號領袖孫怒濤先生在文革結束 40 多年後總結認為，妥協是現代政治的重要理念。他說^[353]：

從小到大，我們這一代人見到的是人與人的鬥爭，受到的是階級鬥爭的教育，在鬥爭哲學的熏陶中長大。對於階級敵人，堅決鬥爭不留情面。“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妥協？在無產階級的字典裏沒有這一說。誰想妥協，誰就是機會主義，就是投降主義，就是出賣革命。文革中，尤其在兩派爭鬥中，時時針鋒相對，處處絕不妥協。蒯大富掌權以後迅即打壓不同意見者。他在半年前被工作組整得絕食，此時他整起人來一樣地凶狠殘酷。由此激起更多的清華大學師生站在他的對立面，許多人對他的做派非常反感。成立“四.一四串聯會”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此後蒯大富視“四.一四”為非法組織不予承認，並加緊打壓。兩派爭鬥漸趨激烈，兩派聯合的機會一再喪失。極端思想膨脹，惡性事件頻發，中間群眾被徹底撕裂。分裂前的唇槍舌戰已經不再，代之以真槍實彈的武鬥，造成了人員的重大傷亡和財物的嚴重破壞。分裂不一定必然導致武鬥，但是分裂為武鬥打開了一道閘門。這點是肯定的。

近半個世紀後，我在回憶錄《良知的拷問》中重新評述清華大學文革的這段曆史，認為組織上分裂是“四.一四”所犯諸多錯誤中最嚴重的錯誤。我的這一認識受到“老四”朋友的一致批評和反對，無人公開表示支持。經過三四年的再思考，我仍然堅持這個觀點，而且更堅定。

是的，我們不能以現時的理念和覺悟水平來要求那時的我們妥協處理政治鬥爭。但是我們在評判曆史的時候，應該站在現時能認識到的人性和現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不能還依舊在那時的話語系統中打轉轉。如果當年兩派都能遵守四項協議，在此基礎上實現大聯合成立革委會，雖然清華大學兩派最終還是會被趕下曆史舞臺，文革最終還是要失敗，但是清華大學文革的具體路徑肯定會不一樣的。師生的傷亡也可能會少一點。更

重要的是，在政治鬥爭中實行必要的妥協，本身就是一筆寶貴的政治遺產。

這一經驗教訓對於今後的政治鬥爭具有重要的意義。

妥協表示通過鬥爭所得的階段成果落到實處。

妥協表示對對手的尊重，對他們代表的另一部分群體利益的尊重。

妥協表示拒絕全勝的誘惑。因為在大獲全勝之後必然導致失敗方的瘋狂報復，仇恨會更深，矛盾更難解決。

妥協是一步一步向著目標穩步前進，不是大起大落最後還是在原地踏步。

善於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方式妥協，需要智慧。

敢於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方式妥協，更需要勇氣！

我們認同孫怒濤先生總結出來的關於妥協的見解。善於妥協需要智慧，敢於妥協需要勇氣。不幸的是，造反群眾不僅缺乏善於妥協的智慧，更缺乏敢於妥協的勇氣。

最後，造反群眾的失敗還源於群眾組織領袖自身的問題。這些領袖在政治上並不成熟。他們沒有認識到派性鬥爭的嚴重後果，沒有採取積極的行動去解決這一問題，更沒有“化敵為友”的能力。只有少數領袖除外，如內蒙的高樹華、黑龍江的範正美和上海的王洪文等人，特別是王洪文。1966年底保守派組織“赤衛隊”瓦解之後，“工總司”曾經開會徹夜辯論如何對待“赤衛隊”的工人。許多造反派領導人不願意接納保守派。王洪文毫不妥協，在辯論會上拍了桌子，堅決主張接納保守派成員。他的主張得到很大程度的實施。由於上海“工總司”沒有排斥保守派工人，各個單位的造反派組織順利地吸納保守派成員，後來“赤衛隊”頭頭幾次想要重新拉隊伍都未能成功。自1967年以後，上海再也沒有出現強大的保守派組織。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武漢。1967年夏，武漢的造反派在保守派“百萬雄師”失勢後，對其進行瘋狂的報復，結怨極深。結果在1969年到1973年的多次運動中，很多原保守派人員成為整造反派的主力，大搞“逼供信”，參與制造“五·一六冤案”。

在上海，由於沒有出現成建制的保守派力量與造反派進行角力，大多數當權派從自己的權力地位著眼，只能乖乖地向造反派靠攏，承認從前的錯誤並表示悔改，保證以後與造反派合作。到1967年秋，上海的部局長一級幹部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王洪文利用1967年底有利於造反派的大好形勢收編保守派“赤衛隊”，從根本上避免了群眾組織的分裂，也從根本上改變上海的文革走向。上海工人造反派的

團結，受到毛的多次表揚，這是王洪文在文革實踐中的最大貢獻[354]。這也是王洪文能被毛選中，試圖培養他成為接班人的原因之一。

從文革中造反群眾執政的情況看，上海的穩定局勢值得關注。上海的長期穩定，除了毛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以外，上海造反領袖的水平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們中的主要人物，均是原中共體制內的官員。例如徐景賢是原市委的幹部，王洪文是一位從事政工的基層幹部，他們的政治素質遠高於普通的學生和工人。

更能說明這一問題的，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公社”。該組織文革中獨樹一幟，是全國造反最早、影響最大、號召力最強的造反組織之一。當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等高校兩派武鬥打得天昏地暗時，北京地質學院竟然能相對平靜。這在北京高校中顯得很不尋常，即使在全國也極為罕見。當該學院的保守派“鬥批改”垮臺以後，造反組織“東方紅公社”一統該院的天下。但是其內部卻一直存在兩派，一派以朱成昭為首，另一派以蔡新平為首。人們習慣上把兩派稱為“朱派”和“蔡派”。“朱派”比較激進，“蔡派”相對溫和。兩派曾三次面臨分裂危機，但“蔡派”卻始終沒有另拉隊伍出去。即使毛的女兒李訥來地院鼓動另立山頭，也未動心，心甘情願地做“內部反對派”。

該派領導人蔡新平做出這樣的決定，與傾向該派的原體制內的幹部有很大關係。他們是“蔡派”的智囊團，由原院長兼黨委書記高元貴、原院團委書記、黨委委員安靜中、原黨支部書記鄭伯讓等人組成。尤其是安靜中，是智囊團的智慧核心。當“蔡派”猶豫動搖是否另拉隊伍時，安靜中說了一句給人印象極為深刻的話：“你們就做內部的反對派吧”。他說，共產黨內曆史上從來就不缺不同意見的鬥爭。他列舉共產黨建黨以來的黨內鬥爭曆史，說毛澤東在中央蘇區不是也被剝奪了領導權嘛，不也是一直堅持內部鬥爭？他還說，黨內有不同意見可以搞鬥爭，但是不能搞組織分裂。這是一條原則。雖然安靜中講的是中共的組織原則，但是對於群眾組織也是適用的。文革中的造反派往往一遇不同意見就分裂，就拉隊伍另起爐灶。當然，堅持內部鬥爭是要付出代價的。“蔡派”的成員後來受到對立派的殘酷打壓，但是他們沒有一個後悔。因為浩劫之後，每當回校的師生看到一個完整的沒有一點武鬥痕跡的地院時，都會不約而同地感歎：奇跡啊！幸虧地院沒有發生武鬥[355]。

所以我們可以預測，如果將來中國出現大規模的成功的群眾運動，其領導者應該是中共體制內的官員，而不會是毫無執政經驗的草莽英雄。

群眾運動的領袖不僅需要政治上成熟，個人的品性也很重要。例如，江蘇的造反派領袖文鳳來是一位正直的教師。按照當時的標準，他本身的政治條件非常過硬，既是黨員又是轉業軍人。他對工作組將矛頭指向普通教師和學生的做法提出批評，完全是出於為民請願，打抱不平。他可以像大多數人那樣保持沉默，但他卻不懼風險，勇敢地貼出大字報，遭到工作組的打擊和圍攻。文鳳來挺身而出貼工作組的大字報，並不是因為他有個人恩怨，而是出於對受工作組打擊的師生的同情和正義感。正是由於他的正直，他成為江蘇群眾運動傳奇式的領袖。後來受到軍方的迫害時，文鳳來只承認反許有錯誤，始終沒有牽連昔日的戰友，受到人們的好評和尊敬。

雲南大學的方向東在萬馬齊喑的高壓下，寫出大字報支持被全校師生圍攻的兩名同學。他當時能這樣做，需要相當的人格力量和勇氣。很快，方向東成了眾矢之的。但正是那張伸張正義的大字報，使方向東日後成為該省赫赫有名的造反派英雄。新疆大學的吳巨輪也是如此。作為團委和學生會幹部的吳巨輪，反對工作組把矛頭指向學生的做法，貼出揭露工作組的大字報，批判工作組執行“形左實右”的錯誤路線。他的大字報立即使他受到批判和圍攻。正因為他敢於仗義執言，吳巨輪成為新疆造反派的領袖。

不正派的領袖會對運動帶來不利的影響，江蘇的曾邦元就是一例。江蘇的“八.二七”（P派）內部分為兩派，一派以曾邦元為首，另一派以袁服武為首。分裂的原因是在對待其支持的幹部高嘯平的問題上。當中央決定把高嘯平作為替罪羊拋出來時，曾邦元無情地將過去的盟友拋棄。袁服武等人對此表示不滿，認為曾邦元兩面三刀，為了保自己升官，不夠厚道。他們倒向曾經的對立派（即“好派”）尋求支持。“清查五.一六”時，軍方主要是抓“好派”的人。結果曾邦元趁機打擊本派內部的不同政見者袁服武，把袁也關起來。袁服武被關起來後，痛恨曾邦元。清查運動本身就是無中生有，結果被關進去的“袁派”串通起來，一口咬定自己是曾邦元發展的。最後曾邦元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關了起來，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場造反派的內鬥，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由於領袖的品質問題，受到軍方支持的造反派在內鬥中兩敗俱傷。

造反群眾組織的分裂，有其歷史原因和文化原因。這就扯出中國人“窩裏鬥”的話題。柏揚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把中國人內鬥的惡習描述得入木三分，把中國人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內鬥潛質揭示得淋漓盡致。中國人熱衷於內鬥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由於單一的價值取向引起的。千百年來，中國人信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理念。“讀書高”的核心是做官。在權位的金字塔下，讀書人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你爭我奪，你死我活。這種單一的價值取向，是形成內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統治階級不把人民當人。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統治階級挑唆並制造人民中的沖突。當人民忙於自相殘殺時，他們的統治才是穩定和安全的。所以中國人好內鬥，是統治者培養出來的。

第三，中國人的內鬥與中國的繼承制度不無關係。西方人（如英國人）很早開始實行“長子繼承權”。英國規定，只有長子可以繼承父母的不動產。這樣一來，多數的英國人（除了長子以外）不能指望父母的財產，必須自行開拓創業。他們的眼睛不是只盯著父母手裏的那點家產，不是只盯著英國國內那塊巴掌大的地盤，而是放眼世界，開拓海外殖民地。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就是這種開拓的結果。他們開拓外疆的精神，在美國牛仔的身上充分地體現出來。牛仔們不斷地向西進發，從美國的東海岸一直打到西海岸。幾千英里的地盤，沒有多少年就被他們征服了。相對於英國的長子繼承法，中國除了皇帝的位子是長子繼承外，其他的人是平等繼承的。普通百姓平等繼承的壞處是，眼睛都盯著父母手上的那份家業，你爭我奪窩裏鬥。

第四，與中國人受到的限制有關。限制包括地域的限制、思想的限制和社會流動的限制。中國的農民世世代代被束縛在土地上，沒有任意遷徙的自由。中國人的思想被獨尊的儒家所禁錮。更重要的是，舊時的中國沒有正常的社會流動。中國的下層百姓很難有機會爬上升遷的階梯，只有科考一條狹窄的道路。由於有如此多的限制，自由空間很小。中國的人口又是如此眾多，沒法子，只好你爭我奪，鬥得不亦樂乎。

第五，是中國沒有經過真正的大工業階段。大工業的特點是嚴密分工。工廠裏的工人往往重複幹一個簡單的工作，年複一年，日複一日。社會分工使大多數人的頭腦變得簡單，每個人像機器上的一個零件。因此不少西方人安於做下手，不在乎為別人打工。對於他們來說，只要有工作做有錢掙就滿足了。中國人受儒家思想和小農經濟的影響，有強烈的出人頭地和光宗耀祖的欲望，望子成龍是大多數家長的心態。中國人個個想當老板，人人想當領導，只要有機會總想拉隊伍自己幹。所以在國外中餐館林立，但是辦得特別好的，成為全國連鎖的卻並不多見。大家在有限的空間裏互相傾軋，靠降價吸引顧客，直到做爛為止。在國外提起中餐館，人們常把它們與“低”字聯系在一起：低價、低質、低品味和低檔次。大工業的高度分工使得人們相互依賴，習慣於相互間的密切合作，講的是團隊精神^[356]。

當然，造反群眾組織並非永遠“死磕”，沒有聯合。例如湖南的兩大造反派從“清隊運動”開始逐步喪失權勢，一步一步跌入牛鬼蛇神的集中營。到了“一打三反”運動時，造反派們遭到幾乎全軍覆沒的厄運，造反派的領導人和骨幹分子都成了挨整對象。到了“批林批孔運動”時，造反派們把謀求翻身，再次造反的鬥爭鋒芒指向省革會中的軍人代表。文革中，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分裂。每當造反派獲得一個大的勝利，他們立即分裂，陷入內戰，造反派在內戰中能量消耗殆盡。但在此次的造反中，湖南的兩大造反派們盡棄前嫌，共同對敵。在省革委會中的造反派們曾有過內訌，後來一派主動向另一派示好，邀請他們出山，使另一派東山再起。造反派們重組力量後，呈現一致行動的獨特態勢，出現“各派團結、一致造反”的新局面。兩大造反派不僅能較為順利地平反，再次燒毀“黑材料”，恢復革委會的職務，還能入黨，被提拔為領導幹部。

湖北的造反派也是如此。湖北造反派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整風”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中，遭到毀滅性打擊。

“鋼、新”兩派這才又一次深感唇亡齒寒，終於走向團結與聯合，發動“反複舊”運動。雖然這是造反派們的最後掙紮，只是強弩之末，但他們畢竟在你死我活的搏殺後又聯合起來抗爭過。

江蘇的情況也如出一轍。軍人在“清隊”、“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沉重地打擊兩大造反派別，兩派的領袖在清洗中均成為階下囚。“批林批孔運動”中，被整肅的造反派領導們把此次運動視為爭取為自己平反的最後機會。兩派的造反領袖與地方幹部，在對付軍人專權上終於聯手出擊。軍方不得不做退讓，同意釋放一批被關押的造反派領導，軍人專權終於以垮臺告終。雖然地方幹部在兩大造反派的幫助下從軍人手中奪回權力後，很快把造反派又一次打入十八層地獄，但是曾經敵對的造反派聯合起來為自己的權益鬥爭的曆史不應被忽略。

為什麼造反派們以前在毛和中央一再號召大聯合的情況下拒絕聯合，打得死去活來、天昏地暗，非要到雙方都被打翻在地後才想到聯合呢？這一遲到的聯合揭示了什麼？在當時的語境下，造反派們仍然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缺乏獨立的思考，也沒有出色的政治家為他們“指點江山”。造反派仍然缺乏正確的思維方式，仍然信奉“非白即黑”的邏輯。他們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兩年內就學會用正確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而擔心秋後算賬的恐懼，比以往更加沉重地籠罩在造反派的心頭。為什麼他們以前在勝利的時刻不能聯合，非要在兩敗俱傷時走向聯合，做臨終前的最後掙紮？文革研究學者王複興總結道^[357]：

兩派都錯，沒有一派政治正確。同一校園的師生本應互敬互愛，卻熱衷派仗，直至發展到冷兵器武鬥，企圖以武力打垮對方。文革結束已半個多世紀，但至今原北京大學兩派的個別校友談起文革，仍以派性論是非，沒有走出文革陰影。北京大學武鬥長達半年之久。到了中後期，堅持武鬥的人員，兩派加到一起只有1,600人左右。“北京大學公社派”一方有900多人，“北京大學井岡山派”有700多人。到最後，“井岡山派”只有200多人堅持武鬥，“公社派”也只剩下四五百人。當時在校師生有13,000人左右。那麼大多數的師生那裏去了？絕大部分人都成了逍遙派，許多人回家了。絕大部分人厭惡武鬥躲避武鬥，代表了正確方面，代表了渴望停止武鬥，恢復正常秩序，實現安定團結的正確方向。然而校園卻被兩派激進的頭頭所掌控。兩派核心層的理性“鴿派”，被激進的頭頭稱為“機派”^[358]。這似乎表明，在群眾運動中，越運動越激進，誰激進誰上臺，誰激進誰掌權，理性者則失去話語權。這些激進的掌權人只知進不知退。他們不懂妥協，不懂見好就收，直到碰了南牆，碰得鼻青臉腫，甚至粉身碎骨。這一現象，人們在1989年於天安門廣場再次看到。如果在1968年的夏季，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領袖夠冷靜有智慧，能夠停止武鬥，實現聯合，相互妥協，結合雙方支持的幹部組成聯合政權，或許就不會發生工軍宣隊開進校園。也就不會發生爾後在抓“五.一六”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對造反群眾的大規模鎮壓，致使原兩派群眾誰也沒落到好。那麼曆史就將改寫。

群眾組織是由個人組成的，每個人都想通過組織獲得某些利益。在研究組織機構時，有的西方學者認為，組織行為可以看成是為得到某種利益的努力（特別是加強組織的利益）。但也有學者認為，應該把組織看成是戰場。在組織內部，有不同的派別不同的利益競爭，試圖控制組織。因此，某個時期的組織行為反映了獲勝一派的決定。還有學者提出，組織最後走向寡頭政治，似乎是一條鐵的定律。組織必將分裂成兩派：一派是小而穩定的精英圈，另一派是眾多的普通成員。雖然表面上看，精英圈代表了全組織的利益，事實上只是代表了他們個人的利益^[359]。群眾組織內部的溫和派與激進派的鬥爭，演變成爭奪組織內部的權力鬥爭。由於大環境的作用，文革中的群眾組織大多是激進派取勝。正如王複興所言，到了群眾運動的後期（1968年），許多民眾已經對運動失去興趣，逐漸逍遙起來。真正的死硬派並不多，但是他們的能量很大，兩派（也有的個別地方是三派或四派）都被激進派綁架。它們之間的鬥爭，只能一條道走到黑。

我們在 2018 年出版的《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譯為《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義》）一書，對文革做過定義：文革是黨內和黨外的激進派、溫和派、保守派 6 個集團之間以及集團內部進行的一場非合作式的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在這場 6 個集團參與的混戰中，激進派和溫和派以前沒有能夠聯合，是因為對形勢發生誤判。這是文革群眾運動失敗的最根本的原因。

這一誤判，部分源於他們沒有分清真正的敵友。他們以為保守派已經完敗，不可能死灰複燃。在對權力貪婪的驅動下，把曾經的同一戰壕的戰友當成敵人，試圖一攬大權，獨霸天下。正是由於這一錯誤的策略（這是致命的錯誤策略！），才出現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分裂，才會有後來的對秋後算賬的恐懼。對秋後算賬的恐懼，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從時間上看，是先有分裂然後才有你死我活的搏殺，最後才有對秋後算賬的恐懼。如果造反的群眾在勝利後立即著手聯合掌權，哪裏會有對秋後算賬的恐懼呢？！如果他們聯合掌權，到秋後，也許會以勝利者的身份對保守派進行清算。

在造反派與保守派對峙的省裏，情況有所不同。有些省的保守派在掌握實權的當權派的支持下，對造反的群眾進行打壓，但這些省不占多數。在全國，造反派獨霸天下的和造反派分裂對峙的省，占了 29 個省份中的 20 個。只有 9 個省是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的局勢，而且這些省也並非都是保守派占上風。如果不是由於大多數省的造反群眾分裂打內戰，造成局勢失控，天下大亂，毛也許不會派出軍宣隊和工宣隊，他們的下場也許不會那麼慘。

這一誤判也源於造反群眾對自己的力量不切實際的高估和對於保守派勢力的低估。當造反群眾內訌廝殺時，他們沒有預料到“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結局。結束這場 50 多年前內戰的最後戰場，是在清華大學校園。當工宣隊進入清華大學校園，造反派即將滅亡時，蒯大富下令向工宣隊開槍。難道蒯大富真的反了？不是！是他發生了嚴重的誤判，以為對方有黑後臺支持，毛是不會派工宣隊來繳他的械的。當毛親口告訴蒯，黑手就是毛自己時，蒯就無話可說了。蒯大富的開槍令標志著造反群眾組織走向滅亡，也是造反群眾誤判形勢的最明顯的例證。

在文革結束 40 多年後，清華大學的學子們合作出版了一本專著《真話與懺悔》，對文革進行了反思。最為可貴的是，這批當年在校園裏昏天黑地拼殺的精英們，終於盡釋前嫌，握手言和。當年鬥得你死我活，付出過鮮血和生命的兩派同學，坐在一起回顧曆史，有討論有爭論，一起反思並達成許多共識。脫離政治漩渦走入社會以後，清

華大學的兩派同學大多都能和諧相處，對大勢的認識也逐漸趨同。80年代末期，“四派”領袖人物汲鵬不記前仇，不避嫌疑，熱情接待新婚的蒯大富夫婦。90年代，深圳的兩派校友做了很多努力，促成蒯大富與沈如槐握手言和，成為和解的一個新標志。2008年初，清華大學曾經敵對的兩派主要人物蒯大富、沈如槐、汲鵬和陳育延等，在盧溝橋舉行聚會。這些遲到的和解雖然晚了，但畢竟發生了。雖然上述和解中仍存在爭議，但意義非常重大。

研究上述和解發生時的中國社會背景，有助於加深我們對和解的認識。在文革初期，老紅衛兵與平民紅衛兵都有罪錯。文革後清查“三種人”時，陳雲認為老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平民造反派，是“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的。為了讓不會掘自家墳墓的“紅二代”接班，必須把最有競爭力的平民造反派領袖（無論有無過錯）統統打下去。於是，給他們戴上“記錄在案”的緊箍咒，成了最行之有效的辦法。在這樣的背景下，清華大學“團派”和“四派”的58位領袖和骨幹被記錄在案。其中有兩位即便“未發現問題”，也沒有逃脫“記錄在案”的命運，就因為他們曾經當過一年多的造反派領袖。中組部的文件明文規定，凡是“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都要記錄在案，不管他們是否有問題。那麼，對老紅衛兵的頭頭呢？因為他們是“紅二代”，就全都赦免了。如拉倒二校門，毒打“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策劃制造“八·二四打砸搶事件”的賀鵬飛們，按其罪錯完全應該被記錄在案的，但他們卻逍遙法外，並步步高升^[360]。陳雲的“自己的子女可靠論”，使“無數夢者”醒悟：紅二代真的發了！而且不是某一派。兩派終於同時憤怒了^[361]。

如果清華大學兩派的和解，進而全國各地造反派的和解早來幾十年，中國的曆史將如何？曆史沒有“如果”，但曆史卻在不斷重現。中國人民在50多年前痛失一次打敗保守派的絕好機會。如果當年的造反群眾能看清形勢，及早聯合，保守派未必能夠東山再起。當然，毛是否會讓造反群眾當權；如果造反群眾當權，中國的情況將如何，並不令人樂觀。但是如果造反群眾沒有內訌自毀，運動的走向和結局肯定會不一樣，至少他們的下場一定不會這麼悲慘。

曆史會再給中國人民機會。中國人是否會像羅征啟校長的夫人梁教授說的那樣：“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們）和蒯大富一起造反，就是要徹底砸爛舊清華大學！”^[362]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的未來全靠中國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國人民會把握好將來的機會嗎？

廣東的文革群眾運動領袖武傳斌在臨終前，為紀念文革五十周年提前寫了兩句話，“如有機遇我當再中流擊水，為將中國民主再推進

一步。” [\[363\]](#)也許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回答。

第二十章 結語：中國未來社會運動展望

“社會沖突派”和“政治過程派”學者們，在研究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之間的關係上存在嚴重的分歧和爭論。他們試圖通過這一關係，推測民眾參加派別的原因。我們堅持，參加一派群眾組織（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僅僅是手段，並不是目的。盡管在許多情況下，參加某派組織能夠部分地體現個人的動機和原因，但終究只是一個近似的替代變量。同一個手段可以服務於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手段也可以服務於同一個目的。對當權者和制度不滿的民眾參加造反派，可以直接向曾經欺壓過自己的走資派和當權派發動攻擊，趁機出口惡氣並改變自己的處境。這些不滿的民眾參加保守派，未必不能達到同樣的目的。鑒於1957年反右和其它政治運動的教訓，他們心存恐懼，不敢反對黨委和工作組。根據以往的經驗，運動過後提意見的人不會有好下場，不如此時向當權派示好，表忠心，或許今後的日子好過些。這樣的想法做法，同樣可以達到最終改善自己處境的目的。

本書對於文革中民眾參加不同派別的問題，採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首先分析民眾為什麼參加群眾組織（無論派別），其次才分析民眾參加不同派別的動機。在分析第一個問題時，我們通過問卷調查，直接詢問當年參加群眾組織的民眾。發現無論是參加造反派還是保守派，人們的根本目的都是相同的。文革時的中國無形中分裂成為兩大陣營：紅色陣營和非紅色陣營。無論民眾參加哪個派別，都是為改善（對於弱勢群體而言）或者保持（對於優勢群體而言）自身的處境而戰。

在分析第二個問題時，首先區分民眾所參加的不同派別。我們將各省的大派別分出三大類，即保守派、溫和派、激進派。溫和派與激進派都是造反派，只是造反的程度不同。各省的派別雖不同，其派別鬥爭總體而言可分為“階級性派別”和“派性派別”兩大類型。前者是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階級鬥爭，後者是造反派之間（即激進派與溫和派之間）的內鬥。“階級性派別”與民眾的家庭出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是因為，家庭出身是民眾自身階級地位的一個重要指標。“派性派別”與階級沒有什麼關係。所以，作為階級地位指標的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自然失去了聯系。

“社會沖突派”沒有充分注意分裂的造反派之間的內鬥，因此沒有意識到文革中的派別鬥爭不僅是既得利益者與挑戰者之間的鬥爭，也存在挑戰者之間的內部沖突。“政治過程派”忽視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片面強調運動的多變過程。真實的情況是，文革是一場博弈，

是既得利益者的保守派與作為挑戰者的激進派之間的鬥爭為主，造反派內部沖突為輔的博弈。文革是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進行的一場非合作式的、信息不明的利益鬥爭。我們用“兩類派別鬥爭”

（Two-Type Factional Struggles Explanation）來解釋文革中的派別沖突，也可以稱作“兩類派鬥說”。

文革研究中兩個重要的問題，也是被許多學者忽略的問題是：

（1）造反派為什麼分裂？（2）他們的分裂對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帶來了哪些害處？由於中共當局對造反派的醜化，盡管有些人對造反派抱有同情心，但很少有人能正視他們。更少有人認真總結他們失敗的教訓，為中國今後的群眾運動探尋方向。造反群眾沒有能夠聯合有多種原因，歸根結底是因為誤判形勢。他們沒有分清真正的敵友，以為保守派已經完敗，以致在對權力貪婪的驅動下，把曾經同一戰壕的戰友當成敵人，試圖獨霸天下。正是由於這一錯誤的策略，出現造反群眾的分裂。你死我活的鬥爭，導致對秋後算賬的恐懼；在對秋後算賬的恐懼下，造反群眾只能相互拼鬥到底。鬥爭到底的結果，是兩敗俱傷的自毀。如果造反群眾在保守派失敗後迅速聯合，共享勝利果實，中國的當代曆史或許會改寫。

文革研究學者王複興認為，文革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苦難，然而反中有正，正中有反，不能以非黑即白和非白即黑的思維方式分析評價文革曆史。文革要否定，但是否定之下仍有正面因素可以挖掘。文革是個多層面多線索多元化的社會運動，各種矛盾錯綜複雜，相互交織。複雜的事物不能簡單化分析，不能一刀切一面倒，否則會失於片面，偏離真相。例如，人民的自主性在文革中便有所進步。毛澤東為發動群眾打倒政敵，暫時給予人民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這在客觀上使人民獲得短暫的自由。人民享有了民主，解放了思想，學會思考並得到鍛煉，從而煥發出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性。當毛想收回給予人民的自由時，就不那麼容易了，“四·五天安門事件”便是典型事例。毛發動起來的群眾，走到他的對立面，全國有上千萬人卷入“四·五運動”。這是1949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大規模公民運動，它要求結束文革，結束秦皇的專治統治。“四·五運動”為迎接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到來，奠定了思想基礎，做了輿論準備。文革後期的“四·五運動”，不是憑空發生的。它是在文革前期和中期各階層的人民群眾逐漸累積和蘊釀的不滿的最後爆發。今天，我們應該去深入挖掘埋藏於地下的思想火種和反專制爭民主的萌芽^[364]。

嚴家祺先生認為，最早公開指出毛澤東專制獨裁的，既不是造反派和激進派，也不是保守派和溫和派，而是父母受到沖擊的“聯動”分子。由“紅二代”中學生組成的“聯動”，在1966年8月公開印刷

的《中央秘字零零三號》文件中提出：“堅決徹底全面幹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兩個主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一切專制制度。”也正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的《571 工程紀要》，在中國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全面非毛化”和反對當代秦始皇的主張，指明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基本方向^[365]。

文革結束至今已有 40 多年了。文革結束後，中國曾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但自從 1989 年民運遭到血腥鎮壓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這是專制體制的結果。一黨專制的國家，不可能允許人民自由結社自由集會，也不可能允許社會運動（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或其他性質的）的存在。但是，中國民眾的抗議活動從未停止過。由無數抗議活動組成的社會運動，將使專制國家向民主化發展^[366]。

多年來，中國民眾的抗議活動不斷。2012 年初，中國多個城鎮年關前陸續爆發討薪抗議潮。廣西梧州一家港資玩具廠，因為拖欠工資及元旦沒有趕工加班費，上千名員工集體罷工。廣州番禺有家工廠的員工三度舉行罷工，要求加薪及改善待遇。江蘇無錫的一家洗衣機廠，有千餘名工人舉行罷工，抗議沒有年終獎金和低工資。根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報導，中國大陸的罷工次數，從 2011 年的 200 次增加到 2017 年的 12,256 次。

除了討薪，還有另類經濟性質的抗議。河南安陽在 2012 年發生大規模抗議事件。因融資公司老板資金鏈斷裂而逃逸，令數千民眾的多年積蓄血本無歸，甚至傾家蕩產。他們集體“散步”，要求當局協助。數千名市民聚集在工人文化宮和人民公園附近，向火車站進發，沿途高唱國歌。中午時分，在火車站廣場有近萬人聚集。部分民眾聲稱，要搭乘火車到北京上訪。河南的非法集資案，在其他城市也引發抗議。焦作市數百位民眾，因不滿擔保公司集資未能按承諾付息，聚集在其中一家擔保公司前示威。鄭州市也有 40 家擔保公司發生問題，導致超過十萬市民未能得到利息。當局不得不加強戒備，所有特警武警都取消休假，氣氛十分緊張。

作為中國南方重鎮的上海也不安寧。2017 年 6 月 10 日晚間，社交網站上出現近千人聚集在上海鬧市區抗議的視頻。他們是受到政府突然改變規定影響住房權益的業主。上海市政府於 5 月 17 日出臺整改商住兩用房（酒店式公寓）的新政策。除了停止審批同類型項目，還要求完工的單位按照商業辦公房屋的功能整改，拆除廚房、衛生間和夾層等居住功能，不符合商辦要求的物業不得辦理過戶。在新規定下，已交房的單位將被清查，列為違規建築，督促整改，未整改的不能進行二手交易。示威的業主們認為，當初在購房時發展商聲稱可以

商住兩用，因此政策改變的後果不應該由業主承擔。業主們要求，在新政策公布前網簽的房屋，按照原來的政策使用。

2018年5月27日，安徽六安市金安和裕安等區縣的在職公辦教師約兩百人，為討回拖欠工資進行維權。在接近市政府時，教師們遭到警察的暴力攔截。視頻瘋傳於社交媒體，產生令人震撼的效果，大批網友表示憤慨。迫於輿論壓力，六安市公安局做出回應，確認教師因待遇集體上訪的事實，並承諾調查六安教師維權遭警方毆打的事件。後來，教師們拿到了拖欠的工資。

2018年6月8日開始，為抗議高油價和官方剝削等，全國多地的車主及司機發起全國卡車司機大罷工。雖然因受到官方恐嚇和協調方面的困難，全國3,000萬卡車司機的大多數未能同步參與罷工，但是罷工仍造成很大的影響。一些地方的激進罷工司機，與繼續營運的司機發生沖突。視頻顯示，包括重慶、安徽合肥、貴州銅仁、江西修水和山東聊城等地的卡車司機參加了罷工。大批卡車集結在公路和停車場，要求降低油價，提高運費，並要求交警及運管部門停止對大卡車的隨意罰款行為。為了協調行動，各地卡車司機組成聯盟，要求外地卡車司機不要前往裝卸貨物，以便為爭取整體權益創造條件。雖然罷工很快平息，但是其影響不容忽視。

更加引人關注的是複轉軍人的抗議。這些曾是國家專政機器的成員也走上抗議的道路，維護自身的權益。2016年10月11日清晨6時，逾萬名來自中國多個省市的複轉軍人，在北京八一軍委大樓前舉行大規模維權行動。中共高層緊急出動各路人馬滅火，先後有中央軍委、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出面安撫。多省的省級官員及複轉軍人聚居的市級領導被緊急召往京城，地方官員向複轉軍人作出承諾。軍方、政法系統和地方政府也達成一致口徑：在第二年元旦前解決問題。參與維權行動的老兵們介紹說，最先是公安部人員以威嚇手段要求他們撤離。但是複轉軍人手拉手搭成人牆，高唱軍歌，表明如果得不到答復，就會一直圍駐在北京八一軍委大樓外。此次大規模維權行動，通過網絡召集的方式，籌備半年之久。複轉軍人由原來的碎片化維權，漸漸走向聚合。

令中共高層始料不及的是，上述抗議過後僅幾個月，2017年2月下旬，大批身穿迷彩服的中國退伍軍人又一次聚集在北京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大樓前，靜坐示威維權。示威者們索取被拖欠的退伍福利，要求解決住房和就業等問題。與2016年10月中旬中國退伍軍人包圍中央軍委八一大樓示威的做法類似，這些退伍軍人身穿作戰迷彩服，在中紀委前的街道上示威。他們排列整齊，呼喊口號。中國國內微信上傳來的消息稱，有2萬名複原軍人聚集北京維權，人數之多創

進京維權人數的記錄。作為一個特殊的維權團體，退伍軍人進京上訪維權給中國政府出了一個難題。如果強力鎮壓，他們擔心會動搖現役軍人的軍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 2018 年 6 月 2 日起，近 2,000 名退役老兵集結在鎮江市政府大樓外維權，要求得到公平待遇。鎮江京口、潤州、丹徒、丹陽等地，19 日有近百名退役老兵聚集在鎮江市政府前示威，並在求見市長。會談無果之後，一直留守門外。6 月 20 日凌晨，多名不明人士與留守的老兵發生衝突，其中一人被打傷。該批不明人士事後進入政府大樓，多名老兵先後被警方帶走。這些舉動觸發全國各地老兵響應網上的號召，大批老兵趕往鎮江，集結抗議維權。鑒於聚集人數愈來愈多，各地的維穩人員都趕到鎮江支援。該事件愈演愈烈，對當局的維穩形成巨大壓力。全國各地的退伍軍人，對頻發的暴力對待退伍軍人申訴感到憤怒，各種號召集結的信息鋪天蓋地，從全國各地遠征而來的聲援老兵也越聚越多。當地民眾也出手援助示威的退伍軍人。

由於中國的專制性質，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運動根本無法生存。如果我們將上述抗議行為看成是未來長期維權運動的組成部分，把這些分散無聯系的抗議行為作為社會運動的一部分來研究，就有了意義。近 30 年來，中國的民主運動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對研究中國未來的社會運動不無益處。“阿拉伯之春”涉及多個國家，如突尼斯、埃及、敘利亞和利比亞等。因篇幅原因，我們僅舉突尼斯和埃及兩國的例子來討論。2010 年 12 月 17 日，26 歲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該事件觸發境內大規模的街頭示威遊行。這一突發事件導致該國總統本·阿里政權倒臺，成為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個因人民起義導致推翻現政權的革命運動。事情的起因是，布瓦吉吉拉著一部攤車在街上賣水果，因為沒有申請執照被警察部門沒收攤車。不久之後，他為抗議警察執法自焚。布瓦吉吉自焚之後，數百名抗議者進行示威，聚集在市府大樓前，警察用催淚彈驅趕。社交網站臉書和油管立即將警察與示威人群的衝突視頻上傳，使得更多的民眾了解此事。抗議活動逐漸擴大，民眾除了要求總統和其他官員下臺，還要求政府取消網絡審查。突尼斯政府涉嫌進行網絡釣魚執法，控制網站用戶密碼，壓制批評言論，國有和非國有網站遭到駭客攻擊。2011 年 1 月 14 日，總統被迫離開突尼斯，出走沙特阿拉伯，結束了他長達 23 年的統治。

在突尼斯革命的影響下，埃及民眾也行動起來。從 2011 年 1 月 25 日開始，埃及爆發一系列的街頭示威、遊行、集會和罷工等抗議活動，向政府表達不滿。1 月 25 日，正值埃及法定警察假日。一個青年

運動組織選定該日作為示威活動開始的日子。抗議示威活動在開羅市和亞歷山大市最為激烈，埃及的其他城市也有明顯的抗議示威活動。抗議者要求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此次持續 18 天的大規模示威，約有 1,500 萬人參加，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議運動。示威者圍繞埃及警察粗暴執法、對國家緊急安全法不滿、公民缺乏自由選舉權和言論自由權、政治嚴重腐敗等政治問題以及失業率嚴重、低工資和高物價等經濟問題進行抗議。示威活動組織者的要求包括：穆巴拉克總統下臺，軍隊結束戒嚴，終止緊急狀態法，民眾有自由的權利，組建一個負責任的民選政府並由他們管理整個埃及的資源。內外交困的穆巴拉克最後不得不宣布下臺。埃及的此次大規模抗議行動，後來被稱為“埃及 1.25 革命”。

“阿拉伯之春”不僅因為參加的人數眾多和非暴力等特點著稱，還有以下三個特點引人注目。“阿拉伯之春”被稱為是“三無”運動：即“無線”（Wireless）、“無領導者”（Leaderless）、“無階級”（Classless）^[367]。“無線”，是指“阿拉伯之春”革命運動的爆發是由新一代的信息和媒體技術（英特網、臉書和推特等）煽起並構框的。早在 2005 年，突尼斯的首位電子博客博主因公開批評專制政府遭到囚禁，死於監獄之中，政府加強了英特網的管制。許多博主采用 Proxy driver 來保護他們的賬號，以防網絡警察的偵破。有些年輕人到該國的信息部大樓前抗議，要求信息自由。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英特網、臉書、博客和推特起到了聯結個人、群體和各社會團體的作用。運動消息的散布、民眾的動員和鼓動、群體行動的協調，無不依靠這一新技術。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是此次革命成功的關鍵^[368]。當局關閉和阻斷英特網和無線聯絡網。可是當局的安保部隊與軍隊也依賴同一信息技術，進行自身的聯絡和協調。對峙的雙方誰都離不開這一新技術，所以當局的措施“害人更害己”。

其次，這是一場“無領導者”的革命。“阿拉伯之春”源於民眾突然爆發的對當局的憤怒，沒有事先周密的計劃。在突尼斯的革命中，自焚青年突瓦吉吉成為一個象征，這一象征是由他人塑造的。他本人並沒有通過自己的決定和行為來動員民眾的計劃，但是他一時的決定卻產生了漣漪效應。他被塑造成反腐象征，成為抗爭的旗幟，激勵了成千上萬的民眾投入運動。如果沒有他人的塑造，他的死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當地事件，只會影響他的家人和朋友。在阿拉伯的革命運動中，沒有處於領導地位的人物、小組、先鋒隊或組織。此次革命中，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具有層次的領導結構。革命是不同的組織共同努力的結果。雖然並沒有某個（或某些）組織占據領導者的地位，但是革命運動卻組織得非常出色。民眾團結在一個目標下，即要求變更

政權。這一共同的目標，使得革命運動團結一致，堅持到勝利。埃及的革命運動中，開羅的解放廣場成為一個“小國家”。食品和各種後勤供應、防禦和安全、聯絡和通訊等，安排得井然有序。

按照法國心理學家勒龐的分析，聚眾是對個體的否定。自勒龐到弗洛伊德，聚眾心理學的興趣從一時的和即時的聚眾轉向策劃的聚眾，從群眾轉向群眾的首領^[369]。按照這一觀點，似乎運動離不開有效的和有號召力的領導人物。但是“阿拉伯之春”的實踐卻表明，運動的發動和發展離開了領導者似乎也能進行。無領導者對運動的發展的另一個好處是，保護了運動的精英和骨幹。在專制國家裏，傳統的運動常常因為運動組織的主要領袖遭到暗殺和監禁陷於群龍無首的困境。“阿拉伯之春”的無領導者狀況給專制政權出了一道難題，當權者不知該如何下手，大規模的濫殺無辜畢竟不是明智的選擇。電子網絡的出現，為運動的領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護。

“無階級”指的是，參加“阿拉伯之春”的民眾拋開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分歧，為改變政權萬眾一心。阿拉伯國家的現代社會運動不是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社會運動毫無聯系的。當突尼斯、埃及、也門、阿爾及尼亞和巴林等國的民眾起來反對他們的專制統治者時，這些國家的抗議運動既不是由意識形態和宗教煽動，也不是由某個（或某些）領導者或政黨煽動的，而是由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心理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冰凍三盡非一日之寒”。“阿拉伯之春”源於積重難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造成 2011 年突尼斯民眾造反的根源，早在 2008 年就因“加夫薩磷礦事件”而埋下。埃及的革命，更是早在 2005 年時的 Kefaya（阿拉伯語“受夠了”之意）運動中就埋下了伏筆。而且，根源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發生的沖突。正是由於這些綜合因素，阿拉伯國家的民眾能夠拋棄政治、宗教和意識形態上的歧見，齊心合力地推翻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專制政權。

根據政治過程論的觀點，運動的參與者並非在真空中選擇他們的目的、策略和手段，政治結構對參與者的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370]。有學者分析美國因種族和貧困發生的暴亂，發現如果城市比較開明，有正規的渠道溝通，發生暴亂的可能較小。如果一個城市比較封閉，沒有明顯的溝通渠道，這樣的政治結構會壓制民眾，發生暴亂的可能也較小^[371]。Tilly 提出，政治開明與抗議之間存在著非線性的曲線關係。這就是說，當政府為民眾提供正常渠道時，民眾抗議很少，因為民眾能夠通過代價較小又更直接的方式施加他們的影響。當政府採取強硬路線時，當局能夠壓制民眾，使他們無法擁有足夠的資源以便組織起來發聲。抗議的爆發，常常發生在政權有適當的容忍度，民眾既沒有足夠的渠道滿足自己的訴求，又沒有完全被壓制得不敢嘗試采

取體制外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372]。換言之，政治開明度與抗議爆發之間的關係是“倒U型”關係^[373]。“阿拉伯之春”能夠爆發並取得成功，歸功於相關的阿拉伯國家在政治和經濟改革中（同時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采取了較開明的政策。但是這些國家的政策，還沒有開明到足夠的程度，以使革命運動沒有理由。當然，如果這些國家采用強硬的鐵腕手段，民眾走上街頭進行抗議只會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強硬的鎮壓只會使溫和的民眾屈服，強硬派則會更加堅強和更加激進。殘酷鎮壓也可能起反作用，即會激起民憤，動員更多的民眾起來反抗^[374]。所以，鐵腕鎮壓是一把雙刃劍^[375]。

民眾投入抗議活動不僅取決於外部條件，而且還取決於內心的因素。當外部條件與內心的感覺相適應時，民眾就會積極投入運動。內心的感覺指的是對外部環境的認知。外部條件不會自動轉變成抗議行為，需要經過“思想上的解放”並轉換成行動。這時被壓迫的民眾才能夠冲破悲觀壓抑的思想狀況，感到應該做些什麼來改變現狀^[376]。伊朗的1979年革命就是一例。從各項客觀指標來看，當時的巴列維政府並非一個虛弱的政權，廣大的伊朗人也不認為當局是個虛弱的政權。許多伊朗人擔心當局會采取強硬手段鎮壓民眾。隨著運動的發展，傷亡人數不斷上升，民眾也意識到上街抗議的危險性。但是意識到危險並沒有使民眾變得順從，反而激發民眾的暴力抗爭。從1978年9月開始，民眾開始感覺到革命運動比政權更強大，感覺到革命能夠成功。這一主觀意識的變化，使得更多的民眾加入到鬥爭行列之中^[377]。全民都起來反對之日，就是巴列維政權只得灰灰溜溜下臺之時。在敘利亞的革命中，政府的暴力鎮壓和威脅也是一個動員因素。安保部隊的行為使運動走向暴力化，激起民憤，使更多的民眾投入運動^[378]。民眾需要排除恐懼心理，才能大膽投入革命運動。正如一位埃及抗議者說的，“當人數少時，你會感到害怕。但是當我們看到那麼多人時，我們感覺我們能成功，感到更有信心。”埃及的抗議者還采用祈禱的方式消除心理恐懼^[379]。“抱團取暖”和“法不責眾”的心理，在這裏發揮了作用。

社會運動（尤其是上述的革命運動）中的參與者之間，存在著複雜的聯系網絡。換言之，社會運動是一個複雜的和多樣化的網絡結構^[380]。網絡是由節點和關係組成的。節點可以是個人、組織或社區等。關係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既可是單線的，也可是多線的。研究人員對於社會運動與社會網絡之間關係的興趣，在不斷地上升^[381]。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 of Separation）與社會網絡的研究有著密切的關係。該理論認為，世界上任何兩個互不相識的人，只需要很少的中間人就能夠建立起聯系^[382]。哈佛大學心理學教

授米爾格拉姆的實驗表明，平均只需要 6 步，就可以聯系任何兩個互不相識的美國人。現代網絡技術為人類的聯系提供了更便利的途徑，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更加方便和簡單了。一項臉書的研究發現，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現在只需 4 步就可以聯系兩個互不相識的人^[383]。推特的研究則發現，用戶之間只需 3.4 步^[384]。

英特網為民眾的組織提供平臺是有目共睹的^[385]。英特網的多向聯絡和合作行動，能促進並動員社會運動。微信群、博客群、Skype 群、臉書群和推特群等等，都是社會網絡的節點。當需要時，它們都可以成為動員的對象，實現整群動員集體加入（Block Mobilization）。英特網能夠使社會運動的組織以較低的代價進行溝通交流、產生信息和發散信息，並且有效地獲得反饋^[386]。“阿拉伯之春”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從實際意義上說，“無領導者”並非真的沒有領導者，而是因為領導者們活躍在英特網絡中。他們不像傳統的運動中那樣需要親自出面來號召和動員民眾。面對專制體制，充分運用英特網的隱蔽性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手段。

中國政府近年來採取了更為嚴厲的輿論控制，對英特網和社會媒體實行嚴格的管制措施。這對於民眾進行抗爭相當不利。類似中東地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但是，小規模的地區性的維權運動卻將會成為家常便飯。對於在專制度下的反抗運動，匈牙利政治學家托克斯提出，需要區分“反對黨”和“持不同政見者”。反對黨公開地企圖取而代之，奪取政權。持不同政見者仍然忠於現政權，只是對某些不合理的方面提出批評意見。持不同政見者是“體制內的反對派”，他們要求通過改革擴大民主，改善以至最後消滅專制體制^[387]。另一位匈牙利哲學家泰拉斯提出，持不同政見人士大張旗鼓地行使合法的權力，避免公開的煽動性口號。他們采用流行的社會批評，故意混淆他們自己的觀點和官方准許的批評^[388]，這是專制條件下反抗運動的特色。以上這些觀點值得我們思考。

“阿拉伯之春”的“無線”特點，應引起我們的關注。其實在中國發生過一系列事件，顯示出電子網絡的強大威力，例如江蘇南京的“周久耕事件”。2008年，周揚言“要查處低於成本價賣房的開發商”，引起網民的憤怒。周久耕參加南京國土局會議的一張官方照片，開始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網民對這張照片仔細查看之後發現，周某手上帶著一只進口的價值十萬元人民幣的名表。他抽的煙，是1,500元人民幣一條的“南京九五之尊”；他開的車，是美國豪華車凱迪拉克。周某的月薪只有4,000多元。周某後來被立案調查，並被判刑。在這場反貪官的鬥爭中，電子網絡發揮了巨大的作用。2016和2017年，複轉軍人的兩次大規模維權行動，也是通過網絡召集的方式

秘密籌備的。兩次高度隱蔽組織起來的大規模抗議行動，打得當局措手不及。

目前微信在華人中非常流行。微信群可以大致分為四類：（1）友情類，（2）興趣類，（3）政治類，（4）商業類。友情類群占很大的比例，聯系著親人、朋友、同學、同事和戰友等。興趣類群是以共同興趣為紐帶，如旅遊、繪畫、書法、讀書、投資、股票和理財等。政治類指的是群裏的言論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如追求民主、自由談論、走向光明、八九六四和民主正義等。此類群常被封群和封號，然而群主和群友們不屈不撓地與網管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封了再建、建了再封的遊戲將無休止地循環下去。雖然此類群友和微信群的總數並不多，但其能量不容小覷。另外還有一些以商業為目的的群，如房地產交易、廣告互利、拍賣、醫療和工程信息等。前三類群的群友間有著較緊密的關係，具備動員民眾的潛力。一旦時機成熟，這些微信群會產生並散布消息，成為未來運動的網絡基礎。

根據幾年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電子網絡的一項調查，中國網民在網絡中不滿政府的言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國政府一直進行屏蔽和打壓。但中國政府真正打壓的重點，並不是這些不滿言論，而是利用網絡的功能號召集會和抗議。一旦政府發現有網民或網群發出集會和抗議的號召，網管會立即封殺，絕不姑息。從這一研究看出，中國政府已經注意到網絡發動民眾的巨大潛力並採取相應的措施。如何對抗政府的這一措施，網民們需要找到更有效的辦法。

有學者認為，在專制國家中，民主運動常以環保運動的形式出現[389]。環保運動也屬於維權範疇的社會運動。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但是環境汙染問題相當嚴重。隨著民眾日益增長的環保意識和維權意識，此類抗爭將不斷增多。此類非政治性的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抗爭，會引起更為廣泛的輿論同情和支持。當地政府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可能采取高壓手段，但面對強大的社會輿論時，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出面幹預。圍繞著環保問題的抗爭，不僅是經濟的和生態的，也是政治的。除此之外，在中國大陸，以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的維權抗議行動，在短期內還將占據主要地位。民工討薪、複轉軍人安置、學生就業、全民醫保、老年人生活保障等問題，都是解不開的結。

實行經濟改革開放拒絕政治改革的一些中東國家，在“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中先後倒臺了。觸發政治變革的事件是無法預料的。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無權無勢的突尼斯青年的自焚，竟然能夠導致巨大的中東社會變革，是任何人都沒有想到的。“阿拉伯之春”的革命運動中，只有突尼斯成功地轉型，實現了民主。其他國家的民主狀況並未獲得根本性的改善，有的甚至變得更糟。這就預示著，未來革命

運動的走向更加捉摸不定。中國是否也會出現類似的突發事件，導致巨大的變革？如果出現類似的突發事件，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能否接受文革中造反派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如果出現了類似的變革，將向哪個方向發展？

世人將拭目以待。

附錄1 樣本量計算

計算抽樣樣本的大小，有多種算法，取決於抽樣設計。屬性抽樣（Attribute Sampling），是保證在一定的精確度內和可靠程度的條件下，為了測定總體特征的發生頻率而采用的一種抽樣方法。例如，我們根據文革發展情況對全國各省進行分類，想知道成熟發展的省份有多少個。再如，我們對某大學進行調查，試圖推測學生參加群眾組織的人數是多少，或參加兩派的人數各是多少。如果事先無法大概知道成熟發展的省份可能有多少個，參加組織的人數可能是多少，或兩派的人數是多少，我們一般采用比較保守的估計，即占一半（50%）。屬性抽樣所需樣本數量的計算公式如下：

$$\frac{x}{i} = \frac{k}{n} \Rightarrow n = \frac{N \cdot k}{x} \quad (1)$$

(1)

$$\frac{n}{i} = \frac{k}{N} \Rightarrow n = \frac{N \cdot k}{i} \quad (2)$$

(2)

上式中，N=總體數量，n=樣本數量，k=總體中具有某種特性的數量，x=樣本中具有某種特性的數量， α =置信度。公式（1）中的k是上限，公式（2）中的k是下限。下表是計算對全國省份抽樣和對人數為10,000的學校所需的樣本數量，精確度為10%（表中的百分數為置信度）[\[390\]](#)：

附錄表 1.1 樣本數量的要求

抽樣單位	總體數量	80%	90%	95%	99%
全國省份	29	26	26	26	26
北京大學或清華	10,000	179	280	386	636

大學					
----	--	--	--	--	--

附錄2 省市自治區的分類計算

附錄2.1 各省市自治的數據

關於各省份的數據，需要說明以下幾點：（1）由於無法搜集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各省 GDP 的資料，用文革結束後 1978 年的資料代替；（2）省革委會第一把手在中央委員會的職務，以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界；（3）文革期間省革委會第一把手的調動或死亡，不算作撤換；（4）文革期間，如果兩任第一把手中一人是軍人另一人是地方幹部，計為一半（0.5）；（5）省革委會成立的時間以 1967 年為界。個別省份的資料因省區劃分的原因無法獲得，筆者對此進行推算。對各省市自治區收集的資料如下：

附錄表2.1 各省市自治區的數據

省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安徽	3124	113.96	1037	是	19680408	60%	是	否	是	是
北京	757	108.8	0	是	19670420	55%	是	否	否	否
福建	1670	66.37	1981	否	19680819	50%	是	否	半	否
廣東	4280	185.85	2179	是	19680221	42%	是	是	是	否
甘肅	1263	64.73	1622	否	19680124	52%	是	否	是	否
廣西	2085	75.85	2373	是	19680826	54%	是	否	是	是
貴州	1714	46.62	2318	否	19670214	50%	是	是	是	否
河北	3986	183.06	292	是	19680203	52%	是	是	否	否
河南	5033	162.92	695	否	19680127	55%	是	否	否	否
黑龍江	2012	174.8	1230	否	19670131	38%	否	是	半	是

省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湖北	3371	151	1171	否	19680205	44%	是	否	半	否
湖南	3718	146.99	1516	否	19680408	47%	是	否	半	是
吉林	1567	81.98	979	否	19680306	59%	否	否	是	否
江蘇	4450	249.24	944	是	19680323	45%	是	否	半	否
江西	2107	87	1458	否	19680105	37%	否	是	半	否
遼寧	2695	229.2	684	是	19680510	58%	是	否	是	否
內蒙	1235	58.04	480	否	19671101	55%	是	是	是	是
寧夏	215	13	1192	否	19680401	26%	否	否	是	否
青海	215	15.54	1819	否	19670812	38%	是	否	是	是
山東	5552	225.45	421	否	19670223	49%	是	是	半	否
山西	1802	87.99	506	否	19670308	35%	否	是	半	否
陝西	2077	87.07	1092	否	19680501	57%	是	否	否	是
上海	1082	272.81	1239	是	19670205	55%	是	否	否	否
四川	6796	256.31	1881	否	19680531	66%	是	否	是	是
天津	583	82.65	125	否	19671206	61%	否	否	否	否
新疆	727	39.07	3300	是	19680905	48%	否	是	半	是
西藏	125	6.65	3736	否	19680905	63%	否	否	是	否

省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雲南	2051	69.05	2907	否	19680813	56%	否	否	半	是
浙江	2832	123.72	1322	否	19680324	47%	是	是	半	否

附錄2.2 個別數據不全省份的推算^[391]

1964年人口普查時，天津屬河北省，沒有單獨列出。河北（含天津）是4569萬人。1982年，河北（不含天津）是5301萬人，天津是776萬人。如果假設兩個地區的人口從1964年到1982年增長率相同，可以推算出1964年天津的人口（x）。計算如下：

$$\frac{x}{776} = \frac{4569}{5301} \times x \quad x = 585 \quad (3)$$

數據中，寧夏1964年的人口暫缺。1982年人口普查，寧夏與青海的人口均為390萬人。兩省區地理位置相近，其他方面也頗為相似，有理由推測，兩地1982年之前的人口增長率也相似。所以經過推算，將寧夏與青海1964年的人口均計為215萬人。

附錄2.3 數據的標準化

由於採用的數據單位不一（如有測量距離的千米，有測量GDP的億元，有測量人口的萬人），必須進行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後才能進行分類分析。換言之，需要將所有的變量轉換成統一的單位。我們設定所有的變量的區間為0至1之間，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x' = \frac{x - x_{\min}}{x_{\max} - x_{\min}} \quad (4)$$

X為變量，X' 為標準化後的數值。例如，1978年的GDP，最高的是上海，為272.81億元，最低的是西藏，為6.65億元，江蘇是249.24億元。所以，上海的GDP標準值為1.0，西藏為0，江蘇為0.91，即：

$$(249.24 - 6.65) / (272.81 - 6.65) = 0.91$$

變量X4, X5, X7, X8, X9, X10的值：“是”則為1，“否”為0。各省的十個變量的標準值如下表：

附錄表 2.2 各省變量標準化後的數據

省份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安徽	0.45	0.40	0.72	1.00	0.00	0.85	1.00	0.00	1.00	1.00
北京	0.09	0.38	1.00	1.00	1.00	0.72	1.00	0.00	0.00	0.00
福建	0.23	0.22	0.47	0.00	0.00	0.60	1.00	0.00	0.50	0.00
廣東	0.62	0.67	0.42	1.00	0.00	0.41	1.00	1.00	1.00	0.00
甘肅	0.17	0.22	0.57	0.00	0.00	0.64	1.00	0.00	1.00	0.00
廣西	0.29	0.26	0.36	1.00	0.00	0.69	1.00	0.00	1.00	1.00
貴州	0.24	0.15	0.38	0.00	1.00	0.60	1.00	1.00	1.00	0.00
河北	0.58	0.66	0.92	1.00	0.00	0.64	1.00	1.00	0.00	0.00
河南	0.74	0.59	0.81	0.00	0.00	0.72	1.00	0.00	0.00	0.00
黑龍江	0.28	0.63	0.67	0.00	1.00	0.30	0.00	1.00	0.50	1.00
湖北	0.49	0.54	0.69	0.00	0.00	0.46	1.00	0.00	0.50	0.00
湖南	0.54	0.53	0.59	0.00	0.00	0.51	1.00	0.00	0.50	1.00
吉林	0.22	0.28	0.74	0.00	0.00	0.81	0.00	0.00	1.00	0.00
江蘇	0.65	0.91	0.75	1.00	0.00	0.47	1.00	0.00	0.50	0.00
江西	0.30	0.30	0.61	0.00	0.00	0.27	0.00	1.00	0.50	0.00
遼寧	0.39	0.84	0.82	1.00	0.00	0.80	1.00	0.00	1.00	0.00
內蒙	0.17	0.19	0.87	0.00	1.00	0.72	1.00	1.00	1.00	1.00
寧夏	0.01	0.02	0.68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0.00
青海	0.01	0.03	0.51	0.00	1.00	0.31	1.00	0.00	1.00	1.00
山東	0.81	0.82	0.89	0.00	1.00	0.57	1.00	1.00	0.50	0.00
山西	0.25	0.31	0.86	0.00	1.00	0.21	0.00	1.00	0.50	0.00
陝西	0.29	0.30	0.71	0.00	0.00	0.78	1.00	0.00	0.00	1.00
上海	0.14	1.00	0.67	1.00	1.00	0.71	1.00	0.00	0.00	0.00
四川	1.00	0.94	0.50	0.00	0.00	1.00	1.00	0.00	1.00	1.00
天津	0.07	0.29	0.97	0.00	1.00	0.88	0.00	0.00	0.00	0.00
新疆	0.09	0.12	0.12	1.00	0.00	0.56	0.00	1.00	0.50	1.00
西藏	0.00	0.00	0.00	0.00	0.00	0.93	0.00	0.00	1.00	0.00
雲南	0.29	0.23	0.22	0.00	0.00	0.75	0.00	0.00	0.50	1.00
浙江	0.41	0.44	0.65	0.00	0.00	0.52	1.00	1.00	0.50	0.00

附錄3 統計學中的聚類分析法

對觀察到的事物進行分類，是人類最基本的思維活動之一。分類也是科學研究中最基本的過程之一，是發展理論所需要的思維^[392]。人類通過對事物的分類，把觀察到的事物（如人、事件、物體）歸入相應的組或類別，以便更好地理解 and 解釋觀察到的現象。用通俗的話說，分類就是把相近的事物歸為一類，相異的事物歸入另類。早在1939年，就有學者提出聚類分析法^[393]。1963年，兩位生物學家的著作《數值分類學原理》^[394]，使聚類分析法得到飛躍性的發展。計算機的發展，對數值分類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分類學在科學研究中的運用非常廣泛，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犯罪學、教育學、人類學、化學、氣象學、地理學等領域，都可以見到分類學的蹤影。複雜的聚類分析與人工智能中的模式識別相關。聚類分析法采用不同的計算方法進行分類^[395]，如K均值算法，凝聚層次聚類法，密度聚類算法等^[396]。聚類分析也可以用於模糊分類^[397]。聚類分析法特別適合於對具有有序數值事物進行分類^[398]。以下是我們采用聚類分析法對各省進行分類的經過^[399]：

附錄表3.1 聚類分析曆史

1	2		3	4	5
類別數	合並類		省的數量	偽F統計量	偽 t^2 統計量
9	CL17	CL14	11	4.0	5.8
8	CL28	CL9	13	3.8	3.0
7	CL8	四川	14	4.1	1.5
6	CL7	CL10	18	3.1	5.4
5	CL6	CL11	24	1.8	6.4
4	CL5	青海	25	2.0	1.3
3	CL4	CL23	27	1.5	2.9
2	CL3	天津	28	1.6	1.3
1	CL2	新疆	29	.	1.6

第4和5列是兩個可以用來確定類別數的統計量。偽F統計量相對大表示類別數量較好；偽 t^2 突然增加，表示不好，應該保持在前一個分類上^[400]。如上表所示，把各省分為7類（粗體字）比較好。

附錄 4 問卷調查

附錄4.1 問卷調查表

關於民眾在文革中參加群眾組織情況的問卷調查

1. 文革時，您（或親友）所在的省、市/地區（如北京、上海、江蘇、新疆）

2. 您（或親友）的出生年份

3. 您（或親友）的性別

4. 您（或親友）的家庭出身

A 革命幹部/革命軍人

B 工人/貧下中農

C 職員/小業主/知識分子

D 黑五類（地、富、反、壞、右

等）

其他

5. 您（或親友）的政治面貌

A黨、團員、積極分子

B一般群眾

C 黑五類

其他

6. 您（或親友）文革開始時的職業

A 中學生 B 大學生（包括軍隊院校） C工人

D 下鄉知青 E農村的農民 F幹部或科員

G 無業人員 其他

7. 您（或親友）參加群眾組織的情況（多選）

A 未參加過群眾組織

B 文革初期參加過保守派組織（如赤衛隊、黑字兵等）

C 參加過群眾造反組織 其他

8. 您（或親友）參加的群眾造反組織屬於社會上的哪一大派？
（如江蘇的P派、好派；湖北的鋼派、新派；重慶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

9. 您（或親友）參加群眾造反組織的原因（多選）

A爭取改變政治處境

B爭取個人經濟權利 C對當權派不滿

D同情受打壓者

E響應毛的號召

F受同事親朋好

友影響

其他 _____

10. 您（或親友）因為參加群眾組織後來受到審查、處理？

是 否 其他 _____

（ 網 上 版 本 ： <https://surveynuts.com/surveys/take?id=133016&c=2104845201JTVP> ）

附錄4.2 問卷調查受訪者的年齡問題

問卷調查在年齡上出現一些問題。例如，第746號受訪者來自四川省的重慶市，1972年出生，男，家庭出身灰五類，本人政治面貌一般群眾，文革開始時職業是中學生，參加過群眾組織，是四川“重慶反到底”成員，參加的原因是響應毛的號召，文革後未受整肅。很顯然，出生年份有誤。因為1972年出生時，群眾組織早已解散不復存在，不可能參加文革中的群眾組織。鑒於這一情況，我們決定將第六個問題（即文革開始時的職業）作為參考依據。凡是回答為中學生、大學生、工人、幹部/職員/教師、農民、下鄉知青、無業人員、軍人等的受訪者，一律視為符合年齡條件。如果是小學生，則根據出生年份，不得晚於1954年。

附錄5 對數回歸模型

附錄5.1 對數回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為了使對統計不太熟悉的讀者能夠理解，我們盡量用通俗易懂語言，因此這裏的解釋可能會顯得不夠專業。首先介紹線性回歸模型（Linear Regression Model）。假設有兩個工程隊，甲隊每小時能完成50立方的土方作業，乙隊每小時可以完成60立方的土方作業。如果求兩隊合作土方工程量，可以用以下公式來計算：

$$\text{土方完成工程量} = 50 * X_1 \text{（即甲隊工作小時）} + 60 * X_2 \text{（即乙隊工作小時）} \quad (5)$$

等號左邊的是因變量，隨著等號右邊的自變量 X_1 和 X_2 的變化而變化。只要知道兩個工程隊的工作時間，就可以求出土方完成工程量。把上述方法運用到社會科學中，可以分析、解釋和推測很多社會現象，如個人收入與一個人的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性別的關係。假設觀察發現它們之間的關係是：

$$\text{個人收入（元/月）} = 200 \text{元} * \text{教育年限} + 300 \text{元} * \text{工作年限} + 100 * \text{男性} \quad (6)$$

這就是說，一個人每多讀一年書，他的月收入可以多掙200元；他每工作一年，收入可以多300元。假如有一個人，讀了12年書，工作了5年，按照收集的情況，他的月收入大致在3900元左右。公式6中有一項是性別。如果是男性，每月的收入可以再加100元。社會科學（如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試圖從收集的數據，得出總結性的分析和推測。這就是所謂的線性回歸模型。

在公式中，除了男性一個變量外，其他的變量都是連續性的函數，即數字可以從負無窮大（或從零）到正無窮大，中間沒有斷點。例如，教育年限可以從0（未讀過書）到20多年（讀博士）之間的任何一個數。工作年限的範圍則更大，可以從0到40多年，即18歲（甚至更小）開始工作，直至55或60歲退休之間的任何一點。

性別是另一種形式的數據，只有男和女，不是用數字來表達的。此類變量還有很多，如人們的職業（如工人、農民、教師、幹部等）。這些變量是無法用數字來表達的，此類數據叫做類別式數據。它

們必須經過特殊處理，才能放入統計模型中進行計算。在線性回歸中，未知的模型參數是通過數據估計出來的。

公式5和6的左邊都是連續函數。如果公式的左邊是類別型數據，一般的線性回歸模型就不適用了，必須用另外一類模型。這就是我們要介紹的對數回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常被譯為邏輯回歸模型（也譯為“分類評定模型”或“評定模型”）。根據模型的原意，其實是用對數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與邏輯並無直接的關係。該英文詞可以譯為“邏輯的”，也可以譯為“對數的”，所以譯為“對數模型”更符合原意。這是因為，在統計學還有一個與對數回歸模型同理的 Log-linear Model，譯為“線性對數模型”。實際上，Log-linear 模型與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本質上是一回事。

對數回歸模型是一種特殊的線性回歸，與線性回歸模型有很多相同之處。它們的模型形式基本上相同，區別在於它們的因變量不同。線性回歸模型的因變量一般是連續函數，對數回歸模型的因變量一般是二分類的（當然也可以是多分類的），如“是”或“非”，“同意”或“不同意”，“通過”或“不通過”等。對數回歸模型中，我們不像在一般回歸模型中計算因變量的具體數值，而是計算其發生的概率 p 。比值的計算是： $p/(1-p)$ 。以下是對數回歸模型的一般表達式：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dots + \beta_n x_n \quad (7)$$

由於對數回歸模型的計算涉及較深的統計知識，此處不贅。

附錄5.2 對數回歸模型的結果

對數回歸的計算結果有兩種：一是參數（Coefficient），二是比值比。參數的解釋比較直觀，但是較抽象，不容易理解。參數可以從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如果是負數，則表示該變量的影響小於另一個對比的類別（通常稱為“參考類”）。如果是正數，則表示變量的影響比參考類大。舉個具體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假設因變量是“參加群眾組織與否”，自變量是“紅五類”，它的對應的參考類別是黑五類。如果紅五類的參數是正的，則表示紅五類比黑五類更有可能參加群眾組織。如果是負的，則表示相對於黑五類，紅五類更可能成為逍遙派。

雖然這樣的理解比較直觀，但如果需要分析到底有多大差別，參數很難給出直觀的結果，所以一般用比值比來解釋。比值比也叫做機

會比、優勢比、交叉乘積比、相對比值、兩個比值的比。比值表示兩數相比所得的值。例如，某個食譜要求面粉與水的重量比例是1:4，也就是說，加1份重量的面粉和4份重量的水。其實比值與百分比是可以互換的。上述例子可以用百分比來表示：面粉占20%（ $1/(1+4)$ ），水占80%（ $4/(1+4)$ ）。在統計人口時，人們也會用到比值。例如，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4年末，8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例為136:100。換言之，80後非婚人口中，男性占到57.6%（ $136/[136+100]$ ），女性占42.4%（ $100/[136+100]$ ）。

如上所述，比值比與百分比有密切的關係。它們是可以互換的，可以推算出來。這裏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其意義。假設有以下一組數據：

附錄表5.1 假設的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情況

	紅五類出身	黑五類出身
保守派	80	30
造反派	20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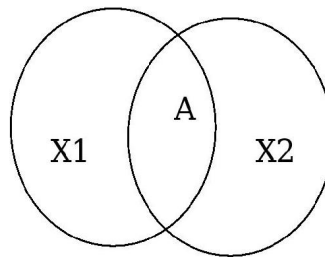
紅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比是80:20（即4:1，比值是4）。可以這樣說，紅五類子弟中，每4人參加保守派，只有1人參加造反派（這也意味著紅五類子弟有80%的人參加了保守派）。紅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的可能性，是參加造反派的可能性的4倍。黑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與造反派之比是30:150（即1:5，比值是1/5或0.2）。換言之，黑五類子弟中，每有1人參加保守派，就有5人參加造反派（這也意味著黑五類子弟中只有16.7%的人參加保守派）。黑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的可能，是參加造反派的可能的1/5。比值可以從0到無窮大，大於1表示可能性大。如前例中紅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與參加造反派的比值是5，說明紅五類子弟更傾向於參加保守派。小於1則表示可能性小。例如黑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與參加造反派的比值是0.2（即1/5），說明黑五類子弟更傾向於參加造反派。

兩個比值的比叫做比值比。上例中，紅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比值與黑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比值之比是（4:1）/（1:5）=20，就是說相對於參加造反派，紅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可能是黑五類子弟參加保守派可能的20倍。由於在日常生活中用比值比的情況不太多，所以使用起來比較別扭。

附錄5.3 多重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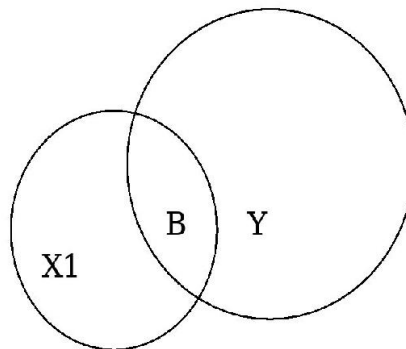
用以下的幾個圖來解釋多重共線性的概念。假設因變量 Y 為群眾組織派別，自變量 X_1 為家庭出身，自變量 X_2 為本人政治面貌。

附錄圖5.1 兩個自變量 X_1 和 X_2 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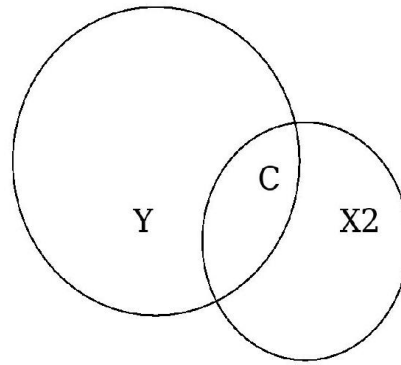
附錄圖5.1中的 A 是兩個自變量間的重合部分，也就是相關之處。例如家庭出身 (X_1) 與本人政治面貌 (X_2) 之間的關係。紅五類子弟多半在政治面貌上也是紅五類，黑五類子弟在政治面貌上多半也是黑五類。

附錄圖5.2 因變量 Y 與自變量 X_1 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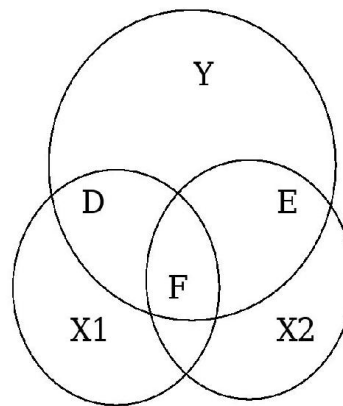
附錄圖5.2中的 B 是因變量 Y （群眾組織派別）與自變量 X_1 （家庭出身）間重合的部分，即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有關係。如家庭出身好的紅五類多半參加保守派，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多半參加造反派。

附錄圖5.3 因變量 Y 與自變量 X_2 之間的關係



附錄圖5.3中的C是因變量Y（群眾組織派別）與自變量 X_2 （本人政治面貌）之間重合的部分，即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有關係。例如，本人政治面貌好的紅五類多半參加保守派，本人面貌不好的黑五類多半參加造反派。

附錄圖5.4 因變量Y與兩個自變量 X_1 、 X_2 之間的關係



附錄圖5.4中的D，E，F，分別表示自變量 X_1 ， X_2 與因變量Y有關係的部分。其中，F部分是兩個自變量共享的。如果只把自變量 X_1 放入模型，只有D和F兩部分與因變量Y相交（如圖5.2，即 $D+F=B$ ）。如果只把自變量 X_2 放入模型，只有E和F兩部分與因變量Y相交（如圖5.3，即 $E+F=C$ ）。當模型中已有一個自變量後，再加另一個自變量時，增加與因變量相交的部分就很小了，或者是D（如果已有了 X_2 ），或者是E（如果已有了 X_1 ）。F部分是兩個自變量共享的，所以加上另一個自變量並不顯示出來。這種現象就是多重共線性問題。

有時候，由於兩個自變量共享的部分太多，以至於加上另一個自變量後，增加的單獨與因變量的相交部分（即D或E部分）很小，可以忽略不計。此時，在統計模型中顯示出該自變量P值大於0.05以上，似

乎該自變量並不能很好地解釋因變量的變化，或者說該自變量對因變量的意義不大。事實上，是因為該自變量與另一個已經在模型中自變量存在著共線性，不是該自變量與因變量間沒有相關的聯系。正如我們舉的例子中的情況，家庭出身與本人政治面貌存在著共線性，所以當模型中已有其中一個自變量後，另一個自變量顯得無足輕重。這不是說明它不重要，而是說明它的作用已經由另一個與其相近的自變量取代，它的作用顯示不出來。

附錄 6 省級群眾大派組織的分類

附錄6.1 各省級大派組織分類的數據

為了進行分類，我們將省級大派組織的數據轉換為數值進行計算。“是”定為1，“否”定為0。以下是分類數據：

附錄表6.1 各省級群眾組織派別分類變量數據

編號	省份	派別簡稱	Y1	Y2	Y3	Y4	Y5	Y6
X1	安徽	安徽好派	0	1	1	1	0	0
X2	安徽	安徽P派	0	0	1	1	0	0
X3	北京	北京天派	0	0	1	1	1	0
X4	北京	北京地派	0	0	1	1	1	0
X5	北京	新北大公社	0	0	1	1	1	0
X6	北京	新北大公社井岡山	0	0	0	0	0	0
X7	北京	清華大學團派	0	0	1	1	1	0
X8	北京	清華大學四派	0	0	0	0	0	0
X9	福建	福建八.二九	0	0	1	1	1	1
X10	福建	福建革造會	0	1	1	0	0	1
X11	福建	福建四.二零革造會	0	1	0	0	0	0
X12	甘肅	甘肅紅三司	0	0	1	1	1	0
X13	甘肅	甘肅紅聯	0	0	0	0	0	1
X14	甘肅	甘肅革聯	1	0	0	0	0	1
X15	廣東	廣東旗派	0	1	1	1	0	0

編號	省份	派別簡稱	Y1	Y2	Y3	Y4	Y5	Y6
X16	廣東	廣東總派（東風派）	1	0	1	1	1	0
X17	廣西	廣西四. 二二	0	1	1	1	0	1
X18	廣西	廣西聯指	1	0	1	1	0	1
X19	貴州	貴州四. 一一	0	0	1	0	0	0
X20	貴州	貴州支紅派	0	0	1	1	1	0
X21	貴州	貴州紅衛軍	0	1	0	0	0	0
X22	河北	河北保定工總	0	1	1	1	0	1
X23	河北	河北保定工籌	1	0	1	1	0	1
X24	河北	河北石家莊反軍派	0	1	0	0	0	0
X25	河北	河北石家莊擁軍派	0	0	1	0	0	1
X26	河南	河南二七公社	0	1	1	1	1	0
X27	河南	河南河造總	0	0	1	0	0	1
X28	河南	河南十大總部	1	0	0	0	0	1
X29	黑龍江	黑龍江捍聯總	0	0	1	1	1	0
X30	黑龍江	黑龍江炮轟派	0	0	1	0	0	0
X31	湖北	湖北鋼派	0	1	1	1	0	0
X32	湖北	湖北新派	0	0	1	1	0	0
X33	湖北	湖北百萬雄師	1	0	0	0	0	1
X34	湖南	湖南湘江風雷	0	1	1	1	0	0
X35	湖南	湖南工聯	0	0	1	1	0	0
X36	湖南	湖南高司	0	0	0	0	0	1
X37	吉林	吉林紅二派	0	0	1	1	0	1
X38	吉林	吉林公社派	1	1	1	0	0	0
X39	江蘇	江蘇好派	0	1	1	1	1	0
X40	江蘇	江蘇P派	0	0	1	1	0	1
X41	江西	江西大聯籌	0	1	1	1	1	0
X42	江西	江西聯絡總站	1	0	0	0	0	1
X43	遼寧	遼寧八. 三一	0	1	1	1	1	0
X44	遼寧	遼寧遼聯	0	0	1	0	0	1

編號	省份	派別簡稱	Y1	Y2	Y3	Y4	Y5	Y6
X45	遼寧	遼寧遼革	0	0	1	0	1	0
X46	內蒙	內蒙呼三司	0	1	1	1	1	0
X47	內蒙	內蒙紅、工、無	1	0	0	0	0	1
X48	寧夏	寧夏總指揮部	0	1	1	0	0	1
X49	寧夏	寧夏總司	0	0	1	0	0	0
X50	寧夏	寧夏三司	0	0	1	0	0	0
X51	寧夏	寧夏籌革造	1	0	1	0	0	1
X52	青海	青海八.一八	0	1	1	1	0	1
X53	青海	青海捍衛隊	1	0	0	0	0	1
X54	山東	山東四二八	0	0	1	1	1	0
X55	山東	山東四二二	0	0	1	0	0	0
X56	山西	山西紅總站	0	0	1	1	1	0
X57	山西	山西紅聯站	0	0	1	0	0	1
X58	陝西	陝西東派	0	0	1	1	0	1
X59	陝西	陝西西派	0	1	1	1	0	0
X60	上海	上海工總司	0	0	1	1	1	0
X61	上海	上海紅革會	0	0	0	0	0	0
X62	上海	上海支聯站	0	0	0	0	0	0
X63	四川成都	四川成都八.二六	0	1	1	1	1	0
X64	四川成都	四川成都紅成	0	0	1	0	0	0
X65	四川成都	四川成都產業軍	1	0	0	0	0	0
X66	四川重慶	四川重慶八.一五	0	0	1	1	0	1
X67	四川重慶	四川重慶反到底	0	1	1	1	1	0
X68	西藏	西藏造總	0	1	1	1	0	1
X69	西藏	西藏大聯指	1	0	1	0	0	1
X70	新疆	新疆三新派	0	0	1	1	1	0
X71	新疆	新疆三促派	1	0	1	0	0	1

編號	省份	派別簡稱	Y1	Y2	Y3	Y4	Y5	Y6
X72	雲南	雲南八派	0	1	1	1	0	1
X73	雲南	雲南炮派	0	0	1	0	0	1
X74	浙江	浙江省聯總	0	0	1	1	1	0
X75	浙江	浙江紅暴會	0	0	1	0	0	1
X76	天津	天津大聯籌	0	0	0	0	0	0
X77	天津	天津五代會	0	0	1	1	1	0

我們對省級大派組織六大分類指標的數值進行統計分析，發現一些規律，提出以下分類方案：首先，如果省級的派別組織是文革初期的保守派，或改頭換面，或其成員主要來自文革初期的保守派（即 Y1 記為“1”），分類為“保守派”。其次，其餘的派別中如果受軍隊壓制和打擊（特別是“二月鎮反”中的受害者，即 Y2 記為“1”），則分類為“激進派”。因為按照徐友漁的說法，“在 1967 年的‘二月鎮反’中，遭到軍隊鎮壓的肯定是造反派（雖然反之不一定成立）”[\[401\]](#)。第三，對其餘的派別進行得分計算，具體公式如下：

$$Z = Y3 + Y4 + Y5 - Y6 \quad (8)$$

指標 Y3 表示該派是否進入省革會常委，Y4 表示該派文革後常委是否受整肅，Y5 表示該派組織的支持者文革後是否受整。這 3 個指標均表示該派組織的造反傾向。大多數省級造反派，勢力強大的進入省革會任常委，文革後受整，其支持者也在文革後遭殃。指標 Y6 則表示保守派傾向。保守派的支持者在文革後大多複出重掌大權。因此一個派別可能的最高得分是 3，可能的最低得分是 -1。得分最高者（3 分）定為“激進派”，得分最低者（-1 分）定為“保守派”，得分居中者（0～2 分）定為“溫和派”。把造反派分為“激進派”和“溫和派”，是因為文革中不僅存在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鬥爭，而且存在造反派內部的鬥爭。這一鬥爭延續的時間更長，鬥爭更激烈、更廣泛。

附錄表6.2 派別組織分類

編號	分類	標準	成員舉例
B	保守派	Y1 為 1 或得分為 -1	廣西聯指、河北十大總部、吉林二社、內蒙捍衛兵、四川重慶產業軍、

			新疆三籌、湖南高司
J	激進派	Y2 為 1 或 得分為 3	河南二七公社、湖南湘江風雷、江蘇好派、青海八一八、四川重慶反到底、清華大學團派
W	溫和派	得分為 0、 1、2	安徽 P 派、湖南工聯、黑龍江炮轟派、四川成都紅成、清華大學四派、浙江紅暴

B^[402]類是保守派或保守派的變種（即 Y1 為“1”），如“湖北百萬雄師”、“廣東東風派”、“廣西聯指”、“河南十大總部”等，也有得分為-1的“湖南高司”和“甘肅紅聯”。“湖南高司”原為造反派，但後來與造反派分裂而轉變立場，趨向保守。原為造反派的“甘肅紅聯”反對分裂出去的“紅三司”，竟與保守派“甘肅革聯”聯手。

J類是較激進的造反派。此類派別大多為“二月鎮反”的受害者，如著名的“河南二·七公社派”、“湖北鋼派”、“湖南湘江風雷派”、“遼寧八·三一派”、“廣東旗派”等。“廣西四·二二派”、“河南石家莊反軍派”和“陝西東派”雖然沒有在1967年初受到軍方的鎮壓，但因為反對軍方受到打擊，所以 Y2 也記為“1”。激進派中還有一些派別，是得分為3的組織。它們的代表進入省革會任常委（或實際掌權），文革後主要成員受到整肅，它們的支持者也受整，如“甘肅紅三司”、“天津五代會”、“新北大公社”等。

W類是較溫和的造反派。它們是得分為0至2的派別組織，如得2分的“安徽 P 派”、“福建八·二九”、“湖北新派”、“湖南工聯”，得1分的“江蘇 P 派”、“貴州四·一一”，和得0分的“清華大學四派”、“浙江紅暴”等。溫和派與激進派相比，只是造反的程度不同。例如，“清華大學團派”屬於激進派，其對立派“清華大學四派”則屬於溫和派。前者堅持“黑線主導論”，認為文革前17年的教育路線是一條黑線，應該徹底否定。後者則堅持“紅線主導論”，認為文革前17年還是在毛的領導下，不應完全否定。盡管它們在如何對待文革前的形勢看法上有分歧，但兩者對清華大學黨委、對蔣南翔均持否定態度。

附錄7 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中派別不明者的分析

表18.2列出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的省份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的關係。在這些省份中，有42位受訪者的派別選擇不明。他們中有11人填寫了參加的組織（如紅衛兵、廣東井岡山、廣西好派等），但是無法確認屬於哪一個省級大派組織。另有27人則未填寫參加的群眾組織。省級組織派別明確和不明確的受訪者與家庭出身的分布如下：

附錄表7.1 保守派與造反派對峙的省份派別明確與不明確者和家庭出身的關係

派別	革命家庭	工農家庭	灰類家庭	黑類家庭	合計
明確者	15 （ 74% ）	29 （ 71% ）	25 （ 69% ）	23 （ 72% ）	92 （ 71% ）
不明確者	6 （ 29% ）	12 （ 29% ）	11 （ 31% ）	9 （ 28% ）	38 （ 29% ）
合計	21	41	36	32	130

如上表所示，派別不明者占各類出身的28～31%之間，比較接近。家庭出身與派別是否明確沒有顯著差別（ $\chi^2=0.0539$ ， $L^2=0.0538$ ，自由度=3，Fisher精確測試P值=1.0）。所以有理由相信，38位派別不明者屬於隨機現象，沒有系統性的偏差，不會影響表18.2的分析結果。

表18.3列出造反派內訌的省份家庭出身與派別選擇的關係。有290人派別選擇不明，另有40人家庭出身未填寫，共有330人情況不明。由於人數較多，需要進一步分析。派別明確和不明確的受訪者與家庭出身的分布如下：

附錄表7.2 造反派內鬥省內派別明確者與不明確者和家庭出身的關係

派別	革命家庭	工農家庭	灰類家庭	黑類家庭	合計
明確者	60 （ 37% ）	88 （ 48% ）	176 （ 75% ）	70 （ 67% ）	394 （ 58% ）
不明確者	101 （ 63% ）	95 （ 52% ）	60 （ 25% ）	34 （ 33% ）	290 （ 42% ）

明確者					
合計	161	183	236	104	684

上表顯示，派別不明者的不同出身之間有較大的差別。革幹革軍子弟和工農子弟，分別有63%和52%屬於派別不明者，灰五類子弟和黑五類子弟卻分別只有25%和33%。紅五類子弟的派別不明者大大多於非紅五類子弟。家庭出身與是否屬於激進派或溫和派有顯著的差別（ $\chi^2=66.0$ ， $L^2=67.2$ ，自由度=3， $P<0.001$ ）。

在290人中，有119人參加的組織填寫為“保守派”，或者組織屬於保守派（如湖南的“高司”、“聯動”）。顯然這些人屬於保守派，不屬於造反派的內鬥。餘下的171人，少數人填寫了派別組織。但是筆者無法確定屬於哪一派省級組織，大部分人則沒有填寫派別組織。這種情況，可以從第一篇第五章中的南京師範學院附中的紅衛兵組織得到解釋。該校曾出現過5個紅衛兵組織，最後成為兩大派：“造反軍”和“紅聯”。前者並未與社會上的大派組織結盟。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的大派別不明者，很有可能與南京師範學院附中的“造反軍”相似。以下是餘下的171名派別不明的受訪者在家庭出身方面的分布情況：

附錄表7.3 派別不明的171名受訪者的家庭出身的關係

派別	革命家庭	工農家庭	灰類家庭	黑類家庭	合計
填寫了組織但不能確定	4（13%）	14（21%）	4（9%）	4（14%）	26（15%）
未填寫組織	27（87%）	52（79%）	41（91%）	25（86%）	145（85%）

合 計	31	66	45	29	171
--------	----	----	----	----	-----

填寫的組織中，有“安徽九二九”、“湖南井岡山”、“山東反到底”等。上表中未填寫組織的受訪者，在家庭出身方面的分布比較接近，在79%至87%之間。他們的差別在統計學上沒有顯著差別（ $\chi^2=0.3324$ ， $L^2=0.3264$ ，自由度=3，Fisher 精確測試P值=0.3626）。所以有理由相信，這些派別不明者屬於隨機現象，沒有系統性的偏差，不會影響表18.3的分析結果。

附錄8 民眾參加群眾組織比例的調整計算

表 16.7 列出各職業類別參加群眾組織的信息，但不能直接用來估算民眾參加群眾組織的比例。這是因為，女性參加調查的人數比例太小，僅占受訪者總數的 27%。根據 1964 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當時的男女比例是 1.05：1。從總體上說，女性參加組織的積極性不如男性。因此，該表中各職業的比例大多高於實際情況。我們在這裏討論如何調整，使之正確反映實際情況。假設某地區、某職業的男女參加比例如下：

表附錄 8.1 某地區某職業中男女參加群眾組織的情況

	女性 (F)	男性 (M)	合 計	百分比
未參加 (NO)	X_{11}	X_{12}	$X_{1.}$	$P_1\%$
參加 (YES)	X_{21}	X_{22}	$X_{2.}$	$P_2\%$
合計	$X_{.1}$	$X_{.2}$	X	100%

調整公式為：

$$x'_{ij} = r_j * x * \frac{x_{ij}}{x_j} \quad (8)$$

式中， $i=1, 2$ （NO=1，YES=2）， $j=1, 2$ （F=1, M=2）， $r_1=0.4867$, $r_2=0.5133$ 。公式比較抽象，舉一個具體例子說明。現有非省會地區中學生參加群眾組織情況如下：

表附錄 8.2 非省會城市受訪中學生參加群眾組織的情況

	女性 (F)	男性 (M)	合 計	百分 比
未參加 (NO)	25	47	72	37%

參加 (YES)	20	101	121	63%
合計	45	148	193	100%

$$x'_{11} = 0.4867193 \times \frac{25}{45} = 52$$

$$x'_{21} = 0.4867193 \times \frac{20}{45} = 42$$

$$x'_{12} = 0.5133193 \times \frac{47}{148} = 31$$

$$x'_{22} = 0.5133193 \times \frac{101}{148} = 68$$

表附錄 8.3 調整後的非省會城市中學生參加群眾組織的情況

	女性 (F)	男性 (M)	合 計	百分 比
未參加 (NO)	52	31	84	43%
參加 (YES)	42	68	109	57%
合計	94	99	193	100%

所以，調整後的非省會城市中學生參加群眾組織的比例是 57%（見表 16.8）。

附錄9 省級群眾組織簡況

文革期間，中共允許民眾成立自己的組織，向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向走資派奪權。各種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這些組織人員龐雜、山頭林立，但各省均存在為數不多的省一級的聯合組織。毛不允許全國性的統一組織，只允許省市級的大組織。群眾組織為尋求社會力量的支持，自動成立或者投靠社會上的跨行業大組織，以期在運動中與本單位的對立派抗衡。眾多的群眾組織形成不同的派別，派別鬥爭隨著運動的進程展開。

從 1966 年 5 月 29 日紅衛兵組織出現到 1967 年初，各省市自治區曾出現過官辦的紅衛兵組織和群眾組織。這些組織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人們常把它們稱作“保皇派”。如上海和江蘇的“赤衛隊”，四川的“赤衛軍”，貴州的“工人糾察隊”等。這些公認的保守派組織因其官方色彩性質非常明確，所以不在本章的討論範圍之內。我們僅對官辦組織以外的群眾組織進行研究和分類。附錄 9 將以地區為序，對各省級大派組織進行簡單的敘述。主要從 6 個方面，為第 17 章中述及的群眾組織進行分類。這 6 個方面是：（1）各省級的大派組織是否文革初期保守派改頭換面的組織；（2）它們是否受到軍隊的打擊（特別是“二月鎮反”）；（3）各大派組織的代表是否進入省革會常委會；（4）進入省革會常委會的群眾代表文革後是否受到整肅；（5）支持各大派組織的領導幹部在文革後是否受到整肅；（6）支持各大派組織的領導幹部在文革後是否複出，重新上臺。

附錄 9.1 中央直轄市：北京、上海和天津

北京的文革由大學的紅衛兵左右。北京先後出現過 3 個松散的全市性組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一司”），“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簡稱“二司”），“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為“三司”）。“一司”是保守派紅衛兵的聯合組織，到 1966 年年底就解體了。“二司”由於成員混雜，沒有搞什麼大的活動，影響不大。“三司”在全國造反派中影響巨大。

1967 年春，北京的大學造反派組織圍繞奪權發生爭執和分化，重新組合為“天派”和“地派”。“天派”以聶元梓、蒯大富和韓愛晶為代表人物，“地派”以王大賓和譚厚蘭為代表人物。聶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共九屆候補中央委員。蒯大富、韓愛晶、王大

賓和譚厚蘭曾任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工宣隊接管前，聶曾當選北京大學學校文革主任（相當於校革委會），蒯是清華大學的實際掌權人，韓愛晶是北京航空學院革委會主任，譚厚蘭是北京師範大學革委會主任，王大賓是北京地質學院的革委會主任。文革結束後，聶、蒯、韓和王均被判刑，譚厚蘭因積極交代且患有子宮頸癌，得以免於起訴，保外就醫，但很快不治身亡。支持這5位學生領袖的中央文革成員，在文革結束後被判刑。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群眾組織在全國很有影響力，所以也在分析之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工宣隊進駐前沒有正式成立革委會，聶和蒯均是實際掌權人。文革結束後，北京大學的“公社派”和清華大學的“團派”主要領導人受到嚴厲制裁，如聶元梓和蒯大富均被判刑。他們的對立面北京大學“井岡山”和清華大學的“四派”的主要領導似乎得到善終，不少人走上領導崗位，或從事專業工作，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支持聶元梓和蒯大富的中央文革成員的命運已提過，此處不贅。

上海的大學紅衛兵組織中，最大、最有影響力的是“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上海最大的工人組織是“工總司”。“紅革會”一直與“工總司”並肩作戰。但該組織在上海有了名氣之後，其領導人自恃造反有功，不甘居人之下。他們收集炮打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材料，甚至綁架張春橋的助手徐景賢。中央文革發出特急電報譴責“紅革會”，其炮打張春橋的失敗導致它的垮臺。

上海市革委會由“工總司”一派的人員掌控。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局勢並未就此穩定。“工總司”因為對上海的群眾組織支一派打一派，積怨甚多，又遇到勁敵——上海柴油機廠的“聯司”。受壓的群眾組織紛紛支持“聯司”，成立全市性的組織“支聯站”，上海的局勢面臨動亂的危險。1967年8月4日，王洪文召集“工總司”，動用1000多輛汽車，10多萬人，強行攻打“上柴聯司”。戰鬥以“工總司”的全面勝利告終，“上柴聯司”司令楊仲池被抓獲下獄。由於“上柴聯司”和“支聯站”的瓦解，“工總司”一家獨大，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

“工總司”司令王洪文曾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直至黨的副主席。文革結束後，王被判刑。支持“工總司”的中央文革成員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兼任上海市革委會正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判刑。“紅革會”的領袖之一——勞元一因很早被趕下曆史舞臺，因禍得福，未受懲罰。等到“四人幫”倒臺鄧小平

掌權，他成為國家科委的幹部。“上柴聯司”的司令楊仲池，在華國鋒時期得到平反。

天津市最早出現群眾組織是從學校開始的，工礦企業的造反組織成立要稍晚一些。在大聯合中，天津市成立“五代會”，即“工代會”、“幹代會”、“農代會”、“大專院校紅代會”、“中學紅代會”。與“五代會”對立的造反組織，組成“天津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簡稱（“大聯籌”）。兩大組織在天津各占半壁江山。中央表態不支持“大聯籌”，形勢急轉直下，“大聯籌”土崩瓦解。

“五代會”的代表在天津市革委會中占有絕對優勢，其主要代表人物林啟予進入革委會任常委。如果不是因為他太年輕，資曆不夠，很可能當上革委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很多“五代會”的領導人判刑，“五代會”進入市革委會常委會的林啟予被判10年。這是因為原天津市委書記張淮三在文革結束重新當權後說過：“我蹲了多少年，他們不能少於我！錯了再改。”文革期間張淮三在監獄裏呆了9年，按照不能少於他的指示精神，判了林啟予10年。文革後“五代會”成員受整，“大聯籌”基本上沒有受整，因為“大聯籌”早被打了下去。“五代會”方面掌了一段權，對迫害幹部負有更多的責任。支持“五代會”的中央文革成員陳伯達和天津革委會主任、老幹部解學恭，在文革結束後分別被判刑並開除黨籍。

附錄 9.2 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和遼寧^[403]

黑龍江是早期造反的省份之一。1967年1月31日，黑龍江省召開大會宣布奪權。2月2日，中央給予公開支持，潘複生和江家道任一、二把手。革委會成立後，革委會的副班長暗中整理潘複生的材料，被潘複生以反革命罪抓進監獄。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色造反團”公開打出反潘旗號，潘複生把反對派的10多人抓進監獄，並宣布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色造反團”為右派組織，予以解散。4月，黑龍江大學的“紅色造反團”貼出大字報，炮轟省革委會，“炮轟派”由此問世。潘複生動員省革委會的群眾代表出面，成立“捍聯總”。反對派不甘示弱，立即成立“炮轟聯絡站”。哈爾濱省在革委會成立後出現新的兩大陣營：“捍聯總”和“炮轟派”。

1971年6月，潘複生倒臺，被撤職。“捍聯總”的代表聶世榮和牛成山曾任省革委會常委，“炮轟派”的代表人物範正美曾任省革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聶世榮和牛成山均被判刑。範正美雖受過審查，但得以善終，成為大學教授。支持“捍聯總”的幹部潘複生被免職審查後，一直接受“監護審查”，直至1980年4月去世。1982

年，中共中央做出結論，潘的歷史問題已經查清，沒有問題；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不作組織處理。

吉林省是東三省之一。1967年“一月風暴”之後，長春的群眾組織逐漸分化為兩大派四個群眾組織：（1）長春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聯合組織“紅色造反者長春市紅衛兵總部”（簡稱“二總部”），（2）以工農為主體，以“二總部”為中堅的“紅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3）以退出“二總部”的部分群眾組成的“長春公社”，（4）以“毛澤東主義教育大學（即東北師範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教大主義兵”）為核心的“東方紅公社”。“教大主義兵”是東北師範大學的保守派紅衛兵，因名聲不好，後改名為“教大紅色造反團”。“長春公社”和“東方紅公社”持相同觀點，是一派，稱為“公社派”（也稱為“長東二社派”或“社派”）。“紅革會”與“二總部”為一派，常稱為“紅二派”。“紅二派”在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

2月23日，“公社派”與“紅二派”在吉林大學發生武鬥。吉林省軍區派出軍隊去“支左”，不容分說，把屬於“公社派”的“公安聯總”打成反革命，強令解散工人造反組織，“長春公社”被壓垮。吉林省軍區要求“三個徹底”（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徹底改組），使“公社派”的許多組織解體。這是發生在吉林省的“二月鎮反”。到了4月初，“公社派”才逐漸恢復組織。8月，經過中央的調解，吉林省軍區承認鎮壓群眾是錯誤的。但是兩派武鬥仍然不斷，直到1968年1月兩派才達成協議，2月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員會。

“公社派”進入省革會常委會的代表有張振標等，“紅二派”的代表有姚美玲、許肇昌等。文革結束後，“紅二派”的省革會常委許肇昌被判刑。支持“紅二派”鎮壓“長春公社”的省軍區副司令賀吉祥得以善終，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黑龍江省和吉林省都只有兩個對立的省級群眾組織，地處東北的遼寧省卻同時並存三個跨省的群眾組織。1966年8月以後，沈陽地區的紅衛兵開始把矛頭指向遼寧省委。9月中旬，省委書記被批鬥。1967年2月16日，“遼寧省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遼聯”）在沈陽宣告成立。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在成立大會上講話表示支持，表明他與“遼聯”的關係。“遼聯”得到相當大一部分機關中下層幹部和已經“站出來”的高級領導幹部的支持。“遼聯”的政治立場是保宋任窮，反對沈陽軍區司令陳錫聯。5月10日，反對東北局的一派組織成立“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簡稱“遼革”），矛頭直指宋任窮。“遼革站”受到軍方支持，其政治立場是

保陳（錫聯）反宋（任窮）。還有一些群眾組織既不贊成保宋任窮，也不贊成保陳錫聯，他們曾在3月被軍區抓進監獄。這是遼寧的“二月鎮反”。6月5日，這些組織成立“遼寧八·三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遼寧八·三一”），其政治立場是既反宋也反陳。至此，遼寧地區三大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從遼寧的三大派別可以看出，東北局的宋任窮支持“遼聯”，沈陽軍區的陳錫聯支持“遼革”，“遼寧八·三一派”背後有北京學生的支持。

1968年5月10日，遼寧省革委會成立。省革委會常委會中，三派均有代表進入。例如，“遼革派”有尉鳳英和魏禮玲任省革會副主任，尉鳳英還是中共九屆、十屆的中央候補委員。“遼聯派”有劉忠禮和郝義田任省革會副主任。“遼寧八·三一派”有任寶成、於桂蘭和張治國任省革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遼革派”的尉鳳英被撤銷職務，回到省裏。其他兩派主要領導人的結局沒有查到。有一點是肯定的，“遼寧八·三一派”的下場一定不會好。因為屬於“遼寧八·三一”的“撫順八·三一派”領導人武振良和郭大可早就被抓進監獄，生死不明，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最終結局。支持“遼聯”的宋任窮文革結束後不僅官復原職，還進入中共核心。支持“遼革”的陳錫聯在文革中出盡風頭，文革結束後以退出政壇而告終，並未受到嚴懲。倒黴的是“遼寧八·三一派”的後臺——北京的造反學生，文革後均受到嚴厲處置，判了刑。

附錄 9.3 華北地區：山東、山西、河北和內蒙^[404]

山東文革較有特色的一點是，該省有位著名的造反幹部——王效禹。王在山東的文革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以至有“地方出了個王效禹，軍隊出了個李再含”之說，他還有“山東小太陽”的別名。王在1957年反右時，為保護四位下屬被打成右傾，受到撤職降級處分。曾經右傾的王效禹在文革初期很緊張，生怕揪到自己頭上。他接受了反右時的教訓，變成左派人物。他與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曾經關係密切，所以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山東的群眾組織與王效禹有著密切的關係。王效禹原本在山東的青島市，當他奪權實際上控制了青島後，中央文革讓他殺到山東的省會濟南去奪權。

1966年8月28日，部分到北京串連的山東大學（簡稱“山大”）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宣布成立“山東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山大主義兵”）。回到濟南後，“山大主義兵”迅速擴大，成為濟南和山東造反組織的中堅力量。另一所在山東文革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大學是山東師範學院（簡稱“山師”）。工作組撤離後，

對黨委和工作組有意見的學生開始串連，成立“山東師範學院文革串連紅衛兵指揮部”（簡稱“山師串連兵”）。

到12月，“山大主義兵”和“山師串連兵”團結一致，基本左右了濟南的局勢。然而在奪權問題上，兩個造反組織產生矛盾，分裂了。“主義兵派”成立“山東省紅衛兵造反總聯絡站”（簡稱“山紅聯”），“山東省革命工人造反聯合會”（簡稱“山工聯”）。“串連兵派”則成立“紅衛兵山東指揮部”（簡稱“紅山指”）和“山東省革命工人造反總指揮部”（簡稱“山工總”）。這樣就形成以“山大主義兵”、“山紅聯”、“山工聯”為一方（為方便起見，我們簡稱為“主義兵派”），以“山師串連兵”、“紅山指”、“山工總”為另一方（為方便起見，我們簡稱為“串聯兵派”）的兩派局面。

1967年1月31日，省公安廳發生武鬥。省公安廳的造反組織參與兩派造反組織的武鬥，並且關押“主義兵派”的成員。“主義兵派”沖擊專政機關省公安廳，毆打公安人員。王效禹迅速做出調整，棄用曾與他並肩作戰的“主義兵派”，在中央文革和濟南軍區、山東省軍區的支持下，於2月2日聯合“串聯兵派”的組織，在濟南成立“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大聯合革命委員會”（簡稱“山東大聯委”），並於次日宣布在山東奪權。2月7日，中央批准承認王效禹在山東省的奪權。

王效禹掌權後，授意手下大肆抓捕反對奪權的“主義兵派”。他們中很多人曾同他一起共同沖擊省市黨委，批判當權派。這些老造反被抓被打，有的致殘。“主義兵派”的造反派與文革初期反對造反派的群眾聯合起來，在4月22日召開大會，要求恢復名譽。王效禹指示支持他的“串聯兵派”，於4月28日也召開大會。至此，山東分成“四．二二派”（“反王派”）和“四．二八派”（“支王派”）兩大對立的群眾派別。

王效禹在文革中幹的兩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是，文革初期在青島造反時，有些較正派的大學生造反派非常反感一些混混造反派的打砸搶行為，曾問為什麼要用這樣的人？王效禹回答說，這些人能沖能打，關鍵時刻稍一鼓動，就能沖上去。當年搞土改的時候，有些地方的貧下中農比較老實，難以發動，就是利用流氓無產者，先打開局面。第二件事是，九大前夕，王效禹為了使造反派能夠成為九大代表，力排眾議，把大批造反派拉進黨內，這也成為他日後的一大罪狀。

山東省革委會成立於1967年2月3日（正式更名為省革委會是2月23日），王效禹任省革委會主任。“支王派”進入省革委會常委會，其代表有楊保華、鹿田計和孟慶芝等。鹿田計曾當選九屆、十屆

和十一屆中央委員。“反王派”似乎也有進入省革委會常委會的[\[405\]](#)。王效禹於1969年5月就倒臺，1971年3月30日被正式撤銷職務。文革結束後，王效禹被開除黨籍，支持王效禹的中央文革也遭到清洗。“支王派”的成員均遭清洗，孟慶芝被判死刑，楊保華被判死緩。

山西的群眾運動以省會太原為中心。1966年8月，山西省委指使成立全省性的保守組織。面對保守派的聯合，10月26日（也有人說是11月1日），造反派成立“山西大中院校紅色造反聯絡站”（簡稱“紅聯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團”（簡稱“兵團”）。太原工學院（簡稱“太工”）的“太工紅旗戰鬥隊”（簡稱“太工紅旗”）是造反組織中較有影響的組織。“太工紅旗”、“兵團”和“紅聯站”對省委均持反對態度。

有一個組織特別值得一提，這就是總部設在太原的冶金部第十三建設公司（簡稱“十三冶”）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簡稱“決死縱隊”）。“決死縱隊”的第一號領導人是楊承效（也有資料寫成楊成孝）。楊敢打敢拼，是山西省著名的文革領袖。楊承效從一個普通工人成為奪權的總指揮，有著過人的膽量和能力。他最有名的一句話，出自他與一位學生造反領導人的對話。當紅衛兵問他什麼叫做“全是清一色的工人階級”時，他答道：“就是他媽的一個共產黨員也不要！”

11月8日，山西工人造反組織“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團”（簡稱“工人兵團”）成立。該組織主要由太原市的大型企業的造反派組成，全盛時期號稱有50多萬人。1967年1月，全國掀起奪權高潮。毛表示讓劉格平（原副省長）執掌山西的文革。劉格平聯絡省軍區政委張日清，以“決死縱隊”的楊承效為總指揮，成立“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於1月12日奪了省委的權。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公開支持劉格平等人的奪權。社論中有在毛的“關懷和支持下”的話，這在文革中空前絕後，其他省的奪權從未有這樣的“殊榮”。山西省的保守派勢力垮臺了。

3月18日，山西省革委會正式成立。劉格平擔任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張日清、69軍長謝振華、昔陽縣大寨大隊書記陳永貴等任副主任。奪權以後，權力中心形成劉格平、陳永貴等人為一派，張日清等人為另一派的局面。5月初，支持劉格平的群眾組織宣布成立“山西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簡稱“紅總站”[\[406\]](#)），“決死縱隊”屬於“紅總站”。另一派群眾成立“山西省紅色造反聯絡總站”（簡稱“紅聯站”），支持張日清一派，“太工紅旗”是其重要成員。曾是同盟的造反派分裂了，成了勢不兩立的對手。在省革會常委

會中，“紅總站”的代表有陳永貴、楊承效等，“紅聯站”的代表有劉灝、段立生、宋捷等。以劉格平為首的“紅總站”定下摧垮“紅聯站”的政策。楊承效率領“決死縱隊”大開殺戒，挑起事端，從此山西陷入兩派武鬥。“紅聯站”絕非“紅總站”的對手，很快招架不住。

1968年1月3日，中央確定69軍長謝振華任山西支左委員會主任，劉格平的權力受到削弱。謝振華上任後為“紅聯站”平反，采取措施制止武鬥。1969年7月，劉格平和張日清被調離山西，謝振華接管山西，任山西省委核心小組組長。謝後來成為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會主任。在謝振華的治下，楊承效於1970年8月被判死刑。楊承效是個勞改釋放犯，在劉格平和陳永貴的支持下當上“紅總站派”的總指揮。楊曾說過：“活著就幹，死了就算，反正是個二級半。”楊承效在文革中造反，賭上了自己的性命。

文革結束後，“紅總站”的支持者劉格平的結論是“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安排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等閑職，算是善終。另一位支持者陳永貴雖然追隨“四人幫”，於1980年被迫辭去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等職，但並未受到其他更重的處罰。謝振華在1974年因得罪“四人幫”曾被罷官下獄，文革結束後謝得到平反，複出任沈陽軍區副司令等職，並當選為十二屆中央委員等，得以善終。支持“紅聯站”的張日清被調離山西後淡出政界，晚年迷上國畫，出版畫集，也算是善終。最倒黴的是“紅總站派”的楊承效，被早早槍決。

華北地區中，河北省占據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河北地處華北平原，北京和天津兩個直轄市在其範圍之內，是京城通往外地的門戶。河北省與眾不同之處是，其省會曾三次變遷。在天津於1967年初成為中央直轄市之前，是河北的省會。天津成為直轄市後，保定市成為其省會。然而僅僅過去兩年，省會又搬到石家莊市。這一變動，使保定和石家莊都沒有成為河北省文革的中心，河北省也沒有像其他省一樣擁有全省性的群眾組織。本節著重討論石家莊和保定兩個市。保定市因為與著名的38軍有關，在河北的文革中具有特殊的意義。

1966年9月，石家莊先後出現許多群眾組織，其中“石家莊工人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工聯司”）較有名。1967年1月下旬，石家莊市委、市人委主要領導成員被“工聯司”關押和批鬥。23日，石家莊市委、市人委各部門被強行奪權，陷於癱瘓狀態。2月1日，石家莊地區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解放軍開始介入文革。群眾組織形成兩大派，“工聯司”被軍管會否定受到鎮壓，成為“反軍派”（“反軍派”的統一組織名稱叫做“石家莊狂人公社總社”，因此也叫做“狂派”）。另一派是“擁軍派”，受到軍隊的支持。兩大派有各自

的勢力範圍，鐵路以西是“擁軍派”的天下，鐵路以東是“反軍派”的天下。

1967年5月開始，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10月18日，“擁軍派”傳達中央文革陳伯達的表態。陳伯達直截了當地說：“‘狂派’是個大雜燴，應該立即解散！”他的表態對“狂派”具有摧毀性打擊，同時大大激發了“擁軍派”的鬥志，“狂派”被武力征服打垮。圍剿最激烈的戰鬥在滹沱河農場。這裏的職工很大一部分是勞改出來的，被稱為“勞改釋放犯”。他們成立造反組織，叫做“滹沱河義和團”，加入“狂派”。在大隊人馬的包圍下，“滹沱河義和團”只剩下了三四十個死硬分子，但就是不投降，退縮到一座磚窯裏。最後彈藥打盡，全部被殲滅。

石家莊武鬥早早平息，形成一派掌權，相對穩定的局面。12月20日，石家莊市革命委員會成立。1968年2月3日，當周邊地區武鬥正酣時，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在石家莊正式成立，從此，石家莊成為省會城市。省革會主任是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河北省軍區第一政委李雪峰，副主任是原河北省第一書記劉子厚等。文革結束後，李雪峰和劉子厚均未受到整肅，得以善終。進入省革會常委會的群眾組織代表，文革後被撤職，但未受其他更重的處罰。筆者沒有查到未進入省革會的造反派的最後結果，也許因為他們早已退出曆史舞臺，故知曉者不多。

河北省的另一個重鎮是保定。1966年10月開始，保定陸續出現一些群眾組織。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下，全國各地出現奪權風潮。河北的造反派較之其他省要遲鈍得多，直至此時，竟然尚無全省統一的組織，也未能產生全省性的造反領袖人物。1967年1月23日，保定的造反派奪了權，但造反派內部為了核心地位爭執不休。2月6日，由省軍區和69軍領導人授意，一些非主流造反派組織成立“河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籌備委員會”，並宣布“一·二三奪權”是“非法的假奪權”，“反革命奪權”。

2月11日，保定的造反派遭受重大打擊，軍人取締了造反派組織。據不完全統計，總共抓捕1,500多名造反派。2月16日，原駐吉林省通化地區第38軍接到中央軍委的換防調令，接替69軍進駐保定。2月21日，省軍區和換防的38軍組成的聯合支左辦公室開始辦公。2月22日，保定終於成立全市性的社會組織“工人革命造反總部”（簡稱“工總”），起到主導保定文革的作用。38軍立即表態，承認其合法地位，並派出人員協助其開展工作。這是保定文革史上一個重要事件。雖然“工總派”的群眾造反較晚，左中右混雜，但這畢竟標志著保定年輕的產業工人隊伍以造反派群眾為主體，開始獨立地

走上政治舞臺。7月11日，保定原有的保守派成立“保定工代會籌委會”（簡稱“工籌”），標誌著保定的保守勢力在新的形勢之下，從政治思想到組織系統的聯合陣線已經形成。

保守的“工籌派”得到省軍區的支持，受省軍區排斥的較為激進的“工總派”主動對新來乍到的38軍示好，尋求支持。38軍與河北原當權勢力沒有任何牽連，在感情上亦傾向於“工總派”。38軍與省軍區在支持誰的問題上各持己見，水火不相容。北京軍區支持省軍區，對38軍頗有微詞。保定兩派沖突四起，武鬥不斷。1968年1月底，省軍區與省委為了避開與38軍的矛盾，採取避其鋒芒的策略，經中央同意將省會搬到石家莊。2月3日，河北省革委會成立，原河北省委書記、省軍區司令和政委、63軍軍長擔任革委會副主任，38軍軍長僅擔任省革委會中的常委。這樣的安排，足見省軍區和省委對38軍的排擠。38軍受到同級省軍區、上級北京軍區及中央文革陳伯達的擠壓，舉步艱難。兩派均有代表進入省革委會常委。

1969年2月，兼任北京軍區政委的謝富治宣布：保定問題由38軍全權負責，北京軍區，河北省革委會和省軍區不得介入。保定成了38軍一家天下後，38軍對兩派都採取嚴厲的政策。7月，38軍和保定地區革委會聯合發出布告，提出了兩派制止武鬥、上交武器，無條件回廠、回校，按系統、行業、班組搞大聯合，堅決鎮壓反革命等一系列強制性措施，8月底，保定地市實現“三結合”。到10月，收繳武器工作基本結束，武鬥工事全部拆除，武鬥人員全部返回原單位，武鬥停歇。盡管此後仍有反複，但保定的局勢基本穩定下來。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軍人結局都不好，唯有38軍雖然支持造反派，但是因為能堅持“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沒有對兩派的群眾採用暴力手段，而且能夠一碗水端平，沒有拉偏架，所以能全身而退。在“一打三反”和“清理五·一六”運動中，“工籌派”和“工總派”均受到整肅。兩派各自的後臺，38軍軍長王猛和省軍區政委李雪峰，省委的劉子厚，北京軍區的鄭維山，均得以善終。

文革中，內蒙的群眾組織有其特色。一般的省級地區存在兩大派、三大派甚至四大派嚴重對立的局面，內蒙卻很快形成一派獨占天下的形勢。1966年10月29日，呼和浩特市的大院校及中專中學師生成立“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紅衛兵司令部”（簡稱“呼三司”）。在此之前，已經有呼市地區“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臨時總部”（簡稱“呼一司”）和以呼市二中為基地成立的以革幹子女為首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第二司令部”（簡稱“呼二司”）。事實上，“呼一司”和“呼二司”為同一個陣營，以幹部子弟為核心。“呼三司”是平民為主，屬於另一個陣營。與“呼一司”和“呼二司”同屬一個陣營的

保守派，還有“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簡稱“工農兵”）、“內蒙古自治區革命職工紅衛軍聯合會”（簡稱“紅衛軍”）和“無產階級聯合總部”（簡稱“無產者”）等。

1967年2月5日，軍區的作戰部副部長柳青打死一名學生。這是文革中軍人向手無寸鐵的百姓打的第一槍。軍方虎視眈眈設下圈套，試圖進行大屠殺，幸而造反派中有複員軍人識破軍方的陰謀，極力阻止學生的盲動行為，才避免了更大的傷亡。這起槍擊事件，是內蒙地區的“二月鎮反”。內蒙軍區殺害學生的槍聲驚動了中央。4月13日，中央發布處理內蒙問題的“八條決定”，承認以“呼三司”為首的組織是革命群眾組織，與其對立的保守派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儘管保守派與軍人進行了頑強的抗爭，終因中央採取強硬措施，一度有百萬之眾的保守派終於土崩瓦解。“呼三司”成了內蒙境內唯一的革命群眾組織。

內蒙革委會常委中“呼三司”的代表不少，如高樹華、王金寶、郝廣德和李楓等。文革結束後，“呼三司”的領導人遭到重創。高樹華被判10年，關了5年後，在胡耀邦的幹預下才得以釋放，免於刑事處分。其他的造反派領袖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不少人被判刑。支持“呼三司”的是中央文革，這一後臺在文革結束後全軍覆沒。支持鎮壓“呼三司”的原軍區副司令黃厚在文革結束後複出，升任內蒙軍區司令。

附錄 9.4 華東地區：江蘇、浙江和安徽^[407]

江蘇的文革中心是南京，南京的中心則是南京大學（簡稱“南大”）。1966年8月，南京大學逐漸形成三個派別：一派是支持省委派來的工作組但反對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的“紅旗戰鬥隊”，以胡才基為首。第二派是既反對工作組和省委又反對南京大學黨委的“紅色造反隊”，以文鳳來為首。由於“紅色造反隊”過分強調組織的純潔性，只接受政治表現和家庭背景無可挑剔的人員參加，文鳳來授意成立一個外圍組織，也就是第三派，叫做“南京大學八·二七串聯會”，以曾邦元為首。因為該組織吸收成員的標準較低，其規模很快超過它的核心組織。

1966年11月開始，南京大學的“紅色造反隊”走出校門，與工礦企業和社會其他階層串聯成立“省工總”和“省紅總”，南京大學“八·二七”也在南京成立“南京八·二七”。南京大學的“紅旗戰鬥隊”則拉起官辦的保守派組織“赤衛隊”。1967年1月3日，“紅總”、“八·二七”為一方，與“赤衛隊”在江蘇飯店發生大規模的武鬥，“赤衛隊”被打垮並迅速瓦解。

1月22日至24日，造反派的領導們開會商議奪權，會議期間成立以文鳳來為首的“奪權委員會”。但是，造反派在奪權問題上分裂了。1月26日凌晨，南京大學“紅色造反隊”、“省紅總”、“省工總”等組織順利奪得省委的權力。“一·二六奪權”並未得到中央認可。江蘇的造反派分裂為“好派”和“P派”；支持奪權的稱為“好派”，反對奪權稱為“P派”。

3月14日，許世友下令對“好派”屬下的部分組織進行武裝鎮壓，“好派”成為“二月鎮反”的受害者，“好派”與軍區結怨。1967年夏，“好派”掀起“反許”浪潮，幾十萬人馬抗議許的暴行，要求揪出並打倒許世友。許被迫躲進南京軍區駐紮在大別山的某機要部隊。誰知消息走漏，“好派”揚言進軍大別山把許世友揪回南京，嚇得許連夜逃到一支親信部隊裏躲藏起來。

從1967年1月的奪權，到1968年3月23日江蘇成立以許世友為第一把手的江蘇省革委會，歷經一年多的時間。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內，兩派經歷了血腥的武鬥。1967年7月3日，江蘇出現第三派組織“促進大聯合委員會”（簡稱“促聯”）。雖然“促聯”在省革會常委會中占了一個席位，但是該派在江蘇文革的歷史中無足輕重，所以對該組織就不作分析了。江蘇的文革，主要圍繞“好派”和“P派”進行。在省革會的常委會中，有兩派的代表。“好派”代表有文鳳來、華林森、朱開地和唐省智，“P派”代表有曾邦元、陳克興和周錫祿。“好派”的華林森當選為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屆中央委員。文革結束後，“好派”的領導人均遭厄運，華林森被判刑，文鳳來被整得死去活來，得了精神病，最終自殺。“P派”的領導人因保許有功，深得許的好感。但是曾邦元自作聰明，為排除異己，與昔日“P派”戰友反目，兩敗俱傷。最後，為抗擊複舊的官僚，“好派”與“P派”聯合，對抗重新上臺的省委，遭到整肅，曾邦元也被判刑。

“好派”支持者主要來自南京軍區空軍，如政委江騰蛟、副政委王紹淵、政治部主任高浩平。“P派”的支持者是原省委統戰部長高嘯平和江蘇省軍區副政委梁輯卿。文革結束後，江騰蛟以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名被判刑。“P派”的支持者，原省統戰部長高嘯平，在許世友的授意下，在關押地點被整死，是否平反不得而知。因為高與江蘇省委其他成員，尤其是原省委書記江渭清不和，很有可能沒有人為他平反翻案。但是支持“P派”的許世友未受任何影響，還升了官。

安徽是江蘇的近鄰，有不少地方很相近。安徽對立的兩大派，也稱“好派”（也稱為“G派”，即好極了）和“P派”（即好個屁），也是在“一·二六奪權”問題發生分歧。1966年8月下旬，安徽省學校的學生和工廠的工人紛紛成立組織。1967年1月初，奪權風

潮從上海興起後，1967年1月26日，安徽的部分組織宣布奪了省委的大權。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否定“一·二六奪權”，決定成立以南京軍區副司令員錢鈞為首的安徽省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偏向P派，人多勢眾的G派不肯善罷幹休，安徽境內發生大規模的武鬥。7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緊急召見12軍軍長李德生，傳達中央決定讓12軍到安徽支左的指示。12軍進入合肥後，展開艱苦工作，採取“一碗水端平”的策略，促成兩派的聯合。李德生在安徽的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中央的高度評價，在1968年4月8日成立的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中任主任，並在中共九大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後曾升至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高位。安徽省革委會中兩派都有代表，雖然有名單，但是目前尚無法分清誰屬於何派。根據資料稱，當萬里接管安徽後，兩派均遭到清洗。兩派背後的支持者都是省內的幹部，似乎均得善終。

浙江省的文革以其省會杭州為中心。文革初期，浙江曾出現過幾個保守派組織，後來保守派失勢。1967年1月30日，中央表態支持造反派進駐省軍區，使造反派聲威大振。在奪權問題上，造反派分裂形成兩派：堅持要打倒江華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簡稱“省聯總”）和保江華的“浙江省紅色暴動委員會”（簡稱“紅暴”）。“省聯總”得到中央文革、空五軍和二十軍的支持，“紅暴派”得到省軍區的支持。

3月15日，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龍潛（浙江省軍區政委）任主任，阮賢榜（浙江省軍區副司令）、曹思明（舟嵎要塞區政委）、南萍（二十軍政委）、陳勵耘（空五軍政委）任副主任。軍管會內部產生不同意見，南萍、陳勵耘認為省軍管會主要領導和省軍區搞“二月逆流”。7月在京解決浙江問題，中央決議支持“省聯總派”，稱省軍區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紅暴派”被稱為是犯了錯誤的老造反派。8月，浙江省軍管會和省軍區改組。南萍為浙江省軍管會主任，陳勵耘為副主任，熊應堂代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南萍代政委。保江華派受到重創。

1968年3月23日，浙江省革委會成立，兩派代表均有進入省革會常委的。“省聯總派”的張永生任省革會副主任，翁森鶴^[408]和謝志明任常委。“紅暴派”有方劍文、滕鑄和張來根，任省革會常委。值得一提的是，翁森鶴在文革中有句名言，反映了一些造反派領導人的心理：“要麼小轎車，要麼小車橋”。小車橋是杭州監獄的所在地。文革結束後，“省聯總派”的張永生和翁森鶴被判無期徒刑，支持“省聯總派”的中央文革、空五軍都受到整肅。支持“紅暴派”的江華文革後複出，1975年任最高法院院長，“四人幫”倒臺後主持審

理林彪集團和“四人幫”的反革命案。另一位支持“紅暴派”的省軍區領導人龍潛也於1975年複出，任河南省軍區政委。

附錄 9.5 華中地區：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409]

1966年8月，在毛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3天後，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也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帶頭支持鄭州大學（簡稱“鄭大”）少數造反學生，此舉帶動了河南一大批領導幹部支持造反派。這批老幹部後來參加各級的革委會，掌握河南省的黨政領導大權達10年之久。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點之一。

文革初期，由於省委主要領導人支持造反，河南的保守派力量並不強大。8月21日，“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簡稱“鄭大聯委”）正式成立。9月3日，“鄭大聯委”發出《火急呼籲書》：

“多少年來，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樣子，五千萬河南人民被窮白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9月4日，“鄭大聯委”成立“專揪吳芝圃戰鬥隊”，派人專程去廣州揪吳芝圃。9月間，在鄭州市召開兩次大會，指控省委領導是曆史反革命。因為1959年前後，河南大搞浮誇風，造成數十萬人餓死的慘劇。作為“鄭大聯委”領導人的黨言川等人之所以能一呼百應，數萬人起來批鬥省委領導，正是基於這個背景。河南的文革運動，是以黨言川揭批原河南省委1958—1961年在河南搞左傾蠻幹、大刮“五風”，實行高指標、高征購、高估產的錯誤政策，造成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410]入手的。這是河南文革的又一個特點。

1967年1月下旬，“鄭大聯委”發起成立“河南二·七公社”（簡稱“二·七公社”）。2月下旬，鄭州工學院的“紅衛兵造反總指揮部”發起成立“河南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簡稱“河造總”）。重新崛起的保守派成立“十大總部”。河南形成“二·七公社”、“河造總”和“十大總部”三派並存的局面。

1967年的“奪權風暴”，使得同為造反派的“二·七公社”和“河造總”在奪權問題上分裂。此時的劉建勳，已於1966年9月1日調到北京工作，任華北局書記、北京市委書記，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是文敏。省軍區對造反奪權並不認同，在3月初對“鄭大聯委”和“二·七公社”予以取締。4月20日，中央廣播電臺宣布劉建勳參加北京市革委會，“二·七公社”的群眾歡欣鼓舞，但是省軍區不買賬。在省軍區的支持下，“河造總”和“十大總部”仍堅持開會批判

劉建勳、文敏生和紀登奎，還派人到北京揪劉建勳，給中央施加壓力。1967年5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勢力到北京談判。

7月25日，《人民日報》公開表態，說“二·七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派。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委會成立。劉建勳任主任。由於中央表態支持“二七公社”，革委會常委中，“二·七公社”的代表占優勢，40名常委中占14名。較有名的如唐岐山、黨言川、鄧國榮、申茂功、陳紅兵等人，唐岐山還當選為九屆和十屆中央委員。

“河造總”的代表不多，有張宗海、丁素琴等。“十大總部”似乎沒有人進入省革會。值得指出的是，這些學生造反派並沒有真正受到重用。隨著畢業分配下到了基層，常委的頭銜只是個虛名。即使有的人在縣裏任職，也只是副職。

文革結束後，在清算文革的“揭批查”運動中，曾經在河南搞左傾蠻幹，造成“信陽事件”者重新掌權，又揮起極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嚴重擴大化。從1977年到1983年，曆時7年，處理“二·七公社”和支持過“二·七公社”的幹部5萬多人，取消黨員資格10.6萬人，逮捕判刑1,700人，突擊判刑2,400人（均為官方數字），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不計其數。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重要特點。在清查中，軍區支持下掌權的“省委造總”、“河造總”、“十大總部”被視為正確派；不僅不清查，還被重用；一些武鬥指揮者，還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權。群眾說：“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監。”“二·七公社”進入省革會常委的黨言川、唐岐山、申茂功、鄧國榮等均被判刑，支持“二七公社”進入省革會任常委的幹部耿起昌（副主任）、張欽禮也被判刑。支持“二七公社”的劉建勳於1978年10月被調離河南，最後結論是，不是“四人幫”的人，但是在河南工作期間是有錯誤的。支持“河造總”的省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雖在文革期間受到沖擊，很快複出；1969年至1983年間，任過武漢軍區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武漢軍區顧問等職。

湖北的文革是以省會武漢為中心。武漢群眾組織分為三大派：“鋼派”、“新派”和“百萬雄師”。“百萬雄師”的支持者是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1967年“一月奪權”運動中，保守派垮臺，兩大派的造反派之間的矛盾上升。3月17日，武漢軍區以貫徹《軍委八條》為名，宣布“鋼派”的“鋼工總”為“反革命組織”，勒令解散。並出動軍區部隊與公安機關，逮捕“鋼工總”的領導人近500人。“新派”也同樣受到軍區的打壓。深感唇亡齒寒的“新派”遂與“鋼派”中的其他組織一道，要求為“鋼工總”翻案，抗議武漢軍區。保守派改頭換面，成立“百萬雄師”，人數超過百萬。

5 月到 7 月間，受軍區支持的“百萬雄師”多次挑起武鬥，打壓“鋼派”和“新派”，制造一系列慘案。“七·二零事件”使“百萬雄師”瞬間瓦解，也使得同屬造反派陣營的“鋼派”與“新派”又一次陷入激烈的權力鬥爭。矛盾主要焦點在於席位之爭。

湖北省革委會於 1968 年 2 月 5 日成立。“鋼派”的朱鴻霞（副主任）、楊道遠（副主任）、胡厚民和夏邦銀等人進入省革會常委會。

“新派”的張立國（副主任）和龍銘鑫等人任常委，“鋼派”的董明會當選九屆中央委員。文革結束後，“鋼派”和“新派”均遭到毀滅性打擊，“鋼派”的朱鴻霞等人和“新派”的張立國等人被判刑。

“百萬雄師”的成員卻因過早地退出紛爭，沒有受到打擊。支持“百萬雄師”的陳再道 1972 起複出，任福州軍區副司令，文革後擔任解放軍鐵道兵司令，得以善終。

湖南的工人群眾運動在文革中顯示出強大的力量。10 月中旬，以市民為主的“湘江風雷”和以大學生為主的“高司”兩個造反組織相繼成立。1967 年 1 月 16 日，中央點名湖南的保守派組織是走資派的禦用工具，這些組織立刻瓦解。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下，湖南的奪權開始，勝利的造反派“湘江風雷”和“高司”不幸分裂。湖南省軍區支持“高司”。2 月 4 日，湖南省軍區對“湘江風雷”進行鎮壓，一夜間摧毀了這個龐大的造反組織。這是發生在湖南的“二月鎮反”。4 月中旬，一個以產業工人為主的造反組織“工聯”正式成立。“工聯”隊伍迅速擴大，成為擁有數十萬工人的湖南省內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湘江風雷”終獲平反。這樣，就形成以“高司”、“湘江風雷”和“工聯”三派鼎立的局面。

8 月 10 日，中央認可“湘江風雷”和“工聯”，批評省軍區，指責“高司”是保守組織。“高司”頃刻土崩瓦解。勝利的雙方還未來得及舉行慶功會，“湘江風雷”和“工聯”立即發生內戰，湖南陷入武鬥。1968 年 4 月 8 日，湖南省革委會成立，“湘江風雷”和“工聯”代表進入省革委會常委會。“湘江風雷”的代表人物是葉衛東（任副主任）和李敬林，“工聯”的代表人物是胡勇（副主任）、唐忠富、雷志忠和許雲秋。唐忠富是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文革結束後，“湘江風雷”和“工聯”均遭到整肅。例如，“工聯”的唐忠富、胡勇和“湘江風雷”的葉衛東均被判刑。支持兩個組織的應是中央文革。“高司”領導們由於很早就被迫退出鬥爭，因禍得福，得以保全，沒有受到整肅。支持“高司”的省軍區司令龍書金得以善終，最後享受大軍區副職待遇，2003 年病逝。

江西省文革前是個農業省，經濟基礎較薄弱，該省曾是中共初期發展的主要根據地。1966 年 9 月 3 日，萬裏浪^[411]等人帶頭造江西省

委的反，許多大型的全市乃至全省性的群眾組織相繼成立，如以工人為主的“江西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簡稱“大聯籌”）。圍繞如何對待省市委，群眾組織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派。堅持打倒省市委的是“大聯籌”，屬於造反派，堅持保衛省市委的保守派組織是“省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總站”（簡稱“聯絡總站”）。

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奪權，省軍區表示支持。但在2月份，軍區改變了態度，支持保守派，發給他們槍支彈藥，打死打傷大批造反派，並在吉安、贛州等地區宣布造反派為反動組織，加以武裝鎮壓，造反派與支左的解放軍發生矛盾。4月23日，造反派沖擊省軍區機關，輪番靜坐絕食長達60餘天。兩派群眾組織陷入武鬥。據周恩來說，大規模的搶槍“是從江西開始的，影響到湖南，又影響到廣州”。兩派發展到動用手槍、步槍、機關槍甚至小鋼炮，江西的文革進入殘酷血腥的階段。7月下旬，中央不得不調動駐紮在山東的第26軍的76師，由軍政委程世清帶領，赴江西制止武鬥。中央對省軍區支持保守派提出批評，並改組省軍區。8月初，中央公開表態“大聯籌”是革命造反派，“聯絡總站”是保守派。江西的保守派組織垮臺。

1968年1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程世清任革委會主任。省革委會常委中的群眾代表是清一色的“大聯籌”成員，如萬裏浪（副主任）、塗烈、蔡松林、陳全生、蔡方根等。可是，勝利的“大聯籌”很快就分裂為兩派：以萬裏浪為首的“好派”和以塗烈為首的“P派”。“好派”人多勢眾，得到一些地方高級領導幹部的支持。曾經給毛澤東當過警衛員的江西省軍區司令員支持“P派”。

“P派”雖然是少數派，但是有這麼個能通天的軍隊大官支持，腰杆硬得很。程世清因林彪事件，於1972年被撤職。

文革結束後，“大聯籌”（無論是“好派”還是“P派”）的主要領導人遭受滅頂之災，萬裏浪、塗烈、蔡松林、陳全生、蔡方根等被判刑。從目前能收集到的資料上看，“聯絡總站”的成員因很早就被迫退出曆史舞臺，似乎沒有受到整肅，至少沒有像“大聯籌”的領導人那樣判刑。曾經反對省軍區並支持“大聯籌”的省委幹部劉瑞森，1984年3月，因在文革中犯的錯誤極為嚴重並有罪行，被開除其黨籍。1985年12月，中央書記處同意開除劉瑞森黨籍。江西省軍區司令吳瑞山，曾因支持保守派鎮壓造反派被撤職。文革結束後，吳瑞山東山再起，升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和武漢軍區副司令員，複出而得善終。

附錄 9.6 華南地區：福建、廣東和廣西^[412]

福建地處東南沿海，海岸線長度居全國第二，是東海與南海的交通要沖，與臺灣隔海相望，具有相當重要的軍事意義。1966年8月20日，福建省內出現省委支持的保守派組織。到10月中旬，又出現一批人數較多、規模較大的造反紅衛兵組織，如以福州大學（簡稱“福大”）鄭火排為首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福建革委會”（簡稱“紅革會”），以廈門大學（簡稱“廈大”）王雲集為首的“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八·二九派”），以王泉金為首的福建師範學院“紅九·二”。3位學生成為福建省文革中的風雲人物。在1967年1月“一月風暴”奪權行動中，立場和觀點相近的造反組織結成松散的聯盟，即“八·二九派”。

1967年1月，支持省委的保守派組織，隨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及省委書記葉飛的倒臺，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隊伍逐步瓦解。軍區司令韓先楚支持造反派反對省委。1月26日，軍內的造反派沖擊軍區召開的會議。結果社會上的造反派也涉入其中，與軍方發生沖突。造反派因為該事件開始分裂。廈門大學的王雲集和福州大學的鄭火排仍維持同盟，沿用“八·二九派”旗號。王泉金為首的福建師範學院“紅九·二”等另起爐灶，組成與之對立的聯盟——“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革造會派”）。2月11日，韓先楚在福州20萬軍民參加的大會上批評造反派沖擊軍區的行為，說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其後，“革造會派”遭到重創，“紅九·二”被取締，領導人王泉金被抓。全省各地軍隊、人武部和軍管部門出面逮捕和拘留2000多人，取締和解散80多個群眾組織，逮捕軍內和軍區機關造反人士8人，拘留65人。這是福建的“二月鎮反”。

後來王泉金出獄，在“革造會派”中形成更激進的“四·二零革造會派”。王泉金出身漁戶家庭，因為家裏有船，階級成份不太好，不像鄭火排出身貧農又是中共黨員，所以比較激進。省委隨著書記葉飛的倒臺出局，軍區和當地駐軍內部逐漸分裂成兩派。軍區司令韓先楚、31軍和空軍支持“八·二九派”，軍區副政委劉培善、28軍和高炮支持激進派“革造會派”。事實上，鬥爭演變為外省人（韓派）與本省人（劉派）的角力。兩派的群眾組織陷入武鬥。

1968年8月19日，福建省革委會成立，韓先楚任省革委會主任。“四·二零革造會派”因過於激進，遭到中央否定被排除在外，未能進入革委會。“八·二九派”和“革造會派”有幸進入省革會常委會。“八·二九派”的鄭火排、王雲集、莊志鵬擔任省革會副主任，張益飛等人任常委。“革造會派”顯然處於劣勢，只有田毓民任副主任；常委也不多，只有黃祖德等。

後來，韓先楚調任蘭州軍區司令，1983年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得以善終。劉培善因與韓先楚鬥爭失敗，於1968年5月8日上吊自殺，1978年平反，追認為烈士。“四．二零革造會派”過早出局，因禍得福。他們沒有繼續走政治這條路，而是回歸日常生活。作為領導人的王泉金，畢業後分配到福州文化局，日後從事電信事業。另一位知名領導人姜觀，一直在《福建日報》工作。“八．二九派”因為韓先楚的調走失去保護傘，於是轉投“四人幫”。最後結局是在1976年時徹底失敗，鄭火排、王雲集、莊志鵬都被判刑。“革造會派”的成員倒未遭此厄運。

廣東省的文革以廣州為中心。1966年12月13日，24個廣東和外地的群眾組織聯合發出封閉和接管《紅衛報》（原《羊城晚報》）的通令。12月15日，中南局宣傳部正式發出停刊通知。封閉《紅衛報》的行動，迅速導致群眾分裂：一部分人支持，另一部分人則強烈反對。文革開始後，廣州地區成立不計其數的群眾組織，從封閉《紅衛報》事件開始，逐漸分裂成兩大派。在“一月風暴”的影響下，1967年1月20日，以中山大學（簡稱“中大”）的“中大紅旗”為首的部分群眾組織成立“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省革聯”）。1月22日，“省革聯”宣布奪權，省委沒有反抗，表示這是大勢所趨，擁護毛主席支持的革命小將的行動，就把大印交給這部分造反派。但是，中央對於廣東的“一．二二奪權”並未肯定。

因為廣州軍區不支持“一．二二奪權”，“省革聯”與軍區關係迅速惡化。2月8日，“省革聯”發動屬下三十多個群眾組織沖擊廣州軍區領導機關大院。3月2日，廣州警備區對廣州公安局實行軍管，並開始對“省革聯”下屬組織進行鎮壓、取締。經過這一打擊，“省革聯”組織瓦解。3月15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正式成立，標志著廣東省的權力中心正式轉移到廣州軍區。

4月17日，周恩來來到廣州，督辦春季廣交會。周表態肯定“中山大學紅旗”、“華南工學院紅旗”和“廣州醫學院紅旗”、“工聯”、“紅旗工人”是革命左派。該派統稱為“紅旗派”或“旗派”，是造反派。周指責“地總”（“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廣州地區總部”）和“紅總”（“紅色工人廣州總部”）是“保守的群眾組織”。該派統稱為“總派”，也叫“東風派”，是保守派。從這時起，廣州的群眾組織正式分化為“紅旗派”和“東風派”兩大對立派別。全國各地，凡以“工人赤衛隊”命名的組織都是保守派，並且在“一月風暴”中全都垮臺。但是，廣州的“工人赤衛隊”卻堅持下來。廣東“紅旗派”也曾出現過分裂的跡象，由於軍方的鎮壓和強大

的保守派大軍壓境，它們終究團結起來對抗政治迫害。它們始終在某種程度上對現存統治秩序施加的壓迫、迫害進行反抗。

1968年2月21日，廣東省革委會成立，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任省革委會主任。“紅旗派”和“東風派”的代表均進入省革會任常委。“紅旗派”有劉繼發（副主任）、武傳斌和高翔等人，“東風派”的有梁錦棠、梁秀珍和易作才等人。梁錦棠當選為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和十屆中央委員。文革結束後，兩派的代表均遭解職。特別是梁錦棠，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雖然兩派均遭受清洗，但沒有像其他省的群眾代表被判刑。支持保守派的軍區司令黃永勝，因林彪事件被判刑。

廣東省的文革有一位造反領袖人物值得一提，這就是“紅旗派”的武傳斌，他的壯舉是高舉平反大旗。1966年底，他帶領手下沖機要室，搶黑材料，為文革初期因為批評黨委和工作隊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眾討回公道。之後，他參與為“珠影^[413]東方紅”平反，為項明平反，為“八·一戰鬥兵團”平反，都是為被當局打成反革命的群眾伸張正義。武傳斌的平反行動不僅限於文革中的冤假錯案，更發展到為60年代初因陶鑄反瞞產受迫害的陽江、廉江等地群眾平反，為解放初期受到黨內錯誤整肅的“雙陳案”（可加一條注釋）平反。總之，他高舉平反大旗，為建政以來直至文革的各種不公不義、違反人權的冤案翻案。這是他的功績，也是廣東“紅旗派”在文革中能發展壯大的緣由。

廣西與廣東是近鄰，有一些相同之處。文革中的廣西最具有特色的是，省委第一書記和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是全國29個省市中唯一沒有倒臺的省級第一把手。廣西在文革初期並沒有分成明顯的兩派。1967年三四月，圍繞“支韋（韋國清）”還是“反韋”問題，群眾組織開始形成兩派，韋國清自然成了整個廣西文革的焦點。兩派形成後，從軍隊到地方，從自治區領導機關到各個基層單位，形成兩大對立陣營。

1967年4月19日，伍晉南發表聲明支持“反韋派”。4月22日晚，反韋的部分群眾組織不同意《廣西日報》報導有關廣西大學數理系革命大聯合的消息，集隊到報社，同軍管小組交涉、辯論，抗議、靜坐，並成立“四·二二指揮部”，後改名為“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四·二二派”）。它得到駐廣西首府南寧的一支直屬北京的野戰部隊的支持。保韋的是“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派”），得到廣西地方部隊的支持。這支地方部隊聽命於兼任廣西軍區第一政委的韋國清。隨著那支野戰部隊於1968年春調出廣西，“四·二二派”失去部隊的支持，平衡開始被打破。

1968年7月以後，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廣西軍區以“貫徹執行‘七．三’布告”為由，利用“清理階級隊伍”，以挖掘“反共救國團”，“對階級敵人刮十二級臺風”等名義，調動軍隊，在全省範圍內武裝剿殺“四．二二派”。據1992年北京權威的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國的廣西》一書披露，廣西在文革中，被“無辜濫殺了8萬多人”（130頁）。這顯然是一個接近事實但縮小了的數字^[414]；而且殺人方式非常殘忍^[415]。

1968年8月2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成立，韋國清任主任。兩派均進入革委會常委會。“聯指派”代表中任副主任的有韋世經、毛鳳鸞、廖煒雄和顏景堂，常委有鄧文光和李家海等。“四．二二派”擔任副主任的有林福文、龍智銘和曾春生，常委有何作然等。“聯指派”的岑國榮當選為九屆和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屆中央委員。

文革結束後，支持“聯指派”的，號稱“廣西王”的韋國清曾擔任政治局委員，並未因在廣西犯下的罪行受到影響。支持“四．二二派”的廣西書記處書記武晉南，於1983年獲得平反，算是善終。文革結束後，兩派後來都遭到清洗，“聯指派”的岑國榮被開除黨籍。

附錄 9.7 西北地區：陝西、寧夏、甘肅、青海和新疆^[416]

陝西省的文革以西安為中心，首先從西安交通大學（簡稱“西安交大”）開始。1966年6月3日，陝西省委派出工作組，進駐西安交通大學。由於工作組壓制學生，6月6日，工程物理系學生李世英貼出《工作組十大罪狀》的大字報，還要向中央發電報，認為“工作組不能領導文革”。工作組把“六．六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李世英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8月下旬，工作組撤走後，西安交通大學改組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由李世英任主任。改組後的文革委員會稱為“文革總會”，李世英逐步成為西安和陝西聞名的造反領袖。1967年2月，以胡煒為軍長的第21軍進入陝西以後，把李世英請到軍隊，奉為上賓，聽取他的意見，表示支持。

保守派垮臺後，受“一月風暴”影響，造反派醞釀奪權。在奪權時，西安地區的各造反組織都標榜自己“最忠心、最革命、最正確”，都想掌握更大的權力，於是造反派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位於東郊的西安交通大學、公路學院等高校和“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是“東派”，位於西郊的西北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安電訊工程學院等高校和“西安工人聯合會”（簡稱“工

聯”）是“西派”。“西派”是多數派，比“東派”更激進，他們把“東派”看做是保守派。

兩派之間的鬥爭由辯論發展到武鬥。為了維持秩序，從1967年2月21日開始，陝西省軍區、蘭州軍區空軍、第21軍對陝西進行軍事管制。軍管後兩派仍發生武鬥，磨擦不斷。直至中央於7月發布關於制止陝西武鬥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陝西的武鬥才逐步結束。1968年5月1日，陝西省革委會成立。原陝西省委第二書記李瑞山任主任，省軍區司令黃經耀、第21軍軍長胡煒等任副主任。

“東派”和“西派”的代表均有進入省革會常委的。“東派”的李世英和馬聖西任副主任，常委還有吳文等人。“西派”的張培信、單英傑、孫福林和楊夢林任副主任，常委還有安文保等人。“西派”的姚連蔚當選為九屆中央候補委員。

文革結束後，支持“東派”的省軍區司令黃經耀、第21軍長胡煒均得善終。常委中，“西派”的張培信和“東派”的馬希聖被判刑。其他兩派的副主任和常委多人被逮捕，關押數年，最後免於刑事起訴，總算未受牢獄之苦。姚連蔚被逮捕後免予起訴，開除黨籍。

寧夏回族自治區是中國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是全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區，首府為銀川。寧夏的文革也是以省會銀川為中心。在“一月風暴”的影響下，1967年1月26日，寧夏成立“寧夏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簡稱“聯委會”），準備奪權。打出造反旗號的原保守派也在加緊準備奪權。迫於形勢，“聯委會”在1月27日匆忙提前奪權。軍區表態，支持此次奪權。倉促奪權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挑戰，首先是內部分歧。奪權後，為建立革委會，“聯委會”內部對革委會的權力分配產生矛盾，部分成員退出“聯委會”，成立兩個新組織：“寧夏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簡稱“寧總司”）和“寧夏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簡稱“寧三司”），削弱了“聯委會”的力量。與此同時，原保守派組織和奪權前退出“聯委會”的造反派組織組成“反聯委會聯盟”。“聯委會”在反對力量的夾擊下，根本無法行使其權力。

2月11日，寧夏軍區發表公告，撤銷對“聯委會”及“一·二七奪權”的支持。此後，軍區強行解散“聯委會”的一些下屬組織，對“聯委會”採取取締行動。在軍區的壓力下，許多人退出“聯委會”。3月10日，原保守派成立“銀川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處”（簡稱“籌備處”）。3月12日，寧夏軍區公開表態支持“籌備處”。3月18日，“聯委會”改頭換面，重新建立“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簡稱“總指揮部”）。於是，寧夏出現了三派四

個組織：“總指揮部”為一派，“籌備處”為一派，“寧總司”和“寧三司”為第三派。寧夏陷入武鬥。

為了穩定寧夏局勢，8月，中央判定寧夏軍區犯了嚴重錯誤，軍區司令被召到北京接受審查，第62師進駐寧夏，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康健民和62師師長徐洪學被指定為新領導。8月18日，蘭州軍區宣布“總指揮部”為革命造反派。從此“籌備處”走向衰落，於1967年底瓦解。其中一部分人另組“籌革造”，取代“籌備處”。造反派很快與軍人在革委會人選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一分歧導致“總指揮部”內部的分裂，兩派之爭開始激化。在中央的督促下，寧夏的四派組織——“總指揮部”、“寧總司”、“寧三司”和“籌革造”實現大聯合，寧夏革委會在1968年4月10日宣告成立。

宣布“總指揮部”為革命造反派的蘭州軍區副司令康健民，於1977年突發心髒病去世。死後未見負面報道，算是善終。支持保守派“籌備處”的省軍區司令朱聲達被中央調離寧夏，到北京接受審查，後被降職使用，文革結束後中央為其平反。支持造反派“總指揮部”的省軍區副司令張懷禮，1988年獲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也得善終。由於寧夏的文革資料不多，未查到四派組織進入革委會任常委的代表及文革後他們的最後結局。

甘肅省的文革以省會蘭州為中心。得到省委支持的保守派組織被中央定為保守組織後失勢，其大部逐漸加入“革聯”。造反的學生在10月中旬開始跨單位聯合，於1967年1月22日形成聯盟組織“紅色造反派聯絡委員會”（簡稱“紅聯”）。2月5日，“紅聯”奪了省委的權。甘肅省軍區主導了這場奪權，軍區司令員詹大南在新成立的“紅聯”中擔任第一把手。奪權後，“紅聯”分裂。被“紅聯”開除或後來自己殺出去造反的組織，於5月成立“甘肅紅色造反派聯合第三司令部”簡稱（“紅三司”），從而形成“革聯”、“紅聯”和“紅三司”的三足鼎立的態勢。詹大南因參與“紅聯”在工作中犯的錯誤，受到中央的批評。

1967年5月13日，蘭州軍區表態支持“紅三司”。“紅聯派”聯合“革聯派”，企圖打垮“紅三司”。1968年1月24日，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公開支持“紅三司”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任主任。似乎只有“紅三司”的代表進入省革委會任常委。“紅三司”的代表任省革會副主任的有邱裕民、謝金勝、李宗虎等，常委有白富貴、張恒雲等。“紅三司”成員張恒雲當選為九屆和十屆中央委員。文革結束後，冼恒漢對葉劍英不通過正式手續，電話下令釋放槍殺青海民眾的趙永夫，未照辦執行。冼恒漢後來遭到清洗，罪名是站在“四人幫”一邊，但還不是“四人幫”的死黨、親信，免於刑事處

分，提前離休，降低政治生活待遇。與冼恒漢一派的人員受“冼家幫”連累遭到清洗。“紅三司”的代表人物張恒雲和邱裕民被開除出黨。支持“紅聯”的詹大南，文革結束後在南京軍區任副司令，1982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算是善終。

青海的文革比北京慢一個節拍。1966年8月底9月初，大批的外地紅衛兵（尤其是北京的紅衛兵）到青海串聯，帶來批判資反路線的消息。被省委壓制的造反派鹹魚翻身，東山再起，紛紛成立戰鬥隊，最後匯合成“八．一八派”。廣大群眾一股腦兒地倒向“八．一八”，聲勢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保守群眾多數是黨團骨幹，也揭竿而起，拉起隊伍，最後匯合成“捍衛隊”。省長王昭支持“捍衛隊”，省委書記楊植霖轉變立場，支持“八．一八”。

1967年1月13日，青海的“八．一八派”的造反派，聯合接管《青海日報》。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在軍內領導層開會，通過了支持“八．一八”的方針。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等人不接受這一決定，成立“造反指揮部”，奪了省軍區司令員的權，趙永夫成為青海的實際最高領導人。2月23日，趙永夫派出軍隊，取締“八．一八”。荷槍實彈的軍人包圍並向占據《青海日報》報社的“八．一八”開槍，造成347人傷亡，其中169人死亡。3月29日，中央決定支持“八．一八”，趙永夫被抓起來，“捍衛隊”頃刻瓦解。

8月12日，青海省革委會成立，劉賢權任主任。省革委會中群眾代表，是清一色的“八．一八派”成員。7個副主任中，有4個副主任是“八．一八派”的人，另外還有一人任常委。進入省革會任常委的兩名“八．一八派”的成員達洛和和隆光前，當選為九屆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可以說，青海的造反派在文革中是勝利者。

文革結束後，形勢大變。趙永夫很快獲釋，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顧問，後以正軍職幹部離休。“八．一八派”的中央候補委員隆光前被開除出黨，另一位中央候補委員達洛被撤職。支持“八．一八派”的劉賢權比較幸運，於1977年至1982年任濟南軍區顧問，享受副大軍區職務待遇。“八．一八派”保的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在1978年後歷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顧問、甘肅省政協主席等職，1992年在蘭州逝世，得以善終。

新疆的群眾組織分為兩大派：“三新派”和“三促派”。“三新派”由三個大組織構成，即“新疆職工總司”、“新疆紅二司”和“新疆農民造反司令部”。新疆建設兵團的“兵農造”與“三新派”是同盟。“三促派”由“新疆革命工人大聯合促進會”、“新疆紅衛

兵革命大聯合促進會”（即“紅一司”）和“新疆農民大聯合促進會”組成。新疆建設兵團的“八野”和“聯總”與“三促派”是同盟。周恩來曾批評說，“紅一司”是保守派。

1968年9月5日，新疆成立革委會，副主任和常委中兩派均有代表。擔任副主任的有“三新派”的吳巨輪和楊立業，“三促派”的胡良才。常委還有“三新派”的楊貴堯和“三促派”的駱建新。“三促派”的胡良才當選為九屆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結束後，“三新派”的吳巨輪和楊立業均被判刑，“三促派”的人基本沒事。支持“三促派”的王恩茂官復原職，1981年重返新疆，成為第一把手。最後王恩茂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得以善終。支持“三新派”的上層人物似乎沒有。周恩來與“紅二司”的吳巨輪關係密切，是出於實用，並不意味著真心支持。真正給予“三新派”支持的，是北京的紅衛兵如“首都紅三司”。所以，“三新派”的真正的上層支持者是中央文革。

附錄 9.8 西南地區：四川、貴州、雲南和西藏^[417]

四川是中國西南地區的一個重要省份，省會是成都市。四川曆史悠久，風光秀麗，物產豐富，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四川的文革有一個特色，這就是其省會成都與重慶兩個城市同時扮演中心的角色。建政初期，重慶曾是中央直轄市，是中共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駐地和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1997年，中央恢復設立重慶直轄市。所以研究四川的文革，對省會成都與重慶都需加以重視。

四川是造反派力量較強的一個省。劉結挺、張西挺是兩位造反的老幹部，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成都文革前期的群眾組織主要有以下幾個：（1）青年學生組成的、屬於造反派的紅衛兵組織，有四川大學（簡稱“川大”）為首的“八·二六戰鬥兵團”（簡稱“八·二六”），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現改名為電子科技大學）為首的“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2）工人造反組織“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簡稱“兵團”）；（3）屬於保守派的“成都產業工人戰鬥軍”（簡稱“產業軍”或“老產”）。“產業軍”的成員，來源於運動初期帶有官方背景的保守的工人組織。他們不甘心被排斥在文革運動主流之外，串聯醞釀，成立有別於造反派的工人組織，與造反派抗衡。到1966年底，成都“產業軍”達到幾十萬之眾。與造反組織相比，“產業軍”有“幾多”：黨團員多，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多，曆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多，部隊轉業複員軍人多。由於這種背景，成都軍區主要負責人選擇“支左”對象時，自然選擇“產業軍”，不肯支持成員複雜，反地方當局色彩濃厚的造反派。

1967年2月上旬，軍方正式介入地方文革，明確支持“產業軍”。軍方宣布，“兵團”和四川大學“八．二六”為代表的造反派為反革命組織，明令取締。“產業軍”在鎮壓中扮演了幫凶的角色，引起成都民眾的公憤和對造反派的同情。4月初，中央進行幹預，改組成都軍區。原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調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原廣州軍區司令員梁興初調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比較接近造反派，被捕的造反派相繼被釋放，造反組織重新崛起。新崛起的成都各造反派，首先把矛頭指向“二月鎮反”中曾經打壓過自己的“產業軍”。兩派的對立越來越嚴重，沖突不斷，終於爆發影響巨大的“五．六事件”。事件中，成都第132廠的“產業軍派”的人員向進攻該廠的造反派開槍。從那一刻起，整個成都市的民心和輿論，以壓倒性的優勢傾向造反派。隨著開槍次數的增多，傷亡者也越來越多；傷亡者的增多，又刺激進攻的造反派更加不顧一切地冒死攻擊沖鋒。由此形成惡性循環，是該事件傷亡慘烈（死52人，傷3,100多人）的重要原因。更惡劣的是，“產業軍”向救援者（包括身著白衣的醫務人員）開槍，徹底失去民心。這一事件導致“產業軍”的垮臺。6月以後，作為一股政治勢力的“產業軍”銷聲匿跡。

然而，成都的局勢並未走向安定。隨著對立的保守派倒臺，造反派發生重大分裂。原來一條戰壕裏的戰友，變為誓不兩立的死敵。

“成都地區革命造反派聯總部”和“地總”為一方（常稱為“紅成派”），“八．二六”和“兵團”為另一方（常稱為“八．二六派”）。兩派嚴重對立，先是互相“文鬥”，後來演變為“武鬥”。雙方如同當初與保守派“產業軍”對抗一樣，各自武裝，搶奪地盤，爭權奪利，大打出手，武鬥不止，傷亡不斷。

四川省革委會成立於1968年5月31日，省革委會主任由張國華擔任。著名的造反派幹部劉結挺、張西挺任副主任。兩派均有代表進入省革委會任常委。“八．二六派”的代表有鄧興國（副主任）、侯振東等，“紅成派”的代表有楊至誠（副主任）等。受劉、張支持的“八．二六派”，似乎占的席位更多些。

文革結束後，劉結挺和張西挺均被判刑，“八．二六派”的侯振東也被判刑。張國華雖然傾向造反派，但因為於1972年病逝，沒有看到對張國華不利的報道。

四川的另一個中心是重慶。重慶最早的較大的學生造反派組織是“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簡稱“重大八．一五”）。重慶最早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組織是“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簡稱“工人造反軍”）和“重慶工人二．七戰鬥團”（簡稱“二．七戰團”）。重慶市的造反派組織（稱為“八．一五派”），到11月下旬

已經形成較大聲勢，足以同得到黨政領導支持的保守派分庭抗禮。10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保守派組織風光不再。不少保守派成員紛紛反戈一擊，倒向造反派，保守派組織退出了曆史舞臺。

1967年“一月奪權”風暴的影響，導致占據文革舞臺的重慶造反派大分裂，群眾組織出現又一輪重新組合。以“重大八·一五”為代表，形成得到部隊支持、占主導地位的一派。以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簡稱“西師八·三一”）、“工人造反軍”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為代表，則形成與之對立的一派。對重慶駐軍的評價，是兩派分歧的一個焦點。駐重慶的第54軍（兼重慶警備司令部）領導人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與重慶大學“八·一五”建立起良好的信任關係，反對派對54軍抱懷疑態度。

1月24日，“重慶大學八·一五”等組織在駐軍支持下進行奪權。以“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為首的反對派向中央發電，稱奪權是“假奪權”。首都的“地派”紅衛兵站在“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工人造反軍”一方，認定重慶大學“八·一五”“右”了、“修”了。北京的“天派”則堅決站在重慶大學“八·一五”一方。2月8日，“一·二四奪權”建立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重慶市革聯會”（簡稱“革聯會”）宣告正式成立。從2月下旬開始，“二月鎮反”掀起高潮，重慶的許多反對“革聯會”的群眾組織被54軍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勒令解散，大批群眾被逮捕，以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為首的“反革聯派”遭到重創。後來，“反革聯派”得到平反。因為其“砸爛革聯會”的立場被稱作“砸派”，最後改稱為“反到底派”。因此重慶形成兩大派別：支持“革聯會”的“八·一五派”和反對“革聯會”的“反到底派”。

1967年6月初起，兩派拉開武鬥的序幕。由於重慶是中國常規兵器工業基地，成了全面內戰的武器彈藥庫，這是重慶武鬥規模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1968年初，中央試圖解決四川及重慶問題。4月至7月間，重慶的兩大派群眾組織展開又一次血火廝殺的大規模武鬥。武鬥的目的十分明顯，是為了爭奪對一些基層單位的控制權，為建立自己一派獨掌大權或基本控制大權的革命委員會掃清障礙。

1968年6月2日，重慶市革委會成立。主任是藍亦農（第54軍政委），副主任白斌（第54軍副軍長）。兩派群眾組織均有代表進入常委會，如“八·一五派”有袁金梁（副主任）、熊代富（副主任）、方文正等6人，“反到底派”的有黃廉（副主任）、李木森（副主任）、汪友根等6人。

支持“八．一五派”的藍亦農後調貴州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貴州省軍區政委。藍曾下放勞動，文革結束後，1983年任昆明軍區顧問，1988年授予解放軍獨立功勳榮譽章，2008年去世，算是善終。支持“反到底派”的劉結挺和張西挺被判刑，“反到底派”的黃廉被判刑，“八．一五派”的周家喻（任省革委會常委）也被判刑。

貴州地處中國西南腹地，是西南交通樞紐，省會是貴陽。貴州的文革以省會貴陽為中心。在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的支持下，1966年9月28日成立“紅衛兵糾察大隊”。因其紅衛兵袖套上有編號，被稱為“號碼兵”。11月15日，正式成立“貴州省工人糾察隊”（簡稱“工糾”）。“號碼兵”和“工糾”，是省委背後支持的保守派組織。

10月初，工人造反組織“毛澤東思想工人紅衛軍”（簡稱“紅衛軍”）等相繼成立。工人運動保守派和造反派兩大派組織出現後，形成對立，貴陽地區接二連三地發生大規模工人沖突和流血事件。到奪權以前，“紅衛軍”迅速發展成勢力最強大的工人群眾組織，號稱有33萬之眾，其基層組織遍布貴陽地區各大小廠礦以及部分專州縣。

“紅衛軍”領導人李鐵乃是貴陽市南明汽車修配廠工人，這是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省文革領導小組成員、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公開支持“紅衛軍”。“紅衛軍”要求解散“工糾”，把躲藏在省軍區地下室的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揪出並扣押起來，轟動省城，“紅衛軍”聲威大振。李再含和李鐵乃被並稱“二李”。

12月5日，“紅衛軍”以查抄“黑材料”的名義，從《貴州日報》社抄出很多材料運回總部。李鐵乃聲稱掌握了李再含的“鋼鞭材料”，說“李再含比賈啟允更壞”，從此“二李”開始交惡。不久，李鐵乃成立“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由“紅衛軍”為首的74個大小組織組成。他們的矛頭對准在貴陽市的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簡稱“地化所”），認為地化所的知識分子想壟斷貴州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內部的工人與知識分子發生分裂。

1967年1月21日，根據李再含的報告，中央文革派人在北京抓捕李鐵乃，其同盟的領導人在貴陽也遭到抓捕。1月26日，貴州某師部隊和省公安廳查抄“紅衛軍”總部和甘蔭塘分部，抓了100多人。省軍區宣傳車在貴陽市街頭和市郊反複宣傳“紅衛軍是反革命組織”。

2月14日，貴州省革委會成立。李再含擔任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明為副主任。2月14日，貴州“奪權經驗”見報。奪權時“紅衛軍”總部被瓦解，奪權後“工糾”宣布解散。李再含總結貴州的奪權

經驗是，“上奪下掃，左右開弓”。其含義是：上奪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的權，下掃李鐵乃等牛鬼蛇神，向左打擊“紅衛軍”等造反派，向右打擊“工糾”等保守派。

繼山西省和山東省之後，貴州省成為全國第三個奪權的省份。4月10日，貴州召開省“紅代會”。貴州醫學院等單位的一些組織因不滿被排除在外，沖擊了會場。4月11日，在軍隊的掩護下舉行開幕式。多個院校的代表向主席團提出抗議，會場混亂，代表們紛紛離場。此事件稱為“四．一一事件”。

李再含支持成立遍及全省、自上而下領導、跨行業的“支紅派”（即支持“紅代會”）隊伍，省革會常委中均是“支紅派”。反對派也形成聯盟，叫做“四．一一派”。僅在貴陽地區，從4月18日至8月16日的4個月內，李再含對“四．一一派”發動武力圍攻達13次之多，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李再含曾試圖軟化反“四．一一派”的立場，遭到“支紅派”領導們的反對。騎虎難下的李再含轉向另一極端，采用高壓手段，試圖壓垮“四．一一派”，在全省各地武裝一派、消滅一派。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各地被專業武鬥隊抓捕、關押、捆綁吊打、銜稻草遊街和揪鬥的，共達26萬餘人次，被迫外逃的達到6萬多人。

1968年11月中旬，在黔野戰部隊換防：第49師調到雲南省保山地區，第41師從那裏調到貴陽。第41師因以前沒有涉及派性鬥爭，比較公正，“四．一一派”的群眾不斷向該部隊反映情況。李再含和“支紅派”的羅錫康當上候補中央委員。李再含覺得腰杆更硬了，第41師扳不動他了，從北京回來後我行我素，置中央解決貴州問題的精神於不顧，再次制造開槍殺害無辜群眾的“七．二九事件”。1968年10月16日，中央決定藍亦農、張榮森領導貴州省的工作，李再含等人留在北京受審查，1971年5月被撤銷職務。李再含在貴州曾大搞個人崇拜。當時貴州的民眾在祝毛“萬壽無疆”、祝林彪“身體永遠健康”以後，還要“祝貴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體比較健康！比較健康！比較健康！”成為文革留下的一個笑料。也有人分析，正是所謂的“小月亮”，使得毛對李再含產生不良印象，導致其下臺。

文革結束後，“支紅派”的羅錫廉、孫昌德和徐英年均被判刑。李再含因早在1975年8月去世，似未受整肅，“四．一一派”似也未受整肅。“紅衛軍”早就出局，是否受整情況不明。

中國西南地區的另一個重要省份是雲南。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下，1967年1月中旬，以雲南大學（簡稱“雲大”）“炮兵團”為主形成“炮派”，準備奪權。以昆明工學院（簡稱“昆工”）

“八．二三造反兵團”為骨幹形成“八．二三派”，也加緊進行奪權準備。在全省範圍內，形成“八派”和“炮派”兩大派別。

參加“八派”組織的群眾，家庭出身不好的多，曆次政治運動中犯過錯誤、受過沖擊的人多。從年齡層次上看，年輕人居多。參加“炮派”組織的群眾，家庭出身是工人和貧下中農的多，老黨員、老模範、老積極分子多。從年齡層次上看，中年以上的偏多。“八派”所支持的幹部是省長周興等人，“炮派”支持的是趙健民等人。“八派”的基層組織在“二月鎮反”中受到迫害。

1968年8月13日，雲南省革委會正式成立。省革委會副主任，“八派”的有黃兆其和徐學惠，“炮派”的有李毅和段寶珍。常委中，“八派”的有9人，“炮派”的只有5人，明顯處於弱勢。炮派保趙建民打周興，證明錯了，因為趙建民被中央拿下；“八派”打趙保周，證明對了。省革委會主任、昆明軍區第一政委的譚甫仁明顯地站在“八派”一邊，對“炮派”橫加指責。

文革結束後，“八派”的黃兆其和劉殷農（省革委會常委）被判刑。支持“八派”的趙健民1975年複出，任雲南省政協副主席，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航空工業部顧問，當選中共第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支持“炮派”的譚甫仁在文革中被人刺殺。周興於1975年病故，算是善終。

1966年12月22日，拉薩成立“造總”，司令是拉薩中學的教師陶長松。與“造總”對立的組織是“大聯指”，成立於1967年2月5日，得到軍區的支持。西藏的文革圍繞這兩派進行。2月24日開始，軍隊包圍被“造總”占領的《西藏日報》報社。3月2日，陶長松等人被軍方抓捕。這是西藏的“二月鎮反”。1968年9月5日，西藏成立革委會，兩派的代表均進入革委會。擔任革委會副主任的“造總派”代表有陶長松和朱景尚，“大聯指派”的代表有劉紹民。“造總派”的劉士毅等擔任常委。

文革結束後，“造總派”的代表人物遭到打擊。陶長松被撤銷革委會副主任職務，拘留審查；審查的時間很長，差不多有一年半。後來陶調入自治區社科院，成為一位專業人士。“大聯指”的人沒有受到審查，他們大多成為審查“造總”人員的幫凶。“大聯指”的劉紹民離開西藏自治區的副主任位置，最後當上山南地委副書記。支持“大聯指”第一把手的任榮，後來擔任武漢軍區副政委，十一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得以善終。2017年6月16日逝世，享年一百歲。同情“造總”的原西藏第一把手曾雍雅，因受任榮排擠離開西藏，擔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和顧問，也得善終。

參考文獻

- Aberle, David. 1966. *The Peyote Religion Among the Navaho*. Chicago: Aldine.
- Adorno, T. W. 1991.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 J. M. Bernstein. London: Routledge, 1991.
- Andreas, Joel. 2002.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1, pp. 463-519.
- Andrew, Joel. 2007. "The Structure of Charismatic Mob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Rebellion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2, pp 434-458.
- Bakhshandeh, Reza, Samadi, Mehdi, Azimifar, Zohreh, and Schaeffer, Jonathan. 2011. "Degrees of Separ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Fourth Annual Symposium on Combinatorial Search*.
- Barabási, Albert-László. 2003.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lume.
- Barnett, Emma. 2011. "Facebook cuts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to four." *Telegraph*, November 22, 2011
- Barrett, Kimberty and Lynch, Michael J.. 2015. "Social Justic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 Bateson, Gregory.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San Francisco, CA: Chandler.
- Baumgarten, Britta and Ullrich, Peter. 2016. "Discourse, Power and Governmentality: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with and beyond Foucault."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Movements: Mutual Inspirations*, ed., by Jochen Roose and Hella Dietz. Springer VS.

- Beck, Colin J. 2008.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o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Sociology Compass*, 2/5, pp. 1565-1581
- Benford, R. D., & Snow, D. A.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pp. 611-639.
-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September, pp. 397-446.
-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 Chan, Anita.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 Issue 1, pp. 61-85.
- Cox, Laurence and Nilsen, Alf Gunvald. 2005. "At the Heart of Society Burns the Fire of Social Movements: What Would a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Look Lik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opular Protest*, ed., by Barker, Colin and Tydesley, Mike.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http://eprints.nuim.ie/460/>.
- David, James A. 1985. *The logic of Causal Order*.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Davis, Joseph. 2002. *Stories of Change: Narrative and Social Movements*. SUNY Press
- Defay, Jason Bradley. 1999.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UCSD.
<http://www.weber.ucsd.edu/~jdefey/sm.htm>.
- Diani, Mario. 2002. "Social Movements, Contentious ac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From Metaphor to Substance'?" *Social Movements Analysis: The Network Perspective*, eds.,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11.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 Contro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May), pp. 425-447.
-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2014. “Foreshocks: Local Origins of Nanjing’s Qinming Demonstrations of 1976.” *The China Quarterly*, 220, December, pp. 1092-11110.
-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01.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pp. 1-26.
- Drury, John. 2015. “Social Movement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isinger, P.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pp. 11-28.
- Ferree, Myra M and Merill, David A. 2000. “Hot Movements, Cold Cognition: Thinking about Social Movements in Gendered Frame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3), pp. 454-462.
- Forster, Keith. 1990.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E: Sharpe.
- Francisco, Ronald. 19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ercion and Protes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 pp. 263 - 282.
- Gamson, W. A. and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Uncelar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1, pp. 1-37.
- Gamson, William. 1975. *Strategy of Protest*.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 Goodwin, Jeff, Jasper, James M. and Polletta, Francesca. 2000. “The Return of the Fall and Rise of Emotion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5(I), pp. 65-83.
- Goodwin, Jeff. 2012. “Social-Movement Studies Today: An Insider’s (self-)Critique.”

- <http://politicsandprotest.ws.gc.cuny.edu/files/2012/07/Goodwin-Contemporary-Sociology-Essay.pdf>
- Greenstone, Michael, Looney, Adam, Patashnik, & Jeremy, Yu, Muxin. 2016. "Thirteen Economic Facts about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hirteen-economic-facts-about-social-mobility-and-the-role-of-education/>
- Habermas, Jurgen.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2 Vols. Vol. I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tland, Gabriel and Goodwin, Jeff. 2013.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apitalism fro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Marx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Colin Barker, Laurence Cox, John Krinsky, & Alf Nilsen. Leiden: Brill, pp 83-102
- Holland, Jeremy, 2014. "Narrative Fidelity to the Little Red Book 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Efforts of the Red Guard Movement: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Foundational Documents." *Discourse & Society*, Vol. 25.3, pp. 383-401.
- Jasper, James M. 1997.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sper, James M. 2010.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oday: Toward a Theory of Action?" *Sociology Compass*, 4/11, pp. 965-976.
- Kaelbel, Hartmut. 2015.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 Killian, Lewis. 1964. "Social Movements." *Handbook of Modern Sociology*, ed., by Farris, Robert E. Chicago: Rand McNally.
- Kurzman, Charles. 1996. "Structural Opportunity and Perceived Opportunity in Social-Movement Theory: The Iranian Revolution of 197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pp. 153-170.
- Kurzman, Charles. 2004.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in Ir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urzman, Charles. 2008. "Meaning-Making in Social Movement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81, No. 1, pp. 5-16.
- Le Bon, Gustave. 2001/1895.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Kitchener, Ontario: Batoche Books.
- Lee, Hong Yung.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nders, Reinoud and Heydemann, Steven. 2012. "Popular Mobilization in Syria: Opportunity and Threat, and the Social Networks of the Early Riser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17:2, pp. 139-159, DOI: 10.1080/13629395.2012.694041
- Mahmoud, Abdesslem. 2015. "Social Movements in Tunisia and Egypt: A Tale of Two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 3, No. 3, pp 8-20.
- McAdam, Doug, Tarrow, S. and Tilly, C.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Carthy, John, and Zald, Mayer.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6, , pp. 1212-1241.
- McPhail, Clark. 1991.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Melucci, Alberto. 1980.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19 No. 2, pp. 199-226.
- Melucci, Alberto. 1985. "The Symbolic Challenge of Contemporary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 No. 4, pp. 789-816.
- Meyer, David. 2004. "Prote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30, pp. 125-45.
- Morris, Aldon and Herring, Cedric. 1987.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pp. 137-198.
- Muller, Walter and Pollak, Reinhard. 2015. "Social Mobilit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 Newman, Mark, Barabási, Albert-László, and Watts, Duncan J.. 2006.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Network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ffe, C. 1985.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pp. 483-99 .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ry, Elizabeth J. and Li, Xun.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Porta, Donatella D. and Diani, Mario.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Rasler, Karen. 1996. "Concessions,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Protest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pp. 132 - 152.
- Reicher, Stephen, and Drury, John. 2015.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4.
- Salter, Lee. 2003. "Democracy,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Internet."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by Martha McCaughey and Michael D. Ayer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hahin, Emadel-Din. 2012.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The Power of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Spirit of Tahrir Square."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3, pp. 46-69.
- Smelser, Neil. 2015.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4.

- Smith, Jackie and Fetner, Tina. 2010. "Structural Approaches in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Handbook of Social Movements across Disciplines*, eds., by Klandermans, Bert and Roggeband, Conny. Springer.
- Snow, David. A. and Benford, Robert. 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pp. 197-217
- Snow, David. A. and Benford, Robert. D. 1992.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 by A. D. Momo and C.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avid. A., Rochford, E. Burke Jr., Worden, Steven K., and Benford, Robert. 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pp. 464-481.
- Staggenborg, Suzanne. 1986. "Coalition Work in the Pro-Choice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 *Social Problems*, 33, pp. 374 - 389.
- Strauss, Anselm L. 1947. "Research in Collective Behavior: Neglect and Ne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 pp. 352 - 4.
- Tarás, G. M. 1993. "The Legacy of Dissent."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4th May, pp. 14-19.
- Tarrow, Sidney. 2011.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3rd edi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 Tilly, Charles. 1984.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Theory*, ed., by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Tökés, Rudolf L. 1974. "Dissent: The Politics for Change in the USSR."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1970's*,

- ed., by Morton, Henry W., Tökés, Rudolf L. and Hazard, J. 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Tolbert, Pamela S. and Hiatt, Shon R.. 2009. "On Organization and Oligarchies: Michel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Classical Foundations*, ed., by Paul Adler.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535231.003.0008.
- Turner, Ralph and Killian, Lewis. 1972. *Collective Behavior*,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Unger, Jonathan. 200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pp. 109-137.
- Unger, Jonathan. 2016. "Grassroots Factionalism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aradigms." *Notes from a roundtable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Seattle March 2016*.
- Van Dyke, Nella. 2003. "Protest Cycles and Party Politics." *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J. Goldsto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oronov, M. 2014. "Toward a toolkit for emotionalizing institutional theory." *Research on Emotion in Organizations*, 10, pp. 167-196.
- Walder, Andrew. 2006. "Factional Conflict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66-1968". *China Quarterly*, 188(I), pp. 1023-1047.
- Walder, Andrew.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M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ndrew. 2016. "Grassroots Factionalism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aradigms." *Notes from a roundtable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Seattle March 2016*.
- Wellman, B. 1988.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edited by Barry Wellman & S.D. Berkowitz. Cambridge
- White, Lynn T.. 1989. *Politic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John. 1973.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Yang, Guobin.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Joshua and Wright, James. 2018. *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Two Deaths by the Red Guards*. Boston, MA: Brill.

- 阿陀。2016。“文革造反派頭頭評毛”。美國加州洛山磯《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
- 巴尚。2018。“文革中西藏的一九六九年尼木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白而強。2012。“我策劃了沖擊三軍文藝演出”。《炎黃春秋》2月期。
- 白磊。1999。“從奪權到軍管——1967—1968年陝西省武鬥”。《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52期。
- 白磊。2018。“文革時期陝西各地區造反組織派別”。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卜偉華。2000。“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點”。《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
- 卜偉華。2009。“關於文革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華夏文摘增刊》第724、727期。
- 陳益南。2006。《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陳益南。2006。“文革中湖南‘省無聯’問題概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網站。
<http://ww2.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5095>
- 陳益南。2015。“對‘造反派’含義的幾點思考”。《昨天》第60期。
- 陳逸。2018。“《青海日報》六三社論發表前前後後”。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陳子明。2014。“文革：一場遊戲一場夢——兼與‘人民文革’說商榷”。《昨天》第28期。
- 程惕潔。2007。“四十餘年回首看內蒙文革”。《文化大革命：曆史真相和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

- 鄧振新。2018。“貴州文革大事記”。下載自《文革地方史交流網》。
- 丁凱文。2018。“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中外學者談文革》。熊景明、宋永毅、餘國良主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丁抒。2002。“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文革大屠殺》。宋永毅主編。香港：開放雜誌社。
- 董國強，Andrew Walder。2012。“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昨天》第12期。
- 董國強。2008。“十四位南京大學師生口述文革曆史”。《記憶》第16、18期。
- 董國強。2011。“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析”。《記憶》第67期。
- 董國強。2011。“南京文革群眾運動的起源和派性認同”。《記憶》第73期。
- 董國強。2012。“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二期。
- 董國強。2015。“關於文革期間‘造反派’概念的幾點思考”。《昨天》第60期。
- 董國強。2016。“派性身份、個人處境與政治抉擇：從地方視角反思文化大革命”。《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杜鈞福。2015。“文革十大武鬥事件質疑”。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杜鈞福。2018。“天津文革中的三輪二社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杜鈞福。2018。“有關天津文革的一點紀事”。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杜鈞福。2018。“文革史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探討”。《華夏文摘增刊》第1147、1148期。
- 樊思清。2018。“我要懺悔”。《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孫怒濤主編。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 範雨臣。2018。“激情年代的激情故事”。《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孫怒濤主編。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 範正美。2018。《秋夢追思》。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馮敬蘭、劉進、葉維麗、宋彬彬、於玲。2010。“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炎黃春秋》第8期。
- 高皋、嚴家祺。198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高樹華、陳鐵軍合著。2007。《內蒙文革風雷——一個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紐約：明鏡出版社。
- 韓鋼。2018。“中共曆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愛思想》。
下載自<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47-2.html>
- 何蜀。2018。“文革時期重慶群眾組織發展演變概述”。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何蜀。2005。“‘文革’時期重慶群眾組織發展演變概述”。《華夏文摘增刊》第449期。
- 何蜀。2007。“論造反派”。《文化大革命：曆史真相和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
- 何蜀。2009。“四川省與重慶市革命委員會中的重慶兩派群眾組織代表名單”。《記憶》第14期。
- 何蜀。2013。“對‘文化大革命’曆史分期的思考”。《愛思想》|《中國數字時代》11月1日。
- 胡平。2016。“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胡平。2016。“造反派為何鬧分裂、打內戰：寫在文革50周年”。《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73、174期。
- 黃河清。2006。“我是新疆文革造反派：文革人民線索的見證”。《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金春明。1995。《“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金春明。1998。“‘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
- 蒯大富。2014。“蒯大富的三十六條權經”。啟之編著。《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臺灣：獨立作家出版社。
- 蒯大富。2014。《清華文革“五十天”》。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 郎鈞。2012。“佇視王晶珪—宋彬彬對簿曆史的公堂——《宋彬彬談話紀要》的解讀及其它”。《華夏文摘增刊》第862期。
- 老田。2014。“老田談造反派的派性鬥爭與大聯合問題的經驗教訓——武漢水院張建成老師文革回憶錄《歲月留痕》的讀後感節錄”。《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李彤。2016。“1967：荒唐慘烈的重慶‘八·八海戰’”。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025/16/2369606_601270195.shtml
- 李遜。2015。《革命造反年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遜。2018。“1967年‘一月革命’”。《中外學者談文革》。熊景明、宋永毅、餘國良主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林啟予。2018。“林啟予口述文革”。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劉國凱。1997。“三年文革與兩條線索”。《中國之春》第2期。
- 劉國凱。2006。《人民文革論》。香港：博大出版社。
- 劉國凱。2006。“論人民文革——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北京之春》第152期。
- 劉世秀。2014。“河街居民遭遇八八海戰”。《昨天》第35期。
- 劉仰。2011。“文革——一個還是兩個，這是一個問題”。《華夏文摘增刊》第825期。
- 柳黎民、鄧賢。2018。“雲南知青三次暴動”。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龍升。2018。“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蘆學舜。2010。“銀川紅衛兵運動述略”。《銀川黨史網》05-26。
- 魯禮安。2005。《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呼天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陸小寶。2009。“複原清華百日武鬥的真實面貌”。《倒下的英才》。唐金鶴。香港：華圖書出版公司。
- 羅力。2018。“文革初期天津十六中（耀華中學）事件始末”。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馬榮升。2018。“我所親歷的雲大文革運動”。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木戈。2108。《文革風雲映滇池》。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匿名。2018。“新疆文革奇人——吳巨輪”。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聶元梓。2005。《聶元梓口述自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聶元梓。2018。《我在文革漩渦中》。香港：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
- 齊晉華。2011。“齊魯三年梟雄王”。《地方史文革交流網》。
- 啟之。2009。“七二零事件的預演：內蒙古軍區與保守派全力對付北京”。《記憶》第40期。
- 啟之。2013。《故事不是曆史：文革的紀實與書寫》。要有光出版社。
- 喬晞華、張程。2014。《傲慢與偏差——66個有趣的社會問題》。北京：新華出版社。

- 喬晞華。2015。《既非一個文革，也非兩個文革：南外紅衛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個案分析》。臺灣：博客思出版社。
- 喬晞華。2018。“烏合之眾論的破產”。《記憶》第211期。
- 日吉秀松。2016。“毛澤東文革目的探析”。《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桑傑嘉。2018。“西藏紅成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沈如槐。2004。《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
- 沈如槐。2004。《清華大學文革紀事》。香港天地圖書。
- 石名崗。2018。“文革在山西”。下載自《地方史文革交流網》。
- 水陸洲。2018。“吉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第三十七節）”。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水陸洲。2018。《文革簡論》（第四十六節福建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水陸洲。2018。《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論》（第十五節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水陸洲。2018。《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論》（第十一節寧夏回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宋永毅。2018。“湖南省無聯：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宋永毅。2013。“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真相”。《縱覽中國》11月4日。
- 宋永毅。2006年。“造反派和‘三種人’——一個亟待深入研究的歷史課題”。《動向》2月刊。
- 宋永毅。2015。《從毛澤東的擁護者到他的反對派：文革中異端思潮文獻檔案》。國史出版社。
- 宋永毅。2016。“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55期。
- 孫怒濤。2013。《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 孫怒濤。2018。《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 孫言誠。2009。“青海二·二三事件”。《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
- 唐少傑。2000。“文化大革命初期群眾組織取向的個案評析”。《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
- 田玉振。2018。“文革狂潮（十五）西安造反派在奪權中分裂加劇”。下載自《田玉振的博客》。

- 王春南。2015。“張生不悔的一件事：文革中批判江蘇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昨天》第47期。
- 王芳。2008。《記憶中的底層文革：關於文革時期武漢“鋼工總”的口述歷史研究》。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王芳。2016。“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以滬、漢兩地為例（1966-1967）”。《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王複興。2016。《搶救記憶：一個北大學生的文革回憶錄》。美國：南方出版社。
- 王複興。2018。《回顧暴風雨年代——北大文革親曆者文集》。美國：南方出版社。
- 王輝。2018。“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王克明、宋小明。2014年。《我們懺悔》。中信出版社。
- 王力德。2018。“記新疆大學‘六.三’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王力德。2018。“新疆第一次大規模‘鬥黑幫’”。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王林、王端陽。“父子日記”。2009。《記憶》第33期。
- 王年一。1988。《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王年一。2001。“五一三事件：一場大有來頭的小型武鬥”。《華夏文摘增刊》第255期。
- 王銳。2012。“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四川省社科院《當代史資料》第1期。
- 王紹光。1993。《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王希哲。1981年。“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月刊》2月刊。
- 王小彬。2018。“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西藏”。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桑傑嘉。2018。“西藏紅成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王毅。2018。“為什麼毛澤東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組’發動與推進文革”。《文化大革命定性——學術研討會專輯》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編。紐約：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
- 王友琴。1988。“女性的野蠻”。《校園隨筆》。北京出版社。
- 王友琴。2014年。“回應宋彬彬等”。《共識網》（2014-3-25）。

- 唯色。“唯色對拉薩紅衛兵主要組建人、‘造總’總司令陶長松的採訪”。<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iseblog/ws-08052016131139.html>。
- 唯色。2018。“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與1969年尼木、邊壩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唯色。2018。“對拉薩紅衛兵主要組建人、‘造總’總司令陶長松的採訪”。下載自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iseblog/ws-08052016131139.html>”。
- 唯色。2006。《西藏記憶：二十三位老者口述西藏文革》。大塊文化。
- 無名。2018。“八枚湖南湘江風雷像章”。下載自《地方史文革交流網》。
- 無名。2018。“江西‘大聯籌’與江西‘聯絡總站’”。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無名。2018。“文革紀實：寧夏派系鬥爭”。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吳迪。2002。“1967年內蒙古‘造反派’與內蒙古軍區的沖突——‘文革’中軍隊向學生開的第一槍”。《當代中國研究》總第78期。
- 吳迪。2010。“從前門飯店會議到兩派之爭”。《地方史文革交流網》。
- 吳過。2018。《紅衛兵檔案》。下載自
www.ebook99.com/lx_jswk_wsgc.htm。
- 武光。2000。《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
- 武麗麗、趙鼎新。2007。“克裏斯瑪權威的困境：寧夏文革的興起和發展”。《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字第101期。
- 席宣、金春明。2005年。《“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 喜東。1996年。“‘十年文革’，還是兩年文革？”《華夏文摘增刊》第83/84期。
- 夏瑛。2014。“從邊緣到主流：集體行動框架與文化情境”。《社會》第34卷。
- 洗恒漢。2018。《風雨八十載》節選。下載自《中國文革研究網》。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8603>
- 向前。2008。“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造反”。《記憶》第45期。

- 向前。2012年。“政治身份體系下的社會沖突：文革初期群眾行為的社會根源”。《記憶》第85、86、87期。
- 徐賁。2010年。“‘人民文革’和中國‘群眾’”。《縱覽中國》2月18日。
- 徐海亮。2005。《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
- 徐景賢。2005。《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徐景賢。2013。《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
- 徐永良。2016。《獨立評論》<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50752>
- 徐友漁。1999。《驀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
- 徐友漁。1999年。《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徐友漁。2000。《直面曆史》。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 徐友漁。2018。“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什麼性質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定性——學術研討會專輯》。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編。紐約：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
- 徐志高。2016。《文革史稿：文革史料匯編（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下）》。世界華語出版社。
- 許愛晶。2011年。《清華蒯大富》。香港：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
- 亞衣。1996。“工人造反派與中國人權運動——訪上海‘工總司’負責人潘國平”。《北京之春》第40期。
- 閻陽生。2008。“清華附中紅衛兵100天”。《炎黃春秋》第12期。
- 晏樂斌。2012。“廣西文革紀略”。《炎黃春秋》第11期。
- 楊大慶。2006。“思想史視野中的‘新思潮’與‘省無聯’。《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楊大慶。2014。“湖南文革中的工湘之爭”。《昨天》第43期。
- 楊海英。2016。“烏蘭夫與毛澤東的相克：大量屠殺蒙古人的理論背景”。《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楊海英。2018。（譯者：劉老伯）“維吾爾人的文革：從既往研究與批判材料中分析維吾爾人的存在”。《縱覽中國》2.2。
- 楊繼繩。2016。《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香港：天地圖書。
- 楊里克。2012。“殺個人比殺只雞還容易”。《昨天》第3期。

- 要寶鐘。2013。 “《洪流三部曲》之二：河北保定文革史略”。《地方史文革交流網》。
- 葉青。2004。 “文革時期紅衛兵組織之特征——以福建紅衛兵組織為個案的分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總第127期）。
- 葉曙明。2018。 “廣州紅衛兵的誕生”。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葉曙明。2018。 “廣州文革研究文章匯編”。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葉曙明。2018。 “造反派的末日”。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葉永烈。1995。《文革名人風雲錄》。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 葉長青。2018。 “文革中的群眾組織之概況（湖南長沙篇）”。2018年下載自
<http://www.jznu.edu.cn/page/depart/lxx/wenge/difang/difang-htm/hunan007.htm>。
- 一丁。2016。 “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佚名。2012。 “文革最慘烈的十大武鬥”。《華夏文摘增刊》第859期。
- 印紅標。1992年。 “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二十一世紀》10月。
- 印紅標。1997。 “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第4期。
- 印紅標。2018。 “1966年的北京學生造反”。《中外學者談文革》。熊景明、宋永毅、餘國良主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余汝信。2018。 “趙紫陽與廣東文革”。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余汝信。2004。 “文革旋渦中的38軍”。網絡雜誌《楓華園》第439、440期。
- 余汝信。2008。 “趙永夫事件淺析——冼恒漢回憶錄補正”。《華夏文摘增刊》第649期。
- 張光渝。2015。 “定義‘造反派’”。《昨天》第60期。
- 張顯揚。2006。 “生前防篡權，死後防鞭屍”。香港《開放》月刊5月號。
- 張震。2018。 “我在文革初期的磨難”。下載自《華夏知青》。
- 章成。2001。 “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香港《開放》第7、8、9、12期。

趙鼎新。2005。“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發展之述評——站在中國的角度思考”。《社會學研究》第1期。

鄭義。1993。《曆史的一部分——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臺北：萬象出版社。

鄭義。1996年。“兩個文化大革命芻議”。《華夏文摘增刊》第83期。

鄭仲兵、雷頤、韓鋼、李鬱。2004年。“漫談文革研究”。《往事》第1期。

周倫佐。2006。《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書屋。

周倫佐。2015。“略談‘造反派’定義”。《昨天》第60期。

周孜仁。2005。“譚甫仁017凶案”。《炎黃春秋》第2期。

周孜仁。2017。“雲南‘摧資兵團’的申明和組織章程”。《昨天》第98期。

朱嘉明。1996年。“三十年後思考文化革命的幾個問題”。《華夏文摘增刊》第97期。

朱培民、餘習廣。2018。“文革第一槍：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華夏文摘增刊》第1117期。

“長春公社”“首都紅衛兵”。1967。“一九六七年春城文化大革命簡介（1967.8）”。2018年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1966年南京八三事件的若幹檔案資料”。《記憶》2013年第94期。

“昆明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2018年下載自《中國文革研究網》。

“文化大革命記實（5）成都的派性鬥爭”。2018年下載自《360個人圖書館》。

寧夏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各戰鬥團聯合指揮部東方紅六盤山

（《八·一三紅衛兵》）1967。“六盤山下風雷激——寧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介”。2018年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人民前線報社》。2016。《軍號嘹亮——人民前線報68年》。內部出版物。

《中國共產黨章程（1956年9月26日八大通過）》“第二章 黨的組織機構和組織制度”2018年下載自《新華網》

中共南寧市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1987。“南寧市“文革”大事件”。2018年下載自《文革地方史交流網》。

[1] 本段落是嚴家祺先生應作者之邀特地為本書寫的。嚴家祺，1942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曾在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1986年與高皋合寫並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已出版增訂版英文日文版，其他著

作有《首腦論》、《霸權論》、《普遍進化論》、《聯邦中國構想》。曾任密西根大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現居美國。

[2] Joshua Zhang and James Wright. 2018. *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Two Deaths by the Red Guards*. Boston, MA: Brill.

[3] 金春明。1998 年。“‘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 2 期。

[4] 金春明。1995 年。《“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5] 何蜀。2013 年。“對‘文化大革命’曆史分期的思考”。《愛思想》|《中國數字時代》11 月 1 日。

[6] Chan, Anita.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 Issue 1, pp. 61-85.

[7]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pp. 397-446.

[8] Lee, Hong Yung.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 White, Lynn T.. 1989. *Politic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0] 介於紅五類與黑五類之間的民眾。

[11] 王希哲。1981 年。“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月刊》2 月刊。

[12] 鄭義。1993。《曆史的一部份——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臺北：萬象出版社。

[13] Chan, Anita.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 Issue 1, pp. 61-85.

[14] 金春明。1998 年。“‘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 2 期。

[15] 徐友漁。1999 年。《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6] 鄭仲兵、雷頤、韓鋼、李鬱。2004 年。“漫談文革研究”。《往事》第 1 期（9 月）。

[17] 席宣、金春明。2005 年。《“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8] 徐賁。2010 年。“‘人民文革’和中國‘群眾’”。《縱覽中國》2 月 18 日。

[19] 王克明、宋小明。2014 年。“前言”。《我們懺悔》。中信出版社。

- [20] 陳子明。2014 年。“文革：一場遊戲一場夢——兼與‘人民文革’說商榷”。《昨天》第 28 期 1 月。
- [21] Kurzman, Charles. 2004.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in Ir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2] 喬晞華。2018。“烏合之眾論的破產”。《記憶》第 211 期。
- [23] Lee, Hong Yung.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4] Chan, Anita.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 Issue 1, pp. 61-85.
-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pp. 397-446.
- [25] Cox, Laurence and Nilsen, Alf Gunvald. 2005. “‘At the Heart of Society Burns the Fire of Social Movements’: What Would a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Look Lik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opular Protest*, ed., by Barker, Colin and Tydesley, Mike.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 1. <http://eprints.nuim.ie/460/>.
- [26]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15.
- [27] Lee, Hong Yung.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5.
- [28]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September, pp. 397-446.
- [29] McAdam, Douglas.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48-51
- [30] Porta, Donatella D. And Diani, Mario.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p. 6.
- [31] Morris, Aldon and Herring, Cedric. 1987.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p. 4.
- [32] Habermas, Jurgen.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2 Vols. Vol. I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350.
- [33] Chan, Anita.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92, Volume 1, Issue 1, pp. 61-85.

- [34] 宋永毅。2006 年。“造反派和‘三種人’——一個亟待深入研究的歷史課題”。《動向》2 月刊。
- [35] 喜東。1996 年。“‘十年文革’，還是兩年文革？”《華夏文摘增刊》第 83、84 期。
- [36] 劉國凱。2006 年。“論人民文革——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北京之春》第 152 期。
- [37] 鄭義。1996 年。“兩個文化大革命雛議”。《華夏文摘增刊》第 83 期。
- [38] 劉國凱。1997 年。“三年文革與兩條線索”。《中國之春》第 2 期。
- [39] Unger, Jonathan. 200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uary, pp. 109-137.
- [40] 喜東。1996 年。“‘十年文革’，還是兩年文革？”《華夏文摘增刊》第 83/84 期。
- [41] 劉國凱。1997 年。“三年文革與兩條線索”。《中國之春》第 2 期。
- [42] 朱嘉明。1996 年。“三十年後思考文化革命的幾個問題”。《華夏文摘增刊》第 97 期。
- [43] 葉永烈。1995。《文革名人風雲錄》。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第 278 頁。
- [44] 喬晞華。2015。《既非一個文革，也非兩個文革——南外紅衛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個案分析》。臺灣：博客思出版社。Zhang, Joshua and Wright, James. 2018. *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Two Deaths by the Red Guards*. Boston, MA: Brill.
- [45] 荀偉華。2009 年。“關於文革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華夏文摘增刊》第 724、727 期。
- [46] 金春明。1998 年。“‘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 2 期。
- [47] 劉仰。2011 年。“文革——一個還是兩個，這是一個問題”。《華夏文摘增刊》第 825 期。
- [48] 金春明。1998。“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 2 期。
- [49] 第一部分的文革敘事基於的史料主要有：楊繼繩。2016。《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香港：天地圖書。徐友漁。1999 年。《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金春明。1995 年。《“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王年一。1988。《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地方文革史交流網》<http://difangwenge.org/>
- [50]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發表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成為文革的前奏。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以說文革始於姚文。
- [51] 1967 年 1 月正式成為中央直轄市。
- [52] 因中國沒有文革及文革前 GDP 的統計，本書採用 1978 年的 GDP 統計。
- [53] 本章敘述還基於：聶元梓。2005。《聶元梓口述自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聶元梓。2018。《我在文革漩渦中》。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王複興。2016。《搶救記憶：一個北大學生的文革回憶錄》。美國：南方出

版版社。王復興。2018。《回顧暴風雨年代——北大文革親曆者文集》。美國：南方出版版社。

[54] 缺席者多為外出串連者。

[55] 本章敘述還基於：蒯大富。2014。《清華文革“五十天”》。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許愛晶。2015。《清華蒯大富》。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孫怒濤。2013。《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沈如槐。2004。《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

[56]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於9月10日改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57] 成立於1966年8月27日。

[58] 成立於1966年9月5日。

[59] 成立於1966年9月6日。

[60] 本章敘述還基於：吳過。2016。《紅衛兵檔案》。下載自 www.ebook99.com/lx_jswk_wsgc.htm。閻陽生。2008。《清華附中紅衛兵100天》。《炎黃春秋》第12期。

[61] 本節敘述還基於：王友琴。1988。《女性的野蠻》。《校園隨筆》。北京出版社。王友琴。2014年。《回應宋彬彬等》。《共識網》（03-25）。啟之。2013。《故事不是曆史：文革的紀實與書寫》。要有光出版社。馮敬蘭、劉進、葉維麗、宋彬彬、於玲。2010。《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炎黃春秋》第8期。郎鈞。2012年。《佇視王晶垚—宋彬彬對簿曆史的公堂—《宋彬彬談話紀要》的解讀及其它》。《華夏文摘增刊》第862期。《記憶》第47、49、106期上的眾多的文章。

[62] 本章敘述還基於：亞衣。1996。《工人造反派與中國人權運動——訪上海‘工總司’負責人潘國平》。《北京之春》第40期。李遜。2015。《革命造反年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徐景賢。2005。《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徐景賢。2013。《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

[63] 有的地方（如江蘇）把這種情況叫做“以工代幹”，在上世紀80年代初進行清理，提拔了許多“以工代幹”的工人進入幹部編制。

[64] 國棉十七廠黨委當時沒有正書記，由黨委副書記張鶴鳴主管工作，王洪文大字報就是針對他的。

[65] 上海紡織工業局應是上海棉紡公司的上級單位。

[66] 後來在毛的建議下，“上海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67] 其實張和姚是故意拖延，不回複“工總司”攻打上柴聯司的請求。

[68] 王洪文最初調了4萬人，後來有些單位自動前來助戰，加起來有10幾萬人。

[69] 本章敘述還基於：王林、王端陽。《父子日記》。2009。《記憶》第33期。羅力。2018。《文革初期天津十六中（耀華中學）事件始末》。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林啟予。2018。《林啟予口述文革》。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杜鈞福。2018。《天津文革中的三輪二社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杜鈞福。2018。《有關天津文革的一點紀事》。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王輝。2018。《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70] 即“工人代表會”、“幹部代表會”、“農民代表會”、“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會”和“中學紅衛兵代表會”。

[71] 本章敘述還基於：章成。2001。“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香港《開放》第7, 8, 9, 12期。向前。2008。“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造反”。《記憶》第45期。向前。2012。“政治身份體系下的社會沖突——文革初期群眾行為的社會根源”。《記憶》第87期。陳益南。2006。《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楊大慶。2018。“湖南文革中的工湘之爭”。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楊大慶。2018。“思想史視野中的‘新思潮’與‘省無聯’”。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宋永毅。2018。“湖南省無聯：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陳益南。2018。“文革中湖南‘省無聯’問題概述”。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72] 魏東明在1959年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林增平為曆史學家，教授。

[73] 原名楊曦光，後成為著名的經濟學家。楊的父親楊第甫曾公開反對大躍進，因此與周小舟一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革開始後，楊第甫及其妻子被省委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鬥爭的對象。楊小凱被工作組列為重點批判對象或與此有關。

[74] 因湖南局勢失控，中央決定讓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不久的張平化回湖南任省委第一書記。

[75] “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簡稱，文革初期由幹部子弟組成的保守派紅衛兵組織。

[76] “湘江風雷”的組織建制為四級機構：總司令部，戰團，支隊和分隊

[77] 葉衛東從監獄裏放出來後第二天直接去北京，作為湖南造反派代表，參加中央召開的關於解決湖南省文革問題的會議。

[78] 該簡稱的含義是“省會”，“無聯”。

[79] 《反迫害》是知青造反組織“反迫害總勤務站”的機關報。該報不僅在長沙發行，部分串聯知青還將該報帶到廣州街頭叫賣，少量報紙流入香港。

[80] 很顯然，“紅聯”把“革聯”與四類分子聯系在一起。

[81] 本節的敘述還基於：魯禮安。2005。《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呼天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王芳。2008。《記憶中的底層文革：關於文革時期武漢“鋼工總”的口述曆史研究》。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82] 即“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後稱為“鋼工總”。為避免混淆，“鋼派”和“新派”的組織在本書中均以後來的名稱統一稱之。

[83] 即“毛澤東思想九·一三兵團”，簡稱“九·一三”，後稱為“鋼九·一三”。

[84] 即“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二司”，後稱“鋼二司”。

[85] 即華中工學院的“新華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司令部”。

[86] 即華中農學院的“新華農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87] 即湖北大學的“新湖大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

[88] 剛開始時，該組織叫“工總”。

[89] 宋永毅。2015。《從毛澤東的擁護者到他的反對派：文革中異端思潮文獻檔案》。國史出版社。

[90] 本章敘述還基於：董國強，2016，“派性身份、個人處境與政治抉擇：從地方視角反思文化大革命”。《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董國強、Andrew Walder。2012。“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昨天》第12期。王春南。2015。“張生不悔的一件事：文革中批判江蘇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昨天》第47期。董國強。2008。“十四位南京大學師生口述文革曆史”。《記憶》第16、18期。董國強。2011。“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析”。《記憶》第67期。董國強。2011。“南京文革群眾運動的起源和派性認同”。《記憶》第73期。“1966年南京八三事件的若干檔案資料”。《記憶》第94期。Dong Guoqiang, Andrew Walder. 2014. “Foreshocks: Local Origins of Nanjing’s Qinming Demonstrations of 1976.” *The China Quarterly*. November 20。喬晞華。2015。《既非一個文革，也非兩個文革》。臺灣：博客思出版社。

[91] 現更名為南京師範大學。

[92] 第一任工作組長是省委常委汪冰石，後來改由省委書記彭沖親自擔任工作組長。

[93] 文革結束後，匡亞明官復原職成為南大的校長兼書記。在清理三種人時，提出胡基才是“三種人”，應當受到懲罰，江蘇省委負責人則對胡才基愛護有加。許家屯在自己逃離香港前把胡調到香港，使其免受江蘇省委的迫害。

[94] 成立於1966年8月23日。

[95] 成立於1966年8月27日。

[96] 括號內為簡稱。

[97] 開始叫“紅色挺進隊”，後更名為“紅色野戰軍”，最後於12月16日更名為“南京師範學院附中紅色造反聯合會”，簡稱“紅聯”。

[98] 造反軍中只有一個小組與南京地區好派結盟，參與反許，其他成員均保軍保許保爹保媽。

[99] 王虹給筆者的回信，2017年9月9日。

[100] 現更名為“河海大學”。

[101] 調查報告沒有披露具體工廠。

[102] “紅色娘子軍”的成員大多數是家屬，由居委會管轄領導。因“赤衛隊”和“紅色娘子軍”的袖章上的字是黑字，也有人稱他們為黑字兵。

[103] P派稱奪權好個屁。P是屁的諧音，以避不雅之嫌。

[104] 另一說法，根據查閱過檔案的原江蘇電視臺長丁群透露，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達26多萬人，其中被關押批鬥的13多萬人，死2540人，傷3500多人。

[105] “好派”領導人、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

[106] 田普曾公開支持P派。

[107] 葉群曾派人到全國各地為其兒子選擇戀愛對象。

[108] 1976年2月6日，姚文元控制的《內部參考》轉載了香港的一篇攻擊周恩來的文章。3月5日，上海文匯報出現“黨內那個最大的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扶上臺”的句子，影射周恩來，引起廣泛的憤怒。1976年3月28日，南京大學400多名師生率先公開組織開展周恩來逝世的悼念活動，以

周恩來的遺像為前導，捧著用玉蘭花制作的花圈，沿著南京主要幹道前往梅園新村。南京其他大專院校的數萬名師生也抬著花圈和挽幛，紛紛湧向梅園和雨花臺。3月29日晚和30日，南大300多名師生分成20多個小組，分赴南京火車站、汽車站、輪船碼頭及主要街道，到處刷寫“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鄧小平和人民心連心！”等大標語。3月31日夜，南京市17所大專院校的學生代表在南京大學秘密舉行聯席會議，醞釀成立“中國民主大同盟”等組織，最後決定以悼念周恩來為旗幟，成立“南京市各界群眾悼念周總理聯絡站”，推選李西寧為“總指揮”，組織悼念周恩來、支援鄧小平、反對繼續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活動。南京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鬥爭逐步擴展到全國，北京爆發了天安門事件。舉世聞名的4·5民主運動終於北京卻源於南京。

[109] 本章的敘述還基於：範正美。2018。《秋夢追思》。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110] 當時稱為山下派，為避免混亂起見，本章統一稱為“炮轟派”。

[111] 本章的文革敘述還基於：高樹華、陳鐵軍合著。2007。《內蒙文革風雷——一個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楊海英。2016。“烏蘭夫與毛澤東的相克：大量屠殺蒙古人的理論背景”。《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吳迪。2002。“1967年內蒙古‘造反派’與內蒙古軍區的衝突——‘文革’中軍隊向學生開的第一槍”。《當代中國研究》總第78期。程惕潔。2007年。“四十餘年回首看內蒙文革”。《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第87-98頁。啟之。2009。“七二零事件的預演：內蒙古軍區與保守派全力對付北京”。《記憶》第40期。

[112] 雖然周恩來早在1967年3月13日就下令拘留柳青，可是直到4月13日後，柳青才在內蒙古軍區負責人歉疚的目光中邁進“監獄”的大門。柳青在獄中可享用煙酒、糖果，奉派看守他的戰士們還時常陪他下棋、打牌。文革結束後，柳青出獄恢復一切軍官待遇，被送到石家莊幹休所養老。被他無故打死的學生韓桐雖然曾在文革中被革委會追認為烈士，文革結束後宣布烈士證書無效，革委會豎的墓碑也被砸爛。

[113] 本章敘述還基於：唯色。2006。《西藏記憶：二十三位老者口述西藏文革》。大塊文化。王小彬。2018。“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西藏”。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桑傑嘉。2018。“西藏紅成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唯色。2018。“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與1969年尼木、邊壩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巴尚。2018。“文革中西藏的一九六九年尼木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唯色對拉薩紅衛兵主要組建人、“造總”總司令陶長松的採訪。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nlan/weiseblog/ws-08052016131139.html>。

[114] 成立時間在8月19至23日之間。

[115] 時任西藏軍區司令員兼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116] 用牛羊毛編織的一種甩石器，是西藏的一種放牧用具。

[117] 後任西藏革委會主任，同情“造總”一派。

[118] 後任西藏軍區政委，代理西藏革委會主任，西藏自治區第一書記，支持“大聯指”一派。

[119] 也有說是1968年11月1日至3日。

[120] 本章敘述還基於：周孜仁。2005。“譚甫仁 017 凶案”。《炎黃春秋》第 2 期。木戈。2018。“文革風雲映滇池”。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馬榮升。2018。“我所親歷的雲南大學文革運動”。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柳黎民、鄧賢。2018。“雲南知青三次暴動”。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昆明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2018。下載自《中國文革研究網》。

[121] 方向東原名方自清，出身工人。

[122] 楊樹先是雲南省建築公司“八派”“一二·六兵團”的領導人，八派赴京代表在《大聯合協議》上名列第二簽字（第一是黃兆琪）的人物。

[123] “三司”原本是北京市大中學生在文革初期的一個造反精神最強的造反派聯合組織。趙璋等人成立“炮三司”的用心不難窺破。

[124] 1 月 30 日，周恩來等人接見雲南兩大派代表、駐軍領導和省委幹部。在接見時，支持“炮派”的趙健民被康生指控為叛徒當場被抓。

[125] 也有人稱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 6 萬。

[126] 王自正當時還因另一件 20 年前的命案受審查。

[127] 本章論述還基於：丁抒。2002。“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文革大屠殺》。宋永毅主編。香港：開放雜誌社。余汝信。2008。“趙永夫事件淺析——洗恒漢回憶錄補正”。《華夏文摘增刊》第 649 期。孫言誠。2009。“青海二·二三事件”。《炎黃春秋》第 10 期。陳逸。2018。“《青海日報》六三社論發表前前後後”。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128] 原為“青海省軍區機關革命造反群眾司令部”，後改為“指揮部”。

[129] 本章敘述還基於：武光。2000。《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朱培民、餘習廣。2018。“文革第一槍：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華夏文摘增刊》第 1117 期。楊海英。2018。（譯者：劉老伯）“維吾爾人的文革：從既往研究與批判材料中分析維吾爾人的存在”。《縱覽中國》2 月 2 日。龍升。2018。“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王力德。2018。“記新疆大學‘六、三’事件”。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王力德。2018。“新疆第一次大規模‘鬥黑幫’”。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黃河清。2006。“我是新疆文革造反派：文革人民線索的見證”。《地方文革史交流網》。匿名。2018。“新疆文革奇人——吳巨輪”。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130] 王恩茂曾於 1975 年被調離新疆。

[131] 第一政委由王恩茂兼任。

[132] 本章敘述還基於：丁凱文。2016。“解放軍與文革的幾個問題”。《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丁凱文。2013。《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紐約：明鏡出版社。

[133] 本節敘述基於：張震。2018。“我在文革初期的磨難”。下載自《華夏知青》<http://www.hxzq.net/asps/show/showarticle.asp?id=10075>。筆者對一位南京軍事學院教官和幾位教官子弟的採訪。

[134] 初建時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簡稱解放軍軍事學院，後更名為南京軍事學院

[135] 本節的簡述還基於《人民前線報社》。2016。《軍號嘹亮——人民前線報 68 年》。內部出版物；《人民前線報社》。筆者對原南京軍區駐無錫炮兵某部顧

某和原南京軍區某局幹訓隊周某採訪。

[136] X局的上級主管部門。

[137] 本節還基於以下資料：白而強。2012。“我策劃了沖擊三軍文藝演出”。《炎黃春秋》2月刊。丁凱文。2013。《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明鏡出版社。

[138] 王年一。2001。“五一三事件：一場大有來頭的小型武鬥”。《華夏文摘增刊》第255期。

[139] Goodwin, Jeff. 2012. “Social-Movement Studies Today: An Insider’s (self-)Critique.”
<http://politicsandprotest.ws.gc.cuny.edu/files/2012/07/Goodwin-Contemporary-Sociology-Essay.pdf>

[140] Hetland, Gabriel and Jeff Goodwin. 2013.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apitalism fro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Marx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Colin Barker, Laurence Cox, John Krinsky, and Alf Nilsen. Leiden: Brill, pp 83-102.

[141]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pp. 397-446.

[142] Walder, Andrew. 2006. “Factional Conflict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66-1968.” *China Quarterly*, 188(I), pp. 1023-1047.

[143] Walder, Andrew. 2016. “Grassroots Factionalism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aradigms.” *Notes from a roundtable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Seattle March 2016*.

[144] Forster, Keith. 1990.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E: Sharpe.

[145] Perry, Elizabeth J. and Li, Xun.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p. 39-69.

[146]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01.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pp. 1-26.

[147] 楊繼繩。2016。《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香港：天地圖書。

[148] 金春明。1995。《“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49] 王年一。1988。《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50] 高皋、嚴家祺。198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51] 劉國凱。2006。《人民文革論》香港：博大出版社。

[152] 徐友漁。1999。《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53] 雲南省第一把手譚甫仁遇刺後，由文官周興接任，是個例外。

- [154] Killian, Lewis. 1964. "Social Movements". *Handbook of Modern Sociology*, ed., by Robert E. Farris. Chicago: Rand McNally, pp. 426-445.
- [155] Morris, Aldon and Herring, Cedric. 1987.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pp. 137-198.
- [156] Porta, Donatella D. and Diani, Mario.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157] Wilson, John. 1973.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 8.
- [158]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6.
- [159] Aberle, David. 1966. *The Peyote Religion Among the Navaho*. Chicago: Aldine.
- [160] McPhail, Clark. 1991.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161] DeFay, Jason Bradley. 1999.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http://www.weber.ucsd.edu/~jdefey/sm.htm>.
- [162] LeBon, Gustave. 2001/1895.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Kitchener, Ontario: Batoche Books.
- [163] Reicher, Stephen, and Drury, John. 2015.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4.
- [164] 陳子明。2014年。"文革：一場遊戲一場夢——兼與‘人民文革’說商榷"。《昨天》第28期。
- [165] 席宣、金春明。2005年。《"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第319-322頁。
- [166] Turner, Ralph and Killian, Lewis. 1972. *Collective Behavior*,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 13.
- [167] 喬晞華。2015。《既非一個文革，也非兩個文革：南外紅衛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個案分析》。臺灣：博客思出版社。
- [168] Cox, Laurence and Nilsen, Alf Gunvald. 2005. "At the Heart of Society Burns the Fire of Social Movements: What Would a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Look Lik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opular Protest*, ed., by Colin Barker and Mike Tydesley,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 1. <http://eprints.nuim.ie/460/>.
- [169] Barrett, Kimberty and Lynch, Michael J.. 2015. "Social Justic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 [170] Smelser, Neil. 2015.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4.

- [171]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72] Drury, John. 2015. "Social Movement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 [173] Mahmoud, Abdesslem. 2015. "Social Movements in Tunisia and Egypt: A Tale of Two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 3, No. 3, pp. 8-20.
- [174] Defay, Jason Bradley. 1999.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UCSD. <http://www.weber.ucsd.edu/~jdefey/sm.htm>.
- [175] Drury, John. 2015. "Social Movement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 [176]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77] Mahmoud, Abdesslem. 2015. "Social Movements in Tunisia and Egypt: A Tale of Two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 3, No. 3, pp. 8-20.
- Davis, Joseph. 2002. *Stories of Change: Narrative and Social Movements*. SUNY Press.
- [178] McCarthy, John, and Zald, Mayer.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6, pp. 1212-1241.
- [179] Drury, John. 2015. "Social Movement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 [180] Jasper, James M. 2010.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oday: Toward a Theory of Action?" *Sociology Compass*, 4/11, pp. 965-976.
- [181] 夏瑛. 2014. "從邊緣到主流：集體行動框架與文化情境"。《社會》第34卷第52-74頁。
- [182] Jasper, James M. 1997.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83]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84] Defay, Jason Bradley. 1999.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UCSD. <http://www.weber.ucsd.edu/~jdefey/sm.htm>.
- [185] Tarrow, Sidney. 1998. *Power in Movemen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86] Tilly, Charles. 1984.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Theory*, ed., by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297-317.

Gamson, William. 1975. *Strategy of Protest*.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187] 夏瑛。2014。“從邊緣到主流：集體行動框架與文化情境”。《社會》第34卷第52-74頁

[188] 趙鼎新。2005。“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發展之述評：站在中國的角度思考”。《社會學研究》<http://oa.shxyj.org/UploadFile/20130926008/2015-08-23/Issue/xq3ebfdi.pdf>

[189] Melucci, Alberto. 1980.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19 No. 2, pp. 199-226.

Melucci, Alberto. 1985. “The Symbolic Challenge of Contemporary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 No. 4, pp. 789-816.

Offe, C. 1985.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pp. 483-99.

[190] Smelser, Neil. 2015.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4.

[191] Drury, John. 2015. “Social Movement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192] 趙鼎新。2005。“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發展之述評：站在中國的角度思考”。《社會學研究》第1期。

[193] Kurzman, Charles. 2008. “Meaning-Making in Social Movement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81, No. 1, pp. 5-16.

[194] 夏瑛。2014。“從邊緣到主流：集體行動框架與文化情境”。《社會》第34卷第52-74頁

[195] Snow, David. A. and Benford, Robert. 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pp. 197-217.

[196] Bateson, Gregory.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San Francisco, CA: Chandler.

[197] Snow, David. A. and Benford, Robert. D. 1992.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 by A. D. Momo and C.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137.

[198] Gamson, W. A. and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Un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1, pp. 1-37.

Snow, David. A., Rochford, E. Burke Jr., Worden, Steven K., and Benford, Robert. 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pp. 464-481.

- Snow, David. A. and Benford, Robert. 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pp. 197-217.
- [199]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38
- [200] Ferree, Myra M and Merill, David A. 2000. "Hot Movements, Cold Cognition: Thinking about Social Movements in Gendered Frame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3), pp. 454-462.
- [201] Snow, David. A., Rochford, E. Burke Jr., Worden, Steven K., and Benford, Robert. 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pp. 464-481.
- [202] Tarrow, Sidney. 2011.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3rd edi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6-22.
- [203] 韓鋼。2018。"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下載自《愛思想》。
- [204] 韓鋼。2018。"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下載自《愛思想》。
- [205] 日吉秀松。2016。"毛澤東文革目的探析"。《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206] 向前。2012年。"政治身份體系下的社會沖突：文革初期群眾行為的社會根源"。《記憶》第85期。
- [207] 《新華網》。2018。《中國共產黨章程（1956年9月26日八大通過）》第二章 黨的組織機構和組織制度。下載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04/content_2391956_2.htm
- [208] 日吉秀松。2016。"毛澤東文革目的探析"。《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209] 胡平。“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210] 張顯揚。2006。“生前防篡權，死後防鞭屍”。香港《開放》5月號。
- [211] Andreas, Joel. 2007. “The Structure of Charismatic Mob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Rebellion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2, pp. 434-458.
- [212] Snow, David. A. and Benford, Robert. 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pp. 197-217.
- Snow, David. A., Rochford, E. Burke Jr., Worden, Steven K., and Benford, Robert. 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pp. 464-481.
- [213] 胡平。2016。“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214] Francisco, Ronald. 19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ercion and Protes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 pp. 263 - 282.
- Rasler, Karen. 1996. “Concessions,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Protest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pp. 132 - 152.
- Staggenborg, Suzanne. 1986. “Coalition Work in the Pro-Choice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 *Social Problems*, 33, pp. 374 - 389.
- Van Dyke, Nella. 2003. “Protest Cycles and Party Politics.” *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J. Goldsto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26 - 245.
- [215]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 [216] 楊繼繩。2016。《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香港：天地圖書。
- [217] 王毅。2018。“為什麼毛澤東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組’發動與推進文革”。《文化大革命定性——學術研討會專輯》。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編。紐約：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
- [218]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19] Goodwin, Jeff, Jasper, James M. and Polletta, Francesca. 2000. “The Return of the Fall and Rise of Emotion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5(I), pp. 65-83.
- [220] 徐友漁。2018。“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什麼性質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定性——學術研討會專輯》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編。紐約：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
- [221] 王年一。1988。《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222] 毛在接見宋彬彬時提議她改名為宋要武。

- [223] 胡平。2016。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224] 徐友漁。1999。《驀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第90頁。
- [225] 何蜀。2007。 “論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第504頁。
- [226] 何蜀。2007。 “論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第510頁。
- [227]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 [228] Walder, Andrew.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M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29] 徐友漁。1999年。《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230] 王紹光。1993。《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231] 印紅標。1997。 “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 。《青年研究》第4期。
- [232] 唐少傑。2000。 “文化大革命初期群眾組織取向的個案評析” 。《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
- [233] 荀偉華。2000。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點” 。《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
- [234] 葉青。2004。 “文革時期紅衛兵組織之特征——以福建紅衛兵組織為個案的分析”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
- [235] 徐海亮。2005。《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
- [236] 葉長青。2018。 “文革中的群眾組織之概況（湖南長沙篇）” 。下載自 <http://www.jznu.edu.cn/page/depart/lxx/wenge/difang/difang-hm/hunan007.htm>。
- [237] 王芳。2008。《記憶中的底層文革：關於文革時期武漢“鋼工總”的口述歷史研究》。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238] 樊思清。2018。 “我要懺悔” 。《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孫怒濤主編。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第291頁。
- [239] 根據我們在2018年1月14日通過聶元梓的兒子于曉東對聶元梓的遠程採訪。
- [240] 我們堅持參與調查自願的原則的另一個原因是沒有經費來源。我們的研究完全是個人行為，沒有任何政府部門或科研機構的資助。
- [241] 問卷調查細節詳見附錄4。
- [242] Unger, Jonathan. 2016. “Grassroots Factionalism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aradigms.” *Notes from a roundtable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Seattle March 2016*.
- [243] 此次問卷調查中，我們主要依靠微信向民眾發送調查問卷鏈接。由於自2018年下半年開始國內對輿論加強了控制，盡管我們從未發表過任何過激言論，

但是我們的微信賬號還是於 2018 年 7 月 15 日和 10 月 4 日兩次遭到封殺。

[244] 我們的基本思路是選擇 1966 年時已經進入中學的受訪者。規定 12 歲界限是因為當時有為數不多的試點小學採取五年制的學制。因此有一些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年齡是 12 歲。我們在調查中觀察到一些 12 歲的受訪者參加了群眾組織。

[245] Unger, Jonathan. 200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pp. 109–137.

[246] 參見附錄 4 的說明。

[247]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東北地區指揮部（簡稱紅東北）。

[248]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簡稱紅西南）。

[249] 受訪者中有 14 人未注明性別。

[250] 有個別小學生，因達到 12 歲，也在樣本之中。

[251] 因非省會科員女性參加群眾組織比例高於男性。

[252] 受訪者中有 84 人未填寫家庭出身。

[253] 受訪者中有 38 人未填寫本人政治面貌。

[254] 表 16.10 中總數為 1,571，有 99 人家庭出身或本人政治面貌未填。

[255] Muller, Walter and Pollak, Reinhard. “Social Mobility.” 2015.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ed.,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256] Kaelbel, Hartmut. 2015.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By James Wright. 2nd, Volume 22.

[257] Greenstone, Michael; Looney, Adam; Patashnik, Jeremy; Yu, Muxin. 2016. “Thirteen Economic Facts about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hirteen-economic-facts-about-social-mobility-and-the-role-of-education/>.

[258] 因為有受訪者未填寫性別，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分析模型實際人數略低於總人數。

[259] 陳益南。2006。《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60] 把知青歸於工人和科員一類是因為他們參加群眾組織的積極性相仿。從身份角度他們與農民有點格格不入，盡管他們被迫下了鄉。

[261] 括號內是人數，下同。

[262] 只有為數不多的受訪者出於經濟利益，下同。

[263] 即 Y2+Y3。

[264] 職業分為 3 類，（1）學生；（2）工人 / 科員 / 知青；（3）其他。“其他”作為參考類。因為有受訪者未填寫性別、家庭出身和 / 或本人政治面貌，所以分析模型實際人數略低於參加群從組織總人數為 894。

[265] 蒯大富。2014。《蒯大富的三十六條權經》。啟之編著。《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臺灣：獨立作家出版社。

[266] Baumgarten, Britta and Ullrich, Peter. 2016. “Discourse, Power and Governmentality: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with and beyond

Foucault.”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by Jochen Roose. Springer.

[267] Benford, R. D., & Snow, D. A.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pp. 611-639.

[268] Voronov, M. (2014). “Toward a toolkit for emotionalizing institutional theory.” *Research on Emotion in Organizations*, 10, pp. 167-196.

[269] Andreas, Joel. 2007. “The Structure of Charismatic Mob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Rebellion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 pp. 434-458.

[270] Holland, Jeremy. 2014. “Narrative Fidelity to the Little Red Book 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Efforts of the Red Guard Movement: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Foundational Documents.” *Discourse & Society*. Vol. 25.3, pp. 383-401.

[271] 許愛晶。2011年。《清華蒯大富》。香港：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第53-63頁。

[272] 沈如槐。2004。《清華大學文革紀事》，香港天地圖書。

[273] 孫怒濤。2018。《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第322頁

[274] 周倫佐。2006。《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書屋，第12-36頁

[275] 徐友漁。1999年。《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第69頁。

[276] 印紅標。1992年。“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二十一世紀》10月號。

[277] 董國強。2015。“關於文革期間‘造反派’概念的幾點思考”。《昨天》第60期。

[278] 陳益南。2015。“對‘造反派’含義的幾點思考”。《昨天》第60期。

[279] 張光渝。2015。“定義‘造反派’”。《昨天》第60期。

[280] 周倫佐。2015。“略談‘造反派’定義”。《昨天》第60期。

[281] 何蜀。2007。“論造反派”。《華夏文摘增刊》第587期。

[282] 類別的意義：激=激進派，溫=溫和派，保=保守派。具體分類請參見下一節和附錄6。

[283] 由於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文革群眾運動中占據特別重要的地位，我們在討論省級群眾組織時把它們也包括在內。

[284] 楊繼繩。2016。《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香港：天地圖書。

[285] 徐友漁。1999年。《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86]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pp. 397-446.

- [287] Andreas, Joel. 2002.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1, pp. 463-519.
- [288] Walder, Andrew. 2006. "Factional Conflict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66-1968."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8, pp. 1023-1047.
- [289] Walder, Andrew.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M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90]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01.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pp. 1-26.
-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11.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pp. 425-447.
- 董國強。2012。"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
- [291] Forster, Keith. 1990.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E: Sharpe.
- [292] Perry, Elizabeth J. and Li, Xun.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293] Yang, Lijun. 2005.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Rise of Faction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tudies*, Vol 51, Issue 4, pp. 32-49.
- [294] Walder, Andrew.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M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95] 徐友漁。1999年。《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徐友漁。2000。"文革中紅衛兵的派別鬥爭"。《直面曆史》。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第139-211頁。
- [296] 印紅標。1997。"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第4期。
- [297] 向前。2012。"政治身份體系下的社會沖突——文革初期群眾行為的社會根源"。《記憶》第86期。
- [298] 另有4人因家庭出身未填寫不在分析之中。此外還有38人派別不明，我們在附錄7中進行了分析。
- [299] 另有40人未填寫家庭出身，以及派別不明的290人不在以上分析之中。我們在附錄7中對這些人進行了分析。
- [300] 何蜀。2005。" '文革'時期重慶群眾組織發展演變概述"。《華夏文摘增刊》第449期。
- [301]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pp. 397-446.

[302] Andreas, Joel. 2002.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1:463-519.

Walder, Andrew. 2006. “Factional Conflict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66-1968”. *The China Quarterly*, 188, pp. 1023-1047.

Walder, Andrew.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M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03] Perry, Elizabeth J. and Li, Xun.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p. 39-69.

[304]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01.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pp. 1-26.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11.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pp. 425-447.

董國強。2012。 “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

[305] Forster, Keith. 1990.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E: Sharpe.

[306] 有2人未填寫家庭出身。

[307] 沈如槐。2004。《清華大學文革紀事》。香港天地圖書，第115-117頁。

[308] 原統計表中自控系總人數可能有誤。“團派”111人，中間派61人，“四派”76人，該系總人數應為248，但表中是249，所以我們的總人數比原表總人數少1人。

[309] 以上孫怒濤先生的觀點和解釋是我們通過微信在2019年2月7日至8日間進行溝通的。

[310] 另有12人因家庭出身不明，所以不在分析之內。

[311] 孫怒濤。2013。《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312] 範雨臣。2018。 “激情年代的激情故事”。《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孫怒濤主編。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313]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pp. 397-446.

[314] 我們在《*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採用推論性統計方法計算了廣州紅衛兵的數據，得出家庭出身與派別有顯著關係的結論。

[315] 孫怒濤。2018。《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第513-515頁。

[316] 楊繼繩。2016。《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香港：天地圖書。第九章。

- [317] 武麗麗、趙鼎新。2007。“克裏斯瑪權威的困境：寧夏文革的興起和發展”。《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字第101期。
- [318] 周倫佐。2006年。《“文革”造反派的真相》。田園書屋出版社，第72頁。
- [319] 王芳。2008。《記憶中的底層文革：關於文革時期武漢“鋼工總”的口述歷史研究》。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320] 胡平。2016。“造反派為何鬧分裂、打內戰：寫在文革50周年”。《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73、174期。
- [321] 楊繼繩。2016。《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香港：天地圖書，第九章。
- [322] 王芳。2016。“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以滬、漢兩地為例（1966-1967）”。《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宋永毅主編。紐約：明鏡出版社。
- [323] 王芳。2008。《記憶中的底層文革：關於文革時期武漢“鋼工總”的口述歷史研究》。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324] 有 31 人未填寫家庭出身，實際分析人數 672。
- [325] 因該問題可多項選擇，所以 Y8 小於或等於 Y2+Y3 之和。
- [326] 王芳。2008。《記憶中的底層文革：關於文革時期武漢“鋼工總”的口述歷史研究》。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327] 周孜仁。2017。“雲南‘摧資兵團’的申明和組織章程”。《昨天》第98期。
- [328] 無名。2018。“八枚湖南湘江風雷像章”。下載自《地方史文革交流網》。
- [329] 葉青。2018。“文革時期紅衛兵組織之特征——以福建紅衛兵組織為個案的分析”。下載自《地方史文革交流網》。
- [330] 孫怒濤。2018。《真話與懺悔：文革 50 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第 572 頁、590 頁。
- [331] 陳益南。2006。《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第 52 頁。
- [332] 本節參考資料還基於：杜鈞福。2015。“文革十大武鬥事件置疑”。《地方文革史交流網》。佚名。2012。“文革最慘烈的十大武鬥”。《華夏文摘增刊》第 859 期。
- [333] 本節參考材料還有：劉世秀。2014。“河街居民遭遇八八海戰”。《昨天》第 35 期。李彤。2016。“1967：荒唐慘烈的重慶‘八·八海戰’”。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025/16/2369606_601270195.shtml
- [334] 陳益南。2006。《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335] 楊里克。2012。“殺個人比殺只雞還容易”。《昨天》第3期。
- [336] 陸小寶。2009。“複原清華百日武鬥的真實面貌”。《倒下的英才》。唐金鶴。香港：華圖書出版公司。
- [337] 孫怒濤。2018。《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 [338] 楊繼繩。2016。《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香港：天地圖書。
- [339] 該職業中女性受整高於男性。

- [340] 原因同上。
- [341] 因為有8人未填寫性別，所以比調整前的人數少。
- [342] 調整方法與前面章節調整民眾參加群眾組織的比例相同（參見附錄8）。
- [343] 因為有受訪者未填寫出身、政治面貌等，所以模型分析的總人數略少於參加群眾組織的總人數。
- [344] 杜鈞福。2018。“文革史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探討”。《華夏文摘增刊》第1147、1148期。
- [345] 許愛晶。2011年。《清華蒯大富》。香港：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第463頁。
- [346] 孫怒濤。2018。《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134頁
- [347] 何蜀。2007。“論造反派”。《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520頁。
- [348] 孫怒濤。2018。《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481頁。
- [349] 何蜀書。2007。《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521頁。
- [350] Walder, Andrew.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M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260.
- [351] 孫怒濤。2018。《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第323頁
- [352] 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 1902-1978）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傳播學者。
- [353] 這是孫怒濤先生應作者邀請專為本書寫的感言。孫怒濤，生於1942年，著名文革研究學者，1960年進入清華大學學習，後留校任教，1980年調入浙江省計算技術研究所，1999年退休，著有回憶錄《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關頭的心路歷程》（2013），主編《曆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2015），《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2018）。
- [354] 老田。2014。“老田談造反派的派性鬥爭與大聯合問題的經驗教訓——武漢水院張建成老師文革回憶錄《歲月留痕》的讀後感節錄”。《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 [355] 蔡新平。2018。“文革研究者之問-地院問什麼沒有發生武鬥？——記‘高安鄭’在文革中的巨大作用”。《昨天的記憶-北京地質學院文革往事記述》蔡新平編。
- [356] 喬晞華、張程。2014。《傲慢與偏差——66個有趣的社會問題》。北京：新華出版社。
- [357] 這是王複興先生應作者邀請為本書寫的感言。王複興，著名文革研究學者，生於1943年，1965年考入北京大學，1970年畢業，主要著作有《搶救記憶：一個北大學生的文革回憶錄》（2016），《回顧暴風雨年代：北大文革親曆者文集》（2018）等。
- [358] 右傾機會主義的“機”。
- [359] Tolbert, Pamela S. and Hiatt, Shon R.. 2009. “On Organization and Oligarchies: Michel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Classical Foundations, ed., by Paul Adler.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9535231.003.0008.

[360] 孫怒濤。2018。《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第565頁。

[361] 樊思清。2018。“我要反思”。《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孫怒濤主編。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第310頁

[362] 許愛晶。2011年。《清華蒯大富》。香港：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第476頁。

[363] 阿陀。2016。“文革造反派頭頭評毛”。美國加州洛山磯《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

[364] 摘自王複興為本書寫的感言。

[365] 摘自嚴家祺先生為本書寫的感言。

[366] Porta, Donatella D. and Diani, Mario.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367] Mahmoud, Abdesselem. 2015. “Social Movements in Tunisia and Egypt: A Tale of Two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3, No. 3.

[368] Shatin, Emadel-Din. 2012.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The Power of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Spirit of Tahrir Square.”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3, pp. 46-69.

[369] Adorno, T. W. 1991.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 by J. M. Bernstein. London: Routledge.

[370] Meyer, David. 2004. “Prote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2004. 30:125-45.

[371] Eisinger, P.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pp.11-28.

[372] Tilly, C.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373] Smith, Jackie and Fetner, Tina. 2010. “Structural Approaches in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Handbook of Social Movements across Disciplines*, eds., Bert Klandermans and Conny Roggeband. Springer, pp. 13-57.

[374] Beck, Colin J. 2008.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o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Sociology Compass*, 2/5, pp. 1565-1581

[375] Kurzman, Charles. 1996. “Structural Opportunity and Perceived Opportunity in Social-Movement Theory: The Iranian Revolution of 197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pp. 153-170.

[376]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Adam, Doug, Tarrow, S. & Tilly, C.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77] Kurzman, Charles. 1996. "Structural Opportunity and Perceived Opportunity in Social-Movement Theory: The Iranian Revolution of 197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pp. 153-170.
- [378] Leenders, Reinoud and Heydemann, Steven. 2012. "Popular Mobilization in Syria: Opportunity and Threat, and the Social Networks of the Early Riser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17:2, pp. 139-159.
- [379] Shahin, Emadel-Din. 2012.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The Power of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Spirit of Tahrir Square."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3, pp. 46-69.
- [380] Diani, Mario. 2002. "Social Movements, Contentious ac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From Metaphor to Substance'?" *Social Movements Analysis: The Network Perspective*, eds., by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81] Wellman, B. 1988.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edited by Barry Wellman & S.D. Berkowitz. Cambridge
- [382] Newman, Mark,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and Duncan J. Watts. 2006.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Network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rabási, Albert-László. 2003.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lume.
- [383] Barnett, Emma. 2011. "Facebook cuts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to four." *Telegraph*. November 22.
- [384] Bakhshandeh, Reza, Samadi, Mehdi, Azimifar, Zohreh, and Schaeffer, Jonathan. 2011. "Degrees of Separ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Fourth Annual Symposium on Combinatorial Search*.
- [385] Yang, Guobin.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386] Salter, Lee. 2003. "Democracy,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Internet."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by Martha McCaughey and Michael D. Ayer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387] Tökés, Rudolf L. 1974. "Dissent: The Politics for Change in the USSR."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1970's*, ed., by Henry W. Morton, Rudolf L. Tökés and J. N. Hazar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388] Tarás, G. M. 1993. "The Legacy of Dissent".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4th May, pp. 14-19.
- [389] Smith, Jackie and Fetner, Tina. 2010. "Structural Approaches in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Handbook of Social*

Movements across Disciplines, eds., by Bert Klandermans and Conny Roggeband. Springer, pp. 13-57.

[390] 所需樣本數量的計算採用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總監察長辦公室（OIG）發布的 Rat-Stat 軟件。該軟件普遍用於美國醫保等方面的審計工作，可以在以下網址免費獲得。<https://oig.hhs.gov/compliance/rat-stats/index.asp>

[391] 本節採用的數據來自維基百科和百度百科。

[392] Aldenderfer, Mark and Blashfield, Roger. 1984. *Cluster Analysis*. Newbury,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p. 7.

[393] 聚類分析（Cluster analysis，也譯為集群分析）。Tryon, K..1939. *Cluster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

[394] Sokal, Robert and Sneath, Pepter. 1963. *The Principles of Numerical Taxonomy*. San Francisco, CA: W. H. Freeman.

[395] Tan, Pang-Ning, Steinbach, Michael, and Kumar, Vipin. 2005. *Introduction to Data Mining*. Pearson Addison-Wesley, pp. 487-568.

[396] 均值聚類法（K-mean），凝聚層次聚類法（Agglomerativ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密度聚類算法（Density-based clustering algorithm，簡稱 DBSCAN）

[397] Zhang, Joshua, Brody, Chalres J., and Wright, James D. 1994. “Soci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Fuzzy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Review*, Vol. 2, No. 2, pp. 171-186.

[398] 數學上有序數值稱為連續函數。

[399] 計算採用 SAS 軟件（即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統計分析軟件）。

[400] SAS. Chapter 33: The Cluster Procedure, pp. 2060-2061.
<http://support.sas.com/documentation/onlinedoc/stat/131/cluster.pdf>

[401] 徐友漁。1999年。“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第78頁

[402] B是“保”字拼音的第一個字母。以下J和W分別是“激”和“溫”字拼音的第一個字母。

[403] 本節參考資料還有：“長春公社”“首都紅衛兵”。1967。“一九六七年春城文化大革命簡介（1967.8）”。《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水陸洲。2018。“吉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第三十七節）”。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404] 華北地區群眾組織簡況參考資料：余汝信。2004。“文革旋渦中的38軍”。網絡雜誌《楓華園》第439、440期。齊晉華。2011。“齊魯三年梟雄王”。《地方史文革交流網》。要寶鐘。2013。“《洪流三部曲》之二：河北保定文革史略”。《地方史文革交流網》。石名崗。2018。“文革在山西”。下載自《地方史文革交流網》。吳迪。2010。“從前門飯店會議到兩派之爭”。《地方史文革交流網》。

[405] 但是其代表筆者暫時未能對上號，有待於今後進一步補充。

[406] 按照通常簡稱的規律，不知“紅”和“站”二字從何而來。

[407] 本節參考資料還有：徐志高。2016。《文革史稿：文革史料匯編（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下）》。世界華語出版社。

[408] 翁森鶴是浙江聞名的“老造反”，原屬於“紅暴派”。武鬥被抓後，改變立場，“紅暴派”的人視他為政治扒手。參見徐永良2016。《獨立評論》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50752>

[409] 本節還參考了以下資料：一丁。2016。“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地方文革史交流網》。無名。2018。“江西‘大聯籌’與江西‘聯絡總站’”。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410] 1959年，中國許多地區饑荒大面積出現並蔓延。河南省信陽地方政府採取封鎖消息的措施，嚴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現人吃人的現象。信陽地區從發生缺糧現象到大批餓死人，前後持續半年之久。從中共中央著手調查到災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終對責任者處理則到了1961年初。整個事件最終成為大饑荒時期典型的地方饑荒事例。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411] 江西省內最大的軍用航空工業企業、原代號為“320”廠的洪都機械廠一個車間的檢驗工。

[412] 本節還參考了以下資料：葉青。2004。“文革時期紅衛兵組織之特征——以福建紅衛兵組織為個案的分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總第127期）。劉國凱。2006。《人民文革論》。香港：博大出版社。晏樂斌。2012。“廣西文革紀略”。《炎黃春秋》第11期。宋永毅。2013。“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真相”。《縱覽中國》11月4日。中共南寧市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1987。“南寧市文革大事件”。2018年下載自《文革地方史交流網》。水陸洲。2018。《文革簡論》（第四十六節福建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葉曙明。2018。“廣州紅衛兵的誕生”。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葉曙明。2018。“造反派的末日”。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葉曙明。2018。“廣州文革研究文章匯編”。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余汝信。2018。“趙紫陽與廣東文革”。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413] 即珠江電影制片廠。

[414] 在《炎黃春秋》2012年11期中，當年參加廣西清查的公安部幹部晏樂斌也寫文章揭露了相近的數字：廣西全省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萬人”，“另外，全區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由此可見，中共的內部檔案中的真相比公開出版物中的“曆史”要真實得多。當然，民間調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還要更高一些，有近20萬之多。

[415] 宋永毅。2016。“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55期。

[416] 本節還參考了以下資料：武麗麗、趙鼎新。2007。“克裏斯瑪權威的困境：寧夏文革的興起和發展”。《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字第101期。白磊。1999。“從奪權到軍管——1967-1968年陝西省武鬥”。《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52期。田玉振。2018。“文革狂潮（十五）西安造反派在奪權中分裂加劇”。下載自《田玉振博客》。蘆學舜。2010。“銀川紅衛兵運動述略”。《銀川黨史網》05-26。無名。2018。“文革紀實：寧夏派系鬥爭”。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寧夏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各戰鬥團聯合指揮部東方紅六盤山（《八一三紅衛兵》）1967。“六盤山下風雷激——寧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介”。2018年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水陸洲。2018。《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論》（第十五節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水陸洲。2018。《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論》（第十一節寧夏回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白磊。2018。“文革時期陝西各地區造

反組織派別”。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冼恒漢。2018。《風雨八十載》節選。下載自《中國文革研究網》。

[417]. 本節參考資料還有：何蜀。2009。“四川省與重慶市革命委員會中的重慶兩派群眾組織代表名單”。《記憶》第14期。王銳。2012。“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四川省社科院《當代史資料》第1期。何蜀。2018。“文革時期重慶群眾組織發展演變概述”。下載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鄧振新。2018。“貴州文革大事記”。下載自《文革地方史交流網》。無名。2018。“文化大革命記實（5）成都的派性鬥爭”。下載自《360個人圖書館》。